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蒙巴顿



作者前言

星移斗转，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已半个世纪了。在那场空前残酷、惨烈的战争中，参战各国都涌现出一批文韬武略、能征善战的著名将领。英国著名军事家路易斯·蒙巴顿就是这样一位声名卓著的战将。

蒙巴顿的一生颇富传奇色彩。1900年6月25日，他生于英国温莎的王室家庭。曾祖母是英国女王维多利亚。父亲巴登堡亲王路易斯原系德国王室成员，后放弃德国国籍，参加英国皇家海军，曾任海军参谋长兼第一海务大臣。由于优裕的生活条件和良好的家庭教育，蒙巴顿从小就能说流利的德语和法语。13岁时，他便按照王室子弟正常的成长道路走进了奥斯本皇家海军学校。然而，他的人生之路刚刚起步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蒙巴顿的父亲因原籍为德国，在英国国内一片反德声浪和极不信任的气氛中，被迫辞去了在皇家海军里的一切职务。当时，少年蒙巴顿也因此备受歧视、屡遭侮辱。不幸的境遇极大地刺激了他的进取心，从此一改往日悠闲贪玩和懒散的习惯，刻苦攻读，进步飞速，最后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达特茅斯海军学院，成为一名正式的海军军官。

加入皇家海军后，蒙巴顿先后在“雄狮”号、“伊丽莎白女王”号、“复仇”号等战列舰任初级军官。1927年起在地中海舰队任无线电通讯军官，有过20多项发明和改进措施，工作极为勤奋。1934年，他出任“勇敢”号驱逐舰舰长；1939年8月，担任“凯利”号新型驱逐舰舰长。二战全面爆发后，蒙巴顿指挥“凯利”号驱逐舰参加了克里特岛海战，击沉了德国“凯克”号等舰艇多艘。1941年5月，“凯利”号驱逐舰被德国飞机击沉，但蒙巴顿幸免于难。

1941年10月，英国首相兼国防大臣丘吉尔任命蒙巴顿为联合作战总部负责人，并指示他为进攻欧洲的登陆作战和而后向大陆推进的作战提出指导思想，训练两栖作战部队。1942年8月，蒙巴顿指挥部队对法国西北部的迪耶普港实施了试探性袭击，这次登陆行动虽然失利，但为后来盟军诺曼底登陆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所以，在1944年6月诺曼底登陆成功之后，丘吉尔、马歇尔等人致电蒙巴顿称：“我们知道登陆作战的妙计和这次冒险的成功，都与你和你曾领导的联合作战总部的参谋人员的努力分不开。”

1943年8月，美英首脑在魁北克会议上决定，组建东南亚盟军司令部并由蒙巴顿出任最高司令，统一指挥盟军的作战行动。10月，蒙巴顿前往印度德里就任新职，而实际上，他的主要作战方向是缅甸。1944年初，日军驻缅方面军先后对若开和英帕尔地区发动进攻，蒙巴顿数次飞抵前线指挥战斗，使战局转危为安，并取得这两次战役的重大胜利。

至1944年底，蒙巴顿所辖的东南亚盟军多达至百万。蒙巴顿不失时机地制定盟军反攻计划。盟军既从北缅向南推进、亦从西部向中部进攻。蒙巴顿指导英印军队突袭敏铁拉、夺取曼德勒，最后于1945年5月收复了缅甸首都仰光，此后，蒙巴顿立即准备发起“拉链”战役以收复马来亚，但因美军对日本投掷原子弹而未能完全如愿。

1945年9月，蒙巴顿在新加坡接受东南亚日军的投降。

战争结束后，他被英王加封为“缅甸的蒙巴顿伯爵”。1947年3月至1848

年 6 月出任印度总督。任内提出关于印度独立的“蒙巴顿方案”并于 1947 年 7 月获得英国议会批准。该方案导致印巴分治及其两国为一些遗留问题的长期纠纷。1948 年蒙巴顿返回英国海军任职。先后担任英国地中海舰队第一巡洋舰队司令、第四海务大臣、地中海舰队总司令等职。1955 年至 1959 年，出任英国海军参谋长兼第一海务大臣。

1956 年，晋升为海军元帅。1959 年，出任国防参谋长和参谋长委员会主席。任内积极推行英军改革计划，重建有权威的国防部而撤销各军种的总部，使英军的指挥系统更有效能和集中统一。1965 年，退出现役后，积极参与各项公共事务。1979 年，被爱尔兰共和军暗杀。

蒙巴顿戎马生涯 50 年，他能在同辈人中出类拔萃，最重要的一点是他有别人无法同他相比的敬业精神。从他 13 岁入海军学校那一天起，他就决心将自己的毕生贡献给海军事业，尽管他的理想多次被打断，但这种矢志不渝的精神，决定了他在其他方面也能取得巨大的成就。蒙巴顿有显赫的贵族地位，也很富有，但这些都成为他的枷锁，一生仍勤奋、努力地工作，这是难能可贵的。

蒙巴顿的另一大特点是顾全大局。他几次被调离他所心爱的海军事业、制定的几次作战计划被抛弃或被束之高阁，他也因此而苦闷和烦恼过，但是，他能着眼于大局，接受现实，从未因不合自己的心愿而消沉过。

他在军事指挥上的优点是注意分工合作、发挥将领们的各自特长，而自己则提出总的指导思想。譬如，在东南亚战区，蒙巴顿规定：组织单一军种的行动，陆、海、空的作战计划处长直接向各自的军种司令报告即可；组织诸军种的联合行动，则必须以计划委员会的名义向他本人报告。他提出的东南亚盟军作战指导思想主要有：当日军在丛林地带实施惯用的侧翼包围战术时，盟军应坚守阵地而不能向补给线方向撤退，补给问题通过空投解决；乘日军认为雨季双方都会停火而无准备之机，实施雨季突击而扩大战果等。这些新的指导思想，为取得几次重大战役的胜利，都起了重要作用。

蒙巴顿善于鼓舞士气也是他的一大优点。他极端蔑视高级司令部人员不与前线官兵接触的现象，所以，他能放下王室成员的架子，经常深入所属部队视察、访问、发表演讲，同各级军官和士兵会面、交谈，让每一个部属都认识他，了解他，从他身上获取力量和信心。从而，使他在官兵中享有崇高的威望。

蒙巴顿的个人品质，也是口碑甚好的。他慷慨大方，忠诚可靠，为人排忧解难不辞辛苦。他心地善良，喜欢所见过的所有人。他讲究礼节，做事周到，善于体贴人。他有惊人的忍耐力，总是随时准备听取他人的意见，到了老年思想僵化时也是如此。他是一个实干家，从不知道什么叫绝望而是随时准备从失败中爬起来，并重整旗鼓。他总是以最大的自信力去确定前进的目标，并选择能够达到这一目标的最佳途径，然后坚韧不拔地干下去。

然而，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与许多著名人物一样，蒙巴顿也有自己的弱点和不足。1973 年，他的好友朱克曼告诉蒙巴顿说，他正在写一篇有关他的文章，蒙巴顿表示非常高兴：“没有谁比你更了解我了。也没有谁能像你一样最有效地揭露我的缺点，因为没有任何东西是完美无缺的。”是的，蒙巴顿并不完美无缺；他的虚荣心很强，升官欲、特别是对获得皇家海军的高级职位的欲望，一直十分强烈；在生活 and 事业上，他是一个奔放不羁的男人，引起过人们的议论；在工作中有时过于急躁或受环境的影响，一定程度

上遭到过某些同事们的嫉恨，等等。但正像英国著名传记作家菲利浦·齐格勒所说：“记住，无论如何，他是一位伟大的人物。”

岁月流逝，蒙巴顿与他经历的那场战争离我们越来越远了。为了使我国读者对蒙巴顿的一生有一个全面而客观的了解，我们倾尽所能，将有关他的历史资料加以积累和整理，撰写了这本书。我们力求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真实而又形象地把蒙巴顿介绍给大家，但是由于资料与能力水平所限，难免有不当之处，欢迎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吕德宏 赵建中

1994年12月15日

第一章 皇族子胥

皇室渊源连全欧，王侯伯爵皆亲友；

二代军旅功业建，陆将海帅显身手。

提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风云人物，路易斯·蒙巴顿勋爵是多姿多彩、独具特色的名将。朱可夫、艾森豪威尔和隆美尔之所以声名显赫，不仅是由于杰出的帅才，也得益于令人钦敬地在没有任何世家基础和军界背景的情况下，从士兵走到军界的顶点并取得了辉煌的战绩。当然，出身显赫军人世家的巴顿将军和麦克阿瑟并不因家庭背景的关系而冲淡了给人们留下的深刻印象，毕竟，人们看一个人，主要是看他本人的素质，看他在困难、危险境地的表现，对于一个军人，特别要看他在和平时期和战争时期的作为。然而，对于蒙巴顿，一切都是那么的不同。

路易斯·蒙巴顿是巴登堡的路易斯亲王和维多利亚公主的第四子。皇室成员的出身给蒙巴顿带来了难以想象的机会，比如说，在剑桥大学学习时，他可以随随便便地请丘吉尔到他所在的俱乐部里参加讲演；但是这一身份也给他带来了一种天然的阻力，他的每一步晋升都会招致各种各样的猜测和议论。那些久经风浪的皇家海军官兵们曾这样在背地里议论：“难道要把价值数千万英镑的战舰交给一个生下来就带有军官臂章的皇家小崽子吗？这太不可思议了！”蒙巴顿必须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他不仅能够指挥一艘战舰，而且的确比其他皇家海军军官更优秀，因此可以超越他们而成为海军元帅。

蒙巴顿做到了。他一向为自己的皇家血缘感到荣耀，难能可贵的是，他为英国皇室带来了更大的光荣。

英国前内阁大臣亚特利伯爵曾这样评论：“蒙巴顿家族是皇室中唯一显示了伟大才干的成员。”显然亚特利可能对英国皇室不太友善，但这番评论对蒙巴顿家族却是完全正确的。蒙巴顿家族是英国最重要、最显赫的家族之一，这不是由于它与英国皇室的关系，而是由于蒙巴顿家族的两代人，路易斯亲王和蒙巴顿勋爵所拥有的智慧、雄心和能力。

蒙巴顿家族也是英国最不受欢迎的家族之一。虽然他们在近100年的时间里为他们所选择的国家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但他们却并不讨人喜欢。部分原因是传统的英国人来说，再也没有什么比看到皇家成员表现出创造性这样的事更令人难以忍受了。但更主要的还是因为蒙巴顿勋爵一旦认为应该

作某一件事，他就会不可阻挡地去干，不管这件事或者他做这件事的方式是否伤害了别人。

不同的人对蒙巴顿持不同的看法。有些人认为蒙巴顿是个可恶的家伙，“能量巨大而又野心勃勃，是个非常危险的人物，他已经攫取了国防机构的控制权，正在向王位靠近，他实际上是个社会主义者”。然而，那些曾在他的指挥的“凯利”号军舰上服过役的官兵，那些曾在东南亚和印度在他手下工作过的人员，他的侍从和得到他精心照顾过的人，对蒙巴顿持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看法。

这两种看法都只在部分上是正确的。蒙巴顿傲慢自负，没有幽默感，极具野心，他内心燃烧着一团不可熄灭的复仇之火，即要为他父亲路易斯亲王所蒙受的痛苦讨回公道。他在追求一个目标时是冷酷无情的，虽然那些目标一般说来都是正当的。

但是，蒙巴顿是卓越的领导者，忠诚、无畏、怜爱下属，尤为罕见的是他既是一个杰出的海军技术专家，同时又是一位富有远见和想象力的政治家，他具有令人目眩的创造力。他是一个虔诚的英国人，是个真正的男人。

蒙巴顿家族几乎与欧洲每一国的皇室都有密切的血亲关系。在 1958 年私人出版的《蒙巴顿家谱》一书中，蒙巴顿认为自己是公元 600 年兴盛起来的法兰西贵族伊道夫公爵的第四十一代玄孙。他不厌其烦地从伊道夫公爵起将家谱推演到他本人。蒙巴顿的一位朋友说他“对祖先的兴趣就像集邮的人对邮票的兴趣一样”。

尽管巴登堡—蒙巴顿家系尊贵而久远，但是巴登堡这个名称本身却是蒙巴顿的祖父赫西和莱茵的亚历山大亲王于 1851 年创下的，巴登堡家族的起源相当浪漫。1841 年春天，赫西和莱茵大公路易斯二世的长女玛丽公主与沙皇尼古拉一世的长子订婚。

为了减轻玛丽公主的寂寞，尼古拉沙皇邀请玛丽的二哥，也是他的教子亚历山大王子陪同玛丽公主从德国来到圣彼得堡。在圣彼得堡，玛丽公主与未来的俄皇亚历山大结婚。亚历山大王子留着一撮小胡子，打扮得像个花花公子，不过他的脸棱角分明。他身材不高，但却精神十足，向往军人的荣誉。尼古拉沙皇发现了这一点，于是把他的教子封为俄罗斯帝国的中尉。当亚历山大王子来到圣彼得堡时，他的教父又将他提拔为上校。旋即又提升为少将。

很自然，亚历山大王子爱上了沙皇的女儿，但尼古拉一世却对他的女儿另有安排。因此，伤心的亚历山大离开了冬宫，作为志愿者上了战场。战争是对不成熟的少年之爱的一个很好的代替物，亚历山大在血与火的考验中证明了自己是个男人，他因作战勇敢而荣获四等圣乔治勋章。回到圣彼得堡后，亚历山大王子发现她的妹妹多了一位迷人的女伴，波兰女伯爵朱丽·豪克。朱丽是个孤儿，她的贵族血统的母亲很早就去世了，他的父亲豪克伯爵是位将军，为保卫尼古拉沙皇的弟弟、波兰的康斯坦丁大公而死，于是沙皇将她收养在冬宫。

朱丽长得非常美丽，聪慧善良，富有性格力量。亚历山大王子一见钟情。在近 10 年的时间里，亚历山大已接近了俄罗斯帝国军队的顶峰。在一幅于 1851 年绘制的油画描绘了他率领俄罗斯大军接受沙皇检阅的情景。尼古拉一世为了表示对亚历山大王子的钟爱，决定要把自己的侄女嫁给他。亚历山大表面唯唯诺诺地表示了对这个荣誉感激，暗地里却与朱丽在一个风雨

交加的午夜狂奔出冬宫，先是骑马，后来坐火车，越过了俄国边界。1851年10月18日，他们于布莱斯劳结婚。尼古拉一世闻此大怒，立即解除了亚历山大的将军职务，并将他开除出俄军。80年后，希特勒的特务头子希姆莱读了德国秘密警察保存的蒙巴顿及其家庭的档案后说：“这就是为什么蒙巴顿家族的行为举止总是有些与众不同的原因。”

对于这位感情用事的年轻王子来说，幸运的是他严厉的父亲已于3年前去世，他哥哥路易斯三世大公执掌着赫西—达姆斯泰特。虽然对亚历山大的私奔很不满意，但路易斯三世是个和善的绅士，他决定把它变成一件好事。路易斯大公在文件里找到一个长期未用的头衔封给了他的弟妹，1851年11月5日，朱丽获得了巴登堡伯爵的称号，巴登堡是群山之中一个无关紧要的小镇。几年之后，朱丽生了一个女儿和几个漂亮的儿子，路易斯大公又将她提为巴登堡王妃，她的儿子由此成为王子。

由于亚历山大作过俄军少将，因而他的表弟奥地利皇帝弗朗兹—约瑟夫任命他为奥军少将，统领骑兵旅。令人惊异的是，虽然命运总是把他放在失败者的一边，但亚历山大王子却在战争中显示出自己是个杰出的将军，为表彰他的战功，奥皇将他晋升为中将，并授予他奥地利最高荣誉勋章。1862年，亚历山大退休，带着他的一家人来到了斯洛斯·海利森堡。这是亚历山大在13岁时继承下的一块领地，它处于赫西—达姆斯泰特的中心。海利森堡坐落在长满松树的山谷里，空气清新，湖水清澈，宁静秀丽。这是朱丽的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家。此时她与亚历山大已有5个孩子：1个女儿，4个儿子，蒙巴顿的父亲路易斯亲王是长子，于1854年出生于奥地利的格雷兹。虽然路易斯亲王后来成了英国人并改成了英国名，但他认为海利森堡是他的“家”。

路易斯亲王8岁时来到海利森堡，在这一共住了6个夏天（冬天他全家到达姆斯泰特的亚历山大宫住），除了星期天在教堂的活动索然无味之外，其他的时间都快乐无忧。他们在自己家的森林里钓鱼、打猎、骑马。海利森堡宾客不断，来自奥地利和法国的大臣的孩子们和来自全欧各国皇室的表兄弟们在—块玩耍，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至少会三种语言，彼此之间用英语、法语或德语聊天。

1866年夏天，路易斯亲王12岁那年，海利森堡平静的生活被打断了一阵。普鲁士首相俾斯麦雄心勃勃，对奥地利宣战。亚历山大奉命率领来自萨克森尼、汉若威和赫西的联合部队与普军作战。亚历山大很清楚自己所带的联军是拼凑起来的，根本不是训练有素的普军的对手。果不其然，亚历山大又一次光荣地战败而归，这次他彻底退休了。在军旅生活中，他的勇敢和才能至少赢得了25枚来自各欧洲国家的勋章。后来英国人认为巴登堡的路易斯亲王是必定亲德的，然而对路易斯亲王的童年生活构成了第一次威胁的却正是普鲁士。12岁的路易斯亲王已经很清楚自己将来的职业是什么，他的这一决定在当时的环境里是很不寻常的。路易斯亲王很喜欢他表哥的妻子，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二女儿艾丽丝公主。艾丽丝对他未来的职业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每当在一起时，他们都用英语谈英国，艾丽丝认为皇家海军是世界上最荣耀的组织，路易斯常常痴迷在艾丽丝关于那些威武的战舰和勇敢的水兵的故事里，不知不觉中几小时就过去了。路易斯对艾丽丝的哥哥，艾登堡的阿尔弗雷德伯爵特别感兴趣，后者已决定加入皇家海军。不久，阿尔弗雷德来看望他的妹妹，路易斯第一次见到了一位标准的大不列颠水手：阿尔

弗雷德身材高大，蜂腰阔背，身着蓝色的皇家海军制服，肩扛金黄色的上尉肩章，两只蓝眼睛炯炯有神。阿尔弗雷德向路易斯讲述了大海和战舰，舰炮的轰鸣和昔日的大海战，水手的传统和海上生活的乐趣与磨难，谈到了正在为维多利亚女王的海军建造的新型铁甲舰，以及作为皇家海军军官的荣誉。路易斯亲王听得如痴似醉，在阿尔弗雷德离开达姆斯特之前，他已决心要成为一名水手。

虽然此时的路易斯亲王还是个举止文雅的小绅士，但他一旦决定要做什么，阻止他是不可能的。亚历山大和其他德国亲戚都觉得路易斯的这个决定荒唐可笑，劝他说整个德国就没有一支值得一提的海军，而德国陆军却是欧洲最精锐的，那才是他要去的地方。路易斯亲王不可动摇地再次表达了自己要在海上获得光荣的决心。

在这种情况下，他的父亲亚历山大建议他加入奥地利海军，在那里，路易斯的伯父弗朗兹·约瑟夫皇帝会为他安排好一切。路易斯亲王干脆回答说，既然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在英国，他为什么要去奥地利加入一个二流海军呢？亚历山大耐心地继续劝他：“这样的话你就得放弃德国国籍而成为一个英国人。”

路易斯亲王恭敬地回答说：“先生，我正打算这么做。”

1868年秋初，路易斯已14岁半，达到了进入皇家海军所需要的年龄。9月25日，他的父亲陪同他动身前往英格兰。在英国的一所预科学校里，教师对路易斯进行的考试表明，除了英语之外，路易斯在所有其他方面都超过了同龄英国学员。1868年10月14日，路易斯来到高斯普特在公证人前宣誓效忠于大不列颠及爱尔兰女王，成为英国公民。之后，巴登堡的路易斯亲王作为海军军校学员加入皇家海军，并被分到驻泊于朴茨茅斯的“胜利”号军舰。

皇室血缘为路易斯的海军学员生涯打开了通路，最早的一个迹象是他被邀请至英国海军部办公大楼与舰队司令共进晚餐。不久，路易斯被提名为海军军官后补生至“艾亚尼”号军舰服役，陪同威尔逊亲王（下任英国国王）游历地中海。1869年5月“艾亚尼”号巡航结束返回英国，在这次出航中，路易斯初步领略了海上生活的艰辛，开阔了视野，雄心和梦想使他积极地克服了各方面的困难，适应老水手们津津乐道的那种生活，更有意义的是，威尔逊亲王非常喜欢他的这个亲戚，这对路易斯的前途产生了重大影响。休假回来后，路易斯被分配到皇家“艾尔弗雷德”号，这是当时英军舰队里最新的战舰之一。

从路易斯亲王到蒙巴顿勋爵，蒙巴顿家族在皇家海军服役了近百年，在这期间海上战争发生了两次革命：父亲经历了第一次，无畏战舰取代了木制护卫舰；而儿子经历了第二次，航空母舰取代了无畏战舰。

皇家“艾尔弗雷德”号原设计是木制舰，在制造过程中，由于在美国内战中铁甲舰显示出了优越性和威力，并受法国铁甲舰的威慑，改装为铁甲舰。1869年，它成为不列颠分舰队的旗舰。路易斯在皇家“艾尔弗雷德”号上服役了4年又7个月，在4年的海上生活中，他熟悉舰上的各种装备，出色地完成了任务，摸熟了大海和战舰的脾气，这些经历使他在成为高级军官后，能像一个老练的骑手凭着直觉判断其坐骑的能力一样，很好地把握住其舰队的状态。就这样，通过实践，通过尝试和失败，经过总结，路易斯学会了在巨浪里控制住八桨鲸形船，学会了在危机中控制别人，更重要的是知

道了怎样在各种环境中控制自己。

皇家海军的生活不全是劳累和辛苦，也充满了乐趣。在皇家“艾尔弗雷德”号上，路易斯交了许多终生的朋友，他得到了昵称“P.L.”，这个昵称一直陪他度过了整个海军生涯。路易斯在舰上作了许多画，这些画反映了水兵的生活，水平非常高；他还用钢琴给尼克尔森上校伴奏，上校洪亮的声音总是吓跑附近的海鸥。在舰上他的级别很低，在岸上则是尊贵的王子。巴巴道斯的一份报纸曾作过这样的报道：“巴登堡的路易斯王子，奥地利和俄国皇帝的兄弟，正在旗舰上作军官候补生。”1872年9月，路易斯与他的同伴开车游历了美国，最西到达了圣路易斯。这次旅行对他很重要，因为当时的许多英国高级官员不信任并讨厌美国。

1874年1月，路易斯回到达姆斯泰特，家人几乎认不出这个高大的年轻人。返回英国后，他被分到“威灵顿”号港口护卫舰上服役一个月，为晋升作准备，不久即以该舰历史上最好的成绩通过了考试，舰队司令对他所作的非常专业的航海日志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由此，路易斯亲王成为海军中尉。

在英国停留期间，一段没有结果的恋情增添了路易斯的生活经验，他爱上了一位伯爵的女儿，一个真正的爱尔兰美人怀特小姐。路易斯向怀特小姐求婚，怀特小姐很痛快地答应了，她也爱上了英姿勃勃、前程无量的路易斯中尉。路易斯在求婚这件事上没有征求家人的意见，因为他一向对皇室之间的联系漫不经心，他认为自己不过是一个海军中尉，也希望别人这么看他。所以，当他得知家人和那些皇室宗亲激烈的反对意见时，大吃一惊，反对这件婚事的人包括威尔士亲王和维多利亚女王。没有资料来说明这段恋情是如何结束的，不过性格因素是找到答案的关键。路易斯是个具有高度的忠诚和荣誉感的人，他根本不会顾及出身的差异，并且还非常倔强，很难想象他会屈服于这些压力。合理的推断是怀特小姐主动解除了婚约，因为爱尔兰高傲而敏感，特别是当涉及到它所屈就的英格兰时，会特别的敏感。英国皇室的反对深深地伤害了怀特小姐的自尊心。

为了奖励路易斯在炮兵学校的优异表现并使他摆脱各种诱惑，威尔士亲王命令路易斯中尉陪同他游历印度。在此期间，路易斯的绘画作品在报上发表，他由此挣了一笔钱并成为水彩画协会的荣誉成员。1876年5月，他拒绝了威尔士亲王的再次邀请，并拒绝了普鲁士议会给他的一个王位，奉命前往“塞莱比斯”号军舰，因为“英国军舰的甲板就是他的家”。同年5月，路易斯晋升为海军上尉，7月，转役于地中海舰队的“撒尔坦”号军舰。1877年，沙皇为争夺不冻港并取得地中海的出海口对土耳其宣战，路易斯随地中海舰队一道经历了战争的边缘，第一次感受到了战争的气氛。1880—1883年，路易斯随舰队远航到远东、南美和非洲，5年的海上生活使路易斯获得了关于人、军舰、强权政治和在外国领土的丰富经验。

1884年4月30日，路易斯亲王与维多利亚女王的孙女维多利亚公主结婚。这是个盛大的婚礼，欧洲每国的皇室亲戚都有人来，特别是正在成为“欧洲祖母”的维多利亚女王也带着她最小的女儿来了。在这次婚礼上，路易斯的弟弟亨利与女王的小女儿一见钟情，并于1885年7月23日结婚，这又是一个盛大的典礼，仅英国的政府官员和贵族就来了200多人。路易斯的母亲朱丽深深地为两个儿子的婚事感到骄傲。

婚后，路易斯陪同维多利亚女王乘游艇去各地游历，到1885年秋离开

时，已是皇家海军中校，在接下来的两年里，路易斯辗转于军校与各军舰之间服役，精通了舰炮与鱼雷技术。1887年7月29日，路易斯中校来到“无畏”战舰上任执行军官。执行军官在军舰上相当于一个公司的经理，在总裁——上校舰长（负责总体决策，签发命令）的指导下具体负责从战斗人员配备到补给的各种任务。这段经历使路易斯在海军业务上有了巨大进步。

在丰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路易斯在海军理论方面又迅速成熟起来。他敏锐地认识到了新技术对海军的影响，精心地研究了新技术条件下军舰的火力、机动以及通信的新特点，他和其他一些年轻军官提出的建议引起了上层的注意，也遭到了不少批判，被称为“蓝色海洋派”。1889年10月，路易斯亲王荣任“搜索”号鱼雷巡航舰舰长。作为舰长，他既吃苦耐劳又能很好领会上级意图，总是出色地完成任务，因而迅速得到了地中海舰队司令霍斯金斯中将的赏识。

路易斯中校是个敢作敢当、个性极强的军人。任“搜索”号舰长期间，他搭救了一位在海里游得精疲力竭的奴隶。一位英国驻外领事上舰来要人，口气很强硬。

路易斯咆哮着对他吼道：“我有权命令你立即滚开！”恼怒的领事马上状告到海军部。不久霍斯金斯中将把路易斯叫到办公室，通知他海军部认为他违反了规定，正式对他提出指责，然后舰队司令又愉快地说道：“我还正式通知你，那个该死的规定马上就要被取消，皇家海军不再受领事系统的节制。”

1891年12月31日，路易斯晋升为皇家海军上校。已被晋升为海军部第二大臣的霍斯金斯元帅任命路易斯为海军情报局助理局长、动员办公室主任和侍从参谋长。

1892年11月路易斯上校来到白厅威灵顿公爵曾用过的办公室开始了新的工作。不久，路易斯又得到两个新的职务，战争办公室海军顾问和陆海军联合国防委员会秘书长，后者的任务是协调同样高傲自大的海陆军之间的关系，这决不是轻松愉快的任务。

路易斯超人的精力、旺盛的工作热情和杰出的智慧终于有机会表现出来。能者多劳，他的上级和同事不断把各种各样的工作交给他或推给他，很快，路易斯又担负了殖民地防务委员会顾问等7项新职务。当时如果有什么棘手的紧急事务需要处理，那么白厅里不成文的规矩就是“让路易斯干”。不可思议的是路易斯不仅出色地完成了极其大量的文字工作，而且还能挤出时间外出巡视，他曾说过自己“在1000个小时之内为1000个要塞作了洗礼”。在白厅的各种职务使路易斯结识了大量的高层人物和各方面的专家；他所处理的文件常常带有“绝密、特急”字样。他解决各方矛盾的方法是尽量在对应的双方之间达成妥协而又不失去原则，他对各方的答复总是软中有硬、逻辑清楚。雷厉风行而又从容不迫的作风使路易斯赢得了上级的欣赏、信任和同事的钦佩。所有这些都极大地帮助路易斯培养起良好的战略意识和统摄全局的能力，这是一个元帅所必须具备的素质。

1890年，美国海军军官艾尔弗雷德·马汉发表了《海上力量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1892年马汉又发表了《海上力量对法国革命与帝国的影响，1793—1812》。马汉的海权思想揭示了“蓝色海洋”思想的精义，大开了英国人的眼界，帮助他们认清了海军的战略角色。路易斯敏锐地把握了海权思想，并通过他对高级官员的影响推动了英国海军史上的一场革命。

路易斯的另一个过人之处是当大多数高级将领都认为俄国和法国是英国最大的敌人时，他却认为德国才是对英国最大的威胁，也许是对其表哥德皇威廉的了解有助于路易斯作出这样的判断。路易斯深入研究取得了成果，即发明了“巴滕堡航海指示仪”，后来该仪器的基本原理又被应用到了早期的飞机上。

1894年10月16日，路易斯就任轻型巡航舰“康布亚”号舰长。尽管“康布亚”号是地中海舰队最小的军舰之一，但是路易斯上校却使之名声大噪，路易斯带领他的属下在地中海舰队的几乎所有体育比赛中夺冠。在此期间，路易斯在阿尔及尔与来访的美国“芝加哥”号舰长马汉上校会晤，两人畅谈多日，交换了对海军现状和前景的看法，双方均受益不浅。19世纪末20世纪初，布尔战争爆发，当时所有的欧陆强国都同情布尔人，德皇威廉更是公开表示如果有强大的海军力量，德国将会支援布尔人。1900年，德国政府通过海军法案，意在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其他欧陆国家的海军实力也不断增长，对英国海上霸权构成了日益严重的威胁——这意味着“日不落”帝国行将在地平线消失。

各国海军的挑战使皇家海军处于一个转折的关头，海军部大楼里气氛已为改革作了准备，一批强有力的人物正在崛起。

1900年6月25日，路易斯的小儿子蒙巴顿出生了，“这是一个非常强壮的婴儿，他踢着喊着来到这个世界”。这个可爱的孩子给路易斯带来了好运。一年之后，路易斯晋升为海军准将，“宿敌”号战舰舰长，“宿敌”号隶属于地中海舰队。像以往一样，路易斯又使自己的军舰闻名于整个舰队：“宿敌”号在体育比赛、内务卫生和射击等方面皆是全舰队第一名。在此期间，路易斯还成功地率领整个舰队进行了实战演习。

此时地中海舰队司令是费索元帅，池才华横溢、能力过人、性格偏激，是英国海军改革的主要领导者之一。路易斯深得费索元帅的赏识，费索在给海军部的一份报告中写道：路易斯亲王是整个不列颠海军中最优秀的两个军官之一，“他不知道的事，没人能教给他”。

1901年1月，维多利亚女王去世，路易斯奉召返回英国协助皇室处理丧事。英国女王的去世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爱德华七世继承王位之后，调整了英国对外政策，与法国、俄国结成联盟，共同对抗日益强大起来的德国。爱德华七世对海军事务有极大的兴趣，他认为皇家海军是英国外交强有力的工具。本来海军部曾打算授予爱德华七世海军元帅军衔，不过女王在世时没有答应，因为维多利亚女王曾分别给陆军和皇家海军写信。建议他们授予她的丈夫陆军元帅和海军元帅军衔，陆军答复说“行”，而皇家海军则不客气地说“不行”。女王对此耿耿于怀，所以当皇家海军要授予威尔士王子海军最高军衔时，女王答复说：“既然我的丈夫不能当元帅，我的儿子也不行。”爱德华七世对此深感遗憾，后来接受了荣誉海军元帅的称号。

尽管有了这件不愉快的事情，爱德华七世还是要竭力使皇家海军再次发展壮大起来。

为此，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任命他所欣赏和喜欢的路易斯亲王为他的私人海军助理。

爱德华七世对路易斯的才华深信不疑，在海军事务方面完全依靠他的建议。路易斯也努力帮助爱德华七世了解新海军政策的复杂性，为费索元帅将要为皇家海军作的革命性变化创造有利条件。1904年10月，费索元帅升

任海务大臣，他继续大刀阔斧地改造皇家海军。在此期间，路易斯亲王出任海军情报局局长，负责制定战略计划。路易斯借鉴德军总参谋部的作法，扩展情报局的规划工作，在舰队组织、军官委任和参谋人员的培养等方面进行了许多重大改革。在白厅，费索元帅与路易斯亲王合作愉快，不过费索改革皇家海军的大手笔（大部分是富有远见和正确的）不可避免地与不少人发生冲突。幸运的是路易斯没有陷得太深，在皇家海军公开分成两派之前，路易斯已奉命出海就任第 2 巡航分舰队司令，1904 年，路易斯亲王晋升为皇家海军少将。路易斯留给山雨欲来的海军部大楼的是友爱和钦敬，当时的一份文件有这样几句话：“他已经成功地树立起了一个受敬重的领导者的形象……他的离开给海军部留下了一片空白和深深的遗憾。”

1905 年 8 月，路易斯率第 2 巡航舰队访问美国，他对美国安那波利斯海军学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样美国海军同仁也对皇家海军的舰炮战术操作和海上机动深表钦佩。路易斯还应邀前往白宫与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一家共进晚餐。在从美国返回英国的途中，路易斯在各舰之间举行了航海竞赛，结果有两艘战舰以平均 18.504 节的航速用 7 天零 7 小时 10 分钟的时间完成航程 3327 英里，创下了当时的航海纪录，这次竞赛检验了舰队在紧急状态下的快速机动能力。

1907 年 2 月，路易斯晋升为海军中将，担任地中海舰队副司令。当路易斯离开第 2 巡航舰队时，全体水兵自动排在甲板上为他送行，这对于一位司令是很不寻常的。

舰长们容易赢得部下的爱戴和忠诚，但对于水兵来说司令的出现意味着超额的勤务。

然而路易斯还是受到了水兵们的拥戴，因为他始终保持着一个真正水手的本色，还因为他是“勇敢与仁慈的化身，坚强有力而富有幽默感”。8 月，路易斯转任日益重要的大西洋舰队司令，旗舰是“威尔士王子”号。像先前一样，路易斯检查了舰上的每一个角落，当他揭开储物箱的盖子时，盖内的字迹露了出来：“除了傻瓜，没人检查这东西。”周围的水兵满脸通红，路易斯高声大笑。

随着时间的推移，欧洲形势日益紧张，英国和德国像两个带电的云团一样逐渐接近。皇家海军内部的冲突也开始白热化了，以海务大臣费索元帅为首的改革派与以运河舰队司令贝里斯福德爵士为首的所谓“守旧派”之间公开相互指责、污辱。

1908 年 5 月，费索与贝里斯福德会晤，费索伸出手以示客气，而贝里斯福德对他的上司未予理睬。这在讲究体面与荣誉的英国上层是个难以忍受的公开羞辱，费索后来忿忿地宣扬：“贝里斯福德这样的败类，他们的妻子应该当寡妇，他们的孩子不该有父亲，他们的家是粪坑。”

1910 年 5 月，爱德华国王逝世，乔治五世继任。爱德华国王是费索的保护人，因而费索也随之丢掉了海务大臣的职位，接替他的是老派的阿瑟·威尔逊元帅。1911 年德法阿哥德危机爆发，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最后一次也是最严重的一次危机，德国声称“为保护它的属国，将派军舰到非洲西海岸”。德国的这一举动将切断英国从好望角到南美洲的运输线，因而震惊了英国朝野。1911 年 8 月，危机达到了高潮，英国首相召集了帝国国防委员会秘密会议。在会上陆军提出了派 6 个师增援法国的计划，而海军的阿瑟·威尔逊元帅没能提出任何计划，只是指责陆军的计划是“荒唐的”。由此，英

国首相认识到必须找到具有战略头脑,并能协调陆海军关系的人替代阿瑟·威尔逊元帅。1911年10月,温斯顿·丘吉尔就任第一海军大臣,他与费索元帅一块建议由路易斯出任第一海务大臣,但是英王乔治认为“让一个德国人执掌皇家海军实在令人恐惧”。不过,路易斯的才干深深地吸引着英国首相和丘吉尔的注意。

1911年12月6日,路易斯出任第二海务大臣,具体负责人事,这是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职位,它对弥合费索——贝里斯福德所造成的皇家海军内部的分裂将起到决定性作用。丘吉尔在海军部的工作极大地倚重于路易斯,而不是第一海务大臣。丘吉尔曾说过:“计划的每个细节都是路易斯制定的,第一海务大臣只是表示同意罢了,路易斯是我的主要顾问。”布里斯门元帅对丘吉尔过分地介入海军事务深感恼火,而丘吉尔则认为布里斯门元帅是个不中用的老东西,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倔的家伙”。终于,丘吉尔抓住布里斯门患阑尾炎和支气管病的机会,给他写了一封很客气但意图十分强硬的信:“我们即将投入战争,鉴于健康状况的关系,您应该退休……”布里斯门接到信后气忿至极,当即公开指出丘吉尔逼他辞职是因为两人意见不和而不是所谓由于身体状况的缘故。这件事惊动了保守党和自由党,保守党抓住这件事向政府开刀,自由党里的许多人也借此打击年轻的丘吉尔,已进入议会的贝里斯福德也乘机搅了进来,一时乌烟瘴气。丘吉尔想方设法平息了这场风波,不过积怨远未散去。路易斯没参与这场纷争,不过他却是焦点人物。1912年,路易斯升任第一海务大臣。

路易斯的梦想实现了。经过艰苦的自我完善和诚实的奋斗,他终于达到了职业海军生涯的顶峰。尽管有少数人在背后对他的成功窃窃私语,但路易斯的声望是如此之高。以至于奥特少将在给费索的一封信中热情洋溢地写道:“如果(路易斯)把黑色说成白色,那么会有上千个皇家海军军官相信那是真的。”

现在路易斯只剩下一个目标——成为皇家海军历史上最好的海军大臣。

这是一个雄心勃勃的目标,也是一个困难重重的目标,未来的不确定性有时是难以预料的。1914年7月,奥地利政府向塞尔维亚发出最后通牒,随即欧洲战事一触即发。就在来自维也纳、圣彼得堡、巴黎和贝尔格莱德的特急文电纷纷涌入海军部大楼的时刻,丘吉尔却带着他的家人去海滨度周末了,留下路易斯一个人守在海军部大楼里。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路易斯面临着艰难的选择:命令皇家第1、第2舰队驶出基地,处于戒备状态,这一行动极可能引起德国的升级反应,从而导致英德立即开战的严重后果;然而不作此命令,德国海军随时都会用突然的袭击将皇家主要舰队歼灭于基地之内。路易斯深知皇家海军关系英国生死存亡的重要性,他决定命令第1、第2舰队出海,即使这一命令将可能带来严重后果使他失去第一海务大臣的职位。

路易斯这一命令是正确的、及时的,它充分显示了路易斯对英国、对皇家海军的忠诚:英国很容易再找到一个海军大臣,但英国不可能再得到一支皇家海军主力舰队。

皇家海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所取得的最大成功是在没损失一人一马的情况下,把英国远征军的4个步兵师、1个骑兵师的8万多人、3万多匹马和大量武器装备运过英吉利海峡。路易斯还在很短的时间内高效率地组织

实施了另一次大部队海上输送。

英国海军和陆军第一流的领导是这两次大规模海上输送成功的主要原因，不过其部分原因也是德军总参谋部的愚蠢。德国人为英国的海上力量所吓倒，以至于把它的公海舰队束缚在港口之内，而不是主动出击。其实英国领海之内只有 24 艘无畏战舰，而德国海军有 16 艘；德国海军驱逐舰的数量是皇家海军的两倍，并且掌握着在自己选择的时间和地点出击的主动权。与德国陆军的指挥艺术相比，德国海军除了后来的潜艇部队之外，简直不知道怎么打仗。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路易斯负责皇家海军的战略指导，为此他殚精竭虑。然而，随着战事的发展，英国在海上特别是在陆上的损失急剧增长，英国人在 100 多年的时间里建立起来的安全感发生动摇，英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已经破灭，他们眼里“迈着鸭子步”的德国军队不断地向英国报纸输送整版整版的英军阵亡官兵名单。英国国内狂热而恶毒的反德歇斯底里终于爆发了。在英国，任何一个有德国名字的人都受到了公开的污辱，甚至英国首相也因使用德籍女管家而受到了强烈的指责。英国公众最不能容忍的是，这个摇摇欲坠的帝国的支柱——皇家海军，竟然在一位德国亲王的统领之下。言辞激烈的信件涌向各大报刊，其中最客气的也是“我们不怀疑路易斯亲王的忠诚和对英国的热爱，但是他必须辞职。在这样的关键时刻，我们英国人不能接受德国人对皇家海军的领导。”1914 年 10 月 14 日，皇家海军最新的“奥得西斯”号触雷沉没，社会舆论对路易斯的压力急剧上升。在此情况之下，路易斯显示了坚强的意志，他认为海军大臣的职位最有利于他为英国贡献自己的才干，因此，他决定继续干下去。然而，英国政府无法承受舆论的巨大压力，内阁决定让路易斯辞职。丘吉尔奉命与路易斯进行了“小心翼翼而痛苦不堪”的谈话。路易斯终于明了，此刻他为英国服务的最好方式就是辞职！辞职就是他对英国的热爱！丘吉尔对自己不得不作的这番谈话深感内疚，后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对路易斯的儿子蒙巴顿格外关照，算是对此事的一个补偿。

1914 年 10 月 18 日，路易斯辞去海务大臣的职务。就在同一天，路易斯的一个侄儿在与德军的交战中阵亡，该消息与路易斯的请辞书同时发表在报纸上。丘吉尔在给路易斯的回信中写道：“这不是一场一般的战争，而是一场种族之间的生死搏斗，它正在抹去欧洲旧有的边界。它在各种族之间煽起了极其恐怖的仇恨。我深知您对皇家海军的热爱和贡献，但我不得不遗憾地接受您的辞职……皇家海军会永远记住您的英名……是您及时地把舰队集中起来，这实际上是保卫英国安全的第一步……我不掩饰对您的负疚之情，在三年亲密无间的共事之中，您的每一个决定都是正确的……”路易斯辞职的消息震惊了皇家海军舰队，杰里科司令在给路易斯的信中写道：“对您的辞职我们深感遗憾和痛心，……对于您，我们永远怀着最高的忠诚、尊敬和深深的感激。”前不久还在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信件要路易斯辞职的报刊又纷纷改换口风，盛赞路易斯“杰出的才干，高贵的气质和骑士精神”。就这样，路易斯带着众人的敬意、惋惜，怀着满腔的惆怅，无可奈何地告别了海军部大楼。

路易斯去职后，74 岁高龄的费索元帅再度出任海务大臣。人老脾气不改，更加倔强，不久即与丘吉尔闹翻，又辞去了海军大臣职务。该事导致了英国保守党内阁的垮台，丘吉尔也失去了对海军事务的管理权。

当德国潜艇对英国的威胁几乎到了掐住了英伦三岛的脖子的地步时，英国的反德歇斯底里达到了顶点，包括英王乔治三世在内的英国皇室成员也不得不改掉与德国有关的名字。在这种声势之下，路易斯亲王也将他的名字改成蒙巴顿。蒙巴顿是巴登堡的英文意译，同时也是朴茨茅斯海湾内一个海岛要塞的名字，实际上蒙巴顿家族所有的新名字都与大海有关。

辞职后路易斯亲王带着全家人住进了临近海边的一座寓所里，过着平静的生活。

1921年7月21日，路易斯应邀参加了每年一度的皇家海军俱乐部晚宴。一般情况下，每次只有50至80人赴宴，但当路易斯将主持晚宴的消息传开后，竟有来自英国各地、包括遥远海岛上的800多人前来参加。当时的英国第一海务大臣李伯爵在祝酒时说道：“我终于盼来了这样一个机会来向您表示我的钦敬和同情，在您辉煌的海军生涯中，您和皇家海军官兵所结下的信任和友谊永远不会消失，永远强壮如昔。”当路易斯致答词时，碰杯的声音持续了5分钟，在场每个人的眼里都含着热泪，比老兵们更恋旧的是那些老水手。8月4日，路易斯晋升为退役海军元帅，这对他是个极大的安慰。

路易斯仍然为自己在最有作为的时候不得不开心的海军而感到遗憾。不过让他感到欣慰的是，他的儿子蒙巴顿正像一颗闪亮的新星在皇家海军升起。正是；半生辛苦登高位。一朝风来亲王归。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章分解。

第二章 少年、军校学员和男人

童年生活多逸安，际遇突变起波澜；
少年早熟存大志，雏鹰振翼正向前。

1914年晚秋的一个烟雨蒙蒙的下午，一个少年孤单地站在奥斯本海军学校的皇家海军军旗之下，浑身都被雨水打湿了，泪水毫不掩饰地在脸上流淌，他就是14岁的蒙巴顿。

他的同学都很同情他，但没人过去安慰他，因为他们知道这种痛苦是没法慰抚的。他们深知蒙巴顿是多么地为他的父亲路易斯亲王感到骄傲，而此刻路易斯却不公平地被逼辞职，这是对蒙巴顿家族公开的伤害和污辱。不过，他的同学们还大年轻，没意识到他们所目睹的这一幕意味着什么。

很少有人能清晰地指出对他的命运和未来起决定作用的某一刻。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未来是在爱好、才能和环境等各种因素综合作用下慢慢定型的。虽然，少年蒙巴顿已经选择了皇家海军，但他还缺乏决心。在路易斯被迫辞职后的那些悲惨日子里，蒙巴顿恨透了整个世界，他心中的愤怒像是处于白炽状态的炉火，锻铸着他铁一般的性格，不仅铸造着它，而且给了它锋利的刀刃，这刀刃闪烁着冷森森的光芒，它会无情地将挡在蒙巴顿前进道路上的每一个人、每一件事劈倒在路旁。当然，他曾幻想到要当海军元帅，但这仅仅是一个少年的梦想，而不是誓言，经过了这一刻之后，它已经成了蒙巴顿的誓言，一个少年含泪的愤怒的宣言，他要向整个世界挑战，他要登上皇家海军职业的顶峰，用他自己的成功来报复这个无情地污辱了他神圣的父

亲的世界，仰俯之间，蒙巴顿已经成了一个永不松懈、永远不忘记过去的人。

迪基（蒙巴顿的昵称）是个腼腆温顺的孩子，显得有点懦弱。他深得父母兄姐的爱护，有时甚至是溺爱。这也不奇怪，他出生时父母已岁过中年，不经意有了这个小宝贝。他的二哥乔治比他大8岁，大哥已11岁，而3年后他的姐姐就与安德鲁王子结婚了。胖乎乎的迪基十分逗人喜爱，维多利亚女王看到他时总是满面笑容地抱起他，而迪基回报女王的是用小脚踢掉她的眼镜。每次路易斯亲王出海回来，都用加倍的爱报偿家人，虽然他更看重乔治，迪基的这个二哥是个聪明而稳重的孩子，但是他更钟爱迪基，他毫不掩饰对小儿子特别的喜爱。喜能生爱，父子之间感情的纽带非常牢固。

与任何正常的标准相比迪基的成长环境都是极富流动性的。水手们的后代习惯于跟着他们的父亲走，水手们停泊在哪，他们的家就搬到哪。对迪基一家来说，由于遍及全欧的亲戚更显得居无定所。从德国到奥地利，从西班牙到马其他，他们家经常搬迁。相对来说，海伦堡是较稳定的一个家，但即使它也是在外国的土地上，因为毫无疑问，迪基是个英国人。

在海伦堡的夏天充满了愉快。迪基像他的父亲小时一样，在祖上留下来的庄园里四处玩耍游荡。他在树丛里寻找小动物，把逮住的蜥蜴和小海龟养起来，蒙巴顿养宠物的习惯就是从这时形成的。他还有一匹小马，有时骑着它到房后的森林里去，但不敢走得太远，因为那里可能有猛兽。

沙皇尼古拉斯有时会带着家人来海伦堡小住。像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来造访迪基的祖父时一样，尼古拉斯一家的到来为海伦堡增添了喧嚣欢笑。起初，蒙巴顿的小名叫尼基，因尼古拉斯是他的5个名字之一。当沙皇一家来住时，叫尼基的小孩就太多了，因此，蒙巴顿的哥姐就叫他迪基。

也许迪基的那些俄罗斯表兄弟们要为他小时恐惧感负责，在五六岁之前，迪基夜里不敢一个人上床睡觉。

“不是怕黑天，”迪基解释道，“而是因为那里有狼。”

路易斯亲王大笑着说：“我说迪基，房子里没狼。”

迪基逻辑清楚地回答道：“我也可以说床边没狼，但我认为那有。”

迪基这是在告诉他父亲，狼在他心里，他的俄国表哥讲了许多大雪原上狼群追逐行人，猎人与狼厮杀搏斗的故事，这些经典的俄罗斯传说激发了小迪基的想象力，使他把草原上的狼联想到房屋后的树丛里。实际上迪基非常小心谨慎，有一次他的婶婶问长大了他想干点什么，迪基回答说：“我还没想好呢。”

“作一名军人怎么样？”

迪基摇了摇头：“当兵的总会被打死。”

“那么当个水手，像您父亲那样？”

“不，舰总会沉下去的。”

不论是否真实，这些故事与迪基的性格是相符的，直到1914年彻底改变了他的那一天。

迪基很喜欢住的另一个地方是马耳他，他成年最幸福的几段时光之一也是在此度过的。这个敏感的小男孩一定感受到了马耳他的美丽。从在山顶上的家里可以看到古老的城堡和要塞，山谷里的桔树，山间乳白的房子，在每道视线的尽头，都是湛蓝的海水，海上白帆点点，还有迪基最喜欢的战舰，那是他父亲的战舰，此时路易斯是地中海舰队副司令。路易斯常带迪基到军舰上玩，把他交给水兵们带，自己则去工作。那时英国水兵喜欢孩子是非常

闻名的，他们尽心尽力地让迪基快乐，而迪基也与水兵们相处甚欢，他在甲板上和水兵们的宿舍里要比在堂皇的军官室时愉快得多。

那个时代的人们喜欢打扮。男人们常身着华丽的军服，头戴插有羽毛的金盔或银盔，女人们则身着精制的裙子，带顶小圆帽。他们经常举行化妆舞会，脸上涂着稀奇古怪的化妆色。在一张路易斯与迪基的合影里，路易斯身穿军装，披着大氅，大氅前绣着一只俄罗斯帝国之鹰，长靴过膝，显得英武挺拔。他身边迪基则穿着哥萨克军官制服，戴着尖角皮帽，也穿着黑色的长靴，带着子弹袋，腰里斜插着一把金柄匕首，像是一个神气的骑士。

皇族亲戚们送给迪基不少军服，俄国的、希腊的以及各种英国军服都有。迪基很大方，朋友们谁来借都行，但他对着装要求很挑剔。如果哪个家伙把子弹袋背错了位置，或皮带束得松松垮垮，迪基就会立即要求他们改正。他自己穿军服则一丝不苟，笔挺合身，这个特点他一直保持着，从多雨的挪威海岸到热浪翻滚的缅甸丛林，蒙巴顿奇迹般地始终保持着整洁完美的军容。

迪基接受了令人吃惊的系统的启蒙教育，这完全归功于他的母亲维多利亚公主。

维多利亚也许本来应该做一位教师，她喜欢开导别人，有着德国人那种典型的方法主义的头脑，并且对教育持有非常严肃的态度。她在固定的时间里教育迪基并且要求他的作业必须按时完成，虽然家里为迪基请了家庭教师，但维多利亚却是毫无疑问的真正教育者。不过，维多利亚失望地发觉，迪基成不了一个学者，乔治对功课的兴趣远比迪基浓厚。

迪基对各种机器和零件的热爱很快就显示出来。3岁那年，他父亲买了一辆汽车。

蒙巴顿在许多年后自豪地说：“我们大家族的各个家系中，我们是第一个拥有一辆烧汽油的汽车的，它的轮胎是实心的。”两年后，他可以对着一个名留声机的圆筒形装置说话，并且为能听到自己的声音而高兴。

他关于航海的第一个记忆来自海森。1903年秋天他住在达姆施泰特时，一幅关于一般古老的木军舰在辽阔的海面上熊熊燃烧的油画把他迷住了。70年后他指出：“这是艺术对我的第一个在意识方面的影响。”其后并没有许多其他类似的事情。

不管怎样，船上生活将充满他的一生。1905年2月他在朴茨茅斯登上杜累克皇家游船，显然这不是他的初次海上观光了。“我确实喜欢杜累克，它是一艘漂亮的船，没有臭味。”他非常渴望能去地中海和父亲呆在一起。那一年的早些时候，他来到在直布罗陀他父亲的旗舰。他成了使负责他的安全的那个军官感到头疼的问题。“他不是高高地爬在桅杆上，就是跑到锅炉舱下面，搞得像打扫烟筒的人一样黑。”如果不是指派了一个能干的水手盯着他的一举一动，有好几次他都会掉到海里去。

1905年1月，迪基第一次接受集体教育。他开始在麦克弗森体育馆上课。每堂课结束时孩子们都要集中起来唱爱国歌曲。迪基并不完全相信那些字眼，“啊，英国，……英国，统治着波涛滚滚的海洋！……”4年以后，他进入了克莱夫登镇的格莱斯顿学校。这所学校在某种意义上留下了它的印记。有一次迪基和另外两个男孩在二楼楼梯平台上玩俯跨栏杆的游戏，看谁腰弯得最大。迪基获胜了，但却翻倒下来，下巴碰到了木椅上。一位医生把他的伤口缝上了，但却留下了一个终身都有的、不太明显的疤痕。仅仅在几

个月前，他在给拴狗链子上钩子时伤了右手中指，伤口很深，以致不得不将中指截掉。这次也留下了一个长期存在的伤疤。这些只不过是他的长长一串可悲的自伤的记录的最初的几次罢了。迪基是大胆而笨手笨脚的孩子，长大成人后也是如此。3年后在一星期之内，他在上木工课时受了切伤，一直伤到骨头，“在一次小打中”被打了眼睛，在企图“使面式罗盘磁化”时，“我的手指被削掉了一块皮”。

在整个童年时代里，与乔治相比，迪基都处于一个非常不利的地位。乔治不仅学习好，而且还是个出色的运动员。在学校里，乔治在学习上和体育运动上都是头儿，而迪基在这两方面都平平。实际上迪基所表现出的特长和雄心是如此的不起眼，以至于路易斯都开始对他的平常感到担心了。不过除了鼓励迪基更努力地学习，特别是专研他最薄弱的数学之外，路易斯认为自己不能在培养孩子的志向方面发挥大大的作用，至于体育特长，那别人就更插不上手了。因而路易斯主张顺其自然。路易斯没有意识到，决心有时会克服天然的弱点。

迪基 11 岁那一年，路易斯带他坐了一次飞机。那时的飞机还很新奇古怪。路易斯被紧紧地绑在机翼后面加设的座位上，乘飞机飞了一圈。迪基看得着迷了，飞机一着陆，他就缠着路易斯说他还要飞一圈，没办法路易斯只好跟飞行员打个招呼带迪基飞了一次。迪基对飞行一点也不感到害怕，因为路易斯向他灌输了自己对飞机性能盲目的自信心。事实上，迪基喜欢上了飞机，尽管缺乏在运动骑术方面的特长，但机械化交通工具对他有种天然的吸引力，逐渐他成了高速汽车、高速摩托艇和高速飞机的专家。

1913 年秋天，迪基进了奥斯本海军学校，入校本身就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当一名皇家海军军官是一种时尚，因而竞争十分激烈。首先是严格的体检，与先前路易斯所接受的粗略检查完全不一样；然后是有相当难度的笔试，淘汰了一半候选人。

最重要的是由一位元帅、几位上校和代表组成的委员会所进行的口试。虽然委员会里的军官们对迪基可能格外关照，但是必须承认迪基长期以来所接受的海洋知识和他那腼腆但很专注的个性可以使他通过口试。

知道了迪基获准加入皇家海军的消息之后，路易斯马上带着他到最好的裁缝那订做了海军制服。这几个裁缝像为舰队司令做制服一样为迪基精心地做了一套制服，而迪基在量尺寸时则一本正经，好像他真的是海军元帅。制服做好后，路易斯带他到海军部灰石拱门前照了个相，从相片里可以看出几分未来的海军元帅所拥有的那种魅力。身着铜扣的蓝色上衣，头戴嵌着铁锚与王冠徽章的海军帽，迪基的眼睛和嘴角泛出笑意，显露出了第一次穿上真正的军服时那种发自内心的欢愉。

然而，在海军学校的生活很难说是让迪基感到快乐。学校里最好的房子已分配给退役军官居住，学员们住的是用木板临时搭起的棚子，木板墙上有许多被学员们踢开的洞，冷风就在这些洞里灌进屋里。每天早上 6 点半值星军官吹哨起床，学员们光着身子跑过长长的走廊，用冰冷的水洗过之后，再跑到另一头用湿巾揩干。在此过程中牙齿上下磕碰，像钟表似地响个不停。

宿舍东南的草坪上是宽敞的大教室，教室的大梁上有浮凸烫金的皇家海军名将纳尔逊的一句格言：没有皇家海军做不到的事。

在学校里迪基没有受到特别的对待。教官们不因为他是路易斯的孩子而给予他特别的关照，同学们也不因为他是王子而对他敌视。迪基像其他学

员们一样，住所简单，食品恶劣，学习时间漫长而且在任何天气条件下都接受大强度的训练。父母们对学校颇有怨言，而校方则声称要给未来的皇家海军军官以斯巴达人式的训练，认为艰苦的条件能锻炼他们的意志，培养他们的生存能力。

在学校迪基没有受到很好的教育。因为奥斯本海军学校与美国海军学校不一样，在美国海校，学员们入学时都超过了 18 岁，他们的课程与一般大学的课程差不多，而奥斯本海校的课程却是纯实用性的，在这里学员们不是学习经典著作和与皇家海军有关的历史，而是重点学习数学、海员的技能、通讯、划船甚至织网。学校还教些英语语法，选学法语或德语。迪基学习了法语，因为他的德语已经说得很好。

当然在海军学校里有各种体育活动，而迪基像小时候一样，不大参与，即使参与也表现平常。每周最激动人心的事是发薪水——一先令的零花钱。学员们拿了一先令之后便蜂拥涌向糖果店。一先令并不像听起来那么没用，那时三先令就能买整整一袋糖。周末还有舞会，当然没女孩子，学员们相互跳舞，海军陆战队的乐队为他们伴奏。运气好的学员可以有幸与学员队里的上尉跳舞，大多数时候上尉先生浑身都透着酒气。

回家永远是件令迪基感到愉快的事情，那时路易斯已晋升为海务大臣。由于路易斯爱好广泛，豪爽好客，因而家里经常是高朋满座。客人中有名噪皇家海军的高级将领，像穿戴整齐、神情严肃的杰里克将军和常歪戴着帽子的贝蒂爵士；有英国两党的显赫人物，其中包括鲍尔福、阿斯奎斯和劳埃德这些英国当时和未来的领导人。当然，最常来的是长着一张孩子脸的温斯顿·丘吉尔，他是客人中最年轻的一位。不过即使当丘吉尔已是一个老家伙时，他仍未失去孩子般的热情，因此他知道怎么与孩子打交道。丘吉尔与迪基都是天生的想象力丰富，他们在一块兴致勃勃地谈论多姿多彩的海军生活，谈论过去的大海战和那些英勇的水手。与丘吉尔聊起天来迪基可不再是个胆小害羞的小男孩。他了解丘吉尔在苏丹和布尔战争中的傻大胆，把他当作一个英雄崇拜，丘吉尔也特别喜爱迪基，常常是让迪基坐在腿上一聊就是一晚上。当然迪基更崇拜他的父亲。

1914 年的春季，迪基年轻的荣誉感达到了高潮。5 月，路易斯来到奥斯本海军学校检阅学员，迪基在队列里高兴得两腿发抖，眼神里充满了自豪。夏季，迪基又有了一件叫他高兴的事。7 月，学员们被分批送往舰上参观，迪基从小就对战舰非常熟悉，这时他第一次感受到了领导者的滋味。迪基带着一队学员到各处参观，像个老水手似地向他们介绍这、介绍那，水兵们也咧着嘴，笑着听迪基的演说，同学们对他佩服极了。当战舰挂满了五彩的旗帜驶向蓝色的海洋，高昂的舰炮隆隆响起的时候，身着海军制服的迪基和他的同学们的爱国心被激发出来，为自己是皇家海军中的一员感到骄傲。对于迪基还有另一种激动，因为这是他父亲治下的战舰。

三周之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经过一段希望与恐惧交织的激动之后，荣誉感再次占据了迪基年轻的心灵。然而，接下来生活给予迪基的是突如其来的污辱，对父亲深深的同情和对整个世界的愤怒，他心目中伟大的父亲路易斯辉煌的皇家海军生涯难道就这样不光彩地结束了吗？

二哥乔治对父亲被迫辞职这件事的反应不及迪基强烈。此时乔治已是一名海军军官，肩负起了海上战斗的责任，而且乔治毕竟年长很多，他已经经历过了生活中的某些不公正，对这些事能够看开一些。当然乔治内心也很

悲苦凄凉，看到乔治难过的样子，他的战友们自动组织起来，并派了一个代表正式地向他表示：“先生，我们为此事深感震惊，对于您父亲的忠诚，我们毫不怀疑。”

迪基的同学们虽然很同情他，但他们没有明显的表示，因为他们深知迪基的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不敢触及也不知道怎样触及这个话题，用一位学员后来的一句话说，“我们巧妙地避开了这个问题”。

就这样，迪基独自承受了巨大沉重的煎熬，在这悲惨的几天里迪基由一个少年成了一个男人。30年后在东南亚，伯纳德·布雷恩在蒙巴顿的桌子上发现了他父亲的照片，不由地感叹说：“他是一个最冤枉的人。”“是的，”蒙巴顿回答说。过了一会儿，他拍着伯纳德的肩膀说：“我只有一个抱负——返回海洋，成为第一海务大臣。”

1914年末，达特茅斯海军学院的高年级学员提前毕业，充实到急剧扩编的舰队里。蒙巴顿和他的同学们被转往海军学院填补这一空缺。离开奥斯本海校时，蒙巴顿在80名学员中排名第35——他的决心还来不及显示力量。

比起奥斯本海军学校，达特茅斯海军学院的条件要好得多。校舍高大漂亮，宽敞舒适，设施完备，食品讲究。周末还有舞会，这次有女舞伴了，她们是教官的妻子和女儿。

1915年10月，他举行了基督教的坚信礼。“我双手按在圣经上，当时的感觉就是直想哭。”两个星期后，他去参加圣餐礼，回来后道：“真是妙极了！”但宗教活动的记录也就从此在他的日记里消失了。他那非常实际的头脑使他拒绝任何不可解释的现象。他对研究自然界有着永不满足的兴趣，但拒绝对超自然的事情花费精力。他并不想把自己归类于无神论者，但上帝在他的心中并无多大的位置。

在达特茅斯，蒙巴顿开始沿着路易斯亲王的道路前进。经过超常的努力，他开始居于学员前列，并位列24个学员队长之一。在体育方面也露出了头角，在一次双桨速划比赛中，蒙巴顿与他最好的朋友斯坦福德一道击败了年大力壮的对手。这是低年级学员的首次胜利。他的一位同学后来回忆这段生活时说：“蒙巴顿快乐、勇敢”。1916年年初，当蒙巴顿离开达特茅斯海军学院时，他的名次已上升到第18名，在凯汉姆斯的最后3个月的强化学习里，蒙巴顿一跃成为第1名。

1916年7月，海军军官候补生蒙巴顿奉命前往贝蒂上将的旗舰“雄狮”号报到。

“雄狮”号是皇家海军中第一流的军舰，也许皇室背景，但更可能是海军对路易斯亲王的尊敬促成了这个对蒙巴顿非常有利的分配。这艘著名的战舰装备着13.5英寸的舰炮，航速27节，已经参加了在北海进行的所有海战。当蒙巴顿来到时，舰体上布满了弹痕，这是战斗留下的光荣标记。前炮塔已换成了新的，德国人的一发炮弹彻底摧毁了旧炮塔，炮组成员全部阵亡。

令蒙巴顿感到遗憾的是，在他看来，“雄狮”号已经打完了最大的一仗。日德兰海战之后，德国公海舰队已不敢再向皇家海军的力量挑战。在某种意义上，德国人通过日德兰海战赢得了一次战术性的胜利，但是他们也认识到是运气使公海舰队逃脱了全军覆没的下场。

蒙巴顿初上“雄狮”号时，军服上佩带着标志他参加了英王乔治五世加冕典礼的绶带。由于“雄狮”号上那些身经百战的军官们都没有绶带，因此，这种典型的炫耀并不是存心要使自己受欢迎。不过，16岁的蒙巴顿对

这类装饰品的态度是“有了就戴”。如果说长官们为他的绶带所激怒，那么他们对蒙巴顿的尽心尽责却挑不出什么毛病。曾在“雄狮”号上服役的官兵后来还记得，蒙巴顿极其认真地钻研业务，不知疲倦地了解各种各样的、有些是与他无直接关系的海军事务，“他惊人的敏锐，干劲十足”。蒙巴顿正在向既定的目标挺进。

1916年10月，杰里科上将就任第一海务大臣，贝蒂上将继任舰队司令。这使两位将军各得其所：杰里科是个出色的管理者，而贝蒂则是个第一流的战地司令。帕克南上将接替贝蒂指挥巡洋舰队，他带到“雄狮”号上的参谋人员里有乔治上尉，这样蒙巴顿两兄弟就得以愉快地在同一艘军舰上服役。在战舰上服役不是仅有艰苦的工作，虽然那时在舰上看电影还是件遥远的事情，但是军官们的即兴演出却往往打破海上勤务单调沉闷的节奏，蒙巴顿在自编自导的音乐喜剧中担任女主角，“他可真他妈的迷人”，他的战友后来回忆道。当心情开朗时，没有人比蒙巴顿更快乐，而当心情不好时，没有人比他更忧郁，毕竟他只有16岁。但忧郁过后，他往往更加精神十足。

1917年2月，乔治和蒙巴顿被调往贝蒂将军的旗舰。“伊丽莎白王后”号是第一流的超级无畏战舰，航速25节，舰炮口径15英寸。就是在这段时间里，巴登堡家族的名字改成了蒙巴顿家族，路易斯由亲王变成了侯爵。蒙巴顿比他的父亲更不喜欢这番更改，因为他很珍视家族的荣誉，而这次改的确使他的家族降低了社会地位。

现在，蒙巴顿已失去了法定的头衔，不再是一位王子，仅仅是出于礼貌，像任何一位侯爵的小儿子一样，人们才称他为路易斯·蒙巴顿勋爵。也许这次变故再次驱使蒙巴顿下决心要使自己的勋爵称谓比其他任何世袭的头衔更显赫光彩。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蒙巴顿并没有亲历过实战。1917年4月，美国进入战争，当美国海军加入到皇家海军这一边后，德国水面舰队就更不敢再出来挑战了。不过，蒙巴顿还是干了些苦差事。1918年，蒙巴顿转役K-6潜艇。与现代潜艇、甚至与它的对手德国U型潜艇相比，K-6潜艇都显得低劣，但在北海下巡逻要比在超级无畏战舰上服役更激动人心，在潜艇里更能给他一种参与战争的感觉。

蒙巴顿在潜艇上服役的时间很短，只够他将能弄清潜艇是怎么回事。不久，他就晋升为海军中尉，奉命指挥皇家海军舰艇P31号。P31号是海军最小的快艇之一，它被用来对付德国潜艇，为开到法国去的运输船护航。蒙巴顿爱上了这只小艇，当艇长不在舰桥上时，18岁的他就负起指挥全艇的责任。实际上蒙巴顿已把它看成是自己的战舰，而且认为它是皇家海军里最好的军舰，事实上他对自己指挥过的所有军舰都持这样的看法。

艇上的工作很艰苦。1918年9、10两月，盟军为结束战争进行了最后的努力。英国的增援部队如潮水般地经舰船的运输涌向欧洲大陆，蒙巴顿的小快艇像发疯了似地来往护航，有时要在24小时之内往返两趟而在等待部队登船的时间里，巡逻艇还要加油和补充其他物资，因此艇上的船员们没人能得到一点休息。一天夜里，P31号正在以20节的速度航行时，蒙巴顿在舰桥站着睡着了。

1919年2月，一个新舰长卡特少校调来了。蒙巴顿描写他说：“为人非常好，我说什么他做什么。”但有一次他突然发了火，对着麦克风咆哮说：“中尉，你是一头喝血的驴子。”这次受辱，教会了蒙巴顿以后从不当众辱骂他

的下级军官。卡特后来也没把它当回事。他在蒙巴顿的鉴定中写道：“他是一个最热情能干的指挥者，非常善于和人打交道。”在蒙巴顿的一生中，从未有过写得不好的鉴定。“雄狮”号舰长查特菲尔德称他是一个“非常有前途的年轻军官”，“伊丽莎白王后”号舰长的评语是“认真、勤奋，相当聪明”。然而，他被人们普遍认为是一个埋头苦干的人，但缺少一种伟大、卓越的东西。一个同事回忆说，当其他年轻军官坐在船舱里闲聊时，蒙巴顿总是写着他的笔记。总之，将近一年的P31舰上的生活锻炼了蒙巴顿独立指挥的能力。

不久，一切好像在突然之间全结束了。德皇乘飞机飞往荷兰；德军退回德国；德国起义的水兵在无畏战舰上升起了红旗；德国新政府的黑衣特使在贡比涅森林的一节火车厢内签署了投降书。10天之后，1918年11月18日，德国公海舰队最后一次驶出港口，在英王乔治和威尔士亲王的陪同下，贝蒂上将接受了德国海军的投降，黄昏时分，德意志帝国海军军旗缓缓降下，没再升起。

1918年11月的一天，蒙巴顿和乔治返回家休假。在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里，天公作美，万里晴空。路易斯与他的两个儿子合了个影。老将军依然强壮漂亮，骄傲地站在两个儿子中间。18岁的蒙巴顿长得高高大大，比路易斯还高了差不多一英寸。

比起父亲和弟弟，乔治显得瘦小，照相时他悄悄地抬起了脚跟。

战后皇家海军急速缩减，P型快艇只保留了4艘，其他的全被封存起来。P31号是这幸运的4艘之一。但是不久后，令P31退出现役的命令下到了艇上，艇长心急火燎地去海军部查清究竟是怎么回事，行前让蒙巴顿在艇上负全责。艇长走后不久，伯纳德上将就从朴茨茅斯打来电话，通知说他将视察快艇部队，看看命令的执行情况。

蒙巴顿显示出了灵活执行命令的天才。他把停留未走的船员推进锅炉房里，锁上门，迅速在门上涂写上几个字“油漆未干”。当伯纳德上将来到艇上时，只有蒙巴顿和几个维修人员留在那里。上将问他快艇是否得到了很好的维护，蒙巴顿回答说：“先生，它很接近那些已维护好了的。”蒙巴顿认为自己没说谎，因为左右泊位的快艇都已得到很好维护，准备封存。

艇长很能干，在海军部上下游说，把各方面的关系都搞得很好，P31快艇又能出海执行命令了。蒙巴顿又在P31号上服役了3个月。

皇家海军急剧的缩编使许多年轻军官面临着没有职位的处境。为解决这一问题，海军部想出了一个好主意，让他们去大学呆上几年，既能受教育又不必考虑工作。

1919年，蒙巴顿奉命前往剑桥大学切斯特学院接受高等教育。

蒙巴顿并没有为暂时离开他所喜爱的海军生活感到消沉，他具有迅速适应任何一种环境的天资。实际上他把类似这样的小插曲看成是生活的调料。1919年古老的剑桥学府充满了欢器。许多大学生都曾在战时服过役，他们已不再是孩子了，而是成熟的男人。从战场上死里逃生回来，使他们感到自己的时间好像是借来的，因此要充分地利用它。蒙巴顿从熟悉的种种管制下解脱出来后，便开始了他人一生中第一个快乐自在的阶段。

最初在学院里蒙巴顿只认识他的两位表兄弟，阿尔伯特王子（后英王乔治六世）和亨利王子（后来的克劳塞斯特伯爵），起初他们交往频繁，不过阿尔伯特天性喜静，并且与亨利一样碍于身份，放不开。不久蒙巴顿便扩大了社交圈。热情奔放和翩翩风度使他在朋友们中大受欢迎。很快蒙巴顿就

有了一大帮朋友，并被吸收入当时很有些声望的比特俱乐部。许多夜晚蒙巴顿都是在那里度过的，与朋友们畅饮，海阔天空地聊天，他长了一个新本事，就是对于一无所知的事情，他也能侃它两个小时。

尽管表面上看来蒙巴顿是个无忧无虑的大学生，但他内心的目标没有丝毫的改变。由于剑桥大学推崇智慧和知识，而出人头地自蒙巴顿 14 岁以来已经成为他个性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因此，他开始向这块至今还很陌生的领域发起了顽强的冲锋。

不过即使如此，他夜猫子式的生活仍未受到影响。此时蒙巴顿身强力壮，他所显示出来的非凡体能令他的同学惊异折服。蒙巴顿白天全天都去上课，从傍晚开始和朋友聊天、喝酒直至半夜，然后开始极其卖力地学习，没人知道他到底几点钟睡觉。

英国名牌大学的学生们对政治非常关注。蒙巴顿对政治没什么兴趣，不过为了达到自己的目标，他要求自己培养起对政治的兴趣。在第一学期蒙巴顿就设法弄到一张参加学生会辩论的请柬，他不仅是第一个能作到这一点的现役海军军官，而且还被邀请为剑桥辩论队的主辩人，对手是牛津大学辩论队。这可是一个了不起的壮举，因为蒙巴顿根本就没有在公共场所讲话的经验，更谈不上懂得怎么辩论了。尽管此时蒙巴顿在正式场合讲话腿还有点发颤，但坚强的意志和敏捷的反应是他的两大优势。既然已经决定要参与，蒙巴顿就拿出了巴登堡家族所特有的不干成功不罢休的架势。根据规则主辩人可以外请一位支持者。“请准呢？谁是最伟大的辩论家呢？”蒙巴顿想了想，当然是丘吉尔。马上他给丘吉尔打了个电话，此时丘吉尔正担任劳埃德·乔治战后联合政府的国防大臣。蒙巴顿心想就凭丘吉尔的名头也会震住牛津大学的那帮家伙。丘吉尔爽快地答应了——路易斯的儿子让他帮忙，那还有什么好说的。

辩论的题目是“动议：建立新政府的时机已经成熟”。剑桥大学是反方。双方辩友们用文雅的语言和他们所极力模仿的老派议员的风格提出了正式的建议和反建议。接着蒙巴顿登场了，他穿着脏乎乎的海军蓝夹克，胸前还挂了几枚勋章。他眼里闪着捉弄人的神色，颇有身份地开始以主辩人的姿态讲道：“先生们，以鄙人卑微的意见看来，到目前为止，双方每个辩友的发言全部是胡说八道。”

辩友们的暴怒还没来得及发泄出来就被丘吉尔粗豪的大笑所压倒。

随着英国经济的复苏，人们渐渐从战时和战后的困境中解脱出来，又开始了忙忙碌碌的社交活动。在伦敦的社交界，最引人注目的三个单身汉是威尔士亲王和他的两个弟弟，其次就要属英俊潇洒的蒙巴顿了。当然，与皇室的亲戚关系也增添了他的魅力。从剑桥到伦敦只需坐一个小时火车，因此蒙巴顿每个周末都回伦敦，出入于名门大宅和各国使馆。在众多看中了他的姑娘中，蒙巴顿觉得詹姆丝小姐长得最漂亮，而且聪明活泼。蒙巴顿爱上她。经过两周的猛攻，蒙巴顿与詹姆丝小姐订婚了。

但是，即使是甜蜜的初恋也没有一丝一毫地拖住蒙巴顿向既定目标前进的步伐。

1919 年 12 月，威尔士亲王圆满完成了对加拿大和美国的访问，回到伦敦。威尔士亲王对旅途的描绘令蒙巴顿心驰神往，“我怎么没和你一块去呢！”蒙巴顿遗憾地说道。

“下次跟我一块去，”威尔士亲王漫不经心地说，“开春我要到澳大利亚

去。”蒙巴顿马上决定了同去。他不仅想看看外面的世界，更重要的是路易斯曾去过澳大利亚。蒙巴顿早已计划好凡是父亲足迹到过的地方他都走一遍，一步一步地像路易斯那样达到海军生涯的顶峰。

1920年3月，蒙巴顿晋升为海军上尉，随即陪同威尔士亲王远航出访。在7个月的时间里，蒙巴顿和威尔士亲王访问了美国、加拿大、新西兰、澳大利亚和太平洋里的许多岛屿。通过这次旅行，蒙巴顿不仅熟悉了他以后将要生活和战斗的那些地方，而且还与他的皇室表兄威尔士亲王建立了牢固的友谊。威尔士亲王在回忆录中写道：“19岁的迪基精力充沛，干劲十足，他鼓动我与他一块做了不少官方计划以外的事情。”蒙巴顿和威尔士亲王究竟在计划之外又于了些什么事，只好由人们自己去想象了。正是：雄心塑造好儿男，扬帆远航出乡关。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章分解。

第三章 埃德维娜

天公有意巧安排，同命相依情似海；
万里奔波真爱现，携手同游云天外。

正当蒙巴顿陪同威尔士亲王在南太平洋上的一个小岛上访问时，詹姆斯小姐来了一封信，告诉蒙巴顿她已决定与陆军少校克提斯结婚。詹姆斯小姐解除与一个贵族后代的婚约而与一位百万富翁订婚，这件事在伦敦传得沸沸扬扬。虽然蒙巴顿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但他表面上显得若无其事。

1921年仲夏的一天，蒙巴顿与埃德维娜·阿什莱小姐在舞会上相识，他们俩的相识、相知、相爱、结合从一开始就是自然而然，好像是上天安排好的一样。

阿什莱小姐是个真正的英国美人。身材修长，皮肤白里透红，一头柔软的红褐色的长发，在伦敦再也找不到一双比她更大更明亮的眼睛。更迷人的是她有着时刻能给人以温暖的善良的心地，有着第一流的心智。阿什莱小姐总是骄傲地说：“我的头脑是从我的犹太人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但是，埃德维娜却不是一位古典式的淑女，她个性极强，活泼好动，爱慕虚荣，这些特点后来让蒙巴顿吃了不少苦头。

她的外祖父是凯赛尔爵士，凯赛尔先生的密友英王爱德华则是她教父。凯赛尔出生于德国的科隆，是一个犹太小银行家的儿子。经过一番艰苦的奋斗，他打开了通往巨富的道路。他以私立银行家和未来的英国国王爱德华七世的金融顾问的身份，将自己深深地置于英国上层社会的最高圈子里。他是欧洲当时最富有白人物之一。

虽然在交友和生意方面一帆风顺，但凯赛尔最心爱的亲人们的运气却糟糕透了。他的爱妻在生了唯上的一个女儿之后便害痲病去世，凯赛尔悲痛欲绝。妻子的死使凯赛尔放弃了自己的宗教而皈依了天主教，“以便我们能在天堂重逢”。凯赛尔的女儿毛蒂嫁给了威尔弗雷德·阿什莱少校（一位子爵的孙子），他忙的女儿埃德维娜·阿什莱出生于1901年11月28日。

埃德维娜的童年生活很不幸。虽然婚后与蒙巴顿的共同生活已远远地弥补了这一点。像蒙巴顿小时一样，埃德维娜小时居无定所。凯赛尔是个极

为成功的商人，哪里有新市场，就往哪里去，从爱尔兰到非洲，小埃德维娜跟着外祖父到过很多地方。毛蒂在 1904 年又生了个女儿，从那时起，她的身体因为遗传的痼疾而每况愈下。

虽然凯赛尔尽了最大的努力挽救他的爱女，毛蒂还是在 1910 年去世了，此时埃德维娜才 9 岁。在接下来的 3 年里，埃德维娜姐妹的生活流动性更大了。她们被不停地送往各亲戚家，在其余的时候则由家庭教师和佣人带。也许是为不妨碍她们的父亲威尔弗雷德，凯赛尔的妹妹米娜太太收养了她俩。米娜太太十分善良，埃德维娜姐妹也很爱她们的这位姑奶，不过她们还是想念自己美丽的母亲，毛蒂虽然身体不好，但总是快乐、慈爱。

埃德维娜与她的父亲合不来。威尔弗雷德高大英俊，很有魅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曾担任国王利物浦团的一个连长，后来入选为国会议员，1924 至 1929 年，曾任鲍德温保守党政府的交通部长。虽然威尔弗雷德是个头脑清楚的公职人员，但他太死板，对新鲜事物存有先天的偏见和反感。1914 年夏天，埃德维娜受到了一次沉重的打击。威尔弗雷德把她叫到书房里，告诉她：他马上就要与玛丽小姐结婚。

埃德维娜闻之脸色煞白，震惊、愤怒、伤感一齐涌上心头，她觉得自己要哭了，但眼泪一滴也没有，埃德维娜认为父亲对她心爱的母亲不忠诚，伤害了她那亲爱的母亲。当然，埃德维娜孩子气的一厢情愿的想法对威尔弗雷德是不公开的，毕竟她只有 12 岁。

玛丽这位继母从一开始起就没能和埃德维娜建立起友好的关系。如果说埃德维娜与她的父亲之间的感情微乎其微的话，那么对于玛丽，埃德维娜则厌恶到了极点，玛丽的反应可想而知。埃德维娜继承了她祖父钢铁般的意志，凯赛尔就是靠这一点从一个穷小子发迹成了世界闻名的大富翁。而且，即使只有 12 岁，埃德维娜在整个家族中也是最聪慧的。冲突不可避免，不久，埃德维娜被送往寄读学校。战时的寄读学校与其他学校一样，潮湿阴冷，教育质量很差，而最令埃德维娜感到不舒服的是由于外祖父的大力资助，她的生活要比同学们高出很多。后来，她转到了英国第一所家政学院。在这里学员们得自己照顾自己，就是做饭这样的事也不能靠别人，学院的教育目的就是让他们成为善于持家的妻子或成为家政学院的教师。继母玛丽把她送到家政学院可能没安好心，希望作饭和拖地这样的家务活能消磨掉埃德维娜非凡的心智。不过实际效果刚好与玛丽的主观愿望相反，埃德维娜在家政学院受到的训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派上了用场。

一战结束后，埃德维娜不想再呆在学校里，于是愉快地接受了外祖父的邀请，到凯赛尔家住，成为布鲁克庄园的女主人。18 岁的埃德维娜承担起了十分繁重的任务。布鲁克庄园或许可以算得上是伦敦最华丽的府邸，它是凯赛尔财富的象征。凯赛尔对于自己从一个穷小子发迹为大富豪深感骄傲，希望让别人知道他的阔气。庄园里的每一样都能显示出主人的富有，就连甬道都是大理石铺的，而宽敞的客厅可容纳 100 多人。

埃德维娜在这里大开了眼界，不过天生的气质和非凡的头脑使她很快适应了高朋满座的场面，这一点与她未来的丈夫蒙巴顿一样。作为女主人，她常招待的客人包括阿斯奎斯首相、丘吉尔父子、鲍尔福和两党的其他要人，伦敦的大银行家，当然还有皇室的成员们。她的年轻漂亮、聪明活泼和周到细致的款待让这帮老家伙和有些年纪的人深感愉快，而她对某些问题一针见血的领悟能力和新鲜有力的见解让这些领导者们惊叹不已。

与她的外祖父相处，埃德维娜却遇到了不少困难。在晚年，凯赛尔的脾气暴躁恶劣，一是由于长期为妻子和女儿的去世深感悲伤；另一个原因是战争期间由于他在德国出生而受到迫害。1915年，他与里丁伯爵一道与美国政府签订了租赁法案，然而，像路易斯亲王一样，他被指责对英国不忠诚。最后凯赛尔给泰晤士报写了第一封也是唯一的一封信，信中有部分内容是这样的：“我在英国生活了50年，我的全部利益——家庭、事业和社会关系全集中在这里。我所有的适龄男性亲戚都在国王的军队中服役，我对英国的忠诚从来就没改变过，也从未受到任何怀疑。顺便说一句，我深深地对德国政府进行战争的方式感到恐惧……”

然而，这封信并没有平息对他的指责。反德联盟试图采取行动把他从枢密院里赶出去，虽然没成功，但此举严重地伤害了凯赛尔。随着战争的结束，人们对这些都淡忘了，但他没忘。

在家里，凯赛尔却成了暴君。留着大胡子，光头，矮小肥胖，目空一切。他会因为一个汤匙掉在地上而大发雷霆。他的仆人们竟然能容忍他，并对他如此竭尽忠诚，简直是个奇迹。有时他也和埃德维娜吵得一塌糊涂，不过他们谁也不曾伤害了对方。血缘关系是条天生的纽带，更何况他们相互尊重，真心地关心和爱护对方。

1920年凯赛尔委托她全权管理布鲁克庄园，埃德维娜愉快胜任。外界活动也多了起来，对她的邀请从来就没断过。闲暇时，她出去跳舞、野炊、到海上泛舟。埃德维娜独特的风采赢得了人们的交口称赞，伦敦的一家报纸曾称她是英国最伟大的女主人。自然有许多年轻小伙子追求她，但埃德维娜并没有恋爱。凯赛尔对她的管束很严，亲自过问和批准她所接到的每一个邀请，并且没有监护人，决不让她出去。

当然以埃德维娜的才智想摆脱这种管束是很容易的，不过她并不常这么做。

埃德维娜手头并不是很宽裕，凯赛尔大事慷慨，小事仔细，他一年给埃德维娜500英镑，买衣服的费用也包括在这里。钱不多，但她也不觉得缺什么，她不需要购置太好的衣物，随便穿什么，埃德维娜都楚楚动人。

凯赛尔患有支气管炎，受不了伦敦阴冷的秋季，因此他听从了医生的建议去法国南部小住。当然，埃德维娜要同去照料她的外祖父。当他们返回英国时，埃德维娜已做好了恋爱的准备，恰在此时蒙巴顿远航归来。

蒙巴顿与埃德维娜一见钟情。埃德维娜深深地爱上了他，她的爱自然、热烈地从心底涌流出来，“像鱼雷一样迅猛”，这是她做事的一贯风格。蒙巴顿也一样，但这次倒是沉得住气，没急着向埃德维娜求婚，他已经受到过一次打击，更不想受埃德维娜的伤害。不久后他又将陪同威尔士亲王出访印度，他不想再当一次被捉弄的未婚夫。不过蒙巴顿还是为这件事作了精心安排，他带埃德维娜见了他的父母。

路易斯亲王与埃德维娜一见面就立即相互喜欢上了，路易斯风趣地说：“迪基，如果你不马上与她订婚的话，我可就要向亲爱的埃德维娜小姐求婚了。”蒙巴顿心中暗喜，不过还是持重得很。

然而没过多久，路易斯亲王就去世了。这对蒙巴顿是个突然而沉重的打击。此时，蒙巴顿正带着埃德维娜在康斯坦丁堡与他的二哥团聚，接到电报后，蒙巴顿悲痛欲绝，立即先期赶回伦敦。四天之后，埃德维娜小姐也回到英国。凯赛尔的秘书到利物浦车站接她，一见面就告诉她凯赛尔刚刚去世。

第二天蒙巴顿来看望埃德维娜。曾经充满了温暖的布鲁克府邸现在却显露出阵阵凄凉。埃德维娜孤单地坐在外祖父的书房里，期盼着蒙巴顿的到来。

此刻，他们都是寂寞凄苦，渴望着安慰。虽然蒙巴顿敬爱他的母亲，但路易斯却是他生活的坐标。对于埃德维娜，凯赛尔像是一个避风港，是唯一能给她以亲情温暖的人。尽管老头子晚年脾气暴躁，但他是埃德维娜精神上的支柱，只要他在场就没有什么事能让埃德维娜感到害怕。

虽然蒙巴顿的痛苦比埃德维娜更深，但是她的失落感却更强烈。毕竟蒙巴顿已有了自己的职业，有了奋斗的目标，路易斯的逝世更使他定下了狮子般的雄心，此时停泊在朴茨茅斯港内的军舰正等着他和威尔士亲王去印度远航。可是埃德维娜却不知道该怎么办：去父亲威尔弗雷德和玛丽那里肯定不受欢迎，而唯一能给她希望的蒙巴顿却要出海 8 个月，在埃德维娜看来这不啻是 8 个世纪！埃德维娜把头埋在蒙巴顿的怀里，无声地哭泣。

蒙巴顿被深深地感动了。不管表面看来多么坚强，蒙巴顿在骨子里却有着德国人典型的多愁善感，更有对那些依赖他的人的忠诚。他可能考虑到是不是放弃印度之行，不过正如事实所表明的那样，他不能接受将改变他的既定目标的作法。突然他来了灵感。蒙巴顿知道印度总督雷丁伯爵是凯赛尔的好朋友，他问埃德维娜：雷丁伯爵是否曾邀请她的祖父和她去印度。埃德维娜说邀请过，于是蒙巴顿拿出了他的建议：“为什么你不到印度去一趟呢？这样我们就能愉快地相聚了。”

这个建议向埃德维娜也向蒙巴顿展示了全新的激动人心的希望，与此相比，哀伤渐渐消退了，取而代之的是对未来的梦想。在确认了蒙巴顿的诚意之后，埃德维娜表示她愿意去印度。虽然那时她还不知道怎样才能成行，但她知道无论如何自己都要去。

凯赛尔留下了 400 万英镑的遗产，埃德维娜得到了其中的 75 万英镑，每年另有 3 万英镑的其他进项。不过这笔钱只能在婚后或她已满 21 岁后才能使用。这样除了定期供给的很少的一点生活费外，埃德维娜两手空空。

1921 年 10 月 21 日，埃德维娜到朴茨茅斯为蒙巴顿送行。此时，她仍然不知道去哪里弄到路费，不过有一条倒是可以肯定的：她的父亲不会提供帮助。她曾到威尔弗雷德那儿去了一趟，结果对她的接待比预想中的还要冷淡，继母玛丽对前一阵报纸上对埃德维娜的赞美感到厌烦。从朴茨茅斯回来后，埃德维娜直接去了她姑奶家。

凯赛尔的这位妹妹借给埃德维娜 100 英镑，其实如果想要埃德维娜在旅途中过得舒适一些，凯赛尔女士至少应该拿出 200 英镑。凯赛尔兄妹俩性格一样，在小事上算得很细，不太爽快。于是，埃德维娜只好坐三等舱，乘客轮前往印度。

在埃德维娜为旅行作准备期间，蒙巴顿已抵达孟买。雷丁伯爵为威尔士亲王举行盛大的欢迎仪式，作为总督陪同威尔士亲王在各地参观，为亲王一行安排了各种各样的娱乐活动，骑马、骑象、玩马球、打猎，还专程到尼泊尔猎虎。让蒙巴顿深感愉快的是小时候路易斯向他讲述过的地方，他都走到了，就连搭乘火车的方式也和路易斯说的一样。不过，蒙巴顿已经感觉到了 3 亿印度人要求独立的情绪，“抵制运动”随处可见，就是在威尔士亲王的欢迎仪式上，也有许多印度人在场示威，要不是英国军队拼命维持秩序，欢迎仪式可能会被冲散。此时尼赫鲁正被关押在英国人的监狱里，威尔士一

行明显地感到那个城市的印度人对他们不感兴趣。这段经历对蒙巴顿日后在印度的政治生涯很有影响。

1922年2月中旬，蒙巴顿随威尔士一行回到德里。那时新德里还像是一个大工地，正处于修建之中。蒙巴顿刚刚安顿好就接到了埃德维娜的电话，“迪基，我已在孟买了，”埃德维娜的声音里透着激动和喜悦，“我手里的钱只够坐三等车厢了，可站长说只有印度人才坐三等车厢，我不能坐。为什么我就不该和印度人一块旅行呢？”

听到小心肝打算乘闷热拥挤的三等车厢，蒙巴顿心里很着急。他见到过当地印度人拉家带口蜂拥挤上火车的情形，觉得埃德维娜的想法很可笑。不过他深知埃德维娜讨厌自高自大，因此在回话时他尽量不让这种想法流露出来。“埃娜，印度挺有意思的，”他说，“但我想你会觉得很不舒服，听我安排吧。”

第二天，埃德维娜来到了德里，坐的是一等车厢。为了在印度与她的迪基相聚短短的6天，埃德维娜往返旅行了12000英里。

威尔士亲王一天的日程安排一般都是这样的——上午8:30与总督和客人们共进早餐，9:30检阅部队，10:30参观医院；下午1:30与市民代表共进午餐，3:00马球赛，6:00招待会，晚间8:30晚餐和舞会。由于在大部分活动里，蒙巴顿都要陪同威尔士亲王，因此留给埃德维娜的时间少得可怜。此外，由于总督要接待大量客人，因此，蒙巴顿和埃德维娜很难找个地方单独呆在一起。

不过蒙巴顿还是找到了一个好地方并挤出了时间。他不再疑虑埃德维娜对他的爱，而他的激情也在激烈竞争的压力下迸发出来——在德国，每个未婚的英国小伙子在认识了埃德维娜之后，都立即向她展开了猛攻。在德里大学13号房间（雷了伯爵念书时的寝室），蒙巴顿正式向埃德维娜求婚，埃德维娜以她特有的直率回答道：“那当然，迪基。”

6天很快就过去了，蒙巴顿继续陪同威尔士亲王作东方之行，又到了马来亚、香港、锡兰和日本。在日本，威尔士一行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在日本所见到的一切在他脑海里留下了深刻而持久的印象。到达横滨时他写道：“我看到了从未见过的精良船只，这使我感到日本在世界上已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一般官方流行的观念是，日本仅仅是西方技术和设备的摹仿者，一个蹩脚的抄袭者。此刻，蒙巴顿很难相信这种说法了。他设法参观了他们最新的战列舰。在这以前，英国海军人员是被拒绝参观的。如果不是他们把蒙巴顿当成一个无足轻重的皇家随员的话，蒙巴顿可能也难逃此运。正巧那天舰长不在，蒙巴顿得以参观了舰上的所有部位，并对他的所见所闻称赞不已。旅行结束时，他总结说：“这次参观使我对日本资源、舰只和军队的了解大开眼界。”

旅游团参观日本后返回英国。对蒙巴顿来说，这是一次迷人的经历。他不仅发现了日本的实力雄厚，还学会了在千变万化的世界里怎样处理各种各样的事务。回到英国的蒙巴顿已变得更富有智慧、更老练成熟了。回来后的一件主要事情是与埃德维娜完婚。这件事已成为他生活中一件至关重要的大事。

1922年7月22日，“荣誉”号返回朴茨茅斯。一见到埃德维娜，蒙巴顿即发现婚礼正在紧锣密鼓地准备着。埃德维娜已经高效率地办好了结婚证书，这样，她就能使用外祖父留给她的遗产了。凯赛尔的代理人为她在银行

的帐号里存了上万英镑。

有了这笔现钱之后，埃德维娜所作的第一件事就是买了一辆灰色的罗尔斯-罗伊斯轿车，作为礼物送给他的丈夫。蒙巴顿非常喜欢这件礼物。

接着送给埃德维娜的结婚礼物开始涌入布鲁克府上。埃德维娜没几件首饰。虽然埃德维娜崇尚简单自然，她还是很喜欢这些名贵的戒指、项链、头饰、胸花和钻石框的眼镜（她有点近视）之类的东西，因为在任何一方面都想领导潮流是她的天性，她愿意成为舞会上的白雪公主。

要不是蒙巴顿和埃德维娜有几匹西伯利亚良种马，在接下来的四周里他俩可能会给累垮了。夸张一点说，差不多每时每刻都有人来邀请他们，他俩的每一顿饭都被热情的伦敦女主人所打断。对他们的邀请包括在白金汉宫举行的盛大宴会，在那埃德维娜挥洒自如——她的风度在给凯赛尔爵士当女主人时就已经形成。蒙巴顿和埃德维娜抽空到她家里去了一趟，这次拜会充满了愉快。埃德维娜头一次在威尔弗雷德和玛丽太太的家里感受到了温暖和热情，她与玛丽太太冰释前嫌。当然这要归功于蒙巴顿，他太会来事了。

1922年7月18日，蒙巴顿与埃德维娜在威斯敏斯特举行了婚礼。这是一个盛大的婚礼，凯赛尔的在天之灵也会为此感到自豪。在他俩婚事的消息公布出来时，新闻界做了一番大张旗鼓的宣扬。俩人都为此而陶醉。埃德维娜喜不自禁地写道：“我听说在伦敦，咱们的订婚消息与阿姆斯特朗凶杀案并排着登在红色的大幅广告牌上，有4英尺高。有意思吧？”

在婚礼上，埃德维娜披着雪白的婚纱，像个天使。妹妹玛丽·阿什莱是伴娘，她的女宾相还有四个希腊公主和蒙巴顿长姐的女儿们。整个皇室都来了，从国王乔治、王后玛丽和王后亚历山大到最小的王子全到了；欧洲各皇室都有人来；此外还有800多名其他客人。在国会广场的栏杆外，有2000多人驻足观看。《约克邮报》用了整整13版的版面来报道这场婚礼，国内的其他报纸也不甘落后。《星报》说这是一次世纪的婚礼。《每日电讯报》的说法比较适当，这是这一年最盛大的婚礼。不管人们相信哪种说法，这个重要时刻的确吸引了全欧的注意力。

蒙巴顿的引宾员全是皇家海军军官。他的伴郎是威尔士亲王，此公身着海军元帅制服。蒙巴顿身穿蓝色的海军长大衣，佩戴着金黄色的海军上尉肩章，腰挂路易斯的金柄短剑，端的英武挺拔。他看上去比威尔士亲王更稳重有力，虽然后者比蒙巴顿大6岁。

蒙巴顿与埃德维娜之间的爱情真挚而热烈。虽然在日后的生活中两个人的关系出现过波折，但总的说来，他们之间的感情不仅没有随着岁月的流逝而稍减，反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与日俱增。蒙巴顿始终保持着对周围事物童稚般的好奇和热心，以及敏锐的观察力和主动进取的精神，婚后丝毫没有损害他的勃勃雄心和精明干练。

埃德维娜则对生活抱有极大的热情，她的开朗大度很容易赢得人们的好感，而她的聪慧机敏又令人深感敬佩。他俩还有个共同特点，就是都精力充沛，似乎永远也不会疲倦。

当然，这对志同道合的夫妇都承认，这桩婚事为他们两人都带来了物质上的利益。蒙巴顿生活品味很高，但他除了军官薪金之外没有别的收入，而埃德维娜的巨大财富不仅能使蒙巴顿过他所希望的那种生活，而且如果不是必不可少的话，还对于他实现海军元帅的梦想很有助益。埃德维娜也不会不清楚蒙巴顿与皇室非同一般的亲缘联系，也使她对蒙巴顿的未来坚信不

移。

婚礼进行到下午，蒙巴顿与埃德维娜已经与客人们握了 500 次手，还有 300 多人待握，忙得不可开交。送走了国王和王后之后他俩感到自由了，蒙巴顿对埃德维娜说：“亲爱的，快去上楼换衣服，我们离开这儿。”

满怀着幸福和喜悦，蒙巴顿与埃德维娜相拥走上了漂亮的罗尔斯—罗伊斯轿车，无声无息地穿过布鲁克北大街，向布劳德兰府驶去，阿什莱上校已答应把房子借给他们。

尽管人们都祝愿他们和睦美满，但是如果两个人太相像，那么争执是不可避免的。他俩的第一次口角就发生在蜜月里，当然，他们在争执中都很有风度。

在海军中所受的训练和德国人那种典型的作风使蒙巴顿成为一个不知疲倦的计划制定者。他为蜜月旅行精心制定了在欧洲大陆上的“摩托化开进”计划，详细到每天要住哪个宾馆，在几点钟喝茶。这超过了埃德维娜所能忍受的程度，她喜欢兴之所至，走哪算哪。当他们乘着罗尔斯—罗伊斯离开巴黎时，蒙巴顿让步了。

当天晚上，他们到达了法国南部的一个小镇上，发现所有的旅店都被来旅游的美国人和德国人住满了。蒙巴顿费了很大气力才在一家旅店里找到了只有一张床的小阁楼。阁楼里又脏又热，床很小还吱吱作响。夜里，蒙巴顿掉在地上给摔醒了。

他拉过一把破椅子坐下，然后推醒埃德维娜，带着点怒意又带着些睡意，翻来覆去地向埃德维娜指出，他认为这样随兴而走、漫无计划是很愚蠢的。两人理论了三四个小时，直到天亮埃德维娜才说“随你的便吧”。这样，蒙巴顿赢得了两人之间第一次战斗的胜利，不过来日方长，他还没赢得一场战争。

走遍了欧洲之后，蒙巴顿还有 5 个月的假，他决定到大西洋彼岸去继续他们的蜜月。由于美国之行时间有限，因此蒙巴顿没惊动在美国西海岸的亲戚们。在华盛顿，美国总统华伦·哈丁在白宫设晚宴为蒙巴顿夫妇接风。蒙巴顿从他的新朋友罗伯特·汤姆森上校那时借了辆福特牌轿车。和埃德维娜开着这辆车游历了纽约、洛杉矶、芝加哥还去了科罗拉多大峡谷、尼亚加拉大瀑布和好莱坞。在好莱坞，他们受到了著名喜剧大师卓别林的款待，他们还一起拍了一部电影。卓别林后来成为蒙巴顿的终身朋友。

1922 年 12 月，蒙巴顿和埃德维娜离开美国。像他的父亲路易斯亲王一样，蒙巴顿在“课外时间”逍遥了 3 年。不过这 3 年并没有虚度，这段历程实际上是蒙巴顿通向希望之路的“间接路线”，它将对蒙巴顿的前途产生直接的影响。在回国的旅途上，蒙巴顿轻轻地从埃德维娜的身边走开，一个人来到客轮的前甲板上。此时，蒙巴顿的勃勃雄心，正像一团火焰，燃烧，升腾，轰然作响，不可遏制。他急不可待地要返回皇家海军。正是：喜得佳人把家成，再赴军旅建奇功。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章分解。

第四章 “凯利”号舰长

刻苦努力打基础，平常之中见杰出；
英勇凯利拼死战，重大责任一肩负。

20 年代初的皇家海军正处于困境。随着和平时期的到来，英国政府颁布了大量裁减军费和人员的指令。在上尉这一级军衔中共有 350 名被解职，截止 1923 年底，蒙巴顿 52% 的同级海校同学要离开海军。后来，有人问裁减委员会的委员柴尔菲尔德，为什么蒙巴顿未被裁掉，柴回答说：“在委员会工作的人所遵循的唯一原则是：以是否对海军有好处来取舍人。我了解蒙巴顿，并且认为留下他对海军有益。”

1923 年 1 月，蒙巴顿奉命前往“复仇”号无畏战舰服役，有意无意之中，蒙巴顿又有了一段与路易斯惊人相似的经历。此时地中海舰队正在封锁达达尼尔海峡，准备对付土耳其军队的进攻。蒙巴顿在康斯坦丁堡赶上了“复仇”号军舰，由于不让带军属，埃德维娜就留在伦敦。这是他们众多分离中的第一次。埃德维娜开明地接受了这次别离，因为她清楚作为一个海军军官的妻子这是难免的。

毫无疑问，蒙巴顿很高兴又回到男人的世界。这里才是他发挥心灵的激情的地方。与和女人们在一起相比，他和男人们特别是水兵们在一块显得更自由自在，并且只有当卖力工作的时候，他才觉得最畅快。随着洛桑公约的签定，土耳其危机得到解决，于是“复仇”号返回马耳他。

1924 年 2 月 14 日，蒙巴顿的女儿帕特里夏在伦敦出生，她的教父教母是威尔士亲王夫妇。7、8 月间，蒙巴顿又随威尔士亲王到美国作了短暂的出访。9 月，在他的请求下，蒙巴顿奉命前往朴茨茅斯皇家海军通讯学校学习远程联络方面的课程，这是他对路易斯又一次有意识的模仿（路易斯曾任信号官），当然蒙巴顿本身也的确对新近发明出来的电子仪器颇感兴趣，这些仪器对于海上通信联络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很快，埃德维娜在朴茨茅斯附近的乡下租下了艾斯丁堡。艾斯丁堡坐落在一个树木繁茂的公园里，带有维多利亚时代那种典型的浪漫风格，各房间看上去很随意地组合在一块，宽大舒适，他们在艾斯丁堡养了许多宠物，其中包括一头幼狮、一对小种袋鼠和一只食蚊兽。蒙巴顿还买了辆新型跑车和一只小快艇。

显然，蒙巴顿要好好享受一下家庭生活的乐趣，不过这并没有影响他在海军通讯学校取得极其优异的学习成果。他的同学迪克回忆蒙巴顿在海校的生活时曾说过这样一段话：

无须任何督促，他就会尽心尽力地把各项工作做好。

他没浪费过一分钟。我对他的钻研精神和思考能力感到吃惊……他一点也不清高自大，是最容易愉快相处的人。我们都很喜欢他，也很佩服他，这一点与他有好几辆轿车和一只快艇无关。

蒙巴顿开始稳步向他的目标前进。他极其精确地制定并执行这样的作息时间表：7:30 起床，8 点到校，学到下午 4:30，然后回家玩高尔夫球或马球；5:45 至 6:30 带女儿散步，然后再回学校继续他的发明，10 点回家吃晚饭，与客人们聊天；11:30 开始写大量的回信。

蒙巴顿非常具有创造性。他从不机械地学习知识，也不局限于学校设置的那些课程上。别人解决不了的问题常常激发他的灵感，即使他的前九个新创意都没能实现，他仍会提出第十个。蒙巴顿从不满足于事物的现状，而

总是想方设法地改进它们。他的这个特点不但表现在海军业务上，而且还表现在日常生活中。他发明了一种弹性鞋带，这样他换鞋时就不用解鞋带了；他还是拉锁式男裤的发明者，他把在裤子上装拉链这个主意告诉了威尔士亲王，结果这个主意从伦敦的邦德大街传遍了整个世界。

以第一名的成绩从通讯学校毕业后，蒙巴顿被分配到预备舰队，作本庭克将军的副官。这个分配不对蒙巴顿的胃口，于是他提出到格林尼治皇家海军学院深造，继续攻读高级电子学理论。在学习期间，他动用了所有的关系。六个月后，蒙巴顿如愿以偿地就任地中海舰队司令凯恩斯上将的助理无线电通讯官。正像曾经指出的那样，与皇室的亲缘关系的确帮了蒙巴顿大忙。

蒙巴顿的部分工作是向海军军官候补生教授无线电基础知识。他是个出色的教师，蒙巴顿用自己的热情引发了学生们的兴趣。他对课程的解释通俗易懂，只要能用一般的语言描述出来，他就决不用术语。在讲授晶体管的原理时，他用彩笔在一个玻璃瓶上画了许多线。结果，抽象的原理，他用几分钟就讲清楚了。蒙巴顿还写了一本小册子——《看图识字：无线电入门》。这本小册子在皇家海军中得到了广泛的使用。

1929年岁末，蒙巴顿来到朴茨茅斯海军学校讲授远程通讯，同时在低级军官和水兵中挑选发报员，这时蒙巴顿已经是一个相当出色的发报能手。他的一个学生曾这样说，“无论提什么问题都难不倒他”。虽然蒙巴顿已承担了地中海舰队无线电通讯的大部分工作，并且还要授课，但是他的精力远未用尽。于是蒙巴顿又开始学习法语，尽管他说法语始终带着牛津腔，但他还是很好地掌握了这门语言，特别是在技术方面，后来他编写并出版了《英法海军术语词典》。

在此期间，蒙巴顿的马球技术突飞猛进，他组建了一支由海军军官组成的马球队并任队长。这些军官们原来根本就不会打马球，蒙巴顿带着他们练球、比赛，总结经验教训，设计新战术、新搭配。蒙巴顿对球队最主要的贡献是他的领导才能。

无论是在球场上，还是在战场上，蒙巴顿都特别善于鼓舞士气，使他的手下发挥出超常的战斗能力并能使他们整体的力量超过个人力量的总和。经过一年多的训练，蒙巴顿率领海军马球队击败了陆军马球队和空军马球队。

蒙巴顿与众不同的地方是无论干什么，他都力求干得彻底、完美。他不满足于能打打马球，而且还写了一本内容非常好的马球教材——《马球入门》。他为这本书设计了漂亮的封面，用笔名“迈克”出版，这本书销遍全球。后来，他还组建了皇家海军马球协会。

1931年，蒙巴顿被任命为地中海舰队无线电联络官。这样，他终于有了一个把自己的思想付诸实际的宝贵机会。很快，他在舰队司令部设置了无线电通讯中心，这在世界各国海军中是领导潮流的。在该中心可以控制和监视整个舰队的通讯。蒙巴顿还设计了一个通讯系统，通过它可以在一分钟之内与地中海舰队的所有30艘驱逐舰交换情报。

另一件使蒙巴顿大受水兵们欢迎的事是他把电影放映设备引进到了各军舰上。

在1921年，只有最大的几艘军舰上才放电影，因为当时的扩音设备很贵，一套要用400英镑，超出了海军部的预算。为解决这一问题，蒙巴顿自己设计了一套扩音设备，主要部件由舰队维修厂自产，其他配件蒙巴顿亲自

去商店购买，整套设备只需 85 英镑。后来蒙巴顿组建了皇家海军电影公司，请肯特伯爵作赞助人。由于蒙巴顿与英国和美国制片商的私人友谊，皇家海军经常能看上新电影，其中有些影片还没在伦敦或纽约公映。

27 岁时，蒙巴顿已获少校军衔，1932 年，他晋升为海军中校。在和平时期，蒙巴顿军衔的晋升是相当快的。他的提前晋职部分是由于他在 13 岁半就加入皇家海军了（此时皇家海军的最低入伍年限已提高，但更主要的还是由于他非凡的才干。他的背景当然也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在谈到这个问题时，大多数海军军官认为蒙巴顿的才能与他的晋升是相称的。

1934 年，蒙巴顿就任新建造的“勇敢”号驱逐舰舰长。“勇敢”号的设计航速是 36 节，但蒙巴顿设法使它开到了 38.2 节。

像路易斯亲王任舰长时对自己军舰的态度一样，“勇敢”号成了蒙巴顿的心肝宝贝。蒙巴顿挑选的水兵真可以说是高大的魁梧，瘦小的精神，个个看上去有运动员的气质（这是路易斯传授给他的经验）。蒙巴顿让他的副官为每个船员作了卡片文件，他细心地研究了这些卡片，并且记住了每个人的名字及其背景情况。当蒙巴顿到某个部门时，他用昵称与水兵打招呼，像朋友一样询问他们在舰上或家里有什么难处，使水兵们觉得舰长了解并且关心自己，实际上蒙巴顿确实是这样。当然，蒙巴顿的这些苦心为的是使“勇敢”号成为整个舰队的明星。

不久出航的命令下达了，“勇敢”号与整个驱逐舰队远航至新加坡，到新加坡后，蒙巴顿将转任“威斯哈特”号舰长。这对蒙巴顿是个痛苦的打击，因为那些老驱逐舰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制造的，相比之下航速很慢。在航行途中，蒙巴顿在“勇敢”号上的工作热情没有丝毫的减弱，这就是他的特点，无论做什么事情，不干则已，干就干好。在新加坡，蒙巴顿依依不舍地告别了“勇敢”号。当他登上“威斯哈特”号时，失望地发现这艘老驱逐舰的状况比想象中的还要差。不过他很快就振作了起来。不管怎么说，“威斯哈特”号已经成了“他的”军舰。按照蒙巴顿的脾气，只要是他的东西，无论什么都是最好的或者他要使它成为最好的。此外，“勇敢”号上的舰员都跟着他来到了“威斯哈特”号上，此时他们对蒙巴顿已忠心耿耿。

埃德维娜也来到了新加坡，她是乘坐跟在舰队后面的客轮来的。当蒙巴顿动身返回马耳他时，埃德维娜继续去爪哇观光，临走她托“威斯哈特”号上的水兵替她捎回去一只小棕熊。

返航用了五个星期，在此期间，蒙巴顿完成了一项意义重大的发明。路易斯亲王发明了巡航指示器，他的儿子则发明了能使舰队保持队形的仪器。发明是在晚上搞出来的，白天蒙巴顿对水兵们进行了高强度的训练，从舰炮操作到通讯练习，到划船、游泳、踢球，使其部下的身体状况达到了最高峰。蒙巴顿不仅指挥和参与这些训练，而且在闲暇时候还练习马球技术，一练就是几小时。他在体育方面有句名言：“如果你是个天生的运动员，那么把书本丢在一边，按你自己的干；如果不是，那么你可以通过学习和不间断的练习来弥补它。”蒙巴顿对部下和自己在体育方面的训练不仅是为了比赛和娱乐，更重要的是他认为取胜的欲望及其在身体和精神方面的素质在战争中是十分宝贵的。

两年以后，蒙巴顿离开了“威斯哈特”号，前往海军部任职。蒙巴顿离开时，“威斯哈特”号上的水兵们没让他乘摩托艇走，而是按皇家海军对舰长表示尊重和敬爱的传统方式，由六名海军军官划船为他送行。

1936年，白厅内军种之间的争执急骤升级，焦点是海军部和空军部竞相争夺对舰队航空兵的领导权。此时，舰队航空兵同时受海军部和空军部节制。事态的发展正如人们所预料的那样，海军部和空军部互不相让，争吵激烈，几乎看不到什么妥协的希望。海军部希望能全权领导舰队航空兵，因此他们想到了蒙巴顿，指望着借助蒙巴顿的交际能力和他那些显赫的关系来加强海军部在竞争中的份量。海军部任命蒙巴顿为舰队航空兵驻白厅参谋，蒙巴顿没让海军部失望。只要是为了达到正当的目的，蒙巴顿在动用各种关系、他的魅力和埃德维娜的财产方面，没有任何不好意思。蒙巴顿不时地邀请首相鲍德福和海军部部长霍尔、第一海务大臣、两党国会议员（包括丘吉尔）海空军高级将领，有时甚至是国王来家中赴气氛轻松愉快的晚宴，或到艾斯丁堡过休闲周末。在蒙巴顿精心促成的这种随便、温暖的气氛中海空军之间的争执似乎已经消失了。像普通人一样，在美味佳肴和好心情的影响下，这帮个性极强的要人们不再那么咄咄逼人、棱角分明，而是懒散安详，宽厚随和。

经过一段时间的装备之后，蒙巴顿给他的上级提供了许多关键的好点子，在形成最后决议的正式会议上，蒙巴顿的上级据此说服了对手。结果海军部如愿以偿，除了海岸侦察航空兵和护航航空兵，其他的舰队航空兵都由海军部全权控制。对于航空兵的这种责任分配，至今还在英美等国存在争议；不过对于蒙巴顿来讲，这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他完成了上级交给他的任务。

蒙巴顿为皇家海军所做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贡献鲜为人知。他尽全力使海军部接受一项发明，这项发明是别人作出的，但蒙巴顿马上认识到了它的极端重要性。1936年，纳粹德国正在重新武装，希特勒已公开宣布他要使德国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军事强国。德国空军正在迅速崛起，英国情报机构已了解到一项秘密计划，即德国正在研制俯冲炸弹；可是英国人几乎没有相应的对付这种炸弹的反措施。

8月里的一天，蒙巴顿正在海军部大楼内他的办公室里起草文件，他的朋友罗斯海军上校突然前来造访，还带来了一位粗壮矮胖、长得很精神的男人，他叫甘兹达，是位奥地利工程师，为逃避纳粹的迫害来到了苏格兰。通过在德国的关系，甘兹达了解到德国人的新型俯冲炸弹，并找到了对待它的办法，他对产于苏黎士的一种27毫米机关炮进行了重新设计，使其射速达到每分钟500发（后来又提高到每分钟1000多发）。起初，甘兹达把这种武器推荐到美国海军军械部，但是美国人对此不感兴趣。

于是甘兹达来到英国，然而他发现英国海军部比美国海军军械部更顽固不化。

下管甘兹达怎么说，他就是没法让英国和美国的海军军官相信在未来的战争中军舰将受到来自空中的攻击，当他说到“航空炸弹将击毁战列舰”时，在场的海军军官们哄堂大笑。蒙巴顿是他最后的希望。

甘兹达后来回忆说，一见到蒙巴顿，他就感觉到了预示着两人终生友谊的那种彼此之间的吸引力。蒙巴顿的热情和恰到好处的提问使甘兹达滔滔不绝地讲出了对俯冲炸弹的威力及其防卫的见解，他的口才从来没这样好过。最后蒙巴顿不仅相信了，而且对此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因为他本人就一直在考虑军舰对空防卫问题。蒙巴顿建议甘兹达“最好去见见我的老板”。

随后蒙巴顿带着这位奥地利人与海军航空兵师长格雷上校共进午餐，饭后一块谈了五个小时。格雷上校也相信了。他笑着对甘兹达说：“先生，

我相信您是正确的，但你找错了门。我们任务是从空中攻击，你得到防空部门去。”很快，蒙巴顿说服即将出任第一海务大臣的预备舰队司令贝克豪斯爵士召集一次高级会议，听取甘兹达的设想。不过，不幸的是甘兹达在约定好的那天得了喉炎，发不出声。还是蒙巴顿代替他作了讲演。甘兹达后来回忆时服气地说：“他比我讲得精彩多了。”

后来，甘兹达与海军部的谈判陷入僵局，他不得不回到苏格兰去。行前，蒙巴顿邀请他到家中共进早餐，“我个人将买下你的发明，”蒙巴顿说，“但你得答应我一件事。”

“什么事？”甘兹达问。

蒙巴顿以异乎寻常的严肃神情回答说：“在我们最终达成协议之前，你要保证这种武器不落入他人手中。”

“我用名誉担保，”甘兹达答道。

这是一个执行起来非常困难的承诺，因为后来的轴心国各国都在寻找这种武器。

精明的日本人找到了甘兹达，日本天皇的弟弟向他表示愿以 40 万英镑和其他一些好处换得这种新型机关炮。甘兹达后来回忆时说：“如果不是答应了蒙巴顿，我肯定会与日本人作这笔买卖。”

两年之后，纳粹活动日益猖獗，甘兹达再次来英国说服海军部接受他的武器。

蒙巴顿一如既往地给予了全力支持，不过事情并不是那么顺利，直到 1939 年 4 月，蒙巴顿的朋友贝克豪斯上将入主海军部，甘兹达的机关炮才终于为皇家海军接受。甘兹达式机关炮很快被投入批量生产，并于 1939 年 9、10 月间装备部队。

实战证明，甘兹达式机关炮是海军里最好的防空武器，后来不仅每艘英国战舰都装备了这种武器，而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制造出来的美国运输舰船也几乎全部装备了这种机关炮。可以肯定，如果不是蒙巴顿的想象力和远见以及为此所作的坚持不懈的努力，英国海军部根本不会接受甘兹达式机关炮，反而会使这种威力巨大的武器落入英国的敌人手里。

在海军部工作期间，最让蒙巴顿感到心情振奋的事情就是去造船厂。蒙巴顿已在 1937 年晋升为海军上校，正在加紧活动准备再次出任舰长，他的目标是正在建造之中的“凯利”号驱逐舰。实际上，蒙巴顿一生中最心爱的东西就是“凯利”号战舰。因任“凯利”号舰长期间，蒙巴顿达到了军旅生活的最佳状态。

后来蒙巴顿在为“凯利”号战舰的舰史写前言时，曾充满感情地写道：“我是她的第一任也是唯一的一任舰长，当她还在图纸上时，我就了解了她，并爱上了她……1941 年 5 月 23 日，‘凯利’号在克里特海战中沉没，直到最后关头来临时，舰上的全体成员们仍在坚持岗位。‘凯利’号战斗到最后一刻，当她下沉时，所有的舰炮仍在轰鸣。不是我们离开了‘凯利’，而是‘凯利’离开了我们。”

“凯利”号被设计为 K 级驱逐舰的首舰，她的设计者是著名的舰船设计大师科尔先生，具体工作开始于 1936 年，此时蒙巴顿刚刚调到海军部工作。蒙巴顿参与了“凯利”号的设计过程，他向科尔提出了不少建议，其中包括新型舰桥和比原设计更舒适的乘员休息室。“凯利”号是单层驱逐舰，重 1605 吨，发动机功率 4 万马力，设计航速 36 节（实际航速 38 节）。她的火力系

统包括机关枪、鱼雷、舰炮和甘兹达式防空机关炮，舰组员额 240 人。蒙巴顿还为她装上了自己发明的航位仪。“凯利”号是皇家海军中唯一一个以海军元帅凯利命名的战舰。

“凯利”号于 1937 年 10 月 25 日下水试航，1939 年正式编入皇家海军序列。在此期间，蒙巴顿经常去造船厂了解“凯利”号的建造情况，与她的建造者们结下了终生的友谊。1939 年初，蒙巴顿被任命为“凯利”号舰长，他高兴极了。不过他并不觉得意外，虽然他自己曾声称这项任命是个意想不到的好运，实际上他一直希望得到“凯利”号，而他希望得到的东西一般都会如愿以偿。

1939 年 8 月 23 日，蒙巴顿以舰长的身份正式接收“凯利”号，并亲自在舰上升起了皇家海军军旗。浅绿色的“凯利”号安详地停泊在港湾，“她美丽极了”，蒙巴顿如痴如醉。不过，就在这一天发生了远比接收“凯利”号更重要的事件。8 月 23 日，德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和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签署了德俄互不侵犯条约，从而解除了希特勒两线作战的后顾之忧。战争的爆发仅是个时间问题。

蒙巴顿早就断定欧洲大战会再度爆发。当英国首相张伯伦及其内阁成员在慕尼黑大搞绥靖政策并高谈阔论所谓“我们时代的和平”的时候，蒙巴顿正在帮助丘吉尔夫妇加固地下室，丘吉尔言辞激烈地指出一场浩劫即将来临，然后又笑着说他得给他的夫人建个安全的地方。

在英国，除了蒙巴顿之外，几乎再没有别人注意到丘吉尔。在整个 30 年代，丘吉尔被三个政党的领导人所厌恶和疏远，“孤独地耕种着自己的那一块土地”。他的那些关于战争正在接近的警告和英国必须得采取措施保卫自己的呼吁被人们当成了耳旁风。当时的英国领导人对丘吉尔究竟讲了些什么一点也不在意，因为丘吉尔的话他们根本就不屑一顾。到了 1939 年夏天英国的政治家们开始不安地感觉到丘吉尔可能是正确的，但是俄德条约的公布仍让他们目瞪口呆。蒙巴顿对此并不感到惊愕，不过倒是激发了他的能量。

8 月 25 日，蒙巴顿率“凯利”号抵达查坦姆港，此时海军部已下达了戒备令并开始征召预备役部队。第二天早上，蒙巴顿命令全舰人员到甲板上集合，他要检阅部队并进行动员。当时的一个水兵在后来回忆到：“我看见蒙巴顿在舰桥上注视我们，他可真英武。然后蒙巴顿走下来挨个检阅我们。他那坚定深邃的目光给了我们一个强烈的感觉：他非常清楚自己正在干什么。到后来战事吃紧时，我们都相信不管怎样他都会带我们回家，只要他在场，再危险的情况也不会让我们觉得难以忍受。我曾服役过的那些军舰的舰长们从未给过我这样的信任感。此外，蒙巴顿长得非常精神，我们都为舰长先生的风度感到自豪。”

看着这些年轻的水兵们，蒙巴顿满心愉快。现在他已经得到了最好的驱逐舰，他还要把眼前的这些小伙子们训练成最优秀的水兵，使“凯利”号成为皇家海军的雄鹰。蒙巴顿在队列前说道：“我一向认为只有快乐的军舰才能成为最有战斗力的军舰。这就是我开始这项使命所要采取的方式。我们已到查坦姆港来装填弹药，海军部给了我们三周时间来完成这项任务，现在我决定，这项任务在三天内完成，全看你们的了……我已为‘凯利’选了一个座右铭：坚持。希望你们不要辜负它。”

三天之内，“凯利”号装弹完毕。

1939 年 9 月 3 日，正当蒙巴顿向舰上的军官们讲解如何操作他发明的

航位仪时，值班军官递来一份舰队司令发来的电报，内容是：“我经常对你们说：‘如果战争在此刻爆发，你们必须清楚自己该干些什么’，现在我正式通知你们，战争已经开始。”

蒙巴顿马上通过话筒向全舰人员传达了这条消息，最后他说：“因此，当我们离开港口时，我们必须作好战斗的准备，我们可能会与前来消灭我们的敌舰相遇，我们必须首先发现他们，先敌开火，消灭他们。”

当天晚上蒙巴顿又收到了海军部发来的只有九个字的电报：“丘吉尔重返皇家海军。”这条消息使皇家海军的士气像火箭升空般地高涨起来。

蒙巴顿对丘吉尔再次出任海军大臣喜出望外。现在蒙巴顿不仅拥有了对自己的信心，对“凯利”号的信心，对部下的信心，而且又对最高层领导的能力和想象力有了信心。他深信那些进步的思想（包括他自己的思想）终于有了施展的机会。

此外，或许蒙巴顿也想到丘吉尔的复出对自己的前途没什么坏处。当然不能过分地把这一点与自私联系起来。从战争爆发的那一刻起蒙巴顿的雄心壮志便与爱国激情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并由此产生一个坚定不移的直接目标——找到敌人，消灭敌人。为此他调动起全部力量，聚精会神地、甚至是毫不留情地去追求梦寐以求的荣誉。

第二天，“凯利”号便开始了真正的战斗。清晨，一艘德国潜艇向“凯利”号进行了鱼雷攻击，蒙巴顿指挥“凯利”号迅速掉转方向，进行规避，并向德国潜艇所在方位投掷深水炸弹。一声问响之后，海面隆起，不久海面上布满了被炸死和震晕的鱼群，随后大量油污也漂现出来。“凯利”号在首战中击中了德国潜艇，但不能确认它是否已被击沉。

9、10月间，“凯利”号与德国潜艇进行了残酷的战斗。它共击中了九艘德国潜艇，其中确定击沉一艘，其他几艘的毁伤情况不明。由于“凯利”号的最初使命是在马耳他，因此舰上既没有集中的供热系统，包括蒙巴顿在内的全舰乘员也没有冬装，因此当“凯利”号在北极圈以北、挪威海岸线以东的广大海域行动时，蒙巴顿和他的部下不仅要与死亡、劳累搏斗，而且还要与严寒搏斗。在极地漫长的寒夜里，水兵们因陋就简地采取了各种防寒措施，有的穿上了救火服，有的头上扎起了毛巾……尽管战斗残酷，生存条件艰苦，“凯利”号的士气却始终十分高昂，这要归功于它的舰长。“蒙巴顿让我们感到他清楚我们的难处，”一个水兵后来回忆道，“他使人们觉得我们中的每个人都是非常重要的……最主要的是蒙巴顿一直在快乐地战斗，战斗越残酷、危险越大，他的精神头就越高”。蒙巴顿独特的幽默感没有丝毫的做作，而是充满了孩子气，这使他与水兵们相处得十分融洽。他们叫他“快乐的路易斯”，他们觉得“路易斯不希望出现奇迹，但如果奇迹没出现他会非常失望”。

10月末，海军部命令“凯利”号截击装有300名英国战俘的德国军舰，该舰企图通过中立国挪威的海岸线溜回德国港口。海军部在命令中告诫“凯利”号不准破坏挪威的中立。接到命令后，蒙巴顿立即率“凯利”号前往挪威水域，他根本不理睬海军部的告诫。当“凯利”号已非常接近挪威海岸时，一艘挪威小炮艇突然从浓雾中冲出，打着信号灯警告“凯利”号：赶快滚开，否则我要开火了。蒙巴顿见之大笑，命令“凯利”号靠近小炮艇，然后通过麦克风向艇长喊到：“请转达对我的表兄奥来弗亲王的问候，祝他健康。”

11月下旬，一场风暴刮掉了舰尾的栏杆和救生船，“凯利”号返回赫本

重新装配，蒙巴顿给他的部下放假两周，让他们回家过圣诞节。在出航的前一天，一个英国叛徒在柏林电台点了蒙巴顿的名：“你们的蒙巴顿先生在哪？他在泰恩河上，别以为我们不知道。但是他再也出不来了。”

第二天，“凯利”号奉命出海搜寻一般 U 型潜艇，它刚刚在港口击沉了一艘英国商船。蒙巴顿提出港口可能已被德国人布下了水雷，但他的意见未被重视。当“凯利”号全速驶向一艘正在燃烧的油轮时，蒙巴顿突然感到舰底碰上了什么东西，他马上意识到“凯利”号撞上了水雷。这枚可怕的水雷一共在舰底擦了三次，最后撞上了螺旋桨爆炸，“凯利”号的舰尾被掀起了好几英尺，当它落下后已经不能动了。

在这个令人恐惧的过程中，除一人外，“凯利”号上的其他人员全都坚持在自己的岗位上。在底舱的一个填煤手感到水雷就在他的脚底下，惊恐地跑到了甲板上。

“凯利”号被拖回了码头，蒙巴顿严厉地对部下说道：“今天我们经历了一场在战争中一艘军舰可能会遇到的最严峻的考验，水雷不停地碰击舰底，而我们所能做的唯一事情就是等着它爆炸。幸运的是这颗水雷威力不大，并且直到舰底才爆炸。在这场生死考验中，240 位乘员中的 239 个都像我所期望的那样坚守着自己的岗位，但有一个人被吓破了胆，抛弃了他的职责和他的战友。”

“当他被带到我面前时，他告诉我说他知道擅离职守是死罪。但也许会让你们感到吃惊的是我放过了他，只是给了他一个警告。我还给了自己一个警告，因为在四个月的时间里，我没有清楚地向你们表明我是个什么样的人，我的原则是什么……”

“从现在起，我希望每个人都要像那 239 个人一样。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不会再次饶恕懦弱和失职。相信你们不会让我失望。”

接着蒙巴顿态度缓和下来，笑着对他的部下说：“你们是皇家海军中最幸运的水兵，‘凯利’的两次维修使你们得到了两个假期。舰长夫人来电话告诉我，她送给你们的圣诞礼物是每人一张到我家的晚宴证。”

蒙巴顿并没有休假，他带着参谋人员到第 5 驱逐舰队的“卡尔文”号上继续战斗，直到 1940 年 2 月“凯利”号修复完毕。

1940 年 5 月，“凯利”号奉命与“伯明翰”号巡洋舰一起出航，在靠近德国海岸的北海水域搜捕德国布雷艇和一些 E 型艇（鱼雷快艇），途中“肯达华”号等新型驱逐舰加入搜捕编队。5 月 14 日夜，像往常一样，此时的北海水域能见度几乎为零。突然一声巨响，“凯利”号被掀出水面，落下时整个军舰已是一片火海，德国鱼雷击中了“凯利”号。谁也不知道“凯利”号究竟损坏到什么程度，不过没人惊慌失措。

蒙巴顿沉着地指挥人员灭火，迅速把舰上的弹药和伤亡人员转移到靠近过来的“肯达华”号上。夜里 11 点左右，“牛头犬”号开始拖着“凯利”号返航。

午夜时分，蒙巴顿突然听到了快艇发动机的声音，转眼间，一般德国 E 型快艇以 40 节的速度从暗中冲出来，它用鱼雷击中了“牛头犬”号，同时用舰载机枪疯狂向舰上的人影扫射。当它转弯想绕过“牛头犬”号时，一头撞在了“凯利”号的翼侧，它直竖起的艇身几乎搭上了“凯利”号的甲板。蒙巴顿后来承认他为自己当时的反应感到惭愧。当德国快艇在 20 码的距离上开枪扫射时，蒙巴顿立即躲到了舰桥的玻璃后面。“这样做可笑”，他说，

“舰桥上的玻璃连步枪子弹也挡不了。忽然之间我觉得窘迫，不过还好，只有我一个人在舰桥上，因此没人看见我的丑态。我对自己说：‘我决不再次让自己表现出恐惧’”。

清晨，“凯利”号舰体严重下沉，“看起来像只潜艇，而不是一艘驱逐舰”。

这时，“伯明翰”号打来信号：立即弃舰，我将击沉“凯利”号。

蒙巴顿恼怒地打回信号：那你就试试看吧，我要先击沉你。

不过蒙巴顿还是决定把大部分乘员转移到其他舰上去，他和 5 位军官和 12 个水兵留了下来。当夜幕降临时，“凯利”号看上去快要散架了，他们也登上了别的舰船。

然而第二天早上，他们发现“凯利”还像它的座右铭那样在那里“坚持”。蒙巴顿带着几个志愿者又来到“凯利”上。不久，海军部派来的两只海军拖船到了，它们拖着“凯利”号返航。在途中，“凯利”号又遭德国空军的轰炸，不过它仍慢慢地奇迹般地在被鱼雷击中后的第 92 个小时返回英国。当“凯利”号进入泰因河时，河两岸挤满了人，早已等候在那里的人们狂呼高叫，向英雄的“凯利”号致意。海军部认为“凯利”号能冲破海上风暴和敌轰炸的阻拦，胜利地回到英国，要归功于蒙巴顿那令人难以相信的领导才能、精湛的航海技术和“纳尔逊式的坚定信念”。

重新修复“凯利”号用了七个月时间，当它再次离开赫本码头时，简直像一艘崭新的战舰。在此期间，英国经历了“最黑暗的时刻”。纳粹德国闪击波兰、比利时，随后英国远征军奇迹般地从敦克尔克撤回本土，不久法国陷落，意大利宣战，这就迫使英国从本来就已紧张的本土舰队抽调出战舰前往地中海，保持在那里的制海权。

1940 年 8 月 8 日，不列颠之战开始。作为入侵英国的前奏，德国空军首先进行了寻求歼灭皇家空军的大规模作战。至 9 日 15 日，皇家空军挫败了德国人的企图，但是在 10 月、11 月和 12 月德国空军仍对英国城市进行了极其恐怖的大轰炸。

虽然“凯利”号此时正在维修，因而没经历英国这段黑暗的时刻，但蒙巴顿却在此期间打了一场他一生中受批评最多的海上战斗。9 月蒙巴顿临时受命指挥第 5 驱逐舰队的“标枪”号等三艘驱逐舰，此时第 5 驱逐舰队驻泊在朴茨茅斯，处于英国防线的最前沿。11 月 29 日 5 点 40 分，“标枪”号驱逐舰的雷达屏幕上出现了五艘德国军舰，蒙巴顿立即率领“标枪”号等三艘战舰出海迎敌。在距敌舰约 900 码时，“标枪”号进行边舷侧炮火齐射，未命中。紧接着蒙巴顿亲自校正位置，又组织一次炮火齐射，命中德军旗舰。当蒙巴顿下令发射鱼雷的话音未落时，两枚德国鱼雷先后击中了“标枪”号，使它失去了战斗力，德舰也随即施放烟幕，在烟幕的掩护下撤出战斗。

“德国人溜掉了”——这是批评的中心。蒙巴顿受到了各种各样的指责，开火太晚，作战队形错误，接敌太近，受到敌人的攻击等等。蒙巴顿心里特别难受。

他也认为自己失败了，虽然他也说不清楚为什么。不过，也有人不那么看。在 1941 年元旦公布的荣誉名录上，蒙巴顿被授予优异服务勋章，除了维多利亚十字勋章之外，这是对军人勇敢精神的最高奖励。

1940 年 12 月 15 日，“凯利”号重返第 5 驱逐舰队。消息传出之后，已经被分配到其他军舰的前“凯利”号船员纷纷返回“凯利”号，其中大部分

人来自更安全的战列舰和巡洋舰，他们之所以回来是因为“这是上帝的召唤，我们爱‘凯利’号，愿意在迪基手下干”。

1941年4月，“凯利”号随第5驱逐舰队离开朴茨茅斯，前往地中海。到了马耳他后，蒙巴顿发现这块熟悉的土地已被战火毁坏得面目皆非。“凯利”号所驻泊的港口距西西里半岛上的德国空军机场只有100多英里，德军飞机日夜不停地狂轰乱炸。

虽然此时希特勒的飞机白天已不敢在伦敦上空轻举妄动，但德国人完全掌握了地中海上空的制空权。

当德军空袭时，蒙巴顿只留一半人在舰上，另一半人躲在山崖下的掩蔽部里。

当然每次蒙巴顿都留在舰上，他曾经坦率地指出：“每次德国飞机来扔炸弹时，我心里都恨得要命，但我更害怕朋友们嘲笑我，说‘凯利’号挨炸时，那位勇敢的舰长正躲在防空洞里。”

5月初的一个夜晚，“凯利”号奉命袭击驻泊在本华兹港内的德国舰船，这次战斗是对港口内之敌进行歼灭性打击的成功范例。在夜暗的掩护下，“凯利”号悄悄驶到港内防波堤的出口处（在岸炮火力范围之内），突然齐射，由于事先已将舰炮的方位设置好，因此几次齐射便击沉了港内大部德国舰船，然后在德军岸防部队做出反应之前，迅速撤出。

1941年5月20日，德军对克里特岛发起了海空协同进攻。英军守岛部队28600人，其中大部刚从希腊撤出，武器弹药严重不足，只有25辆坦克和极少的火炮。但是最重要的差距在空中力量的对比上，在这一地区德军有战斗机和轰炸机610架，连同运输机等其他飞机共1280架，而英军只有5架“飓风”式战斗机和20架已基本无法使用的其他飞机。为进攻克里特岛，德军空降了一支16000人的精锐伞兵部队，另有7000人渡海进攻。虽然皇家海军表示决不允许这7000德国人靠近克里特岛，但是，很清楚，克里特岛英军获胜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1941年5月21日，从马耳他参谋会议上返回后，蒙巴顿即召集全体船员，向他们交待了任务并毫无保留地指出了任务的艰巨性和危险性：“德国空军将日夜轰炸我们，而我们没一架飞机能提供掩护，”最后他说：“无论如何我们都要战斗下去。”

当天晚上，“凯利”号随第5驱逐舰队出航。夜里德国飞机没出动，“凯利”号与其他军舰一道击沉了一艘德国潜艇。蒙巴顿一直守在舰桥上，整夜没睡，每隔几小时勤务员就送来一大块面包和一罐沙丁鱼，他的胃口特别好。

5月22日凌晨4点，德军开始轰炸地中海舰队。当“凯利”号加入主舰队时，英军已有两艘巡洋舰和两艘驱逐舰被击沉，还有的巡洋舰失去了战斗力，几乎所有的舰船都挨了炸，不过在头天夜里，它们已歼灭了一支德军运输队，消灭德军4000人。

当天下午，蒙巴顿奉命率领“凯利”号等三艘驱逐舰至克里特岛西北海域巡逻，傍晚时分，收到岛上被围部队发来的信号：“急盼海军火力支援”，于是“凯利”号以30节的速度向预定海域驶去，途中击沉了两艘载满德军登陆部队的大帆船。

5月23日上午，“凯利”号遭到德军大批飞机轰炸。德国飞机飞得很低，几乎擦到了“凯利”号的舰楼，船员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挂在机腹下重逾千磅的大炸弹。

“凯利”号上所有的对空防御武器猛烈开火，然而密集的俯冲炸弹最终还是击中了“凯利”号，一枚炸弹透过甲板，在舰体内爆炸，顿时“凯利”号浓烟四起，烈焰翻腾，蒙巴顿抓过麦克风大喊道：“我们已中弹，继续射击。”

“凯利”号继续以30节的速度前进，但不久即开始倾斜，最后终于翻倒。在此过程中，“凯利”号上的所有武器都在轰鸣，船员们一直坚守在岗位上，直到涌进来的海水把他们冲走。

“凯利”号在海面上倒着浮了十几分钟，在此期间，蒙巴顿和其他活着的军官多次进入“凯利”号寻找、搭救受伤的水兵。过了一会儿，“凯利”号开始下沉，蒙巴顿用颤抖的声音对身边的部下们说：“‘凯利’要走了，让我们为她送行。”在水兵们痛苦的叫喊声中，“凯利”号慢慢地消失了。

蒙巴顿深知水兵们心里有多难受，因为他是内心最痛苦的一个。但这样无益于事。“小伙子们，唱个歌吧，”蒙巴顿大声喊道，然后用他那粗犷的声音起头：“打开啤酒桶，放出快乐来……”

不久，黑色的德国飞机又返回来，向他们轰炸、扫射，他们的歌声未断。

第二天傍晚，他们被其他军舰救起，送到了地中海舰队总部。

在240名船员中，有130名随“凯利”号沉没或因伤而死。在奉海军部之命返回英国之前，蒙巴顿来到第46号病房与他的部下们告别。当受伤未愈的水兵们相互搀扶着站立起来，并吃力地排成队列之后，蒙巴顿心潮难平，泪水几乎要夺眶而出，他的声音因感情激动而颤抖，有几次几乎都说不出了话。

“我来向你们告别，”他说，“我们已经不知交谈了多少次了，我每次都说些笑话，而你们总是对此抱以善意的笑声，但此刻我讲不出任何笑话，我觉得我们中的任何人都笑不起来。”

“‘凯利’总是受伤，但是即使有人牺牲了，只要大多数人还活着，我们还能在‘凯利’上继续战斗。现在她已和我们的一大半战友一块沉入了海底。

“如果不得不牺牲的话，那么这个方式是多么幸福啊！他们和我们心爱的战舰躺在一块，相互陪伴。我们这些活着的人失去了‘凯利’，但他们还和‘凯利’在一起。”

“‘凯利’大概还剩下半使命没有完成，她没法继续完成了。但是我觉得这将促使我们用更坚强的意志去战斗。现在我们中的每个人对战斗都有了双重的理解，每个人都有了双倍的理由去战斗。

“你们很快就会被派往其他军舰，当你们投入下一次战斗时，别忘了‘凯利’，当你们发射出每一发炮弹时要高喊‘凯利’！这样‘凯利’的精灵就会一直激励着我们，直到战争的胜利。

“最后要说的是，我为你们之中的每个人感到骄傲。无论和你们中的哪个人再度共事，我都会深感荣幸。再见，祝你们好运，衷心地感谢你们！”

克里特之战最终以英军的失败告终，不过丘吉尔却称之为德国的“惨胜”，因为德军唯一的一个精锐空降师在克里特战役中损失惨重，以至于不再具备进行大规模军事行动的能力。正是：创意迭出见才智，浴血海上现虎胆。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章分解。

第五章 转调新任

战舰炸沉心不甘，两栖任务担在肩；
首相提携仕途顺，善于理事获好感。

话说“凯利”号被德军飞机炸沉后，蒙巴顿失去了自己心爱的战舰。他怀着沉痛的心情返回了英国，此时的蒙巴顿已感到筋疲力尽，想好好休息一下。

海军部给了他几个月的假期，并预任他为“辉煌”号航空母舰舰长。皇军海军的“辉煌”号航母，由于在地中海执行任务时中弹负伤，此时正在美国弗吉尼亚州诺福克造船厂里检修，按合同规定要等到1941年11月才能完工。

这几个月的假期怎样打发呢？丘吉尔首相希望蒙巴顿提前到美国去走一走，利用其贵族身份向美国各界作一些宣传工作。妻子埃德维娜生性好动，也劝蒙巴顿跟她一起到美国进行私人旅行，换换心境。8月26日，蒙巴顿夫妇动身前往美国。

这时的英美两国，实际上已经建立了稳固的盟国关系。苏德战争爆发后，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首相丘吉尔在蒙巴顿夫妇的美国之行前不久，于1941年8月14日在大西洋纽芬兰海面美舰“奥古斯塔”号上签署了著名的《大西洋宪章》，宪章的主要内容是：不追求领土或其他方面的扩张；尊重各民族自由选择其政府形式的权利；努力促使所有国家取得世界贸易和原料的平等待遇；保障国际和平与安全；公海航行自由；放弃使用武力等。宣言的发表有利于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形成，为日后建立联合国打下了基础。此时的美国，除了未正式对德宣战外，无论从哪一个方面看，美国都与德国处于实际上的敌对状态，而罗斯福总统已定下了决心：一旦美国公众和国会首肯，便立即向德国宣战。

蒙巴顿到达华盛顿后，与罗斯福总统一见如故。他俩人的性格挺投缘，且有相同之处：都喜欢海洋和舰船，喜欢勇敢和冒险精神。蒙巴顿和罗斯福的亲密关系，使前者获得了到珍珠港参观的机会。蒙巴顿非常热切地想去看看珍珠港，该港是美国最大的海军基地，号称美国的太平洋堡垒。

1941年10月初，蒙巴顿抵达珍珠港。他巡视一周后，对该基地的状况感到吃惊：对于一个刚刚取得了现代战争经验，并且领教了德军空中攻击教训的蒙巴顿来说，珍珠港的海空立体防御显然是大脆弱了。美国将军陪着他参观了基地的每一个角落，蒙巴顿向美国同行们指出珍珠港对空防御力量严重不足，通讯设施也很不完善，并且缺乏对敌方深水炸弹和鱼雷攻击的防御能力。

蒙巴顿尽可能礼貌地向美国人指出了该基地存在的问题，但遗憾的是，基地的负责人并没有重视这位英国客人的意见。因为，在日本海军的联合舰队给他们上了残酷的一课之前，美国海军军官像英国皇家海军军官一样地顽固，对来自敌方的空中威胁，从不予以重视。

10月10日，蒙巴顿收到了来自伦敦的电报。丘吉尔首相电示蒙巴顿：“我们要求你立即返回接受某项使命。有件会令你感兴趣的工作需要你来

做。”其实，对于蒙巴顿来说，恐怕没有任何工作比指挥辉煌号航母令他兴奋了，他现在已经把全部心血交给那条船了，期待着该舰修好后驾着它重返蓝色的海洋。

丘吉尔首相要交给蒙巴顿的“某项使命”是什么呢？按丘吉尔的想法，就是制定和实施以登陆为核心的两栖联合作战。

法国的失陷使英国面对着一一条敌对的海岸线。随着战争的扩大，英国的目标是不仅要保证本土不受入侵，还要最终重返欧洲大陆。这就需要海陆空部队进行联合作战。联合作战是件非常复杂的课题。在机械化部队和快速通讯问世之前，需要的只是提供足够的船只把士兵运送到一般来说防守松弛的海岸上。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在戒备森严、装备精良的敌方登陆已经成为令人头疼的问题，使用特殊方法以解决这一问题的必要性也开始变得明显起来。

但是，两栖登陆联合作战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仍没有取得什么进展。在此期间，英国曾研制了第一艘平底登陆艇，但人们对它的兴趣不大。到1938年时，皇家海军一共只制造了9艘登陆艇。战争爆发初期，英国的装备仍然像1918年时一样落后，难以在遇到敌方抵抗的情况下把部队送上海岸，登陆以后也难以保住阵地。同时，飞速发展的航空打击火力使传统的两栖作战技术显得越来越过时了。但是，这种状况似乎并没有引起负责制订英国战略的决策者们注意。在1939年12月15日举行的一次参谋长联席会议上，联合作战最早的提倡者之一麦克劳德上校要求大量增加登陆艇的数量，与会者几乎一致认为看不出这种装备有什么必要，从而否决了麦克劳德上校的建议。

战争爆发后不久，英军很快失去了在欧洲大陆的立足点，龟缩在英伦三岛承受德国空军的猛烈轰炸，并面临着德军登陆入侵的威胁。不甘被动挨打的丘吉尔力图争取主动，向大陆的德军据点出击，因此使英军对登陆联合作战的需求突然变得重要起来。1940年6月，皇家海军陆战队副官长伯恩中将被任命为突袭行动指挥官和参谋长委员会的联合作战计划顾问。丘吉尔希望这一计划能够更加宏大，更具有独立性。于是不久，他又重新起用上次大战时的英雄、他的老朋友海军元老罗杰·凯斯勋爵，要求他建立起一支强大的部队。此时，凯斯已年近七旬了。

凯斯勋爵使英军的两栖联合作战计划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他组建了联合作战司令部，抽调了约5000名官兵编为10支突击队，对这些人的训练以及对执行重大登陆任务的登陆艇人员的训练也都开始了。然而，一切都很不完善。艾伦·布鲁克曾于1941年9月访问了位于因弗雷里的联合作战训练中心，他发现“训练内容过于陈旧，不能适应我们可能采取的行动中的变化多端的情况，对我们的计划则考虑得更加不够”。当需要人担任某项职务时，凯斯总是从他的同龄人或朋友中去寻找。詹姆斯海军上将认为：“如果罗杰·凯斯继续起用这些退休军官，并把基本上属于年轻人的第一线职务交给他们，将会有许多人咬牙切齿的。”

凯斯处理人际关系和行政事务也不在行。他的联合作战司令部，所有工作人员（包括打字员和通讯员）总共只有23人。这个数字证明了凯斯对臃肿的官僚机构的厌恶，但同时也有力地表明他缺乏处理行政事务的能力，生伯驾驭不了同僚和部属。

他和英军总参谋部的关系搞得也很紧张，其部分原因是由于丘吉尔的

一贯毛病造成的，即任命人员以后却不恰当地规定他的职权范围和地位。凯斯知道，在所有有关联合作战的问题上，他只对国防大臣（此职由丘吉尔首相兼任）负责。而英军的参谋长委员会的成员们则认为，凯斯是他们的下属，在训练和指挥突袭行动中，他只应有有限的权力，在大规模的两栖行动方面则毫无权力。他们之间的矛盾本来是可以调和的，但是凯斯瞧不起委员会里的那些参谋长们。

1941年秋天，争吵公开化了。参谋长委员会坚持认为，应该重新规定凯斯的职责，他的任务只能是联合作战计划的顾问而不得擅权。凯斯对此感到十分恼火，他多次致函丘吉尔，要求首相澄清自己的职权范围。丘吉尔支持参谋长们并告诉凯斯说：“只有参谋长委员会才有责任向国防委员会和战时内阁提出建议。”见丘吉尔变卦，凯斯愤然辞职不干了。

10月初，丘吉尔决定由蒙巴顿接替凯斯的职务。丘吉尔认为，换个年轻些的指挥官可能会把事情办得更好些。关于对蒙巴顿的这个至关重要的任命，丘吉尔在一次日记里写到：“虽然蒙巴顿还只是个海军上校，但是，他的业绩与才华已经表明他适合这一职位。”

其实，事情远不仅这么简单。丘吉尔所需要的是一个没有偏见的年轻军官，一个具有丰富想象力的、易于接受新的战术和新的装备并具有胆识和勇气的人。同时，由于蒙巴顿与皇室的血缘关系和生来的非凡自信（有人认为是傲慢），丘吉尔认为别人不会轻易怠慢蒙巴顿，而蒙巴顿也不会让那些闲言碎语分散自己的注意力，他的尊贵和健力是与生俱来的，因此很容易得到别人的好感和支持。事实上，蒙巴顿要完成使命，就必须赢得参谋长委员会成员们的信任。这就是丘吉尔选中他的原因。

根据美国政府的安排，蒙巴顿结束对珍珠港的访问后，还要与罗斯福总统进行一次会晤，性急的丘吉尔希望蒙巴顿尽快回国，于是便给罗斯福打了一个电话，使白宫取消了这次预定好的会晤。这对美国或许是很不幸的，因为罗斯福很乐于听取别人的意见，特别是非常重视他所信赖之人的意见。如果罗斯福真的再次接见了蒙巴顿，那么他很可能会认真考虑珍珠港的防御问题的，日本海军后来偷袭珍珠港能否顺利得手，便很难说了。

蒙巴顿于1941年10月25日回到了伦敦，他匆匆忙忙地和母亲共进午餐以后，随即赶往契克斯。“关于我的新工作，首相给我下达的命令真使我为难。”他在这天的日记中这样写道。蒙巴顿非常珍惜“辉煌”号舰长的职务，为此他这次当面向丘吉尔表示，不愿接受首相任命的这一新职务。

丘吉尔大发雷霆：“难道你没有历史感吗？如果你不承担这项使命，谁来干呢？还像上次一样自己的军舰被敌人击沉，这次再换一艘航空母舰而已吗？”

接着，丘吉尔施展他的口才，向蒙巴顿解释了新任务的重要性。尽管此时英伦三岛岌岌可危，但丘吉尔向蒙巴顿满怀信心地指出：“你的主要使命是准备进攻欧洲大陆，因为除非我们在大陆上打败德国人，否则便无法赢得战争的胜利。”丘吉尔还告诉他：“现在英国所有的各级司令部都在考虑防御，防备德国人打到英国本土，唯有你的目标是进攻。为此目的，你应该建立和完善机构，筹划装备，寻找基地，建立新的训练营地，预选进攻登陆的地点，等等。你不要考虑防卫，所有的精力都应集中于进攻。”

蒙巴顿对丘吉尔这种超乎寻常的战斗精神而感到振奋。在法国沦陷以后，一水之隔的英伦三岛随时面临着德军入侵的危险，几乎所有的英国人都

在想怎样坚持下去，很少有人会想到要主动进攻。蒙巴顿后来回忆说：“我立刻意识到丘吉尔是正确的，当我离开丘吉尔的办公室时，我感到精神为之一振，不知不觉中把刚才的抱怨抛到了九霄云外。”

蒙巴顿随即被晋升为海军准将，官方头衔是英军两栖联合部队的负责人。他在这年 10 月中旬领受了指挥职务。但是，直到此后三个星期后，关于凯斯去职、由一位年轻的海军舰长接替的传闻才得到官方证实。据英国舆论反映，公众的反应是热情的。凯斯是上次大战中的英雄，但他已经 70 岁了；蒙巴顿也是一位英雄式人物，同时更年轻而富于魅力。这个国家迫切希望有一天能够从只有招架之功的窘况中摆脱出来，能够对德国佬发动反击，哪怕规模很小。对蒙巴顿的任命表明，英国正在朝着这个方面努力。

1941 年 10 月 16 日，蒙巴顿接到了对他的最新指示。他的职权被规定为四个方面：

在参谋长委员会的全面指导下，蒙巴顿应：

1. 在与联合作战的计划和训练有关的一切方面和各个阶段担当技术顾问；
2. 负责协调三军联合作战的全面训练计划，指挥联合训练中心和训练学校；
3. 研究各种形式的联合作战的策略和技术进展情况，从小规模的突袭直至大规模地进攻大陆；
4. 指导和监督联合作战所专门需要的各种技术装备的研制和发展。

根据上述指示，蒙巴顿上任后全身心地投入了工作。同时，他心里明白，不能像前任凯斯那样，与参谋长委员会成员们的关系弄僵，如果自己的举措不能跟参谋长委员会的设想一致，便将一筹莫展。这年他才 40 岁出头，军阶也不高，他取代了一位德高望重的海军舰队元帅，而参谋长委员会中的第一参谋长已经 57 岁了，即使蒙巴顿晋升准将以后，仍比委员会里面所有人的军衔要低。他知道，虽然参谋长们并没有抵制对他的任命，但关键是这一任命却并不是由他们而是由丘吉尔首相提出来的。蒙巴顿预料从这些功名显赫而思想保守的当权者那里得到的将是怀疑，甚至刁难。比如，在英军参谋长委员会组成人员中，第一海务大臣达德利·庞德同意甚至尊重他的这位年轻同事，但他对等级看得很重，觉得一个年仅 41 岁的驱逐舰舰长是不应被突然提拔到白厅，跟元帅和老将军们坐在一起开会论事的。所以，从前面参谋长委员会给蒙巴顿指示的职权范围可以看出，除技术方面提出建议外，他没有制定大规模行动计划的权力，只是在由特种部队执行“非常小规模突袭”时，蒙巴顿才有权任命指挥官并负责制定行动计划。虽然这些权力也很重要，但它们和凯斯所梦寐以求的绝对权威相比显得太微不足道了，也和丘吉尔首相当面暗示过的蒙巴顿所要享有的权力相差甚远。

因此，接任之后蒙巴顿给自己定下了三个工作目标；

首先，汲取前任的教训，与总参谋部（即参谋长委员会）的成员们建立良好的个人关系，从而尽可能多地得到他们的支持。

其次，为免得与白厅的掌权者们争权，自己要把注意力多多放在具体技术和战术上。必须确保工程师们任何有意义的发明都不会被忽略，任何一个有一定意义的建议都有机会被检验。在这方面，他甚至常常做过了头，有时竟鼓励些完全是空想的计划出笼，让个别科学骗子钻了空子，骗取了许多

英镑。然而，蒙巴顿确实支持了诸项对现代战争具有极其重要意义的发明，比如说水陆两用坦克和装配式补给船浮动码头，这两种装备经过进一步改良后，几年后在诺曼底登陆战役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同时，他本人那富有创造性的头脑也构想了几件实用装备，其中有多用途海底输油管 and 登陆指挥船等。指挥船是两栖作战部队浮动的司令部，配有各种通讯设施，在船上指挥官可以与他麾下的陆海空部队保持一体化联络。这种指挥船在英美后来各主要登陆作战中，如从西西里登陆到太平洋战场上的逐岛登陆作战中，都得到了广泛的使用。

最后，蒙巴顿决心使联合作战总部成为一个真正的统一体，让在这里工作的陆、海、空军官把他们对各自军种的忠诚转化为一种团队精神，即转化为对联合作战部队的忠诚。他认为，在需要海陆空三军密切配合的未来作战中，有关人员不仅应在一起制定计划，还应当一起生活，一起娱乐。联合作战总部的工作人员不是海军、空军或是陆军派驻总部的代表，任何这样做的想法或作法，如建立独立的食堂或在餐厅内分兵种分桌就餐，或在讨论某一作战行动时为自己的部队争辩等等都将被视为不适合担任目前工作的证据。当然，多年来形成的习惯是不会轻易丢掉的，各军兵种之间的冲突和猜忌依然存在。特别是来自海军的军官们经常违反这些约束，他们认为自己是英军的精英，比其他军兵种的军官要优越。同样是出身于海军的蒙巴顿，对他的同行们没有姑息迁就，尽了最大努力制止这种倾向，并在相当程度上取得了成功。

美国参战后，美国陆军总参谋长乔治·马歇尔将军访问英国时，参观了蒙巴顿的联合作战总部和部队，他对这个英军作战单位内，各军兵种的整合程度感到吃惊，向蒙巴顿讨教道：“您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

蒙巴顿不想对异国客人述说他为此而吃过的苦头，受过的埋怨，只是淡淡一笑：“不管怎么说，他们毕竟都使用同一种语言。”接着，他眯起双眼露出迷人的微笑：

“马歇尔将军，您也说英语，您为什么不派些美国军官到我这儿来呢？”

不久，马歇尔果然派遣了一批美军军官到蒙巴顿的联合作战总部见习和工作。

戴高乐也派了几位法国人协助蒙巴顿。在蒙巴顿天生的王侯贵族气质影响下，手下各国军官把仅仅对本国利益的忠诚，不知不觉地转化为对联合作战总目标的绝对服从。蒙巴顿领导联合作战总部期间凝铸的团队精神，成为后来艾森豪威尔的欧洲司令部和蒙巴顿自己的东南亚联合司令部的先驱与样板。

英国要重返欧洲大陆，必须预先解决渡海器材问题，更新和改进已经过时的技术装备。为此，蒙巴顿以高薪和高津贴召集一批科学家、工程师组成研究部门，并列入总部的正式编制。他的司令部里，“简直成了学术辩论厅，各色古怪、不修服饰的男女，经常在那里为一个技术细节争论不休”。蒙巴顿这种别出心裁的作法，曾引起来自部队的正规军官们的抱怨，军官们称上司招募来的人是“自命不凡的教授”、“疯狂的恐龙”。但慑于蒙巴顿的严厉命令，还不得不表面上对他们表现出尊重。

蒙巴顿认为，随着战争愈来愈长期化，英国的人力资源短缺，势必需要征募大量妇女加入军队，这将是一个无法避免的客观现实和趋势，莫如及早面对它。同时，他也一直觉得男女在一块儿工作，多数情况下会提高效率。

所以，他在自己的管辖范围内，率先让男女军人和文职人员混和编组。老派的军官们指责蒙巴顿在制造“混乱”，可是，试行的结果表明，虽然从联合作战总部和下属单位中，不时捅出些罗曼蒂克式的故事，但工作人员的士气、情绪和效率确实是提高了。

蒙巴顿按照自己的计划进行着。他最初时每天都要工作在 12 小时以上，还经常睡在办公室里，每天清晨就开始办公，一直忙碌到深夜。尽管在此期间他使这个英军单位的面貌焕然一新，但同时也暴露出作为一个指挥官的严重缺点——对于细节过分热情，即使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他也总是亲自过问、下达指示。在伦敦，他实际上重新设计了司令部大楼的形状，又为手下军官确定了服装颜色；后来调往东南亚时，甚至为一支丛林突击队亲自设计了作战服样式。蒙巴顿的这个习惯，浪费了自己和别人的许多宝贵时间，不过，也表明了他充沛的精力和负责精神。因为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他毕竟也才 40 多岁，有着许多年轻将领普遍存在的毛病。

当然，他迅速决策的才能，无论是在小事，还是在极其紧要的关头——当成千上万人的生命决于一念、当战役的胜利或失败悬于一刻的时候，蒙巴顿能闪电般地作出决断的本领，弥补和掩盖了他的这一弱点。

蒙巴顿是脾气暴躁的丘吉尔为数不多的朋友之一。由于离开了海洋和军舰，相对稳定地呆在伦敦，所以蒙巴顿常去丘吉尔的办公室和私邸里拜访。只要俩人都有可能，每个星期天的夜晚，他俩总要海阔天空地聊一通。据蒙巴顿回忆，肥胖的首相一夜能喝 10 到 12 杯威士忌加苏打水。俩人从私生活、家务事到世界各国的形势，无所不谈。丘吉尔渊博的历史知识和丰富的洞察力、想象力，从历史经验推断未来发展的能力，给蒙巴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老谋深算的丘吉尔面前，他还是个学生，丘吉尔跟他的每次聊天，都使蒙巴顿获益匪浅。

同时，丘吉尔对蒙巴顿处理事务的举措也是比较满意的。他感到自己选择年轻人的正确性已经得到证实，现在应该进行下一步了。1942 年 3 月 4 日，蒙巴顿奉命前往唐宁街首相官邸见丘吉尔，“首相通知我我将担任联合作战最高指挥官，并兼任参谋长委员会里的第四参谋长，被授予海军中将、陆军中将和空军中将军衔”。

蒙巴顿成了英军历史上第一个同时获得三个军种军衔的将军。

对于蒙巴顿得到三栖将军的头衔，英国军界元老们颇有微词，特别是第一海务大臣达德利·庞德更是如此。他写信给首相说，海军不同意这种不合常规的晋升方式，但丘吉尔不为庞德的反对所动。在收到他的信件的第二天，丘吉尔致函参谋长委员会，正式表明了自己的想法：“每当涉及重要议题，或者，正如到目前为止那样，每当讨论联合作战或任何与它有关的具体问题时，联合作战最高指挥官都应作为正式成员参加参谋长委员会会议。”同时；丘吉尔还解释说，联合作战是陆海空三军的协同作战形式，让蒙巴顿有三个军种的军衔，可以使他工作时更方便、更有权威。

得到三栖将军的称号，蒙巴顿自然感到十分高兴。不过，为了平息元老宿将们的议论，他向首相表态说，这一工作结束之后，应允许他回到本来的军阶，仍去指挥一艘兵舰而已。其实蒙巴顿内心的喜悦是无法掩饰的，他曾写信告诉女儿帕特里夏说：“我现在走到哪里都佩戴着海军中将军衔的纹徽，我感到很自信。纳尔逊以后的最年轻的海军中将是贝蒂勋爵，他是在 44 岁时获得这一军衔，我现在比他那时还年轻。这难道不使你感到惊讶吗？尽管

陆军和空军要我穿上陆军中将或空军中将的制服，我现在却感到不好意思，自觉资历尚浅。”

1941年12月7日以后，整个英国的士气突然高涨起来了，因为日本人偷袭了美国的珍珠港，把美国拖入了战争。在珍珠港事件之前，英国公众只是努力争取保住国土不受纳粹德国的入侵，现在他们相信一定能打败德国、赢得战争。8日凌晨3点多钟，当丘吉尔听到副官向自己报告珍珠港事件爆发后，从床上一跃而起，高兴得手舞足蹈。因为日本的炸弹终于使美国摆脱了战与不战的困扰。蒙巴顿也十分兴奋，他对美国的实力深有信心，太平洋上那个小岛燃起的战火，终于使美国与英国的命运完全连在了一起。而且，通过珍珠港被袭，也进一步证明了当初自己的判断力。

不过，两天之后又传来了一个糟糕的消息：英国最新、最快的无畏级战列舰之一“威尔士亲王”号和老式巡洋舰“复仇”号，在马来半岛附近海域被日本鱼雷攻击机击沉。蒙巴顿回想起过去跟父亲路易斯亲王在“复仇”号上共渡的那段难忘时光，不禁黯然神伤。

既然美国已对德宣战，那么任何事情看起来都是可能的了。在英国那段自身难保的困难日子里，丘吉尔和蒙巴顿反攻欧洲大陆的“白日梦”，终于变成了可以实现的一项战略性计划，虽然进一步说服参谋长委员会官员们确信这一点还得需要时间。正像摩根爵士后来承认的那样：“尽管我是英军大陆作战计划的负责人之一，但是在我访问华盛顿之前，在目睹了美国巨大的经济技术实力和感受到美军各级军官坚定必胜的信念之前，我一直认为制定那个计划不过是纸上谈兵而已，没有现实意义。”

蒙巴顿的联合作战总部之黄金时期到来了。一位曾在他麾下的美国军官回忆道：“蒙巴顿成功地使他的每一个部下都觉得自己是精英，他总是挑选像他自己那样的第一流人物，他的司令部里充满了团队精神。在联合作战部队里，没有人会受到惩罚，如果有人失职，那么他将被送回原部队，而那些被送回的人临走时，往往痛哭流涕。”

总部里涌进的美国军官和文职人员越来越多，如何与这些财大气粗、趾高气扬的美国人打交道，是许多英国军官头疼的事情。蒙巴顿倒很善于对付他们，有一次英国国王来视察联合作战总部，蒙巴顿决定让那帮美国军官见识一下英国的礼仪。

“立正！”蒙巴顿发布完口令后，又要求美国人说，“当国王对你们讲话时，你们要低着头听。”接着对美国人笑眯眯地说：“我知道你们是联邦制共和国，美国人不喜欢在国王面前低头。但如今的英国国王，是我的表兄，你们就当向我的哥哥低头好了。”

经他这番巧妙地劝说，美国军官们只好按照英国的规矩，在英王面前低下了他们尊贵的头。

美国参战后，它虽表示要做“民主国家的兵工厂”，但对盟国的武器装备订单也不是有求必应，拖延和扣减是常有的事。如何能使山姆大叔乐善好施，蒙巴顿颇会掌握时机和分寸。

1942年4月初，马歇尔将军来到伦敦，就如何发展盟军战略问题与英国参谋长委员会交换意见。4月10日，他应邀访问了联合作战总部。在马歇尔的随行人员中，有一位颇受赏识的参谋阿尔·魏德迈。他对英国指挥官的看法有一些独到之处，有时也不免持有怀疑态度。为了奉迎这些握有实权的美国人，蒙巴顿在总部举行了盛大的宴会，还邀来乐团和姑娘们来作陪，演奏美

国流行音乐，乐得马歇尔、魏德迈等人连称“美妙极了！”

酒酣耳热之际，蒙巴顿简要向马歇尔将军介绍了他的计划和装备情况，马歇尔此时的注意力正集中在美酒、音乐和姑娘们的身上，根本没有细听对方讲的是是什么，只是问蒙巴顿，“您需要我再做些什么？”

蒙巴顿抓住马歇尔心情愉快的时机，笑着说道：“请您通知国内把英国关于登陆艇和登陆舰的需求增加一倍，请您受理我的新订单。我需要一种能够搭乘 200 人以上并能同时装载坦克的船只。”

“现在有这种型号的专用舰船吗？”马歇尔心不在焉地问。

“目前还没有。”说着，蒙巴顿在餐桌上拿过一张菜单，翻过来在它的背面画了一下早已构思好的船只轮廓。

“好吧，我回国后让工程师们再具体设计一下，给你们制造 150 艘。”马歇尔放下酒杯，膘了膘坐在餐桌对面作陪的几位蒙巴顿总部的漂亮姑娘，显示出很大方、很有实权的样子。

蒙巴顿未料到马歇尔如此慷慨和痛快，赶紧盯上一句：“我们一言为定。”接着又让作陪的姑娘们一起，跟马歇尔干了一杯。

此外，蒙巴顿还提出，如果能够在伦敦港有几百条汽船，将对进攻部队是有力的支持，但是没有发动机，希望美国能够提供。

马歇尔这时有些清醒了，冷静地听着蒙巴顿的这份庞大订单，只表示将尽力而为。

总的来说，蒙巴顿与美国的将军们相处的不错，部分原因是他擅于揣摩美国人的心理，把握住了时机和分寸，部分原因是他贵族的身份，即使作为受施舍者，对方也能对他尊敬和客气几分。

著名美军将领艾森豪威尔曾在马歇尔这次访问后不久，来到英国与蒙巴顿有过一段时间的工作交往，对此他曾回忆道：“在我担任欧洲战区司令之前，在第一次来到英国时我就认识了蒙巴顿。后来，在英美双方将领的联席会议上，我们谈到了在法国的登陆问题。我认为像这种联合作战行动，不宜由一个委员会来指挥，应设立一个全权负责的总指挥，由于英国部队参加行动的人数比我们多，因此应由一位英国将军出任此职。我提到了蒙巴顿，与会的资深英国将军们似乎有些疑虑。于是我又说，‘在美国时，我多次听说有一个人几个月来一直在深入研究两栖战问题。

我知道他的名字是蒙巴顿将军。他是一位充满活力、智慧和勇敢的人，如果这一行动主要由英国部队去完成，我想他能够担任这一工作。我知道，他是一位海军军官，但这没关系，我愿意在他手下效命。’紧接着却是一阵令人尴尬的沉寂。”

那么英国准备何时派兵跨越英吉利海峡，向欧洲大陆进攻呢？且听下章分解。

第六章 战略抉择

西欧何时辟战场，几种意见争短长；
蒙氏追随丘吉尔，筹划预案应各方。

从 1941 年 6 月 22 日德军进攻苏联起，苏德战场就成了大战爆发以来的主要战场。

当时，苏德战场上集中了 75% 的法西斯德国及其附庸国的军队，其中有德国的 153 个师和仆从国的 37 个师。

在白俄罗斯和乌克兰、波罗的海沿岸和摩尔达维亚，苏联红军与德军展开了一系列大规模的、异常残酷的交战。而与此同时，西欧地区几乎没有什么地面军事行动。德军仗着机械化装备的优势和训练有素，锐不可当，势如破竹，很快占领了苏联的大片国土，使苏军陷于被动。斯大林迫切需要英美军队在西欧发动进攻，减轻德国对自己的军事压力。

在英国，关于苏军是否能够抵挡得住德国的进攻以及能够坚持多久，人们议论纷纷。但无论如何，在全力支持俄国人这一点上，英国公众中几乎没有任何人持有异议。像丘吉尔一样，蒙巴顿在政治观点上也是极端反共的，他在写给女儿帕梅拉的家信中这样说：“布尔什维克杀死了我在俄国皇室中的大多数亲戚，我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会把他们作为盟友来欢迎。但是，我们决不能让纳粹获胜，是吧？”只有在打败共同的敌人——纳粹德国这一点上，他们才不得不结盟。

丘吉尔十分清楚打败德国的决战地点是在欧洲大陆，所以即使在英国最困难的时候，也先后任命凯斯、蒙巴顿等人建立联合作战总部和组训登陆部队，以准备重返大陆。但他认为，现在的时机还不成熟。

“第二战场”一词是俄国人喜欢用的一个概念，这个名词意即强调了苏德战场的主战场地位，强调了苏军的作用。英美的政治家和军队将领们很反感使用这个词汇，而俄国人却不理睬那一套硬是经常在与对方的来往电文中使用它，英美抗议无效也只好默默地接受了这个词汇。但是，接受了这个词汇不等于在解释它的内容上没有分歧。按英美的说法，盟国空军轰炸德国、英美海军在大西洋同德国海军作战，以及后来盟军在北非、中近东等地进行的战役，都算是对德战争的第二战场。而按照苏联政府的解释，第二战场就是欧洲战场，更准确地说，是法国北部的战场，因为这一战场的开辟能直接威胁德国本土的心脏地区，可牵制德国约 60 个师及其仆从国 20 个师，从战略上可成为俄国战场的补充。

针对苏德战争一爆发，斯大林就要求英国军队反攻法国的主张，1941 年夏，丘吉尔认为俄国人对军事战略“一无所知”，“不懂得登陆战役的特点”，“不懂得大部队在敌岸登陆有不可克服的困难”。而俄国人讥讽他，“每个隔岸观火的人，都自诩是战略家”，指责英美“在拉芒什海峡彼岸，或者说在大西洋彼岸静观苏联人民同侵略者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血流成河，而不让实力剧增、日益强大的英国和美国的武装力量冒险”。

历史经验证明，德国在两线作战总是失败。俾斯麦、毛奇和施利芬都害怕两线作战。希特勒遵循他们的遗训，力图各个歼灭对手，战争爆发以来，他在初期也达到了这一目的，在基本控制了西欧以后才开始进攻苏联。

在当时情况下，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是否可行？苏联政府认为，根据德国发动进攻以来的军事战略态势，当时德军大多数兵力都已用在东线，在西欧（法国北部）和北欧（北极地区）开辟第二战场是完全可能的，这样做既可大大改善苏联的军事形势，还可以改善英国的军事形势。斯大林称，他十分了解建立第二战场的难处，也估计到这将付出巨大的牺牲，然而为了与共同敌人作斗争的事业，为了英国本身的利益，必须尽快地建立第二战场。

1941年7月，斯大林致函丘吉尔，向英国政府第一次提出了上述要求。丘吉尔立即拒绝苏联关于马上开辟第二战场的建议，指出：“现在对法国实施重兵登陆，势必意味着流血与失败。”9月3日，斯大林又致函丘吉尔：“德国人认为西线的危险是虚的，并且深信现在和将来在西线都不会出现任何战场，可以不受惩罚地将全部兵力从西线调到东线。”对斯大林的激将法，丘吉尔不为所动，再次回信告诉斯大林，英国在这样短的时间里单独开辟第二战场是根本不可能的。

同年12月7日发生日本偷袭珍珠港事件后，美国在对日本宣战的几乎同时，也向德国宣了战。有美国参战，盟国是否能够开辟第二战场已经不成问题了，唯一的问题仍是什么时候这样做。

在苏联政府频频的外交努力下，性急的美国人准备响应斯大林的呼吁，以英国为基地进攻西欧的德军占领区。1942年5月，罗斯福总统和他的首席顾问哈里·霍普金斯，答应苏联政府在当年开辟第二战场，在西欧登陆的兵力规模不少于100万人。

在英国国内，某些舆论和政界上层人物，也敦促丘吉尔赶紧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支持苏联。他们认为，1942年的夏季对俄国战线来说可能是决定性的，英国必须先派遣8至10个师的兵力越过英吉利海峡，在西欧海岸登陆，以牵制和减轻德国对东线形成的强大压力。尽管这些登陆部队有可能全军覆灭，但这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如果俄国的战线垮了，盟国的整个战争前景也就渺茫了。

丘吉尔对上述看法不以为然，他以自己对共产主义制度长期研究的经验，认为苏联的体制和多年形成的社会结构适于战争，能够经受得了残酷战争的捶打，根本不必担心它会像波兰和法国那样，向希特勒举手投降。用不着急不可待地为俄国去两肋插刀。同时，他根据自己的情报系统侦察，认为整个法国海岸都“大炮林立，布满了铁丝网、坚固火力点和岸防地雷”，面对德军在法国西海岸筑成的一道所谓“大西洋壁垒”，他本人“必须要关心美、英两国的青年，不能让他们的鲜血染红大海，不能让他们的尸体堆满海滩”。当然，毋庸置疑，做为一个老牌反共政治家，丘吉尔希望在长期战争中削弱纳粹德国的同时，削弱共产主义苏联的力量。

对英国的无动于衷，斯大林派代表质问丘吉尔：“如果说英国人在德国狂轰滥炸之下能在7天内从敦刻尔克撤走30多万部队的话，那么，为什么不能把同样多数量的部队再运送回大陆开辟新战线呢？”丘吉尔回答道：“撤退和进攻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撤退是以保存力量为目标，进攻则是为了取得和发展胜利，我们不可能像敦刻尔克撤退那样，连私人游艇都动员起来去进攻敌人。”

他嘲讽俄国人的“奇谈怪论”，是让德国人打昏了头，居然能进行这样愚蠢的类比。

蒙巴顿在如何确定开辟第二战场的时机上，是紧紧追随丘吉尔的。蒙巴顿在开始时即坚持认为，盟军在1942年7月以前不可能集结起一支大规模的登陆部队。他从接管联合作战总部的时候起就存有这样的印象。具有不同特殊功能的登陆器材是反攻成功的先决条件，而指望一些粗制滥造的船只和不具备两栖战经验的士兵是不可能的。为了执行特殊使命，需要有各种登陆艇，每条艇的操纵人员都要受过专门训练。需要有大型和小型登陆艇，载人的和载武器的，配备重型和轻型武器的，装载火箭、探照灯、坦克或枪支的，

可以用来攀登峭壁、架设桥梁或梯子的，等等。为了制造这些不同种类的登陆艇，需要有新的科学技术和新的工业部门，而在 1942 年春天的时候，二者都还处于初期阶段。更为严重的是，如果现在就集中仅有的少数登陆舰船用于进攻法国，就不能用它们来训练将来掌握新一代舰艇的人员了，实际上会妨碍今后的大反攻。

关于未来登陆反攻选择的突破口，蒙巴顿也有独到之处。众所周知，1944 年 6 月英美军队胜利实施了诺曼底登陆，这次宏伟的战役，其规模之大、企图之广、实施之巧妙，都是战争史上没有先例的。其实，还在诺曼底登陆实施的两年多以前，蒙巴顿就已经选择了这个地点。

不论丘吉尔内心是怎么想的，1942 年春天，在苏联政府屡屡呼吁和美国政府的敦促下，英国军方确实认真研究了重返大陆的有限行动，并把它命名为“重锤行动”，准备随时付诸实施。当时，这一行动计划提交给联合作战指挥部以后，空军指挥部指挥官肖尔托·道格拉斯和本土部队总司令伯纳德·佩吉特强烈要求在加来海峡登陆。主张在加来登陆的关键论据是此处海峡较窄，便于得到空中掩护，可以把德国空军吸引出来，然后将其全部或者部分摧毁。他们提出这样的看法还有地理方面的原因，因为在勒图凯和布洛涅之间登陆比在诺曼底登陆距离莱茵河要近 150 海里，距安特卫普港只有 130 海里。此外，沿这条线路进攻，塞纳河和索姆河都不会造成障碍。

蒙巴顿不同意这种选择，他认为加来一带的海岸防守甚严，港口水位太浅，入口也太狭窄。对德国人来说，很容易加强这一地区的防御。只有把进攻地点转移到勒阿弗尔以西、诺曼底附近的塞纳湾一带，才有可能使部队登岸而免遭被歼。在参谋长委员会的会议上，争论十分激烈，据蒙巴顿自己告诉罗斯基尔上校，“当时真是吵得一塌糊涂”。蒙巴顿坚持认为，无论是像“重锤行动”这样有限的进攻，还是大规模重返欧洲的计划，如果要取得成功，都必须避开加来地区。蒙巴顿坚持把诺曼底作为登陆地点，对于最后决定在那里登陆是否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还很难说；但他自己经常说，二者之间的关系密切，诺曼底登陆的决定意味着他的见解战胜了道格拉斯和佩吉特的主张。因此可以说，在最初制订“重锤行动”计划的时候，曾把加来海峡作为登陆地点，此后，人们才一致同意诺曼底为登陆地点。在 1944 年 6 月诺曼底登陆战役开始的很久以前，英国军方已经秘密选定它为唯一可能的目标了。

把这种转变完全归因于蒙巴顿也许有些言过其实，但是，在这个问题上他确曾作出过突出的贡献则是毋庸置疑的。

1942 年 5 月 20 日，斯大林派出由外长莫洛托夫和军事代表伊萨耶夫少将组成的代表团访问英、美。目的还是敦促它们尽快开辟第二战场。莫洛托夫一行在伦敦受到了隆重欢迎，丘吉尔把自己的官邸契克斯让给莫洛托夫住，自己则暂时移住到郊外的一幢简朴别墅里。

5 月 21 日双方在契克斯开始会谈时，苏联代表团介绍了苏德战场的形势，通报了预计于同年夏季进行的大会战。德军已将主力集中到苏德战场，有可能取得优势。

所以，莫洛托夫说，苏联政府想知道：“苏联的盟国，首先是英国能否在 1942 年夏秋至少把德国 40 个师从我国战场引开，并通过战斗把它们牵制在西欧。如能做到这一点，那么打败希特勒的问题将在 1942 年解决……，盟国是否能做到这一点？”

擅于辞令的丘吉尔面对莫洛托夫的逼问，只是泛泛地“盛赞苏联人民的英勇、顽强”和“俄国军队捍卫祖国领土、反对纳粹匪徒的伟大斗争”，然而，他除了跟莫洛托夫签署了原则性地战时同盟和战后合作与互助条约之外，没有答应俄国人的具体要求。

从英国人这里未得到具体承诺的莫洛托夫，于是飞往华盛顿。5月29日至30日在白宫同罗斯福进行会谈时，莫洛托夫直截了当地提出了开辟第二战场问题。罗斯福回答说：“我们想在1942年开辟第二战场。这是我们的希望，也是我们的意愿。”结果，会谈后双方发表了联合公报，指出：“会谈中就1942年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这个刻不容缓的任务，达成了圆满协议。”

在对待俄国人要求迅速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态度上，英美两国存在着分歧。

斯大林正是看到了这种分歧，所以抓住美国为突破口。虽然英美两国一致认为应当进攻欧洲，摧毁德军，它们还同意把英国作为发动进攻的基地。但在如何进攻的问题上，双方想法不尽一致。英国主张消耗战，在反攻大陆之前先在地中海采取行动，为最后出击长期积累物质条件。与此相反，美国主张快速猛烈地出击，同时，对英国要求首先清除北非德军的动机表示怀疑，并对英国希望在长期无战事的情况下把美军部署在英国的主张感到不快；认为如果美国驻扎在那里的部队无所事事，那么还不如改变“先打德国”的策略，转而先去击败日本。

丘吉尔知晓美国人的心思，当莫洛托夫一行离开伦敦飞往华盛顿时，他知道俄国人会利用美国人的这种心理，使罗斯福答应他们的要求。于是，苏联代表团刚一离开英国，他便赶紧令蒙巴顿准备出访美国。因为蒙巴顿跟罗斯福的私人关系融洽，同时又担任着对具体实施登陆计划负有责任的指挥官，所以似乎成了就下述事实：即1942年内在欧洲采取任何大规模行动都不会有成功的希望向美国进言的最合适人物。丘吉尔在5月底打给罗斯福的一份电报中说，“（进攻的）准备工作正在以谨慎的方式大规模地进行着”。但他接下去说：“迪基抵达后将向您阐释1942年的困难。”不仅如此，电报中还提到北非的战事，其明显的含义是，在未来的几个月内，英国军队将要进行的主要作战是在那里。

随后，蒙巴顿启程飞往美国。在这个短暂的访问中，他除了与美国军方首脑举行会谈，阐述了英国的主张外，还同罗斯福总统总共进行了长达6个小时的私下会晤。

罗斯福似乎接受了蒙巴顿的看法，即由于登陆艇数量不足，规模有限的登陆作战将难以迫使德军从俄国前线撤回来，而大规模反攻现时还不具备成熟的条件。但总统仍然坚持认为，为了要在秋季摧毁德军的战斗力，英国应当加快准备。访问结束后，蒙巴顿显然相信罗斯福已经接受了英国的观点，因而显得颇为洋洋得意。

蒙巴顿回来后，6月17日，丘吉尔带着英军总参谋长艾伦·布鲁克又亲自飞了一趟华盛顿，再次向罗斯福总统陈述1942年不能开辟第二战场的理由，称：“英国政府不赞成必败无疑的战役，因为这对俄国毫无帮助。”然后，他建议回到在北非登陆的计划即“体育家”计划上来。他清楚，英美军队若实施在北非登陆计划，近期内便会使在法国开辟第二战场的行动告吹。

丘吉尔对罗斯福总统说，实施“体育家”计划，在法属北非作战“是1942年帮助俄国战场的最好机会”。但是，美国军方的某些高层人士不这样看，

马歇尔指出：“即使完全成功地实现了‘体育家’计划，也不能迫使德国人从俄国战场撤走一兵一卒、一辆坦克或一架飞机。”不过，丘吉尔还是说服了他，让美国取消了1942年在欧洲登陆作战的计划，改为执行进攻北非的计划。这一计划的新代号是“火炬”。

按照丘吉利的想法，“火炬”战役不仅应照亮通往北非之路，而且应照亮通往巴尔干之途。

丘吉利的努力如愿以偿了，罗斯福同意立即实施在北非的计划。此后，英美两国参谋部开始详细制定进攻西北非的计划。1942年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问题实际上已从日程表上勾销。

俄国人愤怒了。斯大林谴责英美政府、特别是罗斯福总统违背了自己的诺言，以备备忘录的形式提醒他们，关于1942年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问题，在莫洛托夫访问伦敦和华盛顿期间已经解决，并与美国签署了协议，现在还墨迹未干。备忘录直率地指出，这一行动的目的是“把德国的兵力从东线吸引到西线，并在西线建立起抵抗德国法西斯势力的重要基地”。同时告诉英美领导人：“苏军统帅部在制定自己的夏秋作战计划时，是考虑到1942年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因此，你们拒绝原已同意的作战计划，“对希望开辟第二战场的整个苏联公众是一个精神打击，这使红军在战场上的形势复杂化，给苏军统帅部的计划造成损害”。

美国人有些吃不住劲儿了，罗斯福觉得自己的信誉受到了损害，感到进退两难，他想应该做点什么来弥补一下。其实，聪明过人的丘吉尔也想到了这一点。为了平息一下斯大林的愤怒，同时也给罗斯福挽回点面子，丘吉尔决定在法国北部搞点动作。

这次行动的目标军方早已选好，即法国北部的港口城市迪耶普（一译第厄普）。

进攻这个城市，是蒙巴顿的联合作战总部平素拟议出的一系列作战预案中的一个，行动的总指挥自然非他莫属。

在有些人看来，除了印巴分治外，蒙巴顿一生中遭到最严厉批评的事件就是迪耶普袭击行动了。欲知详情如何，且听下章分解。

第七章 迪耶普行动

多重目的启战端，异想天开忒乐观；

协调不周遭失利，士兵鲜血洒海滩。

迪耶普是法国北端濒临拉芒什海峡的一个港口小城。它原为诺曼底人的古老村庄，在近代商业繁荣后才发展为一座城市，但直到二战时全城的人口也不到3万。

1942年8月，蒙巴顿指挥联合作战部队对该城的进攻，从结果看毋庸置疑是一次失败的军事行动。但是，只有在了解了英国的决策者们，事先想通过这次行动来得到什么，才能分清蒙巴顿本人是否负有责任，或责任有多大。

由于没有及时地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丘吉尔决定作出一个姿态，以

安抚愤怒的俄国人，这是进攻迪耶普的首要政治考虑。同时，丘吉尔觉得这次进攻即使失败，也向俄国人证明了在法国沿岸夺占登陆场是如何的困难。该行动在军事方面的考虑，是试验登陆作战的新技术和战术。另外一个考虑是，“锻炼”一下将要参战的加拿大军队。英国的将军们认为，加拿大军团开入英国已达2年，整天在驻地无所事事，不是酗酒打架，就是与英国姑娘们调情，引起了驻地周围居民们的不满，这次要他们上阵流点血来“保持士气”。可见，这种作战目的上的含混多重与不明确性，正是迪耶普行动在开始前就注定要失败的原因之一。

从1942年4月开始，随着英军小股部队在此前后对布吕讷瓦勒和圣纳扎尔等处之袭击取得了一些战果，英军某些将领认为这类袭击能够减轻俄国战线的压力，有些人甚至以为这类袭击作战可以代替拟议中的“重锤计划”。其实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不论搞多少次持续时间很短的小规模突袭，也无法取代投入8至10个师的登陆行动的。蒙巴顿深知这一点。但是，随着实施“重锤计划”变得越来越遥远，这类突袭行动可以获得“重锤计划”的某些目标的想法也变得更加诱人了。当蒙巴顿于1942年5月初告诉参谋长委员会“重锤计划”难以在8月前实施后，他强调说，作为一种补偿，他可以指挥部队于6月底进行对迪耶普的袭击。特别是“重锤计划”于6月份被英国正式放弃后，蒙巴顿指出：“这使得至少再进行一次稍大规模的袭击变得更加重要了。”到了这时候，英国决策者们认为，进攻迪耶普可能已经成为唯一能使美国和苏联感到满意的行动了。

迪耶普高英国很近，所有有关的人都认为它是进行袭击的理想目标。据侦察，德军平时在迪耶普地区仅驻有一个营，连同辅助部队总共只有1400余名官兵。因为它不是座军港，停泊着的只是些渔船和游艇，一般不被认为是受攻击的目标。5月23日，布鲁克和蒙巴顿一起与丘吉尔就袭击迪耶普以及进攻后的前景等问题进行了3个小时的磋商。布鲁克回忆说，首相“不时地被乐观冲昏了头脑，他把进攻点从加来一直延伸到波尔多，很少考虑本身的力量和登陆设施等问题”。蒙巴顿显然对于行动的成功可能性，也过于乐观了。他认为迪耶普的防卫不强，只要摧毁了港内德军的那些汽艇和其他小型船只，突袭就容易进行了。

这次磋商后，蒙巴顿指示联合作战总部的参谋们着手制订详细的登陆进攻计划。

索利·朱克曼加入总部后的第一项任务，就是确定每个月中将会有几个夜晚适合采取行动。“我工作了将近一个月，研究了潮汐、风力、风向和无月亮的夜晚。最后，我向蒙巴顿报告说，‘情况证明，没有一个晚上是合适的’。”然而，进攻计划还是制定出来了。按照蒙巴顿的设想，登陆部队由英国1000名突击队员和5000名加拿大士兵组成，连同轻型坦克在内，在海军舰炮和空军轰炸机的掩护下，于距离迪耶普一二海里远的侧面实施登陆，继而进行翼侧同心攻击，同时派伞兵部队在迪耶普背后伞降，以牵制对方；并规定整个行动为15个小时，然后迅速撤离迪耶普。

但是，蒙巴顿的这个方案遭到了陆军本土部队将领们的抵制。他们主张对迪耶普实施正面的直接进攻。当时做为本土部队东线指挥部总司令的蒙哥马利中将，在一次联席会议上把侧面进攻的计划斥责为外行的计划。他认为，如果攻击部队只在海岸上停留15个小时，采取侧面进攻的方法便不可能克服种种障碍，在这样短的时间里将无法占领迪耶普，只有正面进攻才是

确保突袭成功的唯一选择。

蒙巴顿要求在登陆进攻时，由皇家海军调拨几艘大型战列舰，以舰炮预先轰击德军的防御阵地，海军部也没有答应。他们只同意在这次行动中，给蒙巴顿调拨 8 艘小型驱逐舰和一些炮艇使用。本来按蒙巴顿的进攻计划，登陆时应以空中轰炸为先导，而空军以实施轰炸会殃及法国和附近的比利时居民为理由，拒绝进行大规模的空中轰炸。后来在丘吉尔首相的干预下，空军同意放宽轰炸限制，可是不久以后，这一立场又发生了变化。在 6 月 5 日的一次作战分析会议上（蒙巴顿此时正在华盛顿与罗斯福会谈），预定的地面行动指挥官、加拿大的罗伯茨少将认为，实施大规模空中轰炸会使迪耶普狭窄的街道出现堵塞，使坦克无法前进。空军指挥官莱马洛利也认为，由于轰炸目标太少，按现有的空军装备，会使多数炸弹将落入海上或沙滩，因此，他也愿意取消空中轰炸。当蒙巴顿从华盛顿回来后，他发现，进攻前不进行空中轰炸的这一决定已经无法改变了。

6 月中旬，当蒙巴顿审查参谋们参照各方面意见而修订出的最终作战方案时，他几乎感到绝望了。除了侧面进攻、空中轰炸和大型军舰支援的原案遭到否决或所谓“变通”外，他原先提出过增加训练有素的英国海军陆战队兵力的意见，也在方案中消逝了，登陆的主力还是那些纪律松弛、毫无两栖作战经验和训练的加拿大士兵。

然而，对人和对事从不愿过分计较的蒙巴顿，还是接受了它。这一点，或许表现了他的贵族风格，但在原则问题上未能坚持己见，注定了这次行动的失败结局。

进入 7 月份以后，拉芒什海峡气候恶劣，仍找不到适合于实施登陆的天气。加拿大士兵临阵磨枪，在训练和演习中频频出事故。蒙巴顿的联合作战总部内情绪沉闷，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本年内恐怕不可能再采取任何重大军事行动了。但是，经过重新考虑之后，蒙巴顿提出了一个不寻常的甚至是过于大胆的建议：继续进攻迪耶普。当他把这一建议提交给参谋长委员会和首相之后，首先得到的反应是惊愕。由于这次行动计划研究和制订的时间过长，它被德国人侦知到是很自然的。不过，俄国人可不这样认为。前苏联著名战史专家沃尔科夫写道：“在蒙巴顿指挥部队在迪耶普登陆前，英国电台广播了一个消息说，此次袭击目的有限。不难理解，这种预告就使袭击丧失了突然性，实质上，这并不是（像英国解释的那样）说给过早准备起义的法国爱国者听的，而是说给德国人听的，其目的是让他们做好‘迎接’登陆兵的准备。在英国电台广播了这则好心的预告以后，德军在该地已集中了一个满员师。丘吉尔仅仅为了证明不能开辟第二战场，就不惜把英国和加拿大士兵当作牺牲品。”且不论这种说法是否出于揣度和偏见，蒙巴顿的突袭行动事先便因走露了消息而失去了突然性，却是毋庸置疑的。

参加这次行动的部队总共约 6000 人。对这个数量连德国人后来都感到奇怪：“这么多的部队作为一次突袭来说规模太大了，而作为一次登陆进攻来说又太少，弄不明白英国人究竟是什么目的？”8 月 18 日上午 10 时，蒙巴顿下令开始行动。英国和加拿大士兵上船时一片混乱，但不管怎么说他们终于全部登上了从驱逐舰到扫雷艇在内的 237 艘大大小小的船只。下午 4 点 30 分，海军部传来消息说，拉芒什海峡上空的一场大暴风雨即将来临，要求立即取消这次行动，令所有舰船返回港口。蒙巴顿马上召集会议，把这一消息通报给与会的各单位指挥官。指挥官们均认为如果重新把船只开回去，

那么，经过这么久才制定出的这次行动计划，可能就会被永远取消了。这些军官们除了罗伯茨少将以外，大多年轻气盛，而罗伯茨少将也表示“如果海军舰船能把我们运抵到那里，我们会进行战斗”。于是会议的表决结果是：“继续前进！”

8月19日凌晨3时47分，一艘同样驶往迪耶普的德军护卫舰发现蒙巴顿的船队，并首先开了火。炮声惊醒了迪耶普的德军。此时，船队在海面上失去了隐秘性，但是掉头返航已经太晚了。5时，登陆部队对迪耶普的强攻开始。

指挥船上。蒙巴顿最初收到的几封电文都是很乐观的，似乎一切还都顺利。实际上，前面大部分攻击部队已处于万分危险之中，来报喜的电报是个别船只上发来的，大部分船只和步兵单位的报话机等设备，或是因炮火震动，或是因海水淹没而失灵，无法向蒙巴顿报告各自的损失情况。1个多小时以前与德舰的短暂交火，已使岸上的德军惊觉并立即作好了战斗准备，因此，加拿大突击部队刚踏上海滩即遭到了歼灭性打击，最先上岸的554人中仅有65人生还，其中33人是伤员。

从迪耶普西面登陆的部队开始时一帆风顺。洛瓦特指挥的突击队在那里成功地摧毁了德军的一个海岸炮兵连，夺取了若干预定地点。但是，当突击部队主力越过一座山崖时，暗藏的火炮和机枪火力点突然开火。因事先英国的情报侦察人员对此一无所知，所以德军设置在这里的直射火炮和机枪阵地，给突击部队造成了重大伤亡。侥幸没死的官兵或是趴在地上，或是躲在岩石后面一动不动，更无法前进一步。

从19日晨8时起，蒙巴顿开始了解到前面的情况越来越糟糕，部队已接近于无法控制的境地。9时30分，蒙巴顿下令撤退，同时请求本土空军来进行支援，并施放烟雾掩护。幸运的是，皇军空军掌握着迪耶普上空的制空权，使德国空军不能对其步兵的地面战斗给予多大的帮助，否则，蒙巴顿的船只和部队肯定会全军覆灭。

撤退过程同样是艰难的。德军增援部队不断抵达战场，火力有了成倍的增强，并紧紧咬住对方不放。英国匆忙间制造的那些登陆艇，质量低劣、功能单一，经过几番折腾大多发动不起来，而驱逐舰、护卫舰等又无法靠近沙滩，相互间的通讯联络也几乎完全中断了。在8月的烈日下，迪耶普城外的沙滩上堆满了弹痕累累的登陆艇，它们成了“德国猎手枪下的呆鸭”。到黄昏时分，除了许多连船都未曾下过的官兵外，68%登岸的加拿大士兵和20%的英国突击队员已经阵亡或受伤、被俘，其余的人多是泅水游到泊在远处的大船上，才得以逃命的。

在撤回英国的航程中，蒙巴顿表情冷峻、心情沉重，但他还是保持住了最高指挥官的风度和冷静的头脑。他抚慰伤员、指挥抢修机器和通讯设备，率领这支残破不堪、士气低落的船队左冲右突，向本土驶去。几天后，船队返抵朴茨茅斯，损失也统计出来了。它大大超过了蒙巴顿的预料：参加行动的6086人中，被消灭、负伤和失踪者共有3623人，占59.5%，而行动前的预计是占10—20%。更糟糕的是，参战的加拿大官兵总共4965人，而伤亡、失踪人员达3367人，占其总人数的2/3以上。

这就是说，进攻迪耶普行动损失最多的是加拿大人，蒙巴顿自然明白，这会严重影响英国跟加拿大的关系。而且，作战的预定目标无一实现。对这次失败，蒙巴顿在当时和后来都没公开指责任何人，也没有试图逃避自己应

负的责任。

8月底，蒙巴顿召集幸存下来的军官们在联合作战总部开会，总结这次失败的经验教训。会上，那些缠着血迹斑斑的绷带、两眼通红的军官们互相抱怨和指责。有的抱怨在战斗时，自己竟然不能像往常那样去看望属下的部队；有的则愤怒地表示，自己被政客和军方上层卑鄙地出卖了；海军指责陆军官兵不敢跳下登陆艇；陆军则指责空军和海军支援不力……大家吵得一塌糊涂，气氛越来越紧张。主持会议的蒙巴顿不时地用顾全各方的姿态进行调解。最后，他用自信、有力地声音讲道：“先生们，开会本身的目的是为了总结经验教训，而不是为了争吵、哭泣。实际上，如果我们真正吸取了经验教训，那么我们就什么也没失去。否则，我们就失去了一切。”这番话起了立竿见影的效果，蒙巴顿很快控制住了会议气氛，使会议得以有秩序地进行下去。

在联合作战总部的一系列会议上，蒙巴顿带领部属们认真总结了迪耶普之战的经验教训。其中，得出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教训是，登陆部队在进攻的开始阶段不能把宝押在占领港口上。其次，这次战斗证明，提前轰炸是至关重要的，应该用更为强大的火力支援登陆部队。由于烟幕的阻挡和德军的攻击，英国海军驱逐舰射击的准确度受到影响，武器装备也过于轻便，无法压制住德军的轻型火炮和机枪。

进攻部队应当得到能够接近敌方海岸向敌方阵地发射密集炮火的大型舰只的支援。

第三，仅仅对登陆艇作出临时性安排是不够的，今后应保持一支永久性的海军攻击部队，它将在进攻中发挥不可缺少的作用。

做为这次行动的最高指挥官，蒙巴顿在当时受到了舆论的指责，如果不是丘吉尔首相的保护和他的贵族身份，他恐怕早就被撤职降衔甚至有被送进军事法庭审判的危险。至今，不少英国和加拿大人对那次“迪耶普悲剧”仍耿耿于怀。

卢斯凯尔在《二战中的皇家海军》及罗伯特斯坦在《光荣与耻辱》等专著中，都指责了蒙巴顿。不过，在丘吉尔和布鲁克等人的回忆录中，这些真正了解事件原委过程的当事人，还是原谅和尽力为蒙巴顿开脱的。尽管作为总指挥的蒙巴顿对迪耶普之战的失败负有责任，但仍有若干对他有利的理由，证明他是“人在其位，身不由己”。

早在行动开始前好几个月，蒙巴顿原案中对迪耶普进行两栖翼侧攻击的计划无疑是正确的，并曾得到最高当局的批准。德军的冯·路德斯泰特元帅后来指出，如果英、加军队采取两翼同心攻击并辅以伞兵突击，那么德军守不住迪耶普。蒙哥马利认为那样太费时间，坚持进行东西两个方向的正面攻击。蒙巴顿应该恢复自己的原案，但显然又已经来不及了。

由此，第一个疑问是：鉴于自己的作战计划已被人改变了，并且调拨给自己的兵力和装备、火力又很不充足，蒙巴顿是否应该取消突袭迪耶普的行动？

不能。丘吉尔首相挑选他计划对欧洲陆岸的进攻，就是看中他坚韧、勇敢和敢于承担责任。由于苏联和美国的强大政治外交压力，英国必须作出某种姿态，哪怕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幕后决策的丘吉尔，对此心知肚明，正因为如此他才无法去指责蒙巴顿，而要在舆论谴责面前保护他。当然，蒙巴顿从自己行动前所掌握的情报中，也显得有些过分乐观，觉得自己至少拥有

一半的胜算，而如果不进行实战，谁都无法在事先就预料到会有悲惨的结局。

最后是关于所付代价的疑问：值得吗？

答案是：值得。首先，实际的损失数并非像数字所显示出来的那么惊人。因为人员损失数字的 3/4 是受伤或被俘，其中的大部分在战后还是回到了加拿大和英国，这在非常重视人的生命价值的西方国家看来，便不算过于悲惨的损失了。另一方面，这次行动是真正的在空军支援下（特别是在撤退过程中）的两栖渡海登陆作战，所有的军事行家们都承认迪耶普之战对后来“霸王”行动的重大影响。这次失败的经验教训，对于不到两年后盟军发起的诺曼底登陆并非无足轻重。局部、暂时的失败，往往孕育着全局、永久的胜利。用蒙巴顿自己的话说，“在迪耶普每失去一条生命，就意味着在诺曼底挽救了十个人的生命”。而“霸王”战役的主要计划者之一摩根爵士则明确宣称：“没有迪耶普之战的血泪，诺曼底登陆的成功是不可能的。”美国人也承认这一点，在诺曼底顺利登陆后的第六天，马歇尔给当时任东南亚战区总司令的蒙巴顿拍去了一封私人电报：“今天我们去法国视察英美军队。我们乘船从舰队之间穿行而过，部队源源不断地开上了法国土地。很长时间以来，我们分享着各种秘密并不遗余力地相互帮助。在此时刻，我想告诉您，这一伟大行动的成功应部分地归功于您的贡献及您和您在两栖作战司令部的参谋们所作的出色工作。”

至于迪耶普之战本身是否为一次完全失败的行动，盟国内部的看法也不尽一致。

英美方面，特别是英国自己认为它是完全失败的。然而，研究过这次登陆整个过程的某些美国军官曾得出结论说：虽然条件极为不利，但这次作战实际上并不能说是彻底失败的，某些方面甚至说是成功的。因为当时英国和加拿大部队以不大的打击力量登上并一度守住了海岸，损失大的原因主要在于突击行动没有得到后续支援。

大规模的进攻，只要能得到大量新锐兵力的保障，就完全有获胜的希望。

这种结论自然深受竭力主张英美开辟第二战场的俄国人的欢迎。事后不久，莫斯科的报纸发表评述说：“迪耶普悲剧后，英国报刊公开进行了热烈讨论，极力证明在法国实施大规模登陆是不可能的。在联合军事会议上某些美国军官在谈及开辟第二战场的现实性时，只要表现一些乐观情绪，英国军官就把在迪耶普受伤的老兵抬进大厅，说明登陆存在着‘不可克服的困难’。难怪美国记者拉尔夫·莫格索尔对这次行动的真正目的表示怀疑：‘丘吉尔有意安排这样一次袭击的唯一目的，是不是为英国人反对以后任何攻入欧洲大陆的企图提供根据呢？’苏联人民和苏军最高统帅部认为，英国的目的显然是这样的。因为对丘吉尔和英国的将军们来说，他们一直把政治考虑置于军事战略和盟国义务之上的。”

迪耶普之战虽只进行了十来个小时，但它却是整个战争期间总是被提起和长期争议的话题之一。究竟如何评价它？从不同的政治立场和军事角度出发，各有各的见解。不过，由于它至少没有取得攻占这个小城的预定目标，议论越多就越对蒙巴顿的声誉不利。蒙巴顿处在这个漩涡中十分难堪，他感到身心疲疲，请求卸去在联合作战总部的重任，重返海军指挥一艘稍大些的军舰便足矣，那样也好尽情地呼吸一下清爽的海上空气。那么，丘吉尔首相对他下一步工作打算作何安排？且听下章分解。

第八章 再衔使命

首相总有小算盘，忙煞蒙氏不得闲；
屡次参与订计划，锋芒才干不一般。

话说蒙巴顿在迪耶普之战失利后，要求辞去联合作战总部指挥官的职务，而丘吉尔并没有立即答应他。由于丘吉尔执意要点燃非洲的“火炬”，攻占法属北非，美国人也只好答应。“火炬”行动是1942年7月20日至25日，由丘吉尔和霍普金斯（代表罗斯福总统）及英美联合参谋委员会成员在伦敦召开的联席会议上作出最后正式决定的。于是，根据丘吉尔的指令，蒙巴顿“暂时忘却”在迪耶普行动中的痛苦，赶紧集中精力投入制订“火炬”作战的计划工作。

“火炬”行动要求英美部队同时在阿尔及尔和摩洛哥登陆。蒙巴顿是制订该作战计划的关键人员，因为人们认为他是关于登陆作战的首席专家。尤其是经过迪耶普突袭失利之后，蒙巴顿的美国同行们几乎一致认为，在涉及什么条件下可以登陆、什么条件下则不可以登陆的问题上，蒙巴顿最有发言权。从中可以看出，迪耶普之战的价值几乎是立竿见影的。

1942年11月8日，也就是迪耶普之战的两个多月后，“火炬”行动拉开了帷幕。

英美两国把13个师及辅助部队总共近50万人的兵力，投入登陆行动。由于驻北非的法国维希政权的军队，对盟军的登陆只是作了象征性地抵抗，所以“火炬”行动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几天之后，英美军队便控制了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的一些战略要地。与此同时，蒙哥马利率英国第8集团军在埃及亚历山大城以西的阿拉曼，击败了德军隆美尔将军指挥的轴心国非洲军团，并将其逐出埃及。在这种有利的形势下，盟军必须尽快确定下一步作战计划，为此需要英美领导人举行一次首脑会谈。

1943年的新年钟声才敲过不久，元月13日，在硝烟刚刚散去的摩洛哥名城卡萨布兰卡，一位“将军”和一位“P先生”在严格保密的措施下进行会晤。这位代号为“将军”的是美国总统罗斯福，那位肥胖的“P先生”，即是英国首相丘吉尔。他们之所以选中这座摩洛哥城市为会晤地点，据说是因为“卡萨布兰卡”一词，在西班牙语里为“白宫”之意，这样会令罗斯福总统感到亲切。从14日开始至25日，双方在该城郊外的安法兵营召开了几次会议。参加会谈的美国方面有：马歇尔将军、海军上将金、阿诺德将军；英国方面有：布鲁克将军、庞德将军、空军元帅波特尔及蒙巴顿将军。

在卡萨布兰卡会议期间，苏联军队经过数月苦战，已经在斯大林格勒地区包围了德国保卢斯将军指挥的22个师，这次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转折点的大会战已接近尾声。德国人第一次感觉到了失败的恐怖，而苏联红军即将转入战略反攻阶段。

为此，丘吉尔和布鲁克、蒙巴顿等人在会议上，极力主张通过英国此前已提出过的所谓出击欧洲软腹部的“巴尔干战略”。

何谓“巴尔干战略”？根据戴高乐的确切说法，该战略的要旨是：在

地中海，“英国既想捍卫它在埃及和所有阿拉伯国家，如在塞浦路斯、马耳他、直布罗陀已夺占的阵地，还打算在利比亚、叙利亚、希腊、南斯拉夫夺占新的阵地。正因为如此，英国才极力把英—美联合进攻的矛头指向该战场的翼侧”。同时，丘吉尔想利用在次要方向作战的时机来积蓄力量，以便在战争的最后阶段向德国进攻，摘取走这颗诱人的桃子。

做为丘吉尔参加这次会谈的主要助手之一，蒙巴顿在鼓吹“巴尔干战略”方面颇为卖力。他对美国人说：“俄国人不是一直要我们尽快开辟第二战场吗？英国认为第二战场的地点不仅仅是俄国人限定的法国，谁能否认我们在地中海和巴尔干采取进攻行动就不是开辟第二战场呢？”

英国要人们以变更内涵的手法，坚持主张开辟第二战场的“巴尔干方案”，并不仅出于维护自己的势力范围和军事上的考虑，也是从政治上着眼。随着斯大林格勒会战即将结束，苏军的反攻已是势所必然。英国要先行一步，挡住苏军通向巴尔干之路，制止当地共产党力量的增强，巩固英国在地中海及其沿岸的阵地，保持它对近东的控制。为了把“巴尔干战略”付诸具体实施，丘吉尔此前提出过建立巴尔干—多瑙河联邦的设想，即巴尔干和多瑙河沿岸诸国联合的计划。该联邦应以保加利亚科堡王朝为首。其成员有：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土耳其、希腊、阿尔巴尼亚。

联邦对外应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实体，而实际上则受英国领导。1942年1月，希腊和南斯拉夫流亡政府签订的政治联盟条约便是建立该联邦的一个步骤。当时在伦敦还签署了关于建立中欧联盟的波—捷协议，一步步地实现着丘吉尔的设想。罗斯福对自己的儿子埃利奥特说过：“首相一有机会就提出经过巴尔干实施进攻的主张，这使所有与会者都十分清楚他的意图何在，他是想在中欧打进一个楔子，以便阻止苏联军队进入奥地利、罗马尼亚，如有可能，还阻止他们进入匈牙利。”

其实，丘吉尔本人也并不掩饰，他打算在巴尔干，打进一个“把欧洲和苏俄隔开的盟军楔子”，在苏联周围建立一个新的“防疫线”。美国记者拉尔夫·英格索尔曾形象地说：“巴尔干就像一块磁铁，无论罗盘怎样抖动，英国战略的指针始终指向它。”因此，英国代表团在这次“非洲白宫”会议上的一项目标是，协调同美国的立场，再次推迟在西欧开辟第二战场，虽然按照俄国人的说法，英美两国政府因未履行1942年开辟第二战场的义务，而向苏联明确许诺过在1943年开辟第二战场。

在卡萨布兰卡会议上，英美双方最终决定：北非战役结束后，英、美军队在西西里岛登陆，实施“哈斯基”战役，迫使意大利退出战争，尔后实施地中海战役。

这样一来，英美军队在法国北部的登陆也就是按俄国人所指“开辟真正第二战场”的事也就再次推迟了。

这次会议的结果是英国人的一次外交胜利。除了丘吉尔本人的雄辩才能外，蒙巴顿也发挥了自己的特殊作用。他以两栖作战专家的身份，在会谈中旁征博引，大谈近期内在法国海岸登陆的困难，使与会的几位美国将军不得不接受了他的观点。

苏联政府认为，卡萨布兰卡会议对解决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联盟战略的主要问题是毫无建树的，进攻西西里岛是一个很不起眼的作战行动。《真理报》援引那位美国记者拉尔夫·英格索尔的话说，“卡萨布兰卡会议是一次折磨人的难产的会议，……最后只生下了一个西西里岛小老鼠。”

1943年5月，蒙巴顿做为英国代表团成员，随丘吉尔赴华盛顿与罗斯福再次会晤。

首相之所以总是带着他去跟美国人打交道，是觉得蒙巴顿的贵族风度和与罗斯福私人感情融洽，会使美国人喜欢。同时，首相也有意让蒙巴顿在重大场合表现一下，尽量让更多地盟国军政上层人物知道和了解这位资历尚浅的英国将军，因为丘吉尔对蒙巴顿下一个职务的安排已有所打算了，尽管还没有拿定主意。5月12日，英美首脑举行会谈，丘吉尔和他的顾问们提出的主要任务是彻底放弃英美军队于1943年在西欧登陆的计划。英国人轻而易举地说服了美方，因为在前次卡萨布兰卡会议上，他们双方已经就此达成了协议。会谈后，双方通过了一项决议，把“英、美攻入西欧的时间推迟到1944年春天”，决定于1944年5月以后大规模在法国登陆，开辟俄国所说的“第二战场”。

这个决定自然要秘密通知苏联政府。斯大林随即致函罗斯福指出：“你们的这个决议给竭尽全力同德国及其附庸国主力进行了两年战争的苏联造成了极大的困难。”

法西斯德国能够同过去一样把自己的主力保持在东线，并不断地补充该线的兵力。”斯大林在致丘吉尔的信中抗议他又一次破坏盟国义务的行为，指出：“不应忘记，它涉及到保护西俄和俄国被占领区内千百万人的生命和减少苏军的巨大牺牲的问题，同苏军相比，英、美军队的牺牲只是区区小数。”斯大林不能容忍在反对共同敌人的战争中无视苏联的切身利益，他临时召回了当时驻伦敦和华盛顿的大使，这一举动被英美两国看作是对两国领导人所奉行政策的抗议。

丘吉尔不听那一套，他不顾斯大林的抗议，仍坚持进攻西西里岛的计划。由于进攻行动预定于当年7月份开始，所以准备工作就显得非常紧迫。做为作战计划具体制订者之一的蒙巴顿，从华盛顿返回英国之后，便整日通宵达旦地投入工作。不过，他很高兴地发现在参谋长委员会配给他的主要助手中，有一位是他以前玩马球时的球友——现海军部计划处处长莱姆比上校。闲暇时，他俩还可以在一起打会儿马球，或去看一场马球比赛，以调剂日常紧张的生活。为了协调作战计划，他还出差去了几趟非洲，与当时正在那里的艾森豪威尔、亚历山大、蒙哥马利和巴顿将军，进行了多次磋商。

在北非的德意军队于5月13日全部投降后，地中海的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占领北非前，英、美只控制直布罗陀、马耳他、苏伊士等几个据点。德、意两国掌握着北岸的撒丁岛到多德喀尼斯群岛，在南岸占有的黎波里至埃尔，法属北非实际上也是德意的重要据点。地中海两岸的德意据点对英美在地中海的战略据点呈现包围的态势。占领北非后，整个地中海的战略形势改变了：英美重新夺得地中海的制海权；北非可为进攻南欧提供空军基地和陆军集结点及出发点；意大利完全暴露在盟军的袭击之下，德意8个师在突尼斯投降，大大削弱了意大利的防守能力。丘吉尔和蒙巴顿等英国将军们抓住这个有利形势，坚持实施西西里岛登陆战役，从军事角度看应当说是正确的。

在这次进攻发起前，希特勒认为盟军很可能在撒丁岛登陆。撒丁岛在第勒尼安海以西，北隔博尼法乔海峡与科西嘉岛相望，东距亚平宁半岛200公里，是地中海中仅次于西西里岛的第二大岛。希特勒觉得盟军如果占领该岛，既可进攻意大利，也可进攻法兰西，加上上了英国情报部门的当，更认

为盟军的进攻目标是撒丁岛。

事情是这样的：蒙巴顿他们在制订西西里岛作战方案时，认为首先要利用人们的一般军事观点，使德军的注意力集中在撒丁岛而不是西西里岛方面。为此，他们精心设计了一个骗局。6月份的某天夜晚，情报人员在西班牙海岸附近丢下一具英国军官尸体，死者身上的公文包里装有很多文件副本，其中还有一封英国参谋部副参谋长给盟军副司令亚历山大将军的一封信。信上提到英军将在撒丁岛和希腊登陆，但在“佯装计划”中，要使德国人相信盟军的进攻是西西里。这一骗局使希特勒加深了盟军进攻目标是撒丁岛。据此，希特勒把德军第1装甲师从法国南部调到希腊；把新成立的第90装甲榴弹炮师调到撒丁岛。而在西西里岛仍只驻有2个德国师和4个意大利师。

蒙巴顿他们制订的西西里岛登陆的战役计划是庞大的：盟军将动用13个师、3个独立旅和5个特种侦察登陆支队；有4000架歼击机和轰炸机、俯冲机，以及不少于1500架运输机，从空中掩护海岸登陆和地面进攻；同时，还要使用3200艘各类舰艇运送登陆部队和作战物资，并掩护部队登陆。之所以使用这么大的力量，是由西西里岛本身的战略地位和人口、面积决定的。意大利的西西里岛，是地中海中最大的岛屿，它地处亚平宁半岛和北非之间，东与意大利本土重心的亚平宁半岛仅隔3公里的墨西拿海峡，开战后守军获得增援是容易的。同时，全岛面积近3万平方公里，人口数百万，尽管希特勒未料到盟军会先拿西西里岛开刀，平时也驻有十几万德意军队。

战役于7月9日打响。是日黄昏，盟军在马耳他岛东西两侧集结部队。夜晚，在西西里岛南侧空投伞兵部队，海军陆战队登陆占领滩头阵地。海滩防线很快就被冲破摧毁，防守海岸的意大利部队几乎一枪未放就瓦解了。11日，蒙巴顿与蒙哥马利一道随后续部队踏进了西西里岛，他看到自己一手搞起的各种两栖作战工具在登陆过程中大显身手，内心十分愉快。

意大利自从参战以来，无论在希腊、地中海，还是在非洲，都是屡战屡败。连年对外侵略，造成消耗不断增大；屡战屡败，使广大士兵士气低落、厌战。据蒙巴顿回忆，当英国第8集团军和美国第7集团军实施登陆时，许多意大利军队实际上没有抵抗，如夺占潘泰莱里亚岛时盟军只有1名士兵受伤，而且是被骡子咬的；意军在兰佩杜萨岛的守备部队，竟向因油料不足而迫降该岛的盟国飞行员投降。由此可见，意大利军队的士气是何等地低落。

7月22日，盟军占领了西西里岛首府巴勒莫。面对这种严重的军事局面，意大利法西斯统治集团内部发生了内讧，一些军队将领包括国王在内酝酿发动推翻墨索里尼的政变，以便同英美停战。以格兰第、波太伊和齐亚诺为首的谋反头子，要求召开法西斯党最高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从1939年12月以来一直没有开过。委员会在7月24日夜间接见，并以19票对8票通过决议，要求把意大利军队的指挥权交还给国王。

7月25日，墨索里尼被国王召到王宫，宣布立即解除他的一切职务，并把他押送到监狱。国王让巴多利奥组成意大利新政府。27日，巴多利奥宣布解散法西斯党，实行全国戒严，在战争结束前禁止一切政治活动，战争将继续下去。8月4日，意大利通过驻里斯本大使馆向盟国试探求和。与此同时，盟军继续进攻，于8月17日占领整个西西里岛，尚未被歼的大约4万德军和6万意军仓皇退往亚平宁半岛，历时38天的西西里岛战役以盟军的胜利而告结束。

至于 1 个月后，希特勒派党卫军突击队把墨索里尼从大萨索山谷的关押地点里救出来，扶植他成立“意大利社会共和国”，同时派隆美尔指挥 8 个师越过阿尔卑斯山脉，占领意大利北部，继续与盟军顽抗，这是后话不表。

由于西西里岛被盟军占领，德国人彻底丧失了在地中海的制海和制空权，地中海实际上又成了英国的“内湖”。虽然英美首脑在上次华盛顿会谈中，已决定于 1944 年在法国“开辟第二战场”，但丘吉尔见这次西西里岛战事顺利，又要求美国重新考虑他的“巴尔干方案”，即首先占领罗马，向意大利北部挺进，然后在巴尔干的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和希腊登陆，他认为，“我们为什么要像蜘蛛一样顺着意大利靴形半岛的脚尖往上爬到法国去呢？打击它的膝部岂不更好”。然而，罗斯福和美国的战略家们见到苏军自 1943 年初的冬季攻势以来，“俄国人不停地向西推进”，担心俄国人首先进入柏林，不但会减损美军在大战中的荣誉，还会削弱未来战后美国在中西欧的地位，因而坚持华盛顿会议作出的决定不容变更。美国军方还认为，从法国东北通往柏林和其他重要经济中心的路总共只有 600—700 公里，是进攻德国的一条捷径，而从意大利到德国边境要走 1200 公里的路，从巴尔干则有 1700 公里。

向巴尔干和意大利进攻，离德国最重要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战略中心很远，而且西欧的地形、地理条件对军事行动比意大利和巴尔干有利得多，法国北部、比利时、荷兰的稠密道路网能够保障大部队顺利运动。

为了解决彼此的分歧，丘吉尔和罗斯福商定于 8 月中旬共赴加拿大的魁北克，举行首脑会谈。

蒙巴顿奉命再次陪同首相出访。虽然丘吉尔这次率领的代表团中仅现役军官就有 150 多名，但蒙巴顿无疑是他的主要助手之一。因为出访前外交大臣艾登曾建议赴魁北克代表团不应乘船，而应该全体一起乘飞机前往，这样既可以节省时间，也可免去海上颠簸之苦。丘吉尔伯飞机失事或遭德国空军截击，对艾登说：“如果我失掉你们，我将会不知所措：我将切断自己的喉管。虽然这里面包含着爱，但又不仅仅是爱。你们就是我的战争机器。布鲁克，波特尔，你，还有蒙巴顿。你们是无法替代的。”

英国代表团乘坐的“女王玛丽”号，在十余艘皇家海军的驱逐舰、护卫舰的护航下出发了。蒙巴顿同自己的部下——来自联合作战总部的 12 名军官，住在船首几间相邻的舱室里。在穿越大西洋的整个旅途中，他除了不时被首相叫去回答有关的问题外，就是紧盯住同船的舰队司令庞德将军不放，要他说出让自己重返皇军海军任职的确切日期。庞德对此闪烁其辞，即使蒙巴顿找到他，他拒绝正面回答，因为他清楚，蒙巴顿能不能调回海军或何时调回，自己是无权决定的，这要看首相打得是什么主意。

特等舱里。丘吉尔已经盘算好对蒙巴顿下一个职务的安排，并以他特有的方式漫不经心地分别征求了布鲁克、雅各布和霍利斯将军的意见，得到了他们并不很情愿的默许，只等下船后找个适当的机会向蒙巴顿本人宣布了。

8 月 8 日，“女王玛丽”号缓缓驶入素称加拿大“北方门户”的新斯科舍省省会哈利法克斯港。该港是世界上最深的不冻港之一，1905 年前为英国陆海军的一个基地。英国代表团上岸后，经过短暂休息，便搭乘加拿大政府安排好的一列装饰华丽的火车，前往英美首脑会谈的地点魁北克。

欲知魁北克有何结果和丘吉尔赋予蒙巴顿什么新任务，且听下章细说。

第九章 魁北克决定

美英首脑筹全局，加国小城来相聚；
蒙氏破格当主帅，颇令老丘费心曲。

魁北克地处圣劳伦斯河与圣查尔斯河的汇流处。它虽是加拿大魁北克省的省会，但当时的人口仅十来万，即使在加拿大也不算是个繁荣的城市。然而，它却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美政治和军方领导人多次在此举行会议，作出过许多重要决定，而在世界现代史上留下自己的一页。

英美首脑的这次首脑会谈，从1943年8月14日开始，地点在魁北克城海德公园内的一幢建筑里。会谈正式开始前，英美双方较低级别的人员已进行过磋商。会议开场后，丘吉尔仍向美国人大谈其“巴尔干战略”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不过，经过一番激烈争论，英国方面还是终于同意通过了代号为“霸王”的战略计划，规定盟军于次年5月1日在诺曼底登陆。另外，还计划了一次在法国南方土伦和马赛附近登陆的辅助性战役，代号为“铁砧”。

然而，就是这项在诺曼底开辟第二战场的计划，也由于英方的坚持而附有一系列前提条件，即进攻法国的“霸王”计划只能在以下前提下付诸实施：

- 风力不太强；
- 潮汐正好符合需要；
- 月光条件正好适合要求；
- 在潮汐和月光合适的条件下天气也应合适；
- 当上述所有条件均不具备时，进攻时间将自动延期一个月，直至下一个满月日期……

英方的这些前提条件，有的是蒙巴顿以两栖作战专家的名义提出来的。它们正对丘吉尔拒绝或拖延在法国开辟第二战场的胃口。俄国人事后得知评论道：“任何思维正常的人都很清楚：要完全具备成功登陆的所有条件不仅可能性很小，而且是不可思议的。但这恰恰是英国政治家们所需要的。”

会议还讨论了制造原子弹问题。会议期间，罗斯福和丘吉尔签署了英、美原子研究合作协定；同时，研制原子弹的“合金管”计划正在加速进行。这是后话了。

魁北克会议还涉及了远东战局，英美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的计划人员第一次提出关于击败日本的联合计划。美方人员相信中国有提供轰炸日本、袭击日本至南海的交通和攻入日本的最大可能性。而英国认为中国并非战时必不可少的伙伴，并且中国战后强盛，或许是大英帝国远东的厄运开始。为此，罗斯福亲自向丘吉尔劝说道：“要迫使日本投降，必须攻入日本本土，而要想进攻日本本土，则必须利用中国基地与人力，这就必须打通中国国际通路，充实中国军备。如果中国（指重庆政府）崩溃，日本在中国大陆发动攻势，进而出扰南太平洋、西南太平洋，美国必将无暇顾及欧洲战场。”

丘吉尔觉得罗斯福的话是有道理的。他抱着与美国交换的态度，如美国同意英国在地中海的计划，英国则不妨赞成美国对远东的主张。出于平衡

英美双方在东南亚地区利益的考虑，丘吉尔在会上提议建立东南亚盟军司令部。由于美国在东南亚地区没有什么作战部队，也不打算再派多少部队去那里，美国的原则是不为恢复英帝国的势力范围而作战，所以东南亚盟军司令部的司令一职自然得由英国人担任。

不过，仅在这一点上，丘吉尔与罗斯福也有一番交易：英美双方曾经达成过共识，即如果有朝一日实施“霸王”战役，将由一位英国将军指挥。丘吉尔还私下答应过布鲁克爵士，由他担任此职。但丘吉尔逐渐发现布鲁克对未来的“霸王”战役，简直没有任何信心，因此觉得让他担任战役总指挥显然是不适宜的。在海德公园林间散步时，丘吉尔向罗斯福透露他有意让一位美国将军指挥“霸王”作战行动，作为交换条件，英国的亚历山大将军出任地中海战区最高统帅，而蒙巴顿则出任新成立的盟军东南亚战区最高统帅。罗斯福痛快地答应了丘吉尔对这两位英国将军的提名，特别是蒙巴顿，罗斯福在英国高级将领中，他最喜欢蒙巴顿。

首相与罗斯福总统在海德公园林间的谈话决定了蒙巴顿未来的前程。丘吉尔之所以以闲谈的方式和似乎漫不经心的口吻，征询盟国领导人的意见及在旅途中试探一下其他英国军方领导人的态度，因为他清楚年仅 43 岁、战前的常规军衔不过是海军上校的蒙巴顿，资历太浅了。在正式场合贸然去提名，恐怕不一定会被大家接受，莫如先私下打过招呼取得共识为好。

还在这次魁北克会晤的 8 个月以前，在卡萨布兰卡英美首脑会议期间，聪明过人的罗斯福已看出丘吉尔有意栽培蒙巴顿。在安法兵营的美国代表团休息室里，罗斯福的儿子埃利奥特·罗斯福曾和父亲有一次对话，小罗斯福回忆说，他看到他的父亲——

在悄悄地发笑。“怎么了，父亲？”

“我在想着蒙巴顿。”罗斯福总统问儿子，“你知道为什么温斯顿让蒙巴顿陪同他到这里来吗？这样一来，我的耳朵里将塞满了把登陆艇转移到东南亚是如何重要一类的话。”

见儿子感到惊奇和摸不着要领，罗斯福接着说：“为了缅甸。英国人想夺回被日本人占领的缅甸。这是他们第一次对太平洋战场表露出真正的兴趣，为什么？为了他们的殖民帝国！”

“可是那和蒙巴顿有什么关系呢？”小罗斯福仍不解地问父亲。

“他们将挑选他在这个崭新的舞台上——东南亚——担任盟军最高统帅。你瞧着吧，温斯顿肯定会这么做。”罗斯福总统对他的英国同行是了解的，显得蛮有预见地对儿子说了上述这样一段话。

其实，尽管丘吉尔一直喜爱和刻意栽培蒙巴顿，但这位年轻的朋友却不是这一职务的最初人选，虽然他的名字列在被考虑的名单之中。在东南亚设立盟军司令部和最高统帅的想法，英国军方早在 1943 年 5 月时就内部议论过，一个月后，得到了英国参谋长委员会的同意。英国内阁的印度事务国务大臣利奥·艾默里是这一想法的热心支持者。5 月 31 日，艾默里给丘吉尔打电话说，英国远东驻军司令韦维尔已经力不从心，首相应当“立即任命一位最高统帅。”艾默里知道首相心里属意的是谁，主动提名蒙巴顿来担任这个要职。但此时丘吉尔还顾忌资深军官们的闲言碎语，表面上拒绝了艾默里的提议，理由是蒙巴顿目前的健康不佳，职位也不够高。但他也不急于考虑其他人选，明摆着要维持现状，待时机成熟后把这个职务交给蒙巴顿。

由于韦维尔在东南亚与驻缅中国军队指挥官史迪威将军的关系搞得很

僵，简直不能在一起共事，美国方面要求另外选派一位英国将军来接替他，促使丘吉尔不得不抓紧把这件事确定下来。

英国军方第一次提出接替韦维尔的候选人是肖尔托·道格拉斯，但是美国人不喜欢他，罗斯福表示不赞成。英军参谋长委员会又提出特德和坎宁安，可是艾森豪威尔认为特德在地中海的职务脱不开身，而坎宁安的工作热情不足。布鲁克爵士讨厌美国人凭借财大气粗对英国指手划脚，坚持坎宁安是最适合的人选，丘吉尔权衡利害，最后还是找理由拒绝了这个意见：“我不认为海军军人适合担任这样的指挥工作。海军的航海技术和科学性使得对士兵的训练非常严格，因此，他们没有时间研究军事史和总体性的战争艺术。”此后，又提出了几位人选，但都未获得丘吉尔的同意。

如果说对坎宁安的提名被丘吉尔以所谓专业不对口而拒绝，那么对同样是出身于海军的蒙巴顿，丘吉尔则又换了一番说辞：“东南亚前线需要一位年轻有为、经过战争考验的军人担任最高统帅，以便重新审议这条战线上战斗的总体情况，给作战注入活力和权威。”他还称蒙巴顿是联合作战计划的大师，对他的任命将会“引起公众的兴趣并得到他们的同意，同时也将表明，年龄不是取得功名的障碍。”

不过，当英美首脑在海德公园林间闲谈时把对蒙巴顿的任命确定后，在返回魁北克市内驻地的途中，丘吉尔将此事告之同车的布鲁克爵士，还是令后者大吃一惊。

布鲁克后来回忆道：“当时我正在俯看车窗外美丽的街景，可是听到这个并不尽如人意的消息，突然使我眼前的一切变得灰暗。”但是，对首相和盟邦总统已经商妥的事情他又不能公然反对，这位可怜的英军总参谋长在当晚的日记中写道：“作为一个独当一面的总司令，蒙巴顿的资格和经验显然不足。他确实有无限的精力和干劲，但需要有一位精心挑选的参谋长不断对他施加影响，来弥补他的不足。”

事情已经决定了，下一步该如何通知蒙巴顿本人呢？丘吉尔清楚，尽管自己出于多种考虑一直有意提携蒙巴顿，但这位出身高贵的家伙却并不一定领情，在这家伙眼里看来，什么事情对他都是理所应当的，况且他心里念念不忘的还是重返海军舰队，此外的一切职位他都未必感兴趣。

“如果他胆敢辜负了我的一番好意，一定要好好教训他一下，煞煞他的傲气！”丘吉尔心里盘算好了通知蒙巴顿的方式。

在魁北克会议期间，丘吉尔故意疏远蒙巴顿，除了正常的工作接触，一反常态地很少跟蒙巴顿聊天。由于蒙巴顿对有关自己职务安排的幕后争执和决定，几乎一无所知，他自己贵族式的天生洒脱气质，也使他不屑去打探究竟，以为首相太忙无暇找人闲聊，所以也并未在意。会议末期的一天，丘吉尔终于对蒙巴顿表示了亲近，邀请蒙巴顿和参谋长委员会的几个主要成员到他的专用餐厅里共进午餐。饭后，丘吉尔要蒙巴顿留下来，下午到他的房间里跟蒙巴顿谈话。

蒙巴顿以为首相忙里偷闲，又要找他谈天说地神侃一番，便乐呵呵地答应了。

下午，蒙巴顿踏着轻快的步伐走进了首相的房间。关上房门，他见丘吉尔正埋首于办公桌上的文件堆里，心里不禁一热：“首相真是太辛苦了，看来午餐后他一直没有休息。”

丘吉尔见蒙巴顿站在那里发愣，便轻轻摆了摆手，示意他坐下，然后

点燃根雪茄烟，指着桌上零乱的文件问道：“迪基，你能把这些东西处理好吗？”

蒙巴顿瞥了一眼桌上的文件，那是一堆来自印缅战区的急电，回答首相说：“我很愿意帮助您整理好这些文件。”

丘吉尔哈哈大笑了几声，对蒙巴顿说：“不，迪基！不是这些文件，整理桌子上的这些东西是副官们的事情，我的意思是你能否承担起东南亚战区的领导责任，你将成为那里的盟军最高统帅！”

蒙巴顿一时没有反应过来，尽管他对自己的仕途一直满怀信心，但在诸多英军资深将领们中还是多少感到有些心虚，不相信首相会把这一重任委予自己。他以为自己听错了，首相可能指让他代表英军总部去那里作短期视察和指导，便回答说：“我愿意服从派遣，但希望从那里回来后，仍能让我回舰队去指挥一艘军舰。”

他知道，自己挂过舰长之名的那艘“辉煌”号航空母舰，骨干都是从沉没的“凯利”号驱逐舰幸存者中陆续调去的。这两年，那些老部下无时不希望他回到“辉煌”号，他也一直在为此努力。

丘吉尔发了脾气，对着蒙巴顿咆哮：“什么？回到海上！难道你不明白我在建议你担任最高统帅吗？”

见首相显得很生气的样子，蒙巴顿马上乖巧了些，“感谢您的提擢和信赖，不过，在接受这一职务之前，请允许我想一想，并且征询一下其他人的指教”。

“罗斯福总统已经同意了。”丘吉尔接着告诉蒙巴顿：“实际上美国人还很热心。不过，你是对的，去听一听资深将军们的指教对你是有利的。”

8月24日，魁北克会议结束了，英国代表团返回到伦敦。蒙巴顿分别拜访了几位英军的头面人物。他首先找到布鲁克爵士，尽管布鲁克心里有不同想法，表面上对蒙巴顿还显得很客气，一番祝贺后对他说：“你已经是一位三栖将军了，你应该到东南亚去。”紧接着，蒙巴顿又去见海军舰队司令达德利·庞德，庞德心直口快道：“这是皇家海军军官出任战区最高司令官之职仅有的一次，干嘛不去？”

蒙巴顿从这些人的神情态度上，看出他们的妒嫉和不满，好在有首相撑腰，他也便不去过多理会了。

虽然蒙巴顿的新任命没被马上公开，但小道消息则开始四处传播。一天晚上，莱姆比上校忍不住问他：“迪基，你肯定在隐瞒什么事。我注意到过去你总是不怎么向远东方面发放登陆器材，但在总部这几天的会议上你却一反常态，为东南亚战区力争到更多的物资。怎么，你要到那里去吗？”

“也许是吧。”蒙巴顿淡然地回答道。

东南亚战区是一个独立的战略单位，它的地位要求其最高统帅必须由至少有一上将军衔的人来担任，因为其副职已拟议由史迪威挂名，而史迪威此时也已是陆军中将。蒙巴顿目前的军衔还是战时中将，职务确定了，还要赶紧解决他的军衔问题。

丘吉尔从魁北克回来后，想立即把这件事办妥，未料却首先遇到了海军方面的阻力。

庞德当面对首相说：“关于对迪基职务的安排，我们服从你的决定。出于指挥关系的考虑，对他晋升为上将我们也可以同意，但晋升的这一军衔应当是战时的和不固定的，否则将破坏海军军官的正常晋衔制度。”

丘吉尔觉得庞德的意见不无道理，对此表示同意。

蒙巴顿在未来东南亚战区的职责，将主要是指指挥陆军和空军作战。当丘吉尔以工作需要的理由，提出蒙巴顿在这两个军种中的晋升军衔问题时，参谋长委员会表示坚决反对。他们说，蒙巴顿已经获得过战时空军中将和陆军中將了，这已经足够了。授予他这两个军种军衔是为了有利于联合作战总部的工作，虽然他们并不想把它们撤销掉。但是，如果再给蒙巴顿加官晋衔，那将意味着“其他战场的最高统帅也将得到其他军种的名誉军衔”。丘吉尔伯引起众怨，于是收回了自己的提议。结果，蒙巴顿只保留了他在陆军和空军中已得到过的名誉军衔，给他规定的正式称呼是蒙巴顿海军上将。

不过，这一称呼带来的荣耀，已经令他格外振奋了。然而欣喜之余，想到要远离本土去肩负独当一面的重任，蒙巴顿又有些惶恐不安。他希望自己那位要强的、独立性很强的妻子能跟他一起去赴任，他在给埃德维娜的一张便笺上写道：

如果没有你，我真无法想象怎样才能完成这一使命。我已经习惯于倾听你的直率而入情入理的批评意见。但是，对于那些我将与之共事的人来说，你的作用太重大了。我不得不又一次地指望从家庭中得到宁静和宽慰……

在我们当初订婚的地方一起生活，从事比那些人更为重要的与战争有关的工作，岂不是很浪漫的吗？请不要认为我轻视了你的工作的重要性——我只是一个想让妻子和他呆在一起的自私的丈夫！

……

当然，蒙巴顿夫人有充分的理由说，她的工作需要她。从去年 8 月起，埃德维娜担任了圣约翰救护队的总监管，经常要带着她的护士小姐们跑到北非和其他需要她们的战地去救护伤员，忙得不可开交。即使没有担当这项工作，以她的性格也未必会只是为了跟丈夫团聚而跑到东南亚去。蒙巴顿的联合作战总部有一些女性军官和文职文员，其中有几位跟他的关系发展的不坏，这是人人皆知的。有人未必公平地说，她们的作用主要是装饰性的。有她们在身边工作使蒙巴顿感到振奋，但是他最需要的是一位可以倾诉衷肠的女人，而这除了夫人埃德维娜之外的别的异性则无法替代。在这方面，他去东南亚最感到担心的就是没有夫人的陪伴。他会欣然受命赴任，但是远离本上对他来说将是一种难以忍受的寂寞。同时，独当一面的职务，必然要出头露面去涉足外交活动，这也需要有埃德维娜陪伴为好。

尽管不大情愿，埃德维娜还是答应了丈夫的请求，同意等处理完救护队的交接事务后，离开英国去遥远的东南亚协助和陪伴蒙巴顿。

8 月 31 日，丘吉尔正式向外界公布了蒙巴顿的新职务。在此之前，丘吉尔还打电报给印度总督及南非、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总理，向他们通报了这一新任命：

……经过仔细考虑，我们决定由路易斯·蒙巴顿勋爵出任盟军东南亚战区的最高司令官。蒙巴顿具有独特的资格。他对陆、海、空三军的情况以及两栖作战都非常熟悉。他作为参谋长委员会的成员，任职达一年半，因此从根本上了解我们的整个战争布置。考虑到东南亚战线陆上和海上的变化莫测的特点，我认为这些背景是非常重要的。蒙巴顿是一位出

色的组织者，具有非凡的精力和勇敢精神。他的任命已经得到了美国总统和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欢迎，宋（指宋美龄——作者）也已代表蒋总司令对此表示热烈赞同……

的确，丘吉尔这份对蒙巴顿似有溢美之辞的通报电文中，也道出了一些实情。

他之所以能不顾某些英军老将们的不满，破格提擢蒙巴顿，美国方面的态度起了很大的作用。罗斯福总统不用说，当听到对蒙巴顿的任命决定后，马歇尔和艾森豪威尔对此也十分高兴，最引人注目的是，连一直对英国不抱好感的海军负责人欧内斯特·金也认为蒙巴顿是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军官。正在太平洋战场苦战的麦克阿瑟听到蒙巴顿将来远东任职的消息后，不但兴高采烈，还要戈达德空军中将直率地转告蒙巴顿：“告诉他，他将需要更多的空军。你把这些话告诉他之后，再代表我告诉他一次，将需要更多的空军！”此前多次访问过欧美，在一些外交场合碰见过蒙巴顿的宋美龄女士，对他的印象也颇佳：“优雅和富于魅力”。

然而他毕竟是个英国人，理所当然地要为英国的利益效劳。对于这一点，蒙巴顿心里是清楚的，丘吉尔对他也是信赖的。公布任命后，蒙巴顿请首相指示处理同那里美国人关系的原则，丘吉尔告诉他：“首先要与美方派出人员搞成伙伴关系，然后加以控制，以便使我们和他们的政策和行动一致起来。”

对此，蒙巴顿心领神会，颌首称是。

临行前，他还拜访了几位私交不错的英国将军。蒙哥马利祝贺他的升迁，鼓励他说：“如果你能够凭着自己的精力和热情使那里摆脱毫无生气的状况，你就是完成了一件前人没有完成的业绩。”他向时任盟军最高司令部参谋长的摩根爵士辞行时，摩根将军交给他一篇亲自撰写的“一位年轻的最高统帅应当知道些什么”的论文。同时告诫蒙巴顿在东南亚要量力而行，现在和联合作战总部时不同了，你已进入最高层，考虑问题要谨慎和全面，并应当深入前线，尽量少地呆在德里。蒙巴顿感谢爵士善意的忠告。

蒙巴顿曾经说过，接替一项工作的最好时刻是在事情一团糟的时候，所以他到东南亚任职的时机是再理想不过了。那么，盟国在那里的战事已经糟糕到什么程度？且听下章分解。

第十章 临危赴任

日军横扫东南亚，盟国防线已崩塌；
为稳阵脚蒙氏来，作为如何日后夸。

话说以日军 1941 年 12 月 7 日袭击珍珠港为标志，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后，头一周日军即占领泰国，迫使銮披汶政府签订城下之盟；12 月 10 日，日军同时在菲律宾和哥打巴鲁登陆；12 日，日军强渡柔佛海峡，进攻马来半岛和新加坡；25 日，香港沦陷，港督马克·扬爵士宣布投降。

此后一个月，马尼拉、吉隆坡和新加坡相继失陷。7 万美菲守军放下武器，8 万新加坡英军向 3 万日本入侵者挂出白旗。日军乘胜南下，攻占爪哇、

南苏门答腊和巴厘巴板。战争初期，对英美盟国来说，无疑是一段充满灾难、耻辱和不堪回首的日子。盟军到处惨遭败绩，狼狈不堪；日本人频频得手，取得一连串震惊西方世界的奇迹般的胜利。

由于缅甸在盟国向中国输入抗战物资的特殊价值，1942年1月日军饭田祥二中将指挥其第15军分三路入侵缅甸：沿伊洛瓦底江江东岸进犯卑谬，沿仰光曼德勒铁路进犯同古，沿泰缅边境的景迈东进。一时间，缅甸成了东南亚战场争夺的焦点。

1月31日，日军第55师团手持轻武器的万余官兵长途奔袭，击溃了两倍于己的敌人，占领了毛淡棉。至此，通往缅甸内地的门户已经洞开，仰光城在入侵者面前暴露无遗。当时，英国在缅甸的守军隶属于驻印英军总司令韦维尔上将指挥。2月5日，韦维尔上将飞抵仰光，决心再作一次挽回败局的努力。经丘吉尔首相同意，韦维尔急调英国名将亚历山大将军来缅任驻缅英军司令，原驻缅司令胡敦改任参谋长。3月5日，亚历山大飞赴仰光，他奉令坚守仰光，但他抵达仰光以后便获知局面已无法改变，日军正向仰光外围的勃固猛攻，并向北翼包抄，企图切断仰光至卑谬的公路，以堵住该城在陆上的最后一条通道。亚历山大分析敌情之后，认为仰光的陷落已是不可避免的了，遂下令炸毁仰光大炼油厂，破坏城市设施，迅速由仰光——卑谬公路向北撤退。

入夜，仰光城到处都在起火，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股呛人的焦糊味。英国当局命令将来不及撤走的大批援华物资，包括972辆汽车组装件和轮胎统统付之一炬。缅甸政府已经撤退到几百公里外的曼德勒，后来又撤到印度。仰光市民则扶老携幼，纷纷躲到乡下去。华侨处境最惨，他们无处躲藏，只好将辛辛苦苦积攒的家业忍痛丢弃，然后凄凄惶惶地向着遥远的中国老家作长途迁徙。昔日耀武扬威的英国军队撤退时的情景也好不了多少，一位叫斯耐潘的英国记者在这期间经历过一番冒险之后，于《泰晤士报》上撰文写道：

……到处都有黄种人（指日本军队）的洪水追赶着白种人和棕色皮肤的人群。日本士兵穿着质地粗劣的黄军服，他们的国旗上画着一个燃烧的太阳，很像印地安部落的图腾崇拜。日本人长得非常矮小，只有5英尺高，但他的步枪和刺刀却比欧洲人的足足长1英尺。这种形象尤其可笑，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北欧童话中那些扛扫帚的小妖怪。……在公路上，日本人的军队正在行军，他们是去攻打仰光。前面仅有几辆小型坦克开路，坦克上搭满了突击队员；接着是炮车，还有骡马和驮牛，我看见一个军官骑在牛背上，不像去打仗，倒像去放牧。后来步兵队伍开过来，他们都骑自行车，天知道这些矮人从哪里弄来这么多自行车。他们有时几百人一队，有时三五人一排，有说有笑，好像是赶到仰光去看一场精彩的拳击比赛。……这是二个陌生的敌人，来自中世纪，英勇善战，斗志顽强，文明的白种人要遏止这些野蛮民族的扩张意志，就必须要用钢铁筑起牢固的堤坝来。然而，白种人的钢铁堤坝正在走向崩溃……

那些行军离不开汽车，打仗离不开坦克大炮，吃罐头食品，携带钢盔和防毒面具，脚上穿着长筒皮靴的英国军队，被士气高涨的日本人像撵鸭子似地驱赶着逃命。

3月8日，日本军队高唱军歌，浩浩荡荡开进缅甸首都仰光。

4月，英军及其印度雇佣军队基本上被赶出了缅甸，只是由于指挥撤退有方和中国入缅军队前来侧援救应，才避免了全军覆没的结局。英国参谋长委员会在分析缅甸战事失败的原因时指出：“那里的英军和印度军队训练低劣、装备不足，指挥不当。皇家空军软弱无力，情报机构几乎默默无闻。他们不懂如何打丛林战，只是死守道路，于是，不是被裹挟在中间，就是被甩在后面。缅甸人则态度冷淡，时常充满敌意。”

缅甸沦陷后，日军又挥师西进，直扑印缅边境。印度，这颗英国女王王冠上的明珠，此时是开放着的。仅仅由于交通线过于分散以及后勤补给不足，日本军队才暂时不敢贸然前进。但此时已为英国远东驻军总司令的韦维尔上将，则大有唇亡齿寒之感，他说：“印度为英国的东方防御枢纽，而远东则为印度的右翼，远东军事形势之任何变更，尤以有关缅甸的变更，将直接影响到印度。”远在伦敦的丘吉尔也一反过去不重视缅甸战事的常态，担心如果日军控制了缅甸而闯入印度和印度洋，则“将造成我们在整个中东的崩溃”。正因为如此，丘吉尔一再要求印缅英军，要坚决把日军遏止在缅甸，尤其不能让它越过英帕尔—科希马一线进入印度境内。

遵照首相的指示，韦维尔试图建立起一支有生力量抵挡日军，然后再进行反攻，然而，由于缺乏训练有素的部队和充足的装备，再加上保卫印度本身安全的任务，他这一设想取得的进展有限。在从位于缅甸海岸的若开半岛发起的规模有限的反击战中，英军的指挥官似乎重复了他们在以前所犯过的全部错误，被饭田祥二郎中将有力量穿插所击败。1943年5月，士气低落的英印军队狼狈不堪地返回开始进攻的地点，侥幸还能逃了回来。只有温盖特少将率领的一个旅，靠远距离空中补给，才在伊洛瓦底江畔的杰沙地区取得过些许战果。

负责指挥着开反攻的欧文将军很快被召回。他在4月中旬这样写道：“今年以来开展的有限行动表明，英国军队训练不足，指挥不力，即使在我们自认占优势的人数和装备方面也无法和日军较量。”蒙巴顿来东南亚赴任前曾在伦敦见到过欧文，他仍然情绪低沉。他告诉蒙巴顿，英印军队的士气简直糟透了，士兵们认为日军是不可战胜的。他说，“他看不出目前在前线的哪支部队能够阻止日军带有试探性质的进军德里的威胁，更不要说挥师前进了。”印度驻军司令奥金莱克也几乎同样地沮丧，称在目前的人力物力条件下，不要发动任何不成熟的反攻，而且什么事也做不成。

面对在北非和欧洲战线，英美军队及苏军已逐步转入反攻阶段，丘吉尔抱怨东南亚战事拖了整个战争的后腿，批评在那里的英国将领们“看来一心在夸大困难，要求得到更多的部队，建议继续拖延”。而实际上，驻在印度的6个师和进入缅北的几支中国远征军部队，在人数上已略微超过了驻在缅甸的5至6个日军师团，盟军在这一地区的飞机数量也比日军要多。他们在军事上频频失利的重要原因，在于精神上不能战胜对手。30年后，英国历史学家约翰·科斯特洛在其权威巨著《太平洋战争》中评论道：“在缅甸，日本人完全不是按照西方人的军事教程作战。他们有自己的习惯和作战原则。他们惯于偷袭，声东击西，分成几股到处渗透，从通常认为最不可能的地方突然钻出来。日本士兵特别能吃苦，不畏惧死亡。……他们相信自己一定会取得胜利，而英国人对胜利却仍然将信将疑。”

好在随着整个欧亚战争形势的好转，信心正在建立。但这将是一个艰

苦的过程。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1943年10月2日，蒙巴顿乘“马可·波罗”号运输机从诺索尔特机场启程，飞往东方上任。

在宽大而简陋的机舱里，蒙巴顿“一想到我已经成为大英帝国重返亚洲发动反攻的外在和实在的象征，在飞越印度海岸的时候，不禁感到一阵激动”。除了印度，给他规定的作战指挥权包括缅甸、锡兰（今斯里兰卡）、暹罗湾、马来半岛和苏门答腊。这些地方都是英国在战前的殖民地或传统势力范围。除了锡兰和缅甸境内靠近铁邦山和若开的一片狭长区域以外，整个地区都被日军所控制。但是蒙巴顿自信，他将执行对他的指示，把日本人赶出这一地区。

10月6日，蒙巴顿抵达德里。他名义上的副手——东南亚战区盟军副总司令史迪威中将，前来机场欢迎他。史迪威是美国派给蒋介石的参谋长，也是在华美军总司令。此人以尖酸冷刻著称于美军，事实上他不愿听从任何人的命令，包括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命令。不过，蒙巴顿与他首次见面倒是令人愉快的。蒙巴顿的魅力令史迪威感到，“这个英国佬热情洋溢、真诚友善，也讨厌保守和顽固，似乎是个聪明的家伙”。

印度土邦主在德里的一处宫殿法里考特宫，被负责安置工作的人员辟为蒙巴顿的下榻之处。蒙巴顿告诉他们：“最重要的是，我应当和我的16位有少将军衔以上的军官们住在一起。”于是，他们把萨默维尔等几位海军将领安排在宫殿的一楼，把法吉德及其几位空军高级军官安排在三楼，蒙巴顿跟他高级幕僚住在中间二楼。

住下不久，蒙巴顿便开始感到摩根爵士曾要他躲避德里的忠告是对的。这里的上流社会生活，还像战前那样充满了洋洋自得地欢乐气氛，好像亚洲根本没有发生战争一样。最高统帅部内外熙熙攘攘，来访者不断。甚至经常有从市民管理机构来找活干的失业清洁工、邮递员以及小商贩，光顾这本应是军事禁区的地方。可见，安全工作非常糟糕，谈不到有什么保密观念。蒙巴顿说：“我开始工作后，一个身高约为4英尺的印度少年（我怀疑他是伪装的日本密探）每天都来到我的办公室，向我兜售香烟和巧克力。”随从参谋和警卫居然无法把他赶出去，最后，还是蒙巴顿本人把他赶走。

在这个最高军事机关内，还充满了懒散的气氛。在蒙巴顿开始工作的第一天，一位参谋人员竟然满不在乎地走进他的办公室，说自己的一本侦探小说似乎前些天忘在这个房间里了，询问蒙巴顿注意到了没有。同时，老手和新人之间的矛盾从一开始就暴露了出来。研究东南亚问题的老手们认为最高统帅从伦敦带来的参谋们鲁莽、傲慢和不稳重，而后者也在寻找对方懒惰和低效率的现象作为回敬。蒙巴顿按照此前在联合作战总部的作法，把来自陆海空三个军种的参谋人员合在一起，组建了联合参谋班子。这引起了当地各军种负责人的不快，并感到别扭，因为他们已习惯于掌握和使用自己的一套参谋班子。摩擦肯定会出现的。“但是，蒙巴顿和我合作得很好，”驻印英军司令奥金莱克这样说，“我认为我们制止了摩擦。”其实，他们两人之间的第一次接触是很冷淡的。在他们的第一次会见中，蒙巴顿感到对方“似乎已经在我们之间筑起了一堵冰障”。

那位韦维尔上将这时也仍在印度，伦敦给他的职位是出任印度总督。他和蒙巴顿的气质、作风都不相同，简直可以说是两种不同类型的人，他虽不反对蒙巴顿来此赴任，但仍疑惑地观察着这位年轻的海军上将。英国内阁

中主管印度事务的国务大臣利奥·艾默里，似乎预见到他们之间会产生一些隔阂，曾写信给奥金莱克，告诫他伦敦希望“总督、蒙巴顿和你将成为不可分离的三驾马车”。“蒙巴顿和他的参谋人员们正在安顿下来，”奥金莱克回答道，“当然，他们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依靠我们获得情报和帮助。只要我在这件事上仍然有发言权，我想我们会尽力而为的，今后也将继续这样做。”

如果说初来乍到的蒙巴顿，在德里的上层人物之间的关系上还有些棘手和不愉快的话，那么，那些战地指挥官则对蒙巴顿的到来表示出了真诚的欢迎。时任新编第14集团军军长的斯利姆中将后来回忆说：“当我见到蒙巴顿勋爵时，心里非常高兴，因为我知道他的形象和举止会极大地鼓舞官兵们的士气。他出身于海军这一点并不让我感到失望，相反我感到很满意，因为我希望进行两栖作战行动。当然，我发觉他有些过于乐观了，不过这不是他的过错。他正确地提出应该从我们战线的南部进行两栖攻击，而不是从北面慢慢地推进。”他们支持和信赖蒙巴顿来领导自己的部队。

蒙巴顿上任10天后，决定动身前往中国访问。中国战区不在他的指挥范围之内，但它的存在和需要将对他的行动产生重大影响。

他知道，重庆方面对英国人怒气冲冲。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以后，主要依靠滇缅公路保持着同海外的联系。英国丢弃缅甸，使中国丧失了“国内战场的唯一的国际供应线，给中国造成了巨大的影响；驻缅英军不通知中国就放弃了仰光，致使中国停留在那里的10万吨军用物资来不及运走，对此蒋介石异常震怒；随后，当中国远征军将英印军掩护至曼德勒地区以后，英国又不征求中国方面的意见而单方面向印度西撤，蒋介石又指责英方背信弃义，要求英国应对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负责。滇缅公路被切断以后，重庆方面便立即丧失了90%的军需品和工业必需品，从1942年4月起，国统区要获得援外物资只有通过印度空运，穿越危险的“驼峰地带”（即喜马拉雅山）运至重庆，但维持这条航线的运输机很少，运量也十分有限，远远不能解决国统区的军需民用。因此，蒙巴顿觉得此次重庆之行，即使达不成多少具体协议，也有必要拜访和安抚一下蒋介石。

10月16日，蒙巴顿飞赴重庆。情报部门在最后一刻得知，日本战斗机正在注视着最高统帅的行踪。因此，穿越喜马拉雅山的飞行不得不推迟到天黑以后，晚了5个小时。抵达的时间也相应地晚了，但几位中国将军依然在机场迎候。蒙巴顿在日记中写道：“我对这次不无理由的失礼深感内疚。”在机场上，他还见到了前几天刚刚返回重庆的史迪威将军。此时，史迪威与蒋介石已闹得不可开交，蒋介石正在争取得到白宫的同意，打算马上解除史迪威在中国的职务。

走下飞机后，蒙巴顿乐呵呵地要拉史迪威合个影，一脸阴郁的史迪威却摇着头表示拒绝，蒙巴顿惊讶地问：“为什么？”

“因为如果我们合了影，那个‘花生米’也会不喜欢你的，他要解雇我。”史迪威生气地说。“花生米”是史迪威给蒋介石起的绰号，除了在中国将军们面前他不敢随便地叫外，跟西方同行们聊天时，他总是这样放肆地称呼中国军队的最高统帅。

“那样的话，我们就更要合个影了。”蒙巴顿轻快地说完，还是拉住史迪威让人给他俩拍了张合影照。

中国和日本交战已有6年之久。国内西南的大部地区虽并没有沦陷，但国民经济和管理状况却一片混乱。在乘车去市内下榻宾馆的路上，蒙巴顿

想起了美国《时代周刊》记者埃里克·塞弗赖德对中国战时首都的描绘：“一座死城……一座丑陋得难以名状的废墟……只剩下一个弹痕累累的门廊。陪都应有的繁华与热闹景象烟消云散，到处都是难民、乞丐和伤兵。医院人满为患，饥饿笼罩城市。为了躲避日本人轰炸，几年来人们干脆把每一幢建筑物都抹上泥灰，把玻璃涂黑。……入夜，全城几乎见不到灯火，连扬子江也死气沉沉，凝固在无底的黑暗中。”

现实也的确证实了这一描绘。在车上，史迪威还以中国通自居，向第一次来重庆的蒙巴顿滔滔不绝地介绍他在这里的见闻和感受，尽管他对其他人也讲过多少遍了。“德基，你知道吗？这是一个多么庞大而顽强的民族。每逢阴雨天气或者没有空袭警报的日子里，重庆的街道上就挤满了各种各样黄皮肤的人群。他们好像洪水塞满河道一样浩浩荡荡在城市和乡村流动，永无尽头。他们中大多是衣衫褴褛的苦力和被战争夺去土地的农民，还有许多失业者和流落街头的学生，这些人的住处都是东倒西歪的小棚子，用一两根木头支撑着，屋外淌着令人作呕的污水和垃圾。我见过几处这样的房子，房子里没有床，主人和孩子在地上吃饭睡觉，但是他们照样活着！上帝，中国人的生命力是多么顽强啊！他们似乎只需一片菜叶或者一口水就能活下去并且成群地繁衍后代。你想想，这样的人民，你如果把他们武装起来加以训练，发给他们最好的武器，吃罐头食口，他们难道不会成为世界上最优秀的军队吗？”

做为皇族子胥的蒙巴顿，从小生活优裕，自然无法去想象和体验史迪威所说的一切。对于美国方面一直主张应积极援华，无论是丘吉尔还是他本人，也向持不同的看法，至少要等一等再说。他岔开了话题，跟冷峻、木讷的史迪威讲起了笑话，不知不觉间，汽车驶进了国民政府专为接待外国贵宾而修建的一幢花园别墅内。

何应钦上将代表蒋介石和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早已等候在那里，为蒙巴顿接风洗尘。同重庆老百姓奄奄一息的悲惨生活相反，欢迎宴会丰盛得近乎奢侈。平民和大兵出身的史迪威历来看不惯中国官场上的这一套，从他的表情上能够觉察得出来。

不过，蒙巴顿却得心应手，令陪同他参加宴会的其他英国人赞赏不已，认为他的举止十分得体，只有曾多年在华工作过的罗布森中校不太满意。罗布森深谙中国式的客套，他认为在经过一番谦让之后，蒙巴顿不应在何应钦之前在宴会桌前就座。他抱怨说，勋爵应当继续推让。并且，他在宴会结束后，立即把这一建议告诉了蒙巴顿。蒙巴顿后来这样写道：

在此后的访问中，我们一直为主人是否应先于我入座而互相争让着。直到快要吵起来的情况下，我才不再坚持了。这显然堪称礼仪之最了！……

晚饭后我想阅读文件，但主人在灯上安装的昂贵的瓷灯罩挡住了光线使人无法阅读。我要罗布森除去灯罩。他扬起手，惊恐地说，他们会认为自己照顾客人不周，没有提供足够的光线。所以，每天晚上我们都呆在半暗中，感受着这令人可怕的客气。

抵达重庆的第二天早上，蒙巴顿刚刚起床，宋子文匆匆来访，并且转告他蒋委员长打算今晚上举行首次会晤。蒙巴顿期待着这个时刻的来临，内心盘算着见到那位中国最高统治者时，应当说些什么和不应当说些什么，怎

样才能既减轻他对英国抱有的不满情绪，又能适当地维护大英帝国的利益。欲知蒙巴顿与蒋介石首次会面的气氛如何，且听下章详说。

第十一章 折冲樽俎

访问重庆获好感，关系玲珑好手段；
无奈巧妇炊无米，再好方案难施展。

蒋介石的黄山别墅位于嘉陵江南岸，距市区 10 英里。这是一座向阳的山坡，视野开阔，草木葱茏，站在观景台上可以鸟瞰重庆市区和两条夹峙在山谷里的弯弯河流。抗战期间，委员长一般都在这里会见来访的外国军政要人。

他向来对英国人不抱好感，这大概是北伐战争时他的兵锋首指英国支持的吴佩孚和孙传芳而结下的积怨。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中国与英国同样对日作战，蒋介石蛮以为做为同盟国家可以捞到跟英国人平起平坐的地位，但是，上次韦维尔访华时所表现出来的傲慢态度使他觉得受到了污辱，至今仍记忆犹新。

韦维尔那次访问重庆是在 1941 年 12 月 23 日。此人被伦敦 1980 年版《历史百科全书》中称作“……二次大战中最有成就和最不幸的将军之一。”他身材魁梧，性格倔犟，第一次世界大战使他失去一只左眼，因此当他跟别人会面时，常常用剩下的那只右眼蛮横地瞪着对方，使人感到他像一头随时都会发怒的独眼公牛。

韦维尔抵重庆时，带来一大群衣着华丽、趾高气扬的军事助手和参谋。这些狂傲的不列颠军官从走下飞机的第一刻起，就以一种西方人的优越感俯视前来欢迎他们的中国主人，并且公开把中国的委员长称做“酋长”，那意思是中国人还都是原始的部落民。

也是在黄山别墅。蒋介石真诚地欢迎并宴请远道而来的英国客人。他身着戎装，满脸微笑，亲自在别墅庭院的大门口欢迎贵宾到来。中国第一夫人宋美龄则亲自为丈夫充任翻译。蒋介石显然对即将开始的双方会谈持乐观态度，因为大敌当前，英国人到处吃败仗，所以他觉得这位英国将军会对他客气一番，并就盟国的援华物资和中国军队参加缅甸共同防务等问题达成原则协议。

不料会见刚开始，韦维尔就不顾起码礼仪，当面对中国的最高统帅宣读了一份态度强硬的备忘录。备忘录要求中国方面将“围集在仰光的租借物资，部分地转入缅甸防务”，并规定中国军队入缅人数“不超过一个团”。因为英国人虽然自顾不暇，却并不情愿中国来插手缅防务。伦敦从来没有忘记中国在历史上与缅甸曾保持过的那种宗藩关系。即使将缅甸丢给日本人，将来打完仗还能收复，可是如果中国人赖在那里不走，岂不是给大英帝国造成一个难以解决的棘手问题吗？

蒋介石挨了当头一棒。会见气氛十分尴尬。

韦维尔一出门，蒋的脸色立刻变得铁青。宋美龄安慰道：“大令（即英语 Darling，亲爱的），同英国人打交道是不容易的，好在美国人跟他们不

一样。”

“娘稀屁！这些洋人，都是帝国主义者，没有什么好东西！”蒋介石狠狠地咆哮。他嗅嗅同韦维尔握过的手，厌恶地皱起眉头。夫人知道丈夫不喜欢同这类洋人打交道，这不仅因为他们盛气凌人态度倨傲，还因为欧美人身上时常散发出一种不讨人喜欢的“羊膻味”。宋美龄立刻大声吩咐：

“来人！侍候先生洗澡。把门窗统统打开，把洋人的臭味都给我赶出去。”

这次蒙巴顿来重庆访问，蒋介石是同意的，事先夫人又对他介绍过蒙巴顿的举止是如何的优雅和懂礼貌，跟韦维尔完全不是同一类型的人，所以他决定见一见蒙巴顿。此前，凡有英国人来华访问，除了老相识和礼节上非见不可者以外，他一般让外交部或军委会的何应钦、陈诚等人去接待，自己则借口公务繁忙或外出视察不在重庆而不愿会见他们。

不过，这次他见蒙巴顿，也还想着借机报复一下上次那个英国将军对他的不礼貌。晚上，蒙巴顿在中国陪同人员的引导下来到了黄山别墅。蒋介石没有在别墅的门口迎候客人，而且蒙巴顿进入会见厅后，蒋介石也没有马上露面，让客人呆呆地在那里等候了一刻钟。当然，蒙巴顿也有过错，没有按照约定的时间到达。但据他本人讲，那确是由于忙乱之中寻找他从伦敦带来的国王的信而姗姗来迟了，并非是故意表现对中国领袖的不尊重。蒋介石迟迟不露面，令他感到不快，心想至今为止还极少有人会以这种方式对待自己。他听说过韦维尔跟蒋会面时给对方造成刺激的那件事，因此他能够谅解蒋介石，不快的心境转而平静了一些。

当蒙巴顿趁这段等候的时间，观赏摆在会见厅里几件精致的盆景的时候，蒋委员长在夫人的陪同下步入了会见厅。他这次没有身着笔挺的戎装，而是穿一件很随便的青布长衫，刻意显出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蒋夫人依然美丽大方，挽着他的胳膊，用温婉动听的英语向蒙巴顿及其几名随员表示了问候。

蒋介石的表情显然很冷淡。可是，他那不含一丝客气的言语，被夫人翻译成英语时作了一番加工，使不懂汉语的蒙巴顿听起来并不那么刺耳。

蒙巴顿对蒋介石说，作为一名年轻而无经验的军官，他感到很有必要前来重庆“向当代最受敬重的军人讨教智慧和经验”。接着他又奉承道：“尊敬的先生，我还没有完全安排好在这里的事务，就赶着来拜访您了。您已与日本人作了长期的浴血奋战，我认为自己必须尽可能早地前来听取您的意见，希望您多予指教。”

奉承得近乎肉麻。蒙巴顿后来回忆，“我还说了其他一些溢美之辞。如果我听别人对我讲这样的话，将会感到不安的。但对蒋来说，它们却好像一杯可口的清茶，泰然受之。”

他的恭维很奏效，蒋介石绷得很紧的脸开始有了笑意。随着蒙巴顿滔滔不绝的奉承和赞美，“会见的气氛越来越好，最后简直是春意盎然了”。

趁这个火候，蒙巴顿向蒋谈起了史迪威的留任问题。宋子文早上拜访他时，曾透露史迪威肯定要离职。蒙巴顿于当天下午即找到史迪威，问他是否愿意继续任职？史迪威回答说愿意。蒙巴顿便许诺晚上跟蒋会面时，将努力促成他能够留任。此时，他在与蒋谈笑风生之中，声称“他个人在缅甸开始新的作战之际，对中国部队更换高级指挥官感到遗憾”。并且，绵里藏针地暗示，史迪威毕竟是他挂名的副手，如果将此人撤职或调离，东南亚盟军司令部直接统辖下的任何部队恐怕都不会满意，也不会配合中国远征军的作

战。蒋想了一想，点头表示理解。

尽管蒋介石同意史迪威留任的因素很多，但在蒙巴顿与蒋的这次会见中，蒙巴顿巧妙地把握住时机替史迪威说项，无疑也起了重要作用。蒋介石第一次见到和结识蒙巴顿，总要给这个融洽的客人点儿面子。就这件事，蒙巴顿后来向丘吉尔报告说：“虽然我也感觉到史迪威将军是一位难于共事的人，但我却很高兴地看到他没有在我抵达这里时被解职。如果那样的话，我可以肯定，这里的美国部队将会认为我是罪魁祸首。”

毫无疑问，蒙巴顿给蒋介石夫妇留下了良好的印象。蒋介石在不久以后给英王乔治八世的复函中，称蒙巴顿是“我的亲密而伟大的朋友”，并说，他们之间已就在抗击日本人的战争中进行合作的必要性问题达成了一致意见。罗斯福也从白宫热情地写信给蒙巴顿，说他已经详细地得知了会见的情况，“两年以来，我第一次对中国和缅甸方面的人事问题怀有信心，这使我激动不已——这主要地应归功于你本人。”因为罗斯福总统不得不承认，做为他手下的典型美军将领之一的史迪威，或许是个出色的军人，但在处理涉外事务方面，跟蒙巴顿相比简直望尘莫及。那个经常给他惹麻烦的史迪威，这次多亏了蒙巴顿替他暂时缓解了与蒋的矛盾，做为美国武装部队的最高统帅，罗斯福自然要对蒙巴顿表示感谢。

当然，通过接触蒙巴顿对蒋介石的气质也很钦佩：“他非常吸引人——在我见到过的中国人中，他是令人印象最深的一个。”对于宋美龄女士，蒙巴顿更是倍加赞赏，“她体态窈窕，腿部和双脚美得令人难以想象”。当蒙巴顿说到今后将大大地仰仗她的帮助时，宋女士答道：“如果她有什么值得夸耀之处的话，那就是她对人们的特点判断准确。她已经决定做我的坚定朋友。”在蒙巴顿于3天后离开重庆时，“应该说，我对蒋介石夫妇怀有一种真正的感情和敬意。我相信这是一种报答。我在返回之后被告之，蒋介石曾不断给有关方面打电话要求保证我安全返回。”这令他十分感动。

其实，除了笼统地表示友好之外——这也正是蒙巴顿此行的主要目的——这次访问没有什么具体的成果。蒋介石要求蒙巴顿监管好在印度的美国援华物资，并保证每月通过喜马拉雅山“驼峰线”运抵中国的物资不少于一万吨。蒙巴顿未置可否地回答说，由于缅甸的战事，供应不足有时将不可避免，但是从长远来看，重新开放陆上通道将使中国获益。言外之意，为了集中精力扭转缅甸的战局，他不能保证绝对有把握地实现中国方面的要求，只不过话说的婉转些罢了。

“我相信你。在这个重要问题上，蒋介石被对方的乖巧言辞所迷惑，表示了对蒙巴顿的信赖。实际上，从蒙巴顿后来的行动证明，他并不是这样做的。蒋介石还同意由蒙巴顿指挥暹罗湾和印度支那的秘密作战，还答应驻在缅北的中国军队可以由蒙巴顿统一指挥。不过，印度支那并不属于东南亚盟军司令部的管辖之内，蒋介石也从来未肯放弃过任何一支部队的指挥权，史迪威的去留’风波就是明显的一例。

所以，他对蒙巴顿的许诺也是根本不可能兑现的。受各自不同利益所决定，他们的相互融洽和好感不可能持续很长时间，正像一贯谨慎的波纳尔见到蒙巴顿出访归来后喜形于色的样子所评价的那样：“我希望他这种乐观态度是有道理的，但我不指望他对东方人的判断力能比我强。中国人有他们自己的利益。毫无疑问，蒙巴顿比韦维尔两年前在相同情况下干得要更好，但是我担心他的热情使他有些忘乎所以。”

就是那个他为之说项过的史迪威，他们之间的友谊也没有维持几个月。史迪威在 1944 年 1 月时这样写道：“（蒙巴顿）这个所谓有魅力的家伙不过如此。我开始怀疑他是否了解自己的部属。机构臃肿，不停地说教，就是不愿意作战。”随着时间的推移，史迪威在日记中的用词也越来越尖刻了。在他的笔下，蒙巴顿“是一个愚昧的混蛋”，“稚嫩，喜欢出风头”，“尿壶”。他像其他美国人一样，怀疑并担忧英国将以美国为代价去寻求自己在东方的殖民利益，说自己“每当看见这个英国佬时，我就更仇视他们”，“这些混帐伪君子千方百计要切断我们的喉咙。一群猪猡。”但是，在和蒙巴顿面对面在一起的时候，史迪威却总是若无其事，甚至态度友善。虽然蒙巴顿发觉跟他越来越难于共事，但却不了解在他脾气乖戾的外表下明显增长的仇恨。只是当蒙巴顿后来感觉到了这一点之后，才反唇相讥，声称史迪威心胸狭窄，尖酸刻薄，带有贫民出身的军人那种自以为是和玩弄权术的坏毛病。

从重庆访问归来后，蒙巴顿继续考虑他行使职权的方式问题。这个在韦维尔原指挥机构基础上组建的东南亚盟军最高司令部本身，以及不同人员之间权力和责任分配方面的争执，给他带来了许多烦恼。有时竟使外人怀疑他们的主要对手不是日本军队，而是内部的分歧和争吵。用一句话来说，“问题在于没有任何人准确地——有时甚至是没有人接近准确地——知道它的最高司令官的职权，或应如何行使职权。”尽管对蒙巴顿本人，人们能够知晓他的工作作风和好恶什么。

战区最高司令官一般认为可以有两种模式，即欧洲战区的艾森豪威尔式和太平洋战区的麦克阿瑟式。艾森豪威尔的作法是，他行事时应对英美两国的联合参谋长联席会议负责，而不是像麦克阿瑟那样，除了重大的战略问题以外，只对一国（美国）的参谋长联席会议负责。另一方面，艾森豪威尔认为，最高司令官应有 3 名半独立的下属司令官，每一位司令官都应有自己的参谋班子。他们可以作为某个委员会的主席，也可以实际担任部队指挥官的职务。而麦克阿瑟则认为，部队指挥官应由统一的联合参谋部门领导。

艾森豪威尔那样做有他的道理，因为在欧洲战区范围内，除了美军外，英国也有旗鼓相当的实力，甚至在数量上还比该战区美国部队要多。而在麦克阿瑟的太平洋战区，除澳大利亚、新西兰的些许部队外，几乎完全是由美军支撑局面的，所以他的作法和方式也有其理由。东南亚战区很特殊，这里有英国、美国和中国的部队，还有当地原来各个殖民地和附属国的部队，况且英军在数量上并不占优势地位。尤其与欧洲和太平洋战区不同的是，在这块战前殖民地或半独立地区作战，几个盟友之间各自挟带的争夺势力范围的矛盾和特点，勿庸讳言是比较突出的。其中，重庆国民政府和伦敦之间尤为互相猜疑。

蒙巴顿本来想按照艾森豪威尔方式工作，但是伦敦总部坚持要他采用麦克阿瑟方式，并得到了丘吉尔的支持。“我不可能逃避这一责任而必须执行伦敦的指令。”蒙巴顿告诉他的海军指挥官萨默维尔，“另一方面，我看到了将成为独裁者的危险”。

不过，按照他个人的主见，至少还是要在表面上建立一个国防性的、把最高司令部的利益放在高于本国和本兵种利益之上的工作班子。完全成功是不可能的，但是，他比大多数人想象的要成功得多，也比其他指挥官所能做到的要成功得多。为了使自己成为各路盟军合作的象征，蒙巴顿在座车的两侧，漆印上他名下指挥的各国军队的旗帜；司令部中的各个机构分别由富

有经验的英国人和美国人负责，尽管中国军官被排除在高级职位以外，但也有一些中下级军官被蒙巴顿邀请进来。

经过一番调和与努力，蒙巴顿的屁股总算坐稳了，开始着手设想重新夺取缅甸的具体计划。

蒙巴顿在魁北克会议期间得知他将被派往东南亚时以为：“他们让我去那里，会给我准备好了一切。”他抵达德里接见第14集团军军长斯利姆中将军时还吹嘘说：“我们得到了许多船只，印度和锡兰的港口都快容纳不下了！”目的是给这位战区一线指挥官鼓劲。起初，确有相当数量的美国和英国舰船停泊在那里，蒙巴顿一厢情愿地以为它们是为了自己的需要而开来的，其实这些舰船的真正用途是什么，华盛顿和伦敦正在争吵中。

做为一位来自海军的将领，除海战外，若干年来蒙巴顿所潜心钻研并熟悉的是在两栖作战方面。如果他要按照自己的专长和本来的设想去完成任务，这些舰船是必不可少的。蒙巴顿认为，只有通过海上进攻和登陆才能击败日本人。除此之外的选择是在缅甸的丛林中进行旷日持久的消耗战，而那却不是英国人的专长，打起来也不会占上风。他的这一观点，得到过英国参谋长委员会的决策者们衷心地赞成，也认为以两栖登陆进攻的作战模式，重新夺取缅甸南部以及仰光“将是付出巨大努力后的一次有规模的战略成功，……占领仰光之前占领新加坡是使用海空军力量的完全正确的作法。它将振奋东方世界，也将对日本产生巨大的心理影响”。而在使东方，还有西方，乃至整个世界感到振奋这一点上，蒙巴顿则想得更多：在缅北的深山密林里，无论怎样苦战和取得多么大的战果，除了中国之外恐怕也不会引起什么国家的舆论反响，而在浩瀚的海洋上实施两栖作战，一举拿下新加坡、占领缅甸首都，便会一鸣惊人。正像对他有所了解的史迪威说的那样：这个还稚嫩的年轻人，爱出风头。

然而，争执发生了。美国的埃弗雷特·休斯将军在日记中写道：“缅甸的事情有点儿南辕北辙。英国人想先去新加坡，美国人要先去援助中国。”罗斯福总统认为，英国在东南亚的战略会妨碍打通陆路援华运输线的计划，美国无意提供帮助。

由于美国人将提供大规模海上作战所需要的大部分装备，因此，没有美国的首肯蒙巴顿是搞不出什么名堂来的。他询问过史迪威的意见，史迪威断然否认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会有同意他那种设想的可能性。实际上史迪威本人于同年11月回华盛顿汇报工作时，曾被问及对蒙巴顿的两栖作战计划持何意见，史迪威回答：“除了批评以外，不值得一提。”应当说，史迪威将军对中国怀有真诚友好的感情，做为美国派驻中国的最高军事负责人，他只会支持能够明显地减轻中国方面压力的行动，即：在缅北、起码首先在滇缅边境地区彻底肃清日本军队，恢复中国通过那里至印度的陆路国际交通线。

面对美国人的反对，丘吉尔不得不表示让步，他承认在对日作战中“英国应谦逊地把自己看作是小伙计”。这样，蒙巴顿雄心勃勃想要一鸣惊人的计划，必然要受到严格的限制，甚至面临夭折的厄运。况且他从伦敦白厅那里得到的支持，也不如他所想象的那么坚决。参谋长委员会赞赏他的观点，但在权衡东西方战场地位时，自然认为应当优先考虑欧洲的需要。特别是布鲁克，则明确反对首相把地中海地区的舰船抽光去“支持蒙巴顿的两栖冒险”。早在离开伦敦之前，蒙巴顿就已经知道，分配给他的登陆艇将被挪用于希腊多德卡尼斯群岛的战斗。经过提出抗议，它们才被勉强地重新分配回

来，但在印度港口驻泊不久便又被拖回了欧洲。的确，他与美国军政要员的关系不错，丘吉尔之所以冲破阻力任命他，相当程度上得益于美国方面对他的良好印象。然而感情并不能取代战略利益和原则，特别是美国在中缅战区的全权代表史迪威，动辄以华盛顿的名义，将任何与打开中国通道没有直接关系的计划均予毫不迟疑的否定。

丘吉尔在自己的回忆录里曾经讲过，“……对英国人来说，放弃一百个缅甸也不会比丢掉一个印度重要。”他之所以不得不关注缅甸战事，是因为担忧日本力量在那里巩固后会西进印度，除此之外他是无所谓的，更不想“为中国人看守缅甸的大门”。丘吉尔是以夺取苏门答腊为目标的“毛瑟枪”行动的热心支持者。他佯称，夺取苏门答腊之后，就会对驻缅甸的日军形成侧翼包围，并可以进攻新加坡——丘吉尔将此称之为印度洋的“火炬”行动。用美国人的话说，即英国人在欧洲自私的“巴尔干战略”在远东的翻版。总之，他真正感兴趣的是离中国愈远愈好的那些南洋群岛和半岛。蒙巴顿说他“曾经，现在仍然对这样的行动极为热心”。但是，他并没有仔细考虑过，到时所需要的人力物力比目前能够得到的要多得多。当他从重庆返回后指示参谋人员按首相意图拟订具体计划时，才发现了这一点。好在恰巧伦敦又发来了电报，说由于从欧洲和其他地方抽不出部队和物资提供给东南亚，指示暂时冻结这次行动。蒙巴顿对此并不感到惊讶，也没有抱怨什么，他把“毛瑟枪”计划暂时放在一边，开始寻找适合他的部队作战的新目标。

同年 11 月，为了研究对德日法西斯的作战问题，并规划战后秩序，美英决定在埃及开罗召开盟国首脑会议，同时指令蒙巴顿等几个战区的主要负责人参加。而此时蒙巴顿新的目标——实施“锦标保持人”作战计划也找到了。正是：上任数月忙协调，携带新案赴开罗。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章分解。

第十二章 开罗会议

丘氏自私又傲慢，盟国战略制定难；
作战计划屡遭弃，利益不同颇麻烦。

话说 1943 年 11 月 23 日至 27 日盟国召开的开罗会议，事先在是否邀请蒋介石参加的问题上美英首脑还有一番争执。丘吉尔以顽固的殖民主义者的眼光瞧不起中国人，反对让中国领导人参加。而罗斯福总统决心让中国成为战后世界秩序的“四块基石之一”，并想使几亿中国人战后居于西方盟国、特别是美国一边，因此极力劝说英国最终同意，邀请蒋介石参加会议。

另一方面，从这年秋季开始，侵华日军发动了著名的常德战役，试图一举占领华中华南，打通京广线。接着，又增兵 30 余万，北逼陕西潼关，兵临黄河风陵渡，南下广西全城江，西进宜昌沙市，对重庆政府形成三面夹击的战略态势，使中国形势骤然严峻起来。根据情报，东京大本营已经将未来战役命名为“1 号作战”，旨在摧毁中国民众的抗战意志和迫降重庆政府。重庆一片惊慌。国民党人何去何从将对亚洲局势乃至整个太平洋战场产生重大的影响。为了坚定重庆方面的抗战决心，并协调亚洲盟军的战略行动，罗

斯福认为也有必要邀请蒋介石参加盟国巨头会议，以示尊重和厚爱。

不过，那位身着大元帅服的斯大林同志怀着对中国独裁者的深刻鄙视，则坚决不肯同蒋委员长坐在一起开会。同时，因苏联尚未对日本宣战，他也不便参加这次会议。罗斯福总统只好委曲求全，将原定的四巨头会晤分成两处：先在埃及的开罗讨论对日作战（美英中会议），然后在伊朗的德黑兰讨论对德作战（美英苏会议）。

并于 11 月 27 日开罗会议一结束，蒋介石取道中东返国，罗斯福和丘吉尔则冒着风沙和敌机截击的危险飞往 1000 英里外的伊朗首都，去会晤来自克里姆林宫的执政者斯大林。历史上也就有了紧接开罗会议之后的德黑兰会议，这里不表。

且说蒙巴顿行前准备好的“锦标保持人”作战计划，能否被会议通过？他心里没有底。大战爆发以来，蒙巴顿没有打过什么大仗，人们对他的实际指挥才能也并不那么欣赏，他的本领在谈判桌上，在协调各方面错综复杂的关系和炮制一个又一个的作战计划上。这一点，他与麦克阿瑟、巴顿和蒙哥马利等战将不同，跟艾森豪威尔倒是有相似的特点。蒙巴顿心里清楚，如果在这一点上也不能取得成功的话，那么他还能有什么作为呢？而他携带的这份作战计划能否被通过，关键取决于中国人的意见。因为在他看来，罗斯福总统“偏爱”中国人，自己的首相又历来视缅甸战场为“野种”、“私生子”，只会给英国添麻烦而带不来实际好处的地方，真正重视它的只有中国人。

蒙巴顿带着他的几个主要助手提前抵达开罗。埃及人为他们准备了豪华舒适的住所，这里干爽的气候和明媚的阳光，也令人愉快。然而，蒙巴顿却无心享受这些，他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等待着中国人的到来……

马达轰鸣，机群咆哮。两架银白色的客机在一大群美国战斗机的护航下离开重庆，乘着夜色飞向遥远的西方。

长夜漫漫，蒋介石被飞机马达声搅扰着，那时飞机的隔音性能还很差。面对舷窗外面漆黑一团的夜空，他耿耿难眠。如果说这次盟国首脑会议对他个人来说意味着一次登上世界舞台的大好机会的话，那么对于近百年来内忧外患的中国命运来说，同样意味着一个历史性的转机——它表明中国正在重新取得参与世界事务的大国地位。

此刻，飞机载着历史在夜空中腾飞，蒋介石好像一个初登舞台的新手，为这个重大时刻的到来而感到一种陌生的兴奋和惶恐。

宋美龄亲自端着一杯热气腾腾的牛奶走过来，“大令，趁热喝吧，你该睡一会儿了。”

“不，我睡不着。你也陪我坐一会儿吧。”蒋介石温存地望着自己年轻能干的夫人，和颜悦色地说。

“大令，你在想什么？”

“我在想，罗斯福是个什么模样？还有那个丘吉尔，他们好对付吗？”蒋介石问夫人。

“噢，让我想想……罗斯福坐在轮椅上，蓝眼珠，很有精神。自信，有教养，像个英国老绅士。跟他相比，那个英国人丘吉尔，反倒没有一点儿英国绅士的味道，说话滔滔不绝、咄咄逼人。他们都不好对付。”见多识广的夫人，边服侍他喝牛奶边回答道。

“他们喜欢这样全世界飞来飞去吗？”

“我想是的。你不认为这样可以使他们感到自己在主宰世界吗？”夫人

反问。

“可是，这却是我头次坐这么远的飞机，我的精力全都用在我们内部的事情上了。”蒋介石似有感触地说。跟早就遍游过欧美的夫人相比，他最远只是去过日本和印度。

“大令，战争结束以后，我们有的是机会到全世界访问。”宋美龄安慰道。她觉得自己的丈夫常年搅在令人头疼的国内事务上，在国际上受到冷落而始终未能走出落后封闭的中国，这既是一种不公平，也局限了他的视野。

“我很想到美国看看，”蒋介石发出一声感叹：“我想象不出来，美国怎么会那么强大？”

“大令，将来我一定会陪你到美国、英国、法国，还有欧洲好多地方去访问。

那时候你是堂堂中华民国的大总统，我是总统夫人。我们也不必租用别人的飞机，我们有自己的专机，最先进的，飞几千公里也不用加油。”夫人陶醉在自己的蓝图中。

“好，好。”蒋介石立刻信心百倍地向夫人许诺：“等打完日本人，我要送你一架最好的飞机，就叫‘美龄号’，先总理不是也送给过你二姐一架‘庆龄号’吗？到时我们乘坐它去访问全世界。”

蒋介石的诺言后来只兑现了一半。抗战胜利，他果真送了一架性能优良的飞机给夫人，取名“美龄号”。但是他没有想到，这次开罗之行竟是他一生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飞出亚洲，那架“美龄号”专机，除了载着蒋介石夫妇奔波于内战战场外，一直没有飞出过国门。

飞机遇上高空气流，出现颠簸，蒋介石更无困意。他又思考着缅甸的事情，想起了与这件事情密切相关的蒙巴顿……

缅甸失守后，中国远征军在滇缅边境地区的作战也失败了：密支那被占领，唯一的一条空中航线被迫北移，空运得经过喜马拉雅山，一切都变得更加困难和危险；云南也遭到了日军的进攻，一时间阴霾密布。1942年10月，他向盟国提出了《联合反攻缅甸方案大纲》，其中，要求英国方面做的事是：一是英军从陆路和海路参战，二是派遣充足的空军部队提供有效支援。那时，蒙巴顿还没有来东南亚。于是他要史迪威代表自己与英国驻远东的韦维尔上将举行了一系列会谈。

照这个方案大纲，既可使中国重新打通经仰光的运输线路，同时英国也可重新在孟加拉湾确立制海权，恢复安达曼群岛，收回仰光。这是考虑到了英国的利益的。

但当时英国却无意于近期收复缅甸，他们顾虑重重，一是北非埃及失利；二是印度民族独立运动正在兴起，英对印度的殖民统治面临着现实的危机；三是英国一心投入北非战场，印度洋制海权已经失控，运输舰队大量投入北非，不可能顾及反攻缅甸，更不能投入大量海军攻击仰光港。同时，英国非但自己不想干，也不愿让中国插手。10月27日，史迪威与韦维尔会谈时，韦维尔拒绝中国在印度接受训练的军队从英帕尔经过达武和加里瓦向缅甸推进，理由是“从孟加拉湾开始的曼尼普尔公路和阿萨姆铁路不能同时支持中国人和英国人”。他只将缅甸北部的胡康河谷规定给史迪威。经协商，“这两位司令官同意史迪威的使命在于占领密支那——八莫，以便使用密支那机场，并与从云南进军的中国军队取得联络。”韦维尔将较平坦的英帕尔至达武一线留为英军自用，而让中国军队从山路崎岖的胡康河至孟拱线入缅，其

目的很明显，他们希望中国远征军作战最多只在占领密支那，对夺取仰光则持反对态度。

由于中国军队将以雷多为基地，从胡康河谷推进，美英双方同意“美国应负责修筑一条公路，从雷多下经胡康河和孟拱河谷至密支那，最后与滇缅公路衔接起来”。

但是，这也不是英国人真心同意的，正如史迪威所言：“英国不需要也不喜欢这项工程，他们宁可使前线无路以利于英国在运输方面保持垄断地位，更重要的是英国人不想让中国人有进出于印度和缅甸的途径。由于华盛顿的坚持，也由于公开拒绝会更加引起中国人的激烈对抗，英国人才表面上同意筑路计划。”

后来，经过一番商议，英国才勉强接受了蒋的尽快反攻缅甸的主张，但把它更改为“发动一场小规模攻势，收复缅甸沿海若开狭长地区的实兑，建立一个战斗机基地，以便将来发动进攻”。韦维尔建议攻势于1943年春季开始，命名的代号是“安纳吉姆”行动，并答应英国投入7个师的兵力，“其中3个师以伊姆法尔为出发地，经卡勒瓦西北取更的宛河流域，其目的为取得卡他、水波、猛瓦一线后再图进取。另以1个师自吉大港进攻阿恰布而占领之，以为向东发展之准备。另外3个师则留为后备。中国军队在战役中则以雷多为根据地，经孟拱山谷，进攻孟拱与密支那而占领之，与英军在卡他会师”。这个行动计划，虽已对蒋提出的全面反攻缅甸方案进行了重大改变，但考虑到英国的实际情况，蒋介石还是同意了。

“安纳吉姆”行动计划确定后，有关各方即按计划着手准备。1942年12月8日，罗斯福批准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关于增拨给史迪威63000吨物资和6000名从事筑路等任务的勤务部队的建议，蒋介石仅在云南方面便集结了15个师，“其中有些师2月中旬即可投入缅甸攻势”，中国在印度受训的部队也已整装待发。但英国方面突然变卦了，他们担心后勤和医疗供不上，进攻缅甸北风险太大，孟加拉湾缺乏驱逐舰掩护在海岸进攻的部队。其实，更担心尔后难于把中国的进攻部队从缅甸请出去。韦维尔推翻原先的承诺，声称他的7个师中只有3个师可参加这次行动，而且还只能打三四个月，“因为他们忍受不了夏季来临时，缅甸多雨天气的折磨”。

蒋介石了解到英国的态度后，一气之下撤销了中方在1943年春季的对缅军事行动计划。“安纳吉姆”计划告吹后，中美英三方又搞出了一个行动规模更小的所谓“茶碟”计划，由于各方对它含糊的措词有不同的理解，直到这次开罗会议召开前也没有实施过。

蒋介石一想到这些，便咬牙切齿地痛恨英国佬的自私。他原先一直认为，中国的落后和贫弱不堪用不着从内部找原因，全是由外国列强、其中尤其是英国逼迫中国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造成的，这也是他在那本著名的《中国之命运》小册子里的主要观点之一。夫唱妇随，宋美龄对英国人也远没有对美国人那样有好感，去年11月她访问美国时，由于她的兄长宋子文代表中国参加5月份在华盛顿召开的“三叉戟会议”时，和丘吉尔进行了公开争辩，罗斯福建议她趁这次访问，同也来美国的丘吉尔见面谈一谈。丘吉尔看在下肢瘫痪的罗斯福奔波调和的面上，勉强同意，但宋美龄却拒绝与丘吉尔会晤，理由是：“我和他没有什么好谈的，我的美式英语让他听起来会感到吃力的。”

“大令，你看这次开罗会议咱们能得到什么实际好处吗？”飞机恢复平

稳后，宋美龄望着丈夫问。

“当然会有好处。首先我得对他们讲，我的国家很危险，如果重庆被日本人占领的话，将来他们得付出数十倍的代价才能在中国争取到自己的利益。其次，他们必须加倍援助我，我需要飞机，需要贷款和武器。中国的牺牲已经很大了，难道他们不该多给些补偿吗？”

“可是，这只能指望实力雄厚的美国，英国人能帮我们什么忙呢？”夫人是有名的亲美派，她自称美国是她的第二故乡，是最受她尊敬和信赖的国家。

“那就看英国人对缅甸战事的态度了。他们新派到东南亚的蒙巴顿上个月不是才跟我们见过面吗？这个人不像那个韦维尔，看起来还不错。不过，听其言还要观其行，要看看他究竟给我们带来什么礼物嘛。”蒋介石用狡黠而炯炯有神地目光望着舷窗外渐渐泛白的天色，回答夫人说。

夫妇俩又聊了些其他事情。说真的，做为事务丛集又恰巧对谁都不放心而不得不亲自过问的蒋委员长来说，也难得有这么长和这么安静的时间与夫人面对面地聊聊天。飞过印度领空以后，宋美龄有点儿困了，于是款款地站起来吻了一下丈夫的额头，“睡一会儿吧，路途还长着哩。”

正如有些人所预料的那样，开罗会议一开始，蒋介石与丘吉尔就闹得关系很僵。

前者抵达开罗城不久便远非情愿地屈尊去拜访丘吉尔，宋美龄因旅途劳累而有些身体不适，没有陪丈夫一起去。另一个原因是，去年在华盛顿她拒绝与丘吉尔会晤，做为一个自尊心极强的女人，这次她也不会主动去见他。除了翻译之外，蒙巴顿是两国首脑首次会面时唯一在场的人。蒋介石与丘吉尔未见面时就互抱成见甚至恶感，见了面也是话不投机，相互客套了几句，蒋介石便起身告辞。丘吉尔送客人到门口时，要翻译转告对方：“我将在明天中午回访蒋先生和尊夫人。”

蒋介石对此感到高兴，心想这个傲慢的英国首相还懂些礼仪，给他点儿面子，于是让翻译订问丘吉尔明天回访的准确时间。

丘吉尔不耐烦了，“请你告诉你，我将在太阳当顶的时候前去拜访。”

由于英语中“太阳当顶”和“10点钟”的发音略有相同，翻译没有听清便取了后一种意思转告给蒋介石，蒋马上回答道：“我将如约在明天上午10点钟恭候阁下的到来。”

当丘吉尔听完这句回答的口译后，几乎喊了起来：“什么上午10点钟？我从来没有那么早起来过！”

翻译没有把丘吉尔的喊叫译给蒋介石，但蒋介石从对方的表情中，已经感觉到这个英国人的粗鲁和不懂礼貌，他感到自己受到了侮辱和蔑视，于是甩门登车离去。

第二天正午时分，丘吉尔果然去回访蒋介石夫妇。蒙巴顿预感到还会发生不愉快的事，那样的话，他在场必然要站在自己的首相一边，而惹恼了蒋介石，丘吉尔远在伦敦无所谓，自己在东南亚还怎么跟中国人打交道呢？所以，他索性让多布森上校陪首相去回访，自己没有露面。

丘吉尔见到蒋介石夫妇后，先对正午时刻来访的不合中国人习惯之处表示歉意，又以自己与众不同的作息和工作繁忙为理由，说他不得不如此。蒋介石客气地表示自己并不介意，欢迎首相随时可以光临。接着，蒋介石提请丘吉尔，在即将正式开幕的开罗会议上，应把盟国援华问题和有关缅甸局

势放在首位。而丘吉尔只是咧嘴笑了笑，称：“委员长阁下和夫人应当利用这个机会，多看看金字塔、狮身人面像和其他埃及的名胜古迹。”

宋美龄见丘氏顾左右而言他不入正题，并如此奚落自己的丈夫，立即回敬道：“中国的名胜古迹不胜枚举，我的丈夫工作更忙而无暇光顾，中国代表团到这里来是要解决实际问题的。”

丘吉尔早已领教过宋美龄的厉害，又不好咆哮发作，只好又闲扯了几句便悻悻离去。

11月22日拂晓，罗斯福乘坐“道格拉斯 C-54”号专机抵达开罗。这次旅行，他先是乘“衣阿华”号战列舰驶往阿尔及利亚的奥兰港，途中，“衣阿华”号还险遭一艘护卫自己的驱逐舰误射。到了奥兰，他改乘飞机经突尼斯来到了这里。美英中三国首脑总算到齐了，23日上午，开罗会议在位于该城西郊门德的美国大使亚历山大·柯克的别墅里正式开幕。

会议在研究远东战事时，根据罗斯福的要求，首先讨论了蒙巴顿携带来的“锦标保持人”作战计划。这个计划的第一阶段要求：中国第22师和第38师从雷多进军（这个行动那时已在进行中），同时要求：1944年1月中旬，英第15集团军在若开区向前推进以占领改善的防线；英第4集团军向茂功、明塔、锡当进军，尽可能向东南推进；2月，上述3支长距离的突破部队开始进攻，伞兵部队于3月中旬必占领英都，然后空运印度第26师据守该地。这个作战计划还原则上确定在孟加拉湾进行两栖登陆作战。

蒙巴顿向全体会议介绍了自己的计划之后，中国方面应邀发表见解。蒋介石客气地提出批评说，此计划没有明确规定水陆两栖夹击的地点和日期，他强调必须坚持三点：1. 南北缅海陆同时夹击；2. 安达曼岛同时占领；3. 英军应进至曼德勒。

由于蒋介石不同意该计划，会议不得不中途停止，而让蒙巴顿与蒋介石私下协调解决。蒙巴顿找到蒋解释说，您所强调的实际上是早先进攻曼德勒计划的一部分，这一计划不切实际，已经被否决过了。“为了证明我们曾经详细地讨论过这一计划，我拿出了地图，还列举了详细的技术细节。”蒋介石回答说：“但那是你们的否决，我们还是要把它付诸实施。”

会上，蒋介石再次提出了全面反攻缅甸的行动方案。它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重庆方面的行动方案，其主要内容是：

加强有效实力，装备并训练90个战斗师，分成3组，每组30个师和1个至2个装甲师。

1. 第一组由在印度的师及那些被指派到云南的Y部队组成。这些师应于1944年1月1日达到规定的足额，并在那时予以令人满意的装备。

2. 第二组的30个师已经指定，并已成立一个学校……通向印度的公路打通时，（第二组的30个师）应重新装备，并可以随时开往战场。

3. 对第三组的30个师将进行类似的程序，在通过缅甸的交通重新打通之后，1个或2个装甲师将组织起来。

4. 中国一切可供使用的资源都将用来产生有效的战斗部队，现存部队中受过训练的人员将成为充实者。

5. 中国将按照约定的计划参加收复缅甸的战役，X部队从雷多进攻，云南部队从保山进攻。此军事行动将得到在孟

加拉湾海军行动的支持。在采取行动之前，英国海军应及时集中，为行动作好充分准备。

第二部分是希望盟军采取的行动：

1. 在 1944 年雨季之前，盟国将使用陆、海、空军尽快作出努力以重新打通由缅甸至中国的交通。
2. 美国将为 3 组 30 个师和装甲师提供装备。
3. 如约维持美国第 14 航空队，并予以充分的补给，俾可持续采取行动。
4. 中国空军将迅速加强到两个战斗机大队，一个中型轰炸机大队，一个侦察机中队和一个运输机中队，并保持这样的实力。

蒙巴顿觉得蒋介石似乎在不断提高要价，蒋要求美国先后要为他装备 90 个师及装甲部队，这比 1942 年底的“安纳吉姆”行动计划实施美国为中国建立 30 个师的计划更宏大。同以前一样，丘吉尔明断宣布拒绝蒋介石的那种等于是陆上战斗的两栖作战。他对在缅甸进行大规模战役的建议并不表示热情。在他看来，缅甸只是大英帝国在印度殖民地的一个前哨，而不是一个具有战略性的地区，“他也不喜欢美国人，特别是中国人分享解放缅甸的荣誉”。当蒋介石在会议上阐述自己的设想时，丘吉尔不留情面地多次打断他的发言。

尽管丘吉尔很不乐意把大量的英军用于拟议中的缅甸战役上，罗斯福此时却支持蒋介石的观点。他认为中国的任务简言之就是这样一项必不可少的工作：“使中国军队牵制住日本军队，这是我们的一大目标。”虽然通过与蒋介石的接触，他也感到蒋介石政权的腐败性，但它毕竟是中国政府的象征和代表，正如他对儿子说的：“尽管蒋氏夫妇的缺点很多，我们还是得依靠他们。”同时，美国军方的“参谋长们竭力主张接受蒋的进攻缅甸北部的计划，另外再在孟加拉湾采取军事行动”。因此，罗斯福答应：“在以一两个月内实行渡过孟加拉湾的大规模两栖作战”；并同意在将来某个时间武装和装备中国的 90 个师。

中国方面之所以坚持反攻缅甸必须“南北缅海陆同时夹击”，要求英国在缅南海岸实施具有一定规模的而不是有限的两栖作战，这是因为蒋介石认为：“……我深信收复缅甸的企图必须有海陆的联合行动。除非盟国海军能从海上阻止敌人增援，或登陆部队能在缅甸南部后方打垮日军，敌人将可迅速集中起来攻击我们在缅甸北部的军队。由于我们的供应线的薄弱，不论我们在后方有多大的兵力，我们赶不上日军所集中的兵力。因此我认为进攻局限于缅甸北部攻势，我们的军队最后势将面临战败的危险。”这些理由，应当说是成立的。

尽管开罗会议最终既没有接受蒙巴顿的“锦标保持人”作战计划，也没有完全认可蒋介石的全面反攻缅甸的行动方案，但美英中三方的军事专家们还是确定由中国军队在缅北发动一次代号为“泰山”的攻势，另由蒙巴顿牵头发起旨在夺取缅甸沿海安达曼群岛的代号为“海盗”的两栖军事行动。

会议结束后，蒋介石带着从盟国得到 10 亿美元贷款和增加“驼峰”航线运输量的保证，以及在稍后发表的《开罗宣言》中，宣布取消中国的一切治外法权，归还日本侵占中国的所有领土，并剥夺日本的工业企业以赔偿中国的战争损失等项成果，返回重庆。蒙巴顿则飞回印度，着手制订他的“海

盗”行动计划。

然而，事情又发生了变化。开罗会议一结束，罗斯福和丘吉尔便飞赴德黑兰去会晤斯大林。11月28日下午，在苏联驻伊朗大使馆富丽堂皇的大厅内，美英苏三国领导人齐聚在铺着奶油色呢绒的圆桌旁举行了著名的德黑兰会议。斯大林答应在打败德国之后立即参加对日作战，作为回报，他要求英美尽快实施“霸王”行动计划（横跨英吉利海峡计划）和“铁砧”行动（在法国南部的协同登陆）。尽管丘吉尔还不情愿放弃他在欧洲的“巴尔干战略”，但事态的发展已把他退进了死胡同，在美苏的一致要求下，丘吉尔不得不当面向斯大林保证支持实施“霸王”战役。

苏联允许对日参战的前景改变了一切。丘吉尔认为，“既然俄国许诺要参加对日作战，便没有必要花那么大的力量来支持中国”。他要求取消夺取安达曼群岛的“海盗”行动计划。他让布鲁克给蒙巴顿打电报，指出由于欧洲战区、特别是“霸王”行动的极端重要性（斯大林施加了极大的压力），原定调拨给他用于“海盗”行动的登陆器材中的半数将转调给欧洲战区，原定调给他的战列舰队亦将改调他处。

这给怀着满腔热情正在拟制作战计划的蒙巴顿，无疑是浇了一盆冷水。

他有些恼恨丘吉尔了。做为东南亚战区总司令，蒙巴顿自然想要在这里建功立业，而丘吉尔则从“欧洲第一”的观点出发来束缚他的手脚。他感到与首相的关系疏远了，自己已渐渐失去了丘吉尔全心全意的支持。前些时候，当他向英国参谋长委员会提出，“海盗”行动所需兵力应当增加到5万人，以形成对日军守卫部队3.5:1的绝对优势时，白厅没有答应，国防部参谋长伊斯梅将军只允诺不到2万人的兵力。

蒙巴顿电请首相寻求支持，丘吉尔回电称，“认为应比敌军占有如此巨大优势才能取胜的这种建议，是对我们的士兵的粗暴的侮辱。”蒙巴顿抬出了美国人，说美国的军事专家们也同意他的建议，而丘吉尔则更加冷淡地来电回答他：“知道了，用汽锤敲开坚果是毫无疑问的。”

那么，美国人还是否继续支持“海盗”行动计划呢？由于罗斯福总统已经向蒋介石许诺过，在他向缅北发起的“泰山”攻势中将会有某种形式的两栖行动予以配合。为此，美英参谋长联席会议曾发生了一阵争吵。英国人认为，考虑到各种许诺，“海盗”行动将是不切实际的；美国人则坚持说，如果取消这一行动，将使对华关系遭受难以想象的严重政治损害。“蒋委员长将会拒绝参加今后在缅甸的任何行动。”布鲁克则满不在乎地告诉美国人，“他不参加也没什么了不起，不会给那里的战局带来多大的影响。”英国正不希望中国插入缅甸事务呢，因为日本的战败就是这几年的事情，届时它必然从缅甸滚蛋，而让中国人以盟友的身分打进来，再清除出去可就难了。

在英国人的吵闹下，罗斯福总统怀着对蒋介石似乎感到愧疚的心情，答应同意放弃在孟加拉湾的进攻计划——“海盗”计划。对此，丘吉尔奉承罗斯福说：“能够控制自己感情的人，比能夺取一座城市的人还要伟大。”以鼓励罗斯福敢于放弃自己诺言的“勇敢精神”。由于对中国人讲话或发出通知，只有美国出面才是适宜的，罗斯福在德黑兰会议不久，便致电蒋介石：“经过与斯大林元帅会商后，我们将于明年晚春在欧洲有一大战，可望能在是年夏末结束对德战事，但因是之故，遂使我们不能供应足量登陆艇于孟加拉湾，实行两栖作战……”

蒋介石执政的中国与美、英、苏虽并列为四大国，但实际上却并没有

与上述国家鼎立相峙的实力，它只有服从它们意志的地位。不过，对丘吉尔和罗斯福的出尔反尔，蒋介石感到十分气愤，遂取消了自云南向缅甸发动大规模攻势的命令。

“海盗”行动计划彻底绝望了，在德里的韦维尔发现蒙巴顿从来没像此时这样的“疲倦和沮丧”。但是，他很快就重新振作起来。他直言不讳地电告布鲁克，虽然东南亚盟军司令部中所有的人“都对这一决定感到心碎”，然而，“我们却仍然保持着乐观的精神和高昂的士气。我们决心在人力物力允许的条件下尽力作战。尽管许多人对这一决定可能对此间士气造成的影响感到沮丧，我所听到的一切却使我承认，我从内心深处同意你们作出的这一决定”。

蒙巴顿没有气馁，又开始着手筹划适合于他的人力物力的新的计划。这次计划的代号为“猎猪”，它的规模更小，目的仅是在梅宇半岛登陆，以切断驻实兑日军的交通线。然而，接着而来的却是被浇了第二盆冷水。白厅向首相指控他拟制这个计划“尚未得到批准，参谋长委员会对此感到非常震惊，而蒙巴顿所掌握的人力物力也许有必要用于其他更重大的行动之中”。一句话，他们不同意蒙巴顿又搞什么“猎猪”计划。1943年岁末，白厅电告蒙巴顿，在印度停泊的5艘大型坦克登陆舰，其中有3艘不准他动用。蒙巴顿以为至少会把另外两艘留给他，于是又以此为基础匆忙地修改了自己的计划。岂料，白厅还是挥下了最后一刀。1944年1月7日，参谋长委员会来电命令他取消在东南亚战区所有的两栖攻击行动，并将所有的登陆器材转运至欧洲。稍后，蒙巴顿甚至接到了将大部分25磅以上的炮弹，也运往欧洲战区的指示。他的“猎猪”计划变成了“被猎之猪”，希望又一次破灭了。

由于任命他这位前联合作战总部指挥官为东南亚战区总司令的目的之一是领导两栖作战，因此，英国参谋长委员会出于欧洲战局的考虑而发来的种种指示，实际上使蒙巴顿在这里干不了他所熟悉的事情。斯利姆将军后来写道：“迪基所遇到的真正的麻烦在于，他制订的作战计划总是无法实施。他是我们历任总司令中运气最差的一个。在二战的最后阶段，没有一位总司令官的处境如此尴尬，要他在某个基础上制订作战计划，然后又把这个基础拿走。”蒙巴顿自己也在日记发泄牢骚说，他的这种差事“足以使我剩下的头发都变成灰白色。我简直难以相信还会有什么人会承担如此艰巨的任务，那些对我的工作表示羡慕的人（如果有这种人的话）一定是发疯了。”

然而，无论境况是多么地令人泄气，至少从外表上看，蒙巴顿却没有使自己表现出消沉的情绪。他不能无所事事，他要未雨绸缪趁这段天赐的时机整顿他麾下的部队、解决未来作战时将必然要面临的诸多难题。这正是：计划方案屡遭弃，索性不闻转精力。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章分解。

第十三章 战前整顿

重整旗鼓振士气，风度魅力令人迷；

各方工作做得好，成竹在胸迎顽敌。

蒙巴顿来东南亚战区就职，至今仅仅几个月。这期间他忙于协调各方

面的关系、参加一系列重要会议和制订一个又一个均未被实施的作战计划。现在，他总算能腾出手来整饬一下归他指挥的部队了。

这个战区的重点，实际上就是缅甸战场。缅甸失陷后，从那里几乎是赤手空拳溃退下来的几十万英、印、中军队涌入印度。他们疲惫不堪、士气低落，至今还未从对日本军队的恐惧症中摆脱出来。1943年底，蒙巴顿带着他的几个助手沿着印缅边界进行了视察，看望了一些部队，得出的结论是：眼下首要的目标是重振士气。

两年来，盟军方面、特别是在缅甸作战的印度、南非和英国部队吃尽了各种苦头。由于指挥不力和兵力、装备不占多少优势，他们被日本人追着打，溃退了几百英里。在此过程中，他们已成了惊弓之鸟，日本人似乎随时都会从树丛后或山道旁发起攻击；疾病和饥饿也无时无刻不在折磨着他们。蒙巴顿声称，“他们仍能作为一支部队生存下来，本身就是一个奇迹。”

因为每一支部队都曾不只一次地败在日本人的手下，至今为止他们还没有取得过一次有多大意义的胜利。所以他们认为，日本军人是超人，是从林战中的战神，目前他们能够在印缅边界地带保持下来，仅仅是由于对方进展过快，后勤给养跟不上。蒙巴顿必须尽一切努力来恢复这些部队的信心，帮助他们认清自己，认清日军。

他的方法是个人领导艺术和魅力。只要飞机能着陆或吉普车能驶入的地方，蒙巴顿都要亲自去看看。他的技巧是不拘于礼节，而是随随便便、气氛宽松的交谈。

通常的作法是：每到一地，他先要召见军官们，与他们进行单独谈话。他详细地询问每个人的过去和偏好，并且总能够找出一些彼此之间的相通之处以显示亲近。谈话时，暗示随行副官默默记下对方的详细情况，下次再见面以前把这些交给自己，使对方常常感到总司令竟如此熟悉他，并佩服蒙巴顿的博闻强记。这套手腕有时并不成功，但大多数情况下都很顺利。军官们为自己和最高司令官之间建立起来的联系感到又惊又喜。

与军官们谈完了，他又去看士兵。他认为，士兵与军官不同，对他们不能装腔作势，也不能耍滑头，一定要真诚地对待他们。通常他总是先选好一块林间空地，将自己挂着将旗和印有麾下各部队标志的吉普车开进去，然后跳下车来站在“偶然”放在那里的一只箱子上，大声吆喝着士兵靠拢过去。很快，在他周围总是挤满了各种肤色的来自英国、美国、中国、印度和非洲的士兵。

“弟兄们，”蒙巴顿底气十足地大声喊道：“弟兄们！可能你们认为缅甸已被人们忘记了。你们错了！它不是被人们忘记了，而是这块战场就从来没听人提起过！”

顿时，丛林空地上一片笑声，气氛活跃了。这是蒙巴顿每次丛林演讲的开场白，听起来似乎有点儿故作一鸣惊人，但效果奇佳，总是引起士兵们听下去的兴趣。

他的讲话简短而随便，使人感到他把听众当作知心朋友。他告诉士兵们，日本人也是脆弱的，他们并不是土生土长的丛林居民，而是城市人，并且是目光短浅的城市人。他通常还会提到国王和丘吉尔首相对他说过的话，言下之意是让士兵们相信他能够解决问题，是一位握有实权的指挥官和一位有才干的人。

一般在时间允许的情形下，他还要向士兵们指出在该地区进行战斗所

面临的哪些特殊困难、丛林作战的注意事项等等。听了不知多少遍他丛林演讲的随行人员，还忘不了他要在讲话的最后来贬低一下日本的种族：

“弟兄们，你们知道日本人为什么擅长于丛林战吗？因为他们还是正在进化的低等种族！他们钻丛林就是明证。现在我们既然也掌握了在丛林山地作战的技巧，那么打败他们就是不成问题的，因为我们是比日本人更高等的人类。”

蒙巴顿乐于到部队去讲话，其间，也发生过一些轶闻趣事。在库米拉，一群飞来的乌鸦使他不得不中断讲话。人们向乌鸦扔石块，但乌鸦们很快又飞了回来。

“最后，包括两位海军陆战队中将，一位空军中将，一位海军陆战队少将，一位空军准将和三位随从参谋在内的一群人向大树发起了持续的进攻，我则在这种干扰下继续讲话。”在访问第 607 飞行中队时，来往不断的飞机时时使讲话受到干扰。最后，蒙巴顿只得作罢。“我只是想告诉大家，我们最终将有足够的物资基础来保证取得胜利，”他抬起手臂指着天空上飞翔的机群说，“我们今天在这里见到的情况比我的任何讲话都更能证明这一点。”

有一次，一支前线部队刚刚从阵地上撤换回营地，士兵们个个脏乱而疲惫，蒙巴顿又来到他们中间要讲话了。米歇尔·爱德华兹回忆说：“当时，最高司令官衣着整洁，上装缀着将星和作为英王助手标志的特种符号。但是他给我们的印象是，他似乎并不是刚刚从舒适的总司令部来到这里的，相反，我们感到他是来清洗我们的汗污的。他把军官们挥到一边，也没有像指挥官那样地说一通大话。他让士兵们稍息，然后开始把自己的想法和希望向他们娓娓而谈。这次讲话真是好极了。至少有一位当初持有疑虑的士兵……在离开的时候已经相信，跟着总司令官干是会出奇迹的。”

为了便于接近印度籍士兵，蒙巴顿还学会了一些乌尔都日常用语，然后就和印度士兵试着说一说，希望他们能听懂。这一作法在多数场合获得了成功，联络了相互间的感情，但有时也会出岔子。有一次，他用乌尔都语问一位看上去很老的印度士兵：“你在部队服役多少年了？”对方感到不知所云。蒙巴顿又重复了一遍。那位士兵终于听明白了总司令那不规范的问话，反而用流利熟练的英语回答他，“我已经服役 12 年了。”令蒙巴顿和在场的其他军官感到一阵尴尬，觉得这个老兵的语言能力比自己强。不过，印度士兵们见总司令肯于说一些自己民族的语言，还是很受感动的。特别是他们得知蒙巴顿是英王的侄子，也就是说，身上带着王室的血液，能够放下架子做其他英国军官做不到也不肯做的事，就更对他留有深刻的印象了。

在印缅地区的美军部队并不多，但蒙巴顿也得要去看望一下。美国人发现，来到他们这里访问的这位贵族出身的英国上将跟他们想象的大不一样。1943 年岁末，刚刚过完圣诞节的蒙巴顿去印缅边境慰问一支美军的侦察分队。美国人对能够亲眼看到这位“据说是迷人的小伙子”感到好奇。他们想，既然蒙巴顿要留下过夜，“这位高贵而听说爱挑剔的总司令一定会需要洗澡的”。前方条件很差，他们费了很大的劲才从一个野战救护所里借来一个白色的澡盆，然后把它安置在一顶帐篷里。

蒙巴顿慰问完部队后，晚上到那里满意地洗了个澡，并连连夸赞他们想得周到，说自己洗得很痛快。使美国士兵们感觉，蒙巴顿既不放作高贵态，对生活也不过分讲究和挑剔。“我们发现他友好，懂得战地军人的生活，敏感，对我们提出的问题显得宽厚而体贴，对我们这支部队的士气鼓舞很大。”

中国在印度兰加驻训的部队，名义上也归东南亚战区司令部管辖。蒙巴顿清楚缅甸对中国抗战的价值，也知道它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那里作战的主力将主要依靠他们，而他们也乐于充当主力。他需要去看望他们，特别是他们与英国人还存有很深的矛盾和芥蒂。

1942年5月，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失败后，新编第38师和第22师先后退到了印度。在他们入印之初，伦敦生怕中国军队的到来会对兴起的印度民族独立运动产生影响，指示韦维尔对退到印度英帕尔和迫不鲁加尔的这两个中国师实行缴械，声称：“不列颠王国准许中国在缅甸的军队及其装备到印度避难。但有一点需要说明：按照国际惯例，中国军队入境前须申报难民身分，由英国军队予以收容，并在指定地点集中管理。”韦维尔起初打算这样做，遂引起了中国方面的强烈抗议。韦维尔只是考虑到这两个中国师援救英军曾有过功劳，若对其缴械，恐引起英国和印度士兵的不满，才经请示伦敦，免了这一不义之举。现在中国军队已经进入印度境内，一切都成了既成事实，在美国的推动下，美英首先达成一项协议：作为实施租借法，由英国为中国军队提供驻地和粮食，而美国则提供军饷和装备、训练。

由于拟议中的反攻缅甸计划的需要，美国人答应大规模训练和装备中国军队。

从1942年10月开始，每天近20架飞机装载中国士兵入印，有时再搭载一些受训完毕的部队回来。至1943年底，将近10万名中国官兵先后在印度接受过训练，其中大部分暂时驻留在那里，以待今后从西路反攻缅甸。

中国军队在印度的兰加驻地，是韦维尔上将掌权时选定的。从地图上看，英国人选择把兰加（一译兰姆伽）作为中国驻印军营地是颇费了一番心机的。兰加位于印度北部的比哈尔邦，恒河流域以北，与西藏和尼泊尔毗邻，满目荒凉，人烟稀少。

高高的喜马拉雅山脉和滚滚恒河恰好把这片不毛之地夹持在中间。以前在这里设战俘营能够有效地防止俘虏逃跑，现在将大量中国部队搁在此地，也能防止他们觊觎印度内地，起到良好的天然绝缘作用。蒙巴顿对此也曾佩服过韦维尔的老谋深算。

驻印军的薪饷由美国人支付，上等兵每月津贴12个卢比，约合3美元；而一名美军上等兵每月薪饷则高达110美元，约为中国人的37倍。但在当时，一名印度工人的月薪通常不超过4卢比，1卢比可买到30磅大米。对于习惯节俭和精打细算的中国士兵来说，3美元的月津贴已经是一笔相当可观的财富，不仅与国内不可同日而语，即使在印度也可算得高薪阶层。再说，由美国军需人员直接掌管财物供给，免去了某些中国官员的克扣和贪污，饮食、被装也都还不错，尽管按西方人的标准还是很低的。

“在这个囚徒般的兵营里，对中国人来说，看来唯一缺少的仅仅是娱乐。”蒙巴顿是这样认为的。所以他每次去兰加营地访问，都让副官们带一些诸如卓别林、盖博、嘉宝、费雯丽等大明星主演的电影胶片。有了电影看，中国士兵自然非常高兴，军营里放电影，银幕竖在山坡上，正面反面都坐满了人，并不影响效果。蒙巴顿让随从的参谋们，也跟大家挤在一起共同分享艺术的魅力，以示对中国士兵的亲近。

他还与中国驻印部队的罗卓英、孙立人、郑洞国和廖耀湘等高级军官，建立了比较良好的个人关系。其中，有些人在他与史迪威发生争吵和冲突时，站在他这一边。自蒙巴顿就任东南亚战区总司令以来，英印当局与中国驻印

军的关系，比起韦维尔时代是改善了。

蒙巴顿频频去看望散驻于各地的部队，是要冒一定风险的。当然，有的风险也是因他逞强好胜而造成的。有一次，美国空军的科克伦中校驾驶一架轻型飞机从印度的瓜利奥尔送蒙巴顿前往外地。起飞以后，蒙巴顿说他以前曾驾驶过飞机，要求科克伦允许他开一会儿。科克伦只好把操纵杆交给他。“他接过去以后的第一次事就是朝地面扎下去。他的脚整个踩在踏板上，飞机转起圈来。我朝他喊道：‘脚离开制动器！’他却问：‘哪个是制动器？’我赶紧向他指出，飞机才恢复了正常。

他驾着飞机在天空盘旋了 1 个半小时，还不停地转过脸得意洋洋地朝我点头微笑，而我却一直在提心吊胆他怎么把飞机降落？”着陆时一场灾难险些发生，最后还是在科克伦的费力帮助下，使飞机一只翅膀擦着地面降落了。后来，蒙巴顿亲自写信给科克伦中校，对几乎毁掉了他的飞机表示道歉。其实，那位中校当时最担心的是总司令的生命安全。

尽管蒙巴顿不可能与散布于印度和印缅前线和数十万官兵都见上面，他每到一群士兵中间时，也不可能跟每位士兵都聊一聊，然而，听过他讲话、见到过他的官兵们，会以各种渠道把蒙巴顿其人其事告诉自己的战友们，结果整个部队的官兵都知道了他们的头儿是蒙巴顿，是有信心带领他们打胜仗的人物。

蒙巴顿知道自己很擅于鼓舞士气，并为此而自鸣得意。除此之外，他也乐于把自己和他的东南亚司令部向外界宣扬。他在请专栏作家怀尔德曼·勒欣顿帮助一位战地记者撰写自己的个人传记时，曾经这样说：“您应当记得，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一直坚定地认为不能宣扬个人，或者说应当尽可能地把它减少到最低程度。但是，目前的形势很危急，某些崇高目的的宣传个人，也许是必要的。”因为东南亚司令部急需建立自己的威望，而令公众觉得领导它的是一位耀眼夺目的英雄这一事实，将会有助于此。

虽然不无理由，但爱出风头确是他的老毛病。盟军的几位战区一级的司令官中，艾森豪威尔和麦克阿瑟是两种截然不同类型的人。前者处事谨慎，讨厌突出个人，在负责指挥英美军队的北非作战时，艾森豪威尔对外发表的战报均以“发自阿尔及尔的非洲最高司令部”的名义，自己从不署名；而西南太平洋地区的公报则是发自麦克阿瑟将军的司令部”。蒙巴顿虽声称不喜欢麦克阿瑟的这种做法，并指示过助手们不准在新闻公报或通报中提到他个人的名字，但实际上他还是默认了下面人的奉迎，他的司令部发表的新闻公报，通常署名是“发自海军上将蒙巴顿的司令部”。

对此，远在伦敦的一些英军老将十分不满，认为这表现出“蒙巴顿对宣扬个人的贪欲”。安德鲁·坎宁安将军后来在一次观看英军重新占领缅甸的纪录影片——《缅甸胜利》时，对该片虽表示了肯定和赞赏，“但是，看上去那个总司令官（指蒙巴顿）和他的参谋人员以及斯利姆和他的参谋人员成了影片中的主角，这使我感到恶心。”

总的来说，尽管某些人不喜欢蒙巴顿，或不那么欣赏他的军事作战才能，但是，凡是与东南亚战区的老兵们接触过的人都不得不承认，蒙巴顿在接近士兵、笼络士兵、进而激发他们的士气和战斗热情方面是成功的。

疾病，尤其是可怕的疟疾，是蒙巴顿必须要解决的第二个难题。

印缅地区，凶恶的疟蚊往往不分白天黑夜地向官兵们发起进攻，把病毒和疟原虫散播在他们的血液中。官兵们一旦染上，便被高热和高寒轮番折

磨，时而如熬炎夏，时而如坠冰窟。特别是在丛林里的部队，“发高烧的人一经昏迷不醒而躺倒，加上蚂蟥吸血，蚂蚁啃啮，大雨侵蚀冲洗，数小时内即变为白骨，令人胆颤心凉”。

侥幸活下来者，也被消耗尽了体力，磨蚀尽了意志，而不能再去行军打仗。

在蒙巴顿抵达东南亚的时候，斯利姆中将的新编第 14 集团军是战区掌握的主要陆军部队，而它的官兵们的身体状况简直糟糕透顶。蒙巴顿的陆军副官长罗纳德·亚当在一份报告说，疟疾“在东部战区是比日本人更重大的敌人”。而实际上，亚当的措词还远非准确，蒙巴顿经过亲自了解发现：“小小的疟虫，现在竟是我们最主要的敌人。”因为在 1943 年的夏秋季节里，野战医院里病员和伤员的比例是 120:1。除了一些痢疾和其他热带疾病以外，大多数病员都是患了疟疾。

同在联合作战总部时成立专门技术机构的作法一样，蒙巴顿在战区司令部内设立了研究和防治热带疾病的专家小组，并在经费和器材方面予以充足的保障。很快，新的防治药品被研制出来，改进医疗制度和治理传播疟疾的蚊子等措施已经开始收到成效，但是更紧迫的是需要上层给士兵们重新注入活力，蒙巴顿亲自担当了这项工作。在对着开前线的第一次视察中，那里医疗所条件的简陋使他感到震惊。他随即强烈要求印度殖民政府提供更多、更好的设备。此外，他还致电伦敦要求从国内增派医护人员，并希望白厅尽快安排运输工具把他们连同设备一起送来。他视察了所有能够前去的战地医院，对值得赞扬的大力表彰，对懒惰和卫生恶劣的状况提出批评。

在疟虫最猖獗的地区，蒙巴顿要求驻在那里的部队每个营都要建立一座卫生清洁站，给官兵定期严格地搞搞卫生：洗澡、理发、清除污垢，打预防针等。肮脏的被装堆在一起，泼上汽油烧掉。士兵过长的头发胡子一律不许保留，统统剃短以防传播寄生虫。他的努力取得了成果，仅仅数月病员和伤员的比例便下降到 20:1，到战争结束时进一步下降为 6:1。整个所辖部队中的疟疾发病率在 1943 年时为 84%，到 1945 年已下降为 13%。

对在军中嬉戏成性、玩忽职守的军官，他也坚决予以惩罚。有一次，一位加拿大籍少将指挥官在前线附近和蒙巴顿相遇。当遇到一群非洲士兵时，这位少将把自己的帽子抛上天空，然后掏出腰间的手枪对着帽子射击。非洲士兵们一阵喝采。这位加拿大军官洋洋得意地对蒙巴顿说：“指挥士兵就应当这样，对不对？”“不对！”

先生。”蒙巴顿对这种在士兵们面前全然不知自重的行为很反感，冷冷地回答。几分钟以后，那位少将的吉普车驶到距离日军阵地的不远处，车上的人都跳下来，躲进壕沟。蒙巴顿对他忘记自己的职责刻意显示个人冒险的举动并不欣赏，几个星期以后，那位加拿大将军就被解除了职务。

恶劣的雨季天气，也是一个令人谈虎色变的难题。每年从 5 月份开始，在印度洋高空积聚了整个一冬的暖湿气流被强劲的西南季风搅动着，像千艘军舰组成的浩浩荡荡的无敌舰队，气势汹汹地闯入南亚次大陆的万里晴空。太阳顷刻消失了，翻滚的浓云就如一座座沉重的大山低低地挤压着地面。凶猛的暴雨像呼啸的长鞭不停地抽打大地和河流，道路被冲断，桥梁常常被卷走，低洼地变成一片汪洋。面对这样恶劣的天气，无论是英军还是日军都认为在雨季季风时期是很难作战的。因此，这里在每年 5 月至 10 月期间，除了一些小规模战斗之外，战争基本处于停止状态。

但是，蒙巴顿不同意这样做。他认为，只要掌握足够的工程部队来开辟道路和加固桥梁，就能够保持作战的不间断性。同时认为，恰恰是要利用敌我双方对雨季不宜进行作战的一般估计，使进攻能够具有突然性，而这种突然性则又会弥补雨季作战给己方造成的麻烦。早在离开伦敦之前，他已经要求专家们研制适合这种策略需要的特别装备了。从开罗回来以后，蒙巴顿视察了斯利姆的指挥部，坦率地告诉他们，希望他们今后无论在任何气候下都能作战。斯利姆对此感到振奋，其他军官们则感到根本不可能。斯利姆的直接上级——地面部队总指挥官吉法德将军在听到这些话之后认为，蒙巴顿只不过是一通吹牛而已，因为他还没有亲身体验过印缅地区雨季的可怕。然而，蒙巴顿还是坚持让部队做好雨季作战的精神和物资上的准备。

结果，在 8 个月以后的 1944 年的雨季里，斯利姆在印度的英帕尔无情地重创了日军，从而证明了吉法德的看法并不正确。在东南亚盟军司令部中担任计划部门负责人的布赖恩·基明斯评论道：“蒙巴顿在雨季作战的决定”迄今为止一直被认为是不可可能的，但是，尽管遇到了许多相反的意见，它却是在这一地区击败日本军队的一个主要原因。”

缓和与印度人的紧张关系，是蒙巴顿这段时间需要解决的最后一个主要课题。

早在 1921 年蒙巴顿与威尔士亲王访问印度时，印度人民要求独立的迫切愿望就给他留有深刻的印象：民众群情激昂，学生纷纷造反，当地警察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如临大敌。战争爆发以后，印度人不管是否愿意，都卷了进来，但是又不想为任务一方发挥作用。印度的主要政党——国大党谴责“一切帝国主义战争”，主张印度对于“英国的战争”不予合作，并深受日本关于“驱逐白种人，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之宣传的蛊惑。1942 年 8 月，国大党在孟买召开大会，通过“要求英国撤出印度的决议”，全面展开了不服从运动。英国殖民当局立即宣布国大党为非法，逮捕国大党全部领袖和积极分子 4 万多人，印度陷入一片混乱局面。与此同时，原国大党中的激进分子苏布拉斯·钱德拉·鲍斯组织的印度国民军，公开与日本驻缅军合作，共同对付英国军队。鲍斯所属的“自由印度临时政府”还与日本达成协议，日方答应今后由日军攻占的印度领土，将交由他的“解放地区行政委员”来掌管。

蒙巴顿清楚，他的战区在人力和物资方面要依赖于南亚次大陆，这里是他的后方。印度，作为大英帝国国王王冠上的“珍珠”，在是否允许它独立的重大问题上，他无权决定。再说，战争期间提出这个问题也不适宜。但是，他现时能做的是，至少要缓和与印度人的紧张关系。在这方面他需要中国人的帮助。蒙巴顿在政治上是精明的，他知道在安抚印度人的反英情绪时，中国人说话的地位要比英国人自己有利的多，因为这两个国家的境况几乎差不多。他请中国驻印机构的人员在各城市散发宣传品，宣传品中称：“为了打倒人类公敌日本强盗，为了争取各民族共同胜利起见，我们必须并肩作战。要对世界各民族的安危祸福，视为一体；对世界正义自由之保障，更引为己任。现在，全世界阵线分明，一为德意日侵略集团，一为中英美苏联和全世界各族的反侵略集团，所以这一次战争为光明与黑暗之战，自由与奴役之战，正义与残暴之战！”并指出：“我们必须粉碎日寇一切无耻宣传，日本已发动了这妄欲奴役人类的不义之战，却还公然欺骗我们说‘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南进是为了驱逐白种人，解放亚洲各民族’。这是何等卑劣无耻之班语，中

国人不是亚洲人吗？他们何以要处心积虑以侵略中国？要知道，在日本的心目中，亚洲根本不是亚洲人的亚洲，而是它所独有私占的亚洲，不仅白种人应退出，非日本的亚洲人，都应该做它的奴隶牛马！日本为了实现它那大亚洲新秩序，竭尽方法，挑拨离间我们各民族间的感情和意志，望欲拆散我们反侵略阵线的伟大集团，因此，在这场战争中，我们必须彻底粉碎日本的一切无耻宣传，勿受其愚弄而为虎作帐，巩固我们严整的抗战阵容。”

相同内容的话，由中国人说出来效果很大，印度人相信：同样遭受过西方列强长期侵略和压迫的中国人不会欺骗他们。因而蒙巴顿多次感谢中国驻印机构的宣传工作，并承诺在资金和物资上提供保障。另一方面，蒙巴顿还觉得应当办些实事使印度人感到满意，起码要改善一下英国人长期以来形成的掠夺者形象。1943年下半年印度自然灾害频繁，蒙巴顿认为，大规模的救援计划对于这里迫在眉睫的赈灾工作是非常必需的。可是，他却感到由于丘吉尔首相的顽固态度，难于把这种紧迫感传达给白厅。因为丘吉尔认为给印度提供粮食，只不过表明了某些英国人对印度民族主义分子的“绥靖伎俩”而已，是对那些人闹独立的鼓励。至1944年初，印度的饥荒已发展到危急程度。蒙巴顿致电伦敦：“除非立即制订进口小麦计划，否则，他将被迫把军用船只用于运送小麦。”这一威胁果然奏效，伦敦的决策者们只好同意派船抢运来自美国和加拿大的小麦，去援救印度的灾民。他在这件事上赢得了当地人的好感，战后不久蒙巴顿之所以能出任印度总督，也与这一好感不无关系。

蒙巴顿缓和英国与印度人的紧张关系，目的是为了他的作战需要。尽管总的说来他基本上实现了这一目的，但有时也遇到过麻烦。例如，当他提出要印度企业界把每月的降落伞产量从3.5万个增加到20万个时，得到的回答却是这样做将会占用民用市场的布匹。有人甚至怀疑说：“在这一切的背后是一种未曾表达的或隐或暗的想法，即在战后使印度成为英国产品的市场。”蒙巴顿生怕引起新的纠纷，只好作罢。

在阿萨姆铁路问题上，蒙巴顿也遇到过声称代表印度人利益的当地殖民政府的抵制，但是这一次他取得了胜利。通往印度利多的铁路是以前驻缅英军及通过喜马拉雅山向中国运送物资的重要通道。这条铁路原本是为制茶业设计的，每天可以运送600吨茶叶，到1943年底时，它在印度的路段已每天提高到2800吨运量，但蒙巴顿需要它在此基础上再提高3倍。当地政府反对如此大规模地提高运量，理由是一旦战争结束后，这条铁路这样大的运输量会引起本地区的通货膨胀。蒙巴顿请求伦敦直接干预，首相这次帮了他的忙，以军事需要的名义命令当地殖民政府接受蒙巴顿的要求。于是在美国工程师的协助改造下，这条铁路的“每日运输量很快达到8000吨，即使在最恶劣的天气下，也不会低于6000吨”。

到了1944年的初春，蒙巴顿和他属下的部队已经做好了和日军作战的准备。但是，由于他此前制定的几个主动进攻的作战计划被抛弃，只好排兵布阵等待着对方首先进攻，这也正是蒙巴顿所期待的。恰好此时，1944年2月上旬日军向着开发起了进攻，蒙巴顿数月的辛劳终于有了一显身手的机会。欲知英军能否抵挡得住日军的这次攻击，且看下章细说。

第十四章 若开之战

日军主动来进攻，蒙氏正好试刀锋；
倚重名将梅塞维，旗开得胜展雄风。

缅甸南北最长距离为 1900 多公里，东西最宽约为 960 公里。除面临印度洋的部分外，东部、北部及西部印缅边境大多被山岳和高原所包围。地形呈北高南低，中央部分则为平原地带。若开地区位于缅甸西南沿海，处在阿拉干山脉尾部，濒临孟加拉湾，军事地位十分重要。

日本的决策者们对缅甸战场是非常重视的，并不像丘吉尔和白厅的那些将军们认为缅甸是遥远的、相对来说是并不重要的战场。东条英机曾在东京大本营会议上说过：“缅甸是帝国大东亚共荣圈的关键一环，是我们在印度洋地区的防御屏障。

这一地区的战略地位是如此重要，日本决不能放弃它。”

自美英首脑的魁北克会议以后，日本人清楚地意识到了盟军在印度的兵力集结以及蒙巴顿东南亚盟军司令部的建立对它的潜在威胁。1943 年 10 月，日本增加了通过锡兰运送日军的预算。它当初占领缅甸时只用了由饭田祥二郎中将指挥的 4 个师团，第 5 个师团是在 1943 年抵达的，1944 年 1 月又增派去 2 个师团。这样，在若开战役前后，日军在缅部队总共已有 8 个师团。当时整个缅甸的人口仅有 1600 余万，远不及中国大陆的一个中小省份，日本居然在这里保持这样大的兵力表明了它对缅甸战场的重视。

同时也表明，日本在准备首先发动进攻，或者至少将对盟军正处于酝酿阶段的反攻作出先发制人的反应。因为这时日军已经感受到了盟军发动进攻的危险，但仍然认为自己尚有时间先发制人。1944 年 1 月，日军大本营在其每周的情报通报中指出：“英国驻印度军队尚不能适应丛林战。因此，我们在缅甸的攻势将是两头并进的，即同时从印度—云南地区和泰国—印支地区发动进攻。”日军认为，进攻阿萨姆将会切断英国第 14 集团军主力和驻扎在缅北的由史迪威指挥的中国部队之间的联系，而此前先对缅西南的若开发动一次有限的攻势，以试探这一期间对方的战斗力状况，如能成功，甚或可以使盟军从印度洋基地发动两栖战的可能性完全消失。

若开战役开始前，驻缅日军刚刚完成了改组。其中，为实施在缅西南沿海地区的攻势作战，于 1944 年 1 月专门编组了第 28 军。军司令官由樱井省三中将担任，下辖第 2、第 54 和第 55 师团。第 2 师团系在瓜岛作战遭美军重创，后又在菲律宾重建的部队；第 54 师团是才于上一年在国内匆促组建的所谓“特设师团”（相当于预备役部队）；只有第 55 师团是一支老部队。

实际在这次战役之前，韦维尔上将曾指挥英印军在这里打过一仗，史称“第一次若开作战”。韦维尔在英军中也是一位军事眼光极其敏锐的将领，他看出若开地区是日军最易由海陆并举进攻印度的地带，另一方面，对于当时在印度洋英国海军力量尚不雄厚的情况下，这一地带作为向缅甸中枢地区进行反攻的据点，将会起非常关键的作用。尤其着开附近设施完善的空军基地和船只停泊地，是敌我双方都要重视的地方，如果自己一旦将反攻据点推进到这个地带，以后就可以水陆并进直捣缅甸的心脏地区。但是，鉴于力量不足，这次若开作战的目标有限，仅仅是为了收复梅宇半岛和东孟加拉湾外面的若开岛。这座长 90 英里、宽 20 英里的狭长半岛，夹在梅宇河与孟加拉湾之间。岛上森林茂密，大部分地区被认为是难以穿行的。一条高 2000 英

尺的山脉贯穿整个岛屿。按韦维尔的原来意图，陆路攻势是牵制性的，主攻乃是敌后实施登陆。但是，上面拨给他的登陆艇的数量却明显不足。

1942 年底，这次攻势在一片要打回缅甸去的声浪中开始了。按照韦维尔的作战计划，在他发动这场进攻的同时，一支中国部队将从缅甸另一侧的云南山区中展开攻势。此外，由奥德·温盖特旅长指挥的经过特殊训练的“钦迪”旅。“铁迪”原是神话中守卫缅甸神庙的半狮半鹰的怪兽。这支部队以此命名，表明在陆上和空中都能称雄。现在该旅将实施一次大胆的纵深穿插突袭。该旅 3000 名士兵将翻过 3 座山脉，跨越 3 条大江，穿过地图上标明无法通过的几百英里的丛林区，迂回跋涉 1000 英里。这个旅是温盖特精心挑选的一批具有“典型的”英国人种“特性”的士兵，其中多半是皇家利物浦团中城镇居民出身的士兵以及从其他 12 个团中零星抽调来的士兵，许多是 28 岁到 35 岁的已婚男子；另一少半是廓尔喀族的雇佣兵。

进攻开始后，韦维尔以印度第 77 旅为先头部队进到靠近印缅国境的布迪当。孟都，与驻守在这里的日军第 33 师团展开激战，但结果都被击退。英军从印度调来更多的部队，不久就增加了 4 个满员的英印旅和 1 个英国旅前来参战，而日第 15 军司令官饭田祥二郎中将也增调其第 55 师团开至前线。由于日军据有坚固的工事，能安全地避开那些直接向他们射来的或是在他们周围散落的大炮、迫击炮弹和机枪火力，遂使英印军屡屡进攻均遭失败。

战至转年 3 月份，英印军队中出现了士气趋于瓦解的迹象。英印士兵在阴森森的沙沙作响的丛林里，不断遭到日军的伏击，许许多多同伴遭伤亡，使英印士兵的士气沮丧，感到他们将无法战胜对手。恰巧这时，一支从缅甸中部悄悄调来的日军有延支队，从背后对驻扎在梅宇河彼岸加叻丹山谷闷热的丛林内的英军侧翼警戒部队发起猛攻，并将其击溃。与此同时，日军棚桥大佐率领其第 112 联队从拉德堂周围的丛林中钻出来，猛扑英军第 55 旅的后卫部队。在日军凶神恶煞般地猛烈进攻下，这旅部队死伤惨重，经过一番苦战，才勉强脱身。

棚桥的第 112 联队得手后，接着于 3 月 20 日进抵马由河右岸，横穿毛杜科山脉向团丁附近挺进；日第 55 师团的第 143 联队则沿毛杜科山脉纵行。这两个凶悍的日军主力联队相互呼应，3 月下旬向已被压缩在团丁附近的英第 6 旅发起了猛攻，全歼了这个旅，并俘获了该旅旅长。而那个在加叻丹山谷奇袭取胜的有延支队，也从那里南下进抵马由河谷，企图控制对英印军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孟都—布迪当公路。同时，饭田祥二郎中将指挥第 33 师团和第 55 师团的主力，继续向这里集中。在布迪当和孟都的数旅英印军面临着被分别包围的险局，韦维尔只好下令全面撤退，率部队逃回了印度境内。

英军这次对若开地区的进攻最终以失败告终。不过，就在韦维尔垂头丧气的时刻，温盖特和他的钦迪旅经长途奔袭，重新在亲敦江对岸的丛林中出现了。诚然，这支部队此时经一路穿插已有 1/3 的人伤亡或失踪，但是这些面容憔悴、胡须满腮、衣衫槛楼的官兵能打到这里，就已经证实了它的指挥官温盖特少将的一贯论点：英国士兵是能够战胜丛林的，能够在日军称王称霸的酷热地带机智地与敌人周旋，并战胜对手。由于有钦迪旅做策应，1942 年底，英第 14 集团军所属”的第 15 军又卷土重来，趁日军从若开地区收缩兵力之机，挺进到梅宇半岛，并形成了新的防线，这时的韦维尔已在数月前被任命为印度总督，领导殖民政府的行政工作，前线的军事工作已由蒙巴顿全盘接管。

若开前线的英第 15 军由 3 个师组成：即英国第 5 师、英印第 7 师和第 81 西亚师。军长为克里斯蒂森中将。为了加强这个军的指挥力量，蒙巴顿调换了几名师级指挥官，其中经伦敦同意，将英军与意大利军队在埃塞俄比亚多洛戈罗要塞之役的英雄弗兰克·梅塞维少将，调来任第 7 英印师的师长。1944 年 1 月，蒙巴顿还亲自视察了前线部队，“昨天路易斯·蒙巴顿来到这里看望我们，给我们带来了力量，”英第 5 师的洛马克斯少将回忆道，“他对士兵们发表的讲话精彩极了，人们都愿意见到他。他是个很有个性的人。”第 15 军军长克里斯蒂森中将是位不喜欢吹捧的人，他也曾在这次战役结束后对蒙巴顿说：“和我交谈过的许多军官和士兵都说，你对若开的鼓舞人心的访问是他们在关键性的 3 个星期内保持战斗意志和士气的重要因素。”视察时，蒙巴顿还向该军保证，如果交通线被切断，他将调动手里掌握的全部飞机向他们空投所需要的各种补给物资。

被日本大本营称为“哈”号作战的日军进攻计划，首先要求割裂英军的若开战线，切断第 5 和第 7 这两个师的交通线，然后各个加以歼灭。进攻的主力为日本第 28 军的第 55 师团，其他两个师团担任掩护和预备队任务。第 55 师团是一支从中国战场调到缅甸的部队，曾在长沙会战中遭受过重创。不过，在缅甸战场该师团战果赫赫，参加过攻打毛淡棉、锡唐河、东吁等一系列战斗，可谓久经沙场的部队。它新上任的师团长竹内宽中将更是个雄心勃勃的年轻将领，一心只想为天皇的大东亚“圣战”建功立业。经过多次补充，该师团拥有兵员为 20259 人，150 毫米野战炮 36 门，迫击炮 200 门，坦克装甲车 40 辆，空中支援方面有 3 个航空中队负责。除几个联队被调往他处担任守备任务外，师团主力全部投入这次战役。进攻前，樱井省三中将亲自到第 55 师团司令部坐镇部署，将该师团编成 3 支突击部队，并调来棚桥大佐指挥主要突击部队。因为这个令人胆寒的日军大佐，曾使上次韦维尔突入若开的军事行动遭到惨败。

按照樱井省三和竹内宽的具体部署，棚桥大佐将率领他的突击部队迅速而秘密地穿过第 7 英印师及外翼警戒部队——驻守在加叻丹山谷的第 81 西亚师之间的丛林。

他们将从背后袭取东市场，攻夺卡拉帕津河渡口，再从后面迂回扫荡，最后向南挺进以切断雅基都山口。这样一来，梅塞维的第 7 英印师将完全陷入包围。另一支由久保少将率领的突击部队，将向北挺进，穿过丛林，夺取戈佩山口，该山口是第 7 英印师可借以突围的另一条可能的退路。然后，日军的一些小股部队将穿过梅宇山脉，绕到山脉那一侧的英第 5 师的后面。这样就可切断英第 15 军的全部交通线。师团的第 3 支突击部队，由土肥少将指挥，将从南面进攻第 7 英印师，完成对该师的歼灭战。

战役定于 2 月 4 日开始，至 2 月 10 日结束。因为骄狂的日军没有充分估计到自蒙巴顿上任以来，经过一番努力已经使他的国籍复杂的军队发生了变化，还依照自己的老眼光和上次若开战役的经验，认为 7 天时间已足以歼灭第 7 英印师，之后再由这 3 支突击部队会合以击溃英第 5 师大部。

战斗刚刚打响的时候，蒙巴顿接到的来自若开前线的报告似乎表明，战役进程正按日军指挥预想的方案发展，第 7 英印师的侧翼遭到了包抄，交通线被很快切断。

蒙巴顿赶紧把他此前从中东借用来的 79 架飞机连同自己直接掌握的飞机，向印缅边境机场集中，随时准备对地面部队提供空中支援。然而，日军

投入这次战役的飞机总计有 100 多架，其中有些是新式的“零式”战斗机，这种飞机的机动性能多少抵消了英国喷火式战斗机所具有的高速度的长处，使蒙巴顿起先允诺的向被分割包围部队空投补给品的保证一时无法实现。蒙巴顿当即决定，本身没有自卫能力的运输机不再起飞，从而使战斗机甩开负担，集中起来掩护轰炸机对地面部队提供火力支援。

2月5日黄昏，棚桥大佐率领的突击部队已逼近了第7英印师的司令部。廓尔喀士兵在坦克的支援下，于距离司令部仅两英里远的一条丛林山脊上顽强抵抗。日军一步步向前逼近，廓尔喀士兵则掘壕据守，战至夜幕降临后，棚桥大佐才下令让饥饿和劳累了一整天的士兵停止进攻，在山谷中埋锅造饭，歇息了一夜。

面对日军各突击部队正陆续从四面包围紧逼过来，梅塞维少将向官兵们坚定地表示：他和自己的司令部就地坚持战斗——如果需要的话，将一直战斗到最后一把刺刀，最后一名士兵。破晓时分，晨雾开始从丛林里升腾而起，就在这时，日军高喊着“帮扎依”（日语“万岁”之意）冲了过来。由于双方混战一团，英国空军已无法提供火力支援。英印士兵杀退了从各个方向冲进师司令部的几十个敌兵。由于英军的顽强抵抗，又打退了对方的又一次进攻。这时，日军调来了重型迫击炮和平射步兵炮，并在四周高地上架设了重机枪。天下起大雨，不久，丛林中的小道就变得泥泞溜滑，难于行走；同时，迷雾也使能见度减低了。

上午10时左右，日军的炮弹和重型迫击炮弹开始在英印军士兵中间落下。梅塞维此时认为，师司令部坚守原地的目的已经达到。在销毁了所有的文件和无线电装备之后，梅塞维少将率领身边的官兵一小批一小批地悄悄撤离，奔向师后勤补给地信兹维亚。由于梅塞维撤退前没有电告他的直接上级克里斯蒂森军长，后者以为他已经阵亡，并上报给第14集团军司令部。集团军军长斯利姆中将信以为真，立即将梅塞维少将阵亡的消息告诉了蒙巴顿，蒙巴顿却肯定地说：“他还活着。我不相信一个在埃塞俄比亚战场上的英雄，会被一名叫棚桥的日本大佐打败。”

信兹维亚在雅基都山口的东面，第7英印师的后勤掩蔽所建在这里一处丛林环绕的一片稻田开阔地上。该地是由杰弗里·埃文斯指挥的英第5师第9派负责防守，除步兵外，他还有一些李—格兰特式轻型坦克。埃文斯接管防务后发现：掩蔽所四周，陡峭的群山环抱，山上密林覆盖，如果日军来进攻，尽可以穿过密林直接潜行到稻田边缘而不致被人发觉；掩蔽所的中央是一座灌木覆盖的小山，如果部队被一批数量上占优势的强敌围困在这块地区内，那就无异是陷入了绝境。于是，他决定尽可能快地着手构筑一道防御圈，整个防线分派给各个单位防守，不论它是军需供应处保管大炮的仓库兵，还是指挥机构，都得负责防守一部分防线。尽管这样，兵力仍然不敷调用，防御圈的东沿和东北沿只好任其空着。指挥官们奉命带领各自的部下开始构筑工事，布设有刺铁丝网，并在丛林中设置一些障碍物。埃文斯旅长命令各部队应对后勤掩蔽所内自己防守的小掩蔽所负责。他们必须坚持战斗，直到援军赶来。而在平坦的稻田上，即掩蔽所的中心，埃文斯将他的那些坦克作环形部署，并派两连步兵掘壕守卫。

正当士兵们在奋力构筑工事的时候，一个满身泥污、衣衫褴褛但昂首挺胸的英国军官，从丛林里走了出来。他就是梅塞维少将，随同来到的还有师司令部的参谋们。接着，又有许多被打散的官兵陆陆续续穿过丛林来到了

师长身边。梅塞维此时是这里的最高指挥官，他同意埃文斯的部署方案，并通过无线电指示自己下辖的另3个旅向这里靠拢。

日军以为攻陷了第7英印师的司令部，并完成了对该师各部队的深远包围以后，全歼这个师已指日可待。东京的报纸、电台大肆渲染，“向德里的进军已经开始！”“棚桥，若开的胜利者！”并造谣说，“英国斯利姆的第14集团军已全部就歼”。

臭名昭著的“东京玫瑰”又用她那诱人的嗓音对印缅战场上的盟军士兵们广播说：“你们为什么不回家呢？缅甸已全完了！”日本的缅甸方面军司令官河边正三中将还狂妄地在作战地图上标上记号，表明日第55师团各突击部队用不了一周就可以攻入印度的吉大港（现属于孟加拉国）。但是，蒙巴顿向伦敦发誓，这次战役一定要打赢，绝不会重演失败！同时要求驻印空军，只要气候条件允许，就必须勇敢地起飞，全力提供对地面部队的火力支援和向他们空投补给品。

2月7日上午，日军向信兹维亚一带的第7英印师各阵地发起进攻。但几次攻击，都被对方的坦克和大炮密集而猛烈的火力击退了。不久，一度是树木丛生的斜坡就成了一片布满断树残草和日军尸体的荒野。炮火轰击之后，英印步兵随即端起刺刀，勇猛地冲向敌人。随着越来越多的日军增援部队穿过丛林来参战，他们进攻的势头也日见凶猛。但日军的进攻总是一再被击退；日本兵身材矮小，在短兵相接、难解难分的格斗和拼刺时，往往败于那些身高体长的英印和廓尔喀旅士兵的手下。

日军继续发动进攻，其凶猛的势头始终有增无减。日本人未料到在丛林中会遇到英军的坦克，由于树枝和树叶的阻挡，火炮无法击毁它们，许多日本士兵竟身上绑上炸药去扑坦克，结果却死伤累累、收效甚微。激战两天后，一向妄自尊大的日本人终于意识到：战局的发展不尽符合自己的如愿算盘，英国人既没有惊慌失措，也不打算撤退，而是坚毅果断地在进行抵抗。

一次次攻击失败，使樱井省三中将明白：除非他能拔掉对手的一些丛林掩蔽所，特别是摧毁掉第7英印师的后勤掩蔽所及其重要的补给仓库，否则，他的进攻必定会失败。在一次大规模的进攻中，他把所有在若开的部队，除了那个在加叻丹山谷包围非洲士兵的骑兵联队以外，全都用来攻打信兹维亚战场边缘四周那些薄弱的环形防御阵地。樱井省三中将还把其第54师团的大部调来，以作增援或乘胜追击之用。

日军各突击部队不顾一切地从四面八方攻打后勤掩蔽所，而且攻势一次比一次更凶猛。日本飞机的轰炸和扫射，使这块地方化成了一片令人窒息的火海，但是，蒙巴顿的空军出色地顶住了日本空军，在绝大部分时间内掌握住了这一地区的制空权，使日机不敢再进一步肆虐。到2月11日，争夺后勤掩蔽所的激战已持续了5天5夜。

按照樱井省三这次发动进攻前的要求，5天之内就要把第7英印师消灭掉。但到这时，7天已经过去了，梅塞维出色地抗击着敌军。与此同时，仅带着7天给养的各支日本突击部队，则处于缺粮少弹的困境，他们之所以一心要拿下信兹维亚的英军后勤掩蔽所，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为了缴获英军的军需物资来补充自己的补给。

日方对自己的胜利仍深信不疑，东京电台一直在按照原计划进行广播。它每天都要报道英军在若开被歼的最新消息。有一次战斗间歇期间，梅塞维在自己的帐篷里竟然收听到这样一条日本的英语广播新闻，这条新闻编造了

一些令人毛骨悚然的细节，详尽描述了第7英印师的覆灭经过，以及师长梅塞维如何丢掉部下，只顾自己逃命的情形。梅塞维听罢，嘿嘿一笑。

蒙巴顿电告梅塞维：“只要坚守住你们就可以创造历史，就可以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同时，他和吉法德上将、斯利姆中将一起会商增援问题。2月13日，英军第5师的一个前卫旅开始打进雅基都山口；北面，英印第26师是斯利姆直辖的集团军总预备队，这时也奉蒙巴顿的命令派2个旅从吉大港向前线进发。见增援部队就要陆续开到，梅塞维命令手下各旅从其各自的掩蔽所开始一步步地反击。埃文斯旅的坦克首先向雅基都山口开进，企图与正在攻击山口的英军第5师取得联系，但由于道路正被日军破坏，加上日本官兵的拼死阻击，不得不退了回来。梅塞维少将为了加强他那里的反击力量，又从所辖第89旅掩蔽所调来一个苏格兰营。这时，他自己的指挥所已被日军的炮火炸成一片废墟，他不停地转移着自己的指挥位置，手下的参谋们也死伤不少。梅塞维这个非洲战场上的英雄，开始感到有些精疲力竭了。而就在这时，他听到从北面和西面不断传来隆隆炮声，这说明第26师和第5师的增援部队离这里越来越靠近了。2月17日，情况已相当清楚，这一阵阵从远处传来的隆隆炮声，对日军来说乃是一种预兆不祥的信息：英军的策略是，让第7英印师作为一只铁砧顽强固守，而让后备部队像铁锤一样把对方击碎。蒙巴顿后来宣布：“我是这种策略的发明者，并要把这种方法推广开来。”日军感到自己的两个师团有遭到反包围的危险，从17日起逐步分批撤退，虽然开始时还几乎难以觉察。

2月24日，英军第5师终于完全占领了雅基都山口，彻底解除了日军对梅塞维部队的包围。樱井省三中将不得不承认，这次若开战役日军失败了。日军第55师团和第54师团经过20来天的战斗，此时已伤亡惨重，实力大大减少。由于蒙巴顿直辖的第21、第224英国飞行团，对地面的火力攻击愈来愈猛烈，樱井省三被迫把大部队分散成一股股小部队，试图穿过丛林逃跑。久保突击部队在撤退时，遭到冲杀出来的第7英印师和向南进逼的英印第26师以及第36师的夹击，全部被歼。投入对梅塞维部队主阵地进攻的7000名日军官兵，至少有5000人死在丛林里，其中有些是饿死或是病死的。

在争夺信兹维亚英军后勤掩蔽所的战斗中，日军先后将其第28军的两个师团投了进去，担任主攻或增援、掩护的任务，占其发动若开战役总兵力的2/3强。因此，这一战斗结束后，若开战役实际上也随之告终了。整个战役中，梅塞维的第7英印师蒙受了二三千人的伤亡，但是，他们在各路援军的配合下，总共击毙了7000名日军官兵；陆续生俘了500余名日本兵（这在缅甸战场确是闻所未闻的）。英国的、印度的、非洲的及廓尔喀族士兵，为了自己的生存和打败日本人，进行了殊死的战斗，表现了顽强的意志。战役结束后，蒙巴顿给妻子埃德维娜写信，告诉她胜利的消息，他说：“这要归功于我们的军人的高昂士气和勇敢精神。在几乎同样的情况下，他们以前曾狼狈而逃，因此我认为东南亚盟军总部已经证明了它的存在的必要性。”为了鼓舞士气，在作战人员中树立英雄主义的榜样，蒙巴顿还利用他与王室的特殊关系，使国王批准了向10多位参战有功人员授予维多利亚十字勋章。在一次战役中，有这么多人获得这一殊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军在任何其他战区都没有过先例的。

在相隔着半个地球的英国伦敦，当丘吉尔首先闻知胜利的消息后，兴奋地拟就了一份贺电。他给蒙巴顿的电文说：“我对你和第14集团军在着开

与日军进行的一系列的作战中所取得的胜利战果，表示衷心的祝贺。在缅甸的丛林战中，日本军队受到挑战并被击败。他们大言不惭的自吹自擂，这回可得到了有力的揭露——这对于从事于我们共同事业的各阶层人士、各民族人民来说，都必然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白厅的高级将领们也纷纷打来电报，向蒙巴顿、斯利姆和克里斯蒂森等人表示祝贺。

战役结束后，蒙巴顿立即召集总部的参谋们总结了作战经验。他指出：这次若开战役和上一次韦维尔进行的那场战役相比较，关键的区别是，第二次着开战役中己方的空中力量特别是在后期得到了很大加强，正是由于如此，才使处于敌后的部队能够得到支持。同时，英印军队的士气经过整饬也有了很大的变化。这一点，从日本著名战史专家桑田悦和前原透合著的《简明日本战》中，也能得到相似的结论：“1944年2月，日军在若开方向发起了攻势，以利于英帕尔作战的实施。突击部队穿过东部山脉，插到敌人侧后，同正面攻击的部队一起在辛遮瓦盆地包围了英印第7师主力。眼看就要获胜，但英印部队依靠坦克的环形防御阻止进攻，并从空中得到支援和补充给养进行抗击。轻装的日军无力攻破环形阵地，不断变更攻击部署，26日解除包围后撤。随着盟军空中优势的扩大，不得不中止作战。”

正当英军陶醉在着开战役的辉煌胜利之中时，蒙巴顿司令部的情报机构发现了阿萨姆边境地区的一些不祥迹象：日军正在缅甸一侧集结重兵，发起的攻势将比若开攻势的规模更大。虽然蒙巴顿料到日本人在那里会挑起战端，但没有想到进攻会来得那样迅猛。若开地区的战火刚刚平息10余天，3月8日，日军第15军所属的3个师团及配署部队的近10万法西斯官兵开始越过亲敦江攻入印度境内，揭开了英帕尔战役的战幕。这是战争后期，英日双方在东南亚战场上规模最大的一次较量，究竟孰胜？孰败？且看下章细说。

第十五章 激战英帕尔

冒险武士犯印境，蒙氏布阵巧用兵；
盟军官兵同仇忾，杀得日寇心颤惊。

在日本大本营的作战序号中，英帕尔战役被命名为“乌”号作战。战后，日本防卫厅战史研究室编纂的《缅甸作战》一书，称它是驻缅日军“进行的一场无谋的作战”。

积极主张发动这次战役的牟田口廉也中将，是日本陆军中著名的少壮派将领。

侵缅初期，此人任日第18师团师团长，后因作战有功，接替饭田祥二郎中将升任日第15军军司令官。接任以来，他极力主张进攻英帕尔，占领东印度的阿萨姆地区，认为用大约3个师团的兵力以及足够3个星期食用的粮食轻装奇袭，可在短期内攻占英帕尔。日军南方军总司令官寺内寿一大将和缅甸方面军司令官河边正三中将考虑到后勤方面的问题，起初不大同意这一冒险计划，但是，他们架不住牟田口及其手下一批悍将的苦劝，答应由南方军总司令部积极向东京大本营报请批准。

1943 年底，寺内大将派其副总参谋长绫部中将赴东京，提出了驻緬日军实施英帕尔作战的意见，请大本营作出决断。鉴于整个太平洋战局对日本愈来愈不利，大本营就英帕尔战役感到疑虑的以下 5 个问题，征求了绫部的意见：

1. 必须慎重考虑防备英印军在孟加拉湾方面和緬甸南部沿海一带的登陆作战，如果在实施“乌”号作战当中出现这种情况，能否采取相应的对策？
2. 由于攻占了英帕尔平原，结果是否还需要增加兵力？是否会给防卫緬甸带来不利的后果？
3. 我空军兵力处于极端劣势，对完成地面作战有无妨碍？
4. 补给能否跟得上？
5. 第 15 军的作战设想是否坚实可靠？

绫部与牟田口同属少壮派将领，俩人私交也一直不错。他这次赴东京前，专程由南方军总司令部所在地的新加坡飞抵緬甸，牟田口在曼德勒为他饯行，拜托他一定完成好晋京的使命。因此，对大本营的疑虑，绫部立即做出了确有把握的答复，并声称，通过实施本战役，可以使防御战凭借英帕尔附近的有利地形，因而反倒可以节省兵力，加强緬甸的防卫。

1944 年 1 月 17 日，绫部中将带着大本营的批准文件抵达仰光，并向緬甸方面军各高级将领作了传达。至此，“从昭和 17 年（1942 年）夏季以来，多次议论过的印度进攻作战，大本营终于做出了决断”。

在牟田口率部进行战役准备期间，2 月 26 日，他听到了樱井省三的第 28 军在若开战场上失败的消息，不过他认为，若开之战已使蒙巴顿掌握的几个师的预备队投了进去，现在他们还陶醉在胜利的兴奋之中，来不及调到北面来，他正可以趁此机会奔袭英帕尔。

日军对印度的进攻为什么首先选择英帕尔呢？这是由英帕尔的战略地位决定的。

英帕尔是东印度的主要边境城市，位于吉大港通往阿萨姆邦的交通干线上。该城周围是曼尼普尔山脉，近郊是长 40 英里、宽 20 英里的英帕尔平原。自英军被赶出緬甸后的两年中，这里已建成一个巨大的基地。总有一天，盟军将由此基地展开反攻。

平原上，遍布着大型巴沙营房（由竹子和芦苇编成的营棚）、医院、军械仓库、弹药库、工场以及军事基地所需要的各种大型设施，四通八达的沥青公路从基地中间穿过。此外，从 1942 年起就开始从原始丛林中辟建一条宽阔的汽车公路，把英帕尔和转运军需物资的重要铁路终点站迪马普尔连接了起来。“在英帕尔，一切井井有条，组织得相当完善，具有供未来反攻部队使用的基地所应具有的各种条件。”蒙巴顿来东南亚战区上任后，曾视察过这里并得到了这样的印象。

但是，英帕尔的地形则不像那位绫部中将所声称的那样，这里决不是打一场防御战的理想地点。因为这个平原完全处于丛林覆盖的陡峭群山的俯瞰之下，而且那里的防御设施也不尽如意。3 月 5 日，也就是英帕尔战役开始的前 3 天，集团军军长斯利姆中将写信向蒙巴顿报告说：“我给你写信是为了更为严重的第 4 军的阵地问题，我们在那里的部署不够理想……如果可能的话，我急于加强那里的阵地。”负责防守英帕尔方面的第 4 军，下辖第

17、第 20、第 23 英印师，军长是斯康斯将军。此时，他们正在英帕尔外围很远的地方驻扎，当日军进攻已明显地迫在眉睫时，才开始陆续返回英帕尔。不过，未等他们到齐，战斗已经打响了。

当 3 月 8 日牟田口中将的先头部队渡过亲敦江向英帕尔打来时，蒙巴顿还正在医院住院。原来在几天以前，蒙巴顿访问史迪威的前线指挥部时自己驾驶吉普车在一条林间小道行驶。不巧，汽车的前轮压住了一根毛竹，驶过以后，竹子反弹起来，扎进了他的左眼。蒙巴顿事后说：“当时我不敢相信我的眼球是否依然在眼眶里。

证实这一点是需要相当的勇气的。我发觉它仍然在那里，并为此松了一口气，但紧接着我发现自己的左眼完全瞎了。我紧急包扎一下以后，又继续朝前开。”后来，蒙巴顿被送往利多的陆军医院，幸亏那里有一位美国的眼科专家沙伊上校。他经过诊断后说，蒙巴顿的左眼严重内出血，但只要不过分劳累，很快就会好的。蒙巴顿双眼都扎上绷带休息了 5 天，但是，来自英帕尔的消息使他心急如焚。他不顾医生的劝阻，自己离开医院，飞抵卡米拉的斯利姆指挥部。他知道这样做左眼将有失明的危险，但是，哪怕肯定会瞎，他也要去前线部署作战。

斯利姆中将见蒙巴顿眼缠着绷带被人牵引着走进自己的指挥部，感动得不禁紧紧地拥抱住他，然后，立即向他汇报了当前的战事情况。蒙巴顿此时不能看也不能写，但思路仍十分清晰、敏锐。听了斯利姆的汇报，他思考良久定下了决心：把在亲敦江以西沿边境进行防御的部队，撤至英帕尔附近高地上来组织防御。因为他认为，这样一来就会使日军进攻部队远离自己的后勤基地，敌人不仅要被迫背靠着宽阔的亲敦江作战，而且还得完全依赖很不安全的丛林运输线。此外，己方的空中优势不仅会保证可能遭包围的一些部队的补给供应，而且还能阻止日军获得补给品。

由于雨季即将使一些干涸的河床变成汹涌的急流，日军必须在雨季到来之前迅速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否则就不得不面临一场灾难。据战后日本防卫厅的战史专家称：“这一决策正中日军要害，而牟田口中将恰恰没有看出这一点。”

蒙巴顿定下决策后，便离开卡米拉返回德里，去制订和协调从若开地区调动部队增援英帕尔的计划了。

担任主攻英帕尔任务的是日第 15 军的第 33 师团和第 15 师团，师团长分别是柳田中将和山内中将。

日第 33 师团渡过亲敦江后，师团主力分为左右翼两个突击队。为夹击歼灭铁定、通赞地区的英印第 17 师，两个突击队在 3 月 15 日到 18 日之间分别进到通赞东侧及辛格尔地区，这时，拥有汽车千余辆的英印第 17 师，正遵照后撤的命令，行进在通赞南北一带悬崖绝壁上的羊肠小道和曼尼普尔河的深山峡谷之间，被日军追咬住。牟田口中将接到这一情况的报告后，大为欣快。然而，万没料到，他的部下们这时错误造出：其中之一是，当该师团右翼突击队插进英印第 17 师的心脏部位的一个要害地点吐特姆（通赞东北侧）后，发生了错觉，以为对方已向北面逃走，便放弃了吐特姆这个要害而向东侧的山谷集结。及至发觉错误，为时已晚，该地又被英印部队重新占领了；另一错误是，左翼突击队在对手激战时向师团部发电称：“销毁了密码本、处理好了军旗，以全部牺牲的决心进行战斗。”柳田师团长误以为他们要全军覆灭，于是命令他们暂时撤退以保存力量，因而等于给英印第 17

师开放了退路，使其带着数百门汽车牵引的大炮向英帕尔方向撤去。尤其是柳田师团长考虑补给上的问题，没有立即向英帕尔方向紧追逃敌，并且公然向牟田口提出部队“以立即停止‘乌’号作战，转入防御态势为宜”的建议，气得牟田口不久便撤掉了他的职务，由以骁勇闻名的田中信男少将接替师团长职务。

田中信男受命后，立即在英帕尔以南地区展开积极攻势作战，很快打到了距英帕尔西南约 20 公里的比辛布尔地区。虽然许多联队长、大队长在战斗中相继战死，师团的战斗力已大为下降，但封锁住了英帕尔的南部通道。

从北路进攻英帕尔的日第 15 师团，奉牟田口军司令官的命令，各个联队一律轻装，“像一团烈火似地穿过群山前进”。他们以惊人的速度穿过丛林，越过河道，在夺取了英帕尔东北方向的乌科鲁尔以后，于 4 月 8 日占领了英帕尔至科希马之间的秘宣，封锁住了英帕尔的北部通道。

面对日军两个师团已对英帕尔形成南北合围夹击之势，斯利姆中将急电蒙巴顿调更多的部队前来增援。

实际上蒙巴顿的增援计划早已拟就完毕，但协调和实施起来却不无阻力。他在若开战役期间，为了空运部队和补给曾动用过向中国运送物资的美国运输机。但是，这要征得史迪威和英美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的同意。由于这番手续大费时间，蒙巴顿从德里给伦敦拍了一封电报：“日本取得胜利的危險和我们击败他们的可能性都比若开战役时大。”他说，如果不遭到反对的话，他建议自 3 月 18 日起把用于喜马拉雅山运输线上的飞机挪用过来。参谋长委员会立即作出了反应，要求美国方面予以同意。丘吉尔首相还以私人名义给罗斯福总统发电，指出“这场战役利害重大，如果取得胜利，将会产生深远影响”。美国方面同意了英国的请求。蒙巴顿认为他的建议得到同意是理所当然的，因此早已命令作好各方面的准备。到 3 月 9 日，空援已经开始了，最初有 30 架达科型运输机参加行动。

史迪威反对挪用“驼峰”运输线的飞机，给蒙巴顿添了不少麻烦，说服他同意颇费了一番口舌。东南亚盟军地面部队总指挥官吉法德上将，也对增援行动的必要性持怀疑态度。早在 3 月 5 日，蒙巴顿就曾要求吉法德开始把救援物资通过陆路运往英帕尔，但是，10 天以后，仍然一点动静都没有。吉法德对英帕尔的危急程度表示怀疑，受到了蒙巴顿的严厉批评，萨默维尔在日记中写道：“将军（吉法德）动作迟缓，我想，正是由于最高统帅蒙巴顿勋爵个人施加压力的结果才使 1 个师的兵力得以及时赶到英帕尔，避免了被日军歼灭的结局。”后来，蒙巴顿想劝说吉法德以感到疲倦和身体不适等健康原因退休。“但是，他是一位耿直的老绅士，”蒙巴顿回忆说，“他不同意任何一种伪装的理由。”结果经白厅同意，蒙巴顿只好以命令的形式解除了吉法德的职务。

且说牟田口中将的两个师团形成了对英帕尔的南北夹击态势后，5 月上旬，牟田口决定主攻方向完全集中在第 33 师团一个方面。他从山本支队调来坦克和重炮联队，又从新编入的第 53 师团调来两个步兵大队增援，并亲临第 33 师团指挥战斗。日军在这个方向的主要对手是英印第 20 师和第 17 师。

英印第 17 师自甩开日军第 33 师团的围追堵截后，庞大的车队向着英帕尔前进。

田中信男师团长对该师迅猛追击，但是，每一次接触都被打退。英印

士兵终于在4月5日进入英帕尔，而在整个行进过程中，他们的补给品完全是由空投提供的。英印第20师也与此前后，成功地从达木和加包山谷的尽头，边战边撤到英帕尔平原，该师的两个旅驻守在帕莱尔的前面，封锁通往英帕尔的东南方进路，而第3个旅则驻在英帕尔作为预备队。

进攻刚开始，日军就派出重兵向北穿插，占领了一个坐落于伊里尔峡谷和英帕尔—科希马公路之间丛林密布的突出山头。英印第5师赶紧前来助战。一场从4月中旬延续到5月初的激烈战斗，就是在这座具有威胁性的突出阵地上进行的。最后，日军在这座可借以监视整个英帕尔平原的突出山头的南端被击退了。同时，在帕莱尔公路的入口处，英印第20师的官兵也已占了日军精锐丛林部队的上风；那儿的地势峻岭起伏，深谷交错，浓密的丛林绿荫层层覆盖。在这一片绵延25英里的崎岖地区内，只有英印第20师的两个旅兵力，所以要构成一条连续防线是不可能的。于是，英印军就在这一带构筑了一系列切断公路入口处的大小通路 and 帕莱尔公路本身的工事，同时分兵把守备制高点。在防区内，英印军不断派出战斗巡逻队拦截日军的渗透部队，因而从4月初开始，丛林中就一直未停止过肉搏战。牟田口中将在他的作战地图上把帕莱尔公路上的谢阿姆山口标为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突破口，蒙巴顿也几次电令斯利姆中将转告那里的部队，一定要死死守住。4月10日，日军集中坦克和重炮向山口发起攻击；11日，英印军被迫退守直接俯瞰着公路干线的坦努帕尔。尽管他们展开勇猛反击，将日军逐退，然而，5天以后，日军调来大量增援部队进行反扑，终于在由缺乏战斗经验的印度士兵扼守的薄弱环节上打开了缺口。

牟田口意识到这是夺取胜利的好机会，于是逐渐加强攻势。4月19日夜，山本支队的所有坦克连续3次发动猛攻，但均被粉碎。然而在22日，日军还是终于楔入英印军的阵地。5月8日，日军又多次企图扩大占领帕莱尔公路入口处周围一带的山地，但都被英印第17师的一个旅挡住。然而，牟田口却认为胜利已经在望，攻进英帕尔已在指顾之间。他又调集了一批增援部队，企图在坦努帕尔突破防线。经过一连几夜的疯狂进攻，日军取得了一些胜利，英印军的防线被迫后撤。无可否认，此时日军已接近于突破对方的防线。但是，12日在空军的配合下，英印部队在一次反击战中，又收复了大部分丢失的阵地。随后，蒙巴顿指示斯康斯军长，把第20师遭到严重减员的一些部队撤出战斗，而将该军兵员足额的第23师派去接防。危机过去了，战线又一次稳定下来。

与此同时，沿铁定公路及周围地区和锡尔恰尔—比申普尔小道一带的战斗也进入了最高潮。日军敢死队在一次夜袭中，成功地炸毁了一座山涧之上连接小道的吊桥。接着，又以一个旅团的兵力攻打比申普尔。斯康斯军长不得不把第17英印师的部分部队从英帕尔调来。4月19日，这部分增援部队在千钧一发之际及时到达，在比申普尔西北与敌展开激战，并将其阻击住。

4月末，日军该旅团又在比申普尔南面展开进攻，并在一些地段取得突破。进攻中，该旅团投入了全部兵力，动用了全部轻重武器，甚至出动一批零式战斗机轮番扫射，但是，它们很快被蒙巴顿的空军抑制住。这时，该战线还破天荒地出现了几起日本士兵过来投诚的事件。他们供认，作战顽强的日第33师团一个前锋联队的3000人中，已有2000多人伤亡。然而，也有迹象表明，具有相当规模的日军部队，正向这里赶来增援，英帕尔以南地区的局势仍不容乐观。

其实，当比申普尔的战斗趋于激化时，日军就从原来进攻科，希马的部队中调来一些强大的战斗部队。这也正中蒙巴顿的下怀他认为英帕尔战役主要不应在英帕尔打，那里的地形不利于防御者，而应把日军远远地从离英帕尔近在咫尺的比辛布尔和帕莱尔逐步向南吸引。在日军沿英帕尔公路南下途中，他们占领了设在康拉顿比的英第 14 集团军的一个补给站。日军在那里遭到了拥有坦克支援的第 17 英印师一个旅的攻击。5 月中旬，该旅开始包围康拉顿比，这时，已经由蒙巴顿从若开地区空运到英帕尔前线的第 5 英印师前来接替该旅，后者就转而投入比申普尔战斗。第 5 英印师得到第 7 英印师（该师也从若开地区空运到英帕尔前线）的增援，发起一次坚决有力的进攻，于 5 月 21 日几乎完整无损地夺回了该补给站。

雨季到来了，飘泼似的阵雨越下越猛，也越来越频繁，地面逐渐变得泥滑难行。

由于日军几乎没有空投力量，只得靠丛林中的小道进行陆路运送补给，在盟军空军掌握制空权的情况下，能从缅甸后方运到前线的物资微乎其微，日军官兵仅以在当地抢夺来的一些稻谷充饥，而在居民稀少的地区则只能靠野菜和逮住的野兽填一下肚皮。况且为避免盟军飞机轰炸扫射，在天气晴朗的时候不仅不能举炊，甚至也不敢晾晒一下衣物。看来，蒙巴顿关于雨季作战有利于盟军的观点得到了证实。蒙巴顿认为，除非日军能在最后的全面出击中大获全胜，否则，雨季的阵阵雷鸣就预告了对方的失败。在他看来，这场挫败了敌人企图的大规模消耗战，已接近尾声。在每条可能前进的道路上，日军都被挡住了。他的司令部开始制定自己的进攻计划，不但打算解除英帕尔之围，而且还准备全歼牟田口中将的日本第 15 军。

蒙巴顿受伤的眼睛直到 4 月底才有所好转。这期间，眼伤带来的疼痛和不便，并且还要时常到难于行动而又充满危险的战地四处奔波，再加上对战役结局的担心，使他看上去有些憔悴。虽然他的朋友、缅甸流亡总督多尔曼·史密斯认为蒙巴顿“仍充满了自信”，但韦维尔总督却感到，“在日本人的问题上，以及在和伦敦及美国人的交往中，蒙巴顿已经失去了昔日的那种似乎是漫不经心的自信”。诺埃尔·科沃德在英帕尔战役最激烈的时候曾和蒙巴顿在一起，他在蒙巴顿饱经日晒和充满热情的脸膛儿后面“觉察到了他眼中的一丝紧张”。

尽管从总的态势看，英印军队在英帕尔方面还处于守势，但蒙巴顿和斯利姆还是开始着手反击了。第一次主动进攻实际上是在 5 月 15 日开始的。那天，英印第 17 师的第 48 旅楔入日第 33 师团的后方，并在铁定—英帕尔公路上第 33 号里程碑处修筑起工事。日军暴跳如雷，把一切可用的部队包括后勤部队都一股又一股地投入了反扑。

4 天以后，日第 15 师团也上来一部分加入反扑，但还是被击退了。随后，英印第 48 旅向北推进到莫伊朗，他们经过激烈的战斗，在那儿设下了另一个立足点，威胁着日军第 33 师团的后路。

6 月初，日本驻缅方面军司令河边正三带病视察了帕莱尔第 33 师团阵地，听取了师团长田中信男的战况汇报，并亲自向他宣布东京大本营将他由少将晋衔为中将的提升命令。归途于 6 月 5 日在东枝会见了牟田口军司令官。河边正三认为本次战役已呈胶着状态，没有什么获胜的希望，继续拖下去只会给日军带来不利。牟田口则态度坚决地说：“英帕尔之战关系重大，决不能半途而废！方面军司令官阁下，应支持我们继续进行下去。”

河边正三，是日本陆军中军人兼政客、处事圆滑的人物。他早先是大正天皇的御前侍卫官，后来又做过昭和天皇的军事幕僚，同时也是一名颇有造诣的棋士。从内心讲，他不大看得惯那些咄咄逼人的少壮派军官，认为他们阅世浅，晋升快，并且总在露骨地觊觎更高的地位。但是，在此帝国前途不妙、人心已愈来愈涣散的时刻，又不能不依赖这批战意坚决的少壮派将领来苦撑局面，再说牟田口还是东条英机赏识的人物，他不能不考虑到这一点。于是，还是同意牟田口把英帕尔之战继续打下去。

帕莱尔在英帕尔的东南方向，是牟田口主攻部队的集结出发地域。为了再尽最后一次努力，牟田口决定变更主攻正面，向英帕尔以北迂回，企图从北面打入英帕尔。雨季已真正开始了，倾盆大雨冲刷着大地，小径车道变成了溜滑难行的泥浆带，丛林就像一座蒸汽弥漫的绿色地狱。日军穿过尸体狼藉、散发着恶臭的丛林向前推进。6月10日，日军与英印第20师在丛林里迎面相遇，随即展开了残酷的拉锯战。由于日第33团连续几个月的苦战，全部驮牛和大部驮马已经累病而死，或被当作充饥物吃掉，靠人背肩扛的弹药已经几乎用尽，官兵们在“武士道”精神的支撑下，在丛林里一面和饥饿、疾病搏斗，一面在连绵的阴雨中作决死的战斗。至22日，竟奇迹般地突破了英印军队的堵截，冲出了丛林，打到了英帕尔的边缘。日军官兵们，“遥望英帕尔市街，祈祷着作战成功”。

但是，此时的日军第33师团和配署的第15师一部，已精疲力竭如强弩之末，它们的实际战斗力与当初渡过亲敦江进入印度时相比，下降到30%以下，没有力量再进攻了，更没有击退对方的反攻之力。它们在英帕尔平原的边缘地带正面临着溃灭的危机。

这就是牟田口廉也中将勇无谋的冒险结果。如果一支军队经过一系列苦战，面临的却是上门去送死，或者溃逃，那么又何必派去呢？他低估了对手的军事和物质实力，过于相信精神的力量。这一点，他没有英国人稳健。蒙巴顿注意提高部队的士气，更注意物资、器材和技术方面的东西。而且，无论是前次若开战役，还是这次英帕尔之战，英印军的基本态势是“以守待攻”，起初虽然被动，却不失战略上的稳健之举。按照西方人的观点，战斗的胜负取决于后勤补给。此话是有道理的。

当英印士兵打仗时能得到充足的弹药、食物、甜酒甚至换洗的衬衣，而日军士兵却啃野菜、嚼稻谷；当英印第17师的一个营重新占领吐特姆以掩护师主力向英帕尔撤退，而在吐特姆遭包围时，士兵们在高地上唇干舌焦、口渴如焚，又找不到水源，蒙巴顿立即命令空军不惜一切代价去空投贮水袋，士兵们感到上级是惦念他们的，从而顽强地坚守在那里。忍饥挨饿的日本下层官兵得不到自己上级的关怀，牟田口也没有办法解决部队的给养供应，仅靠执行纪律和精神力量来支撑起来的士气，是维持不了多久的。他的第31师团在科希马前线，果然出了问题，此处暂且不表。

单说日军抵进到英帕尔平原的边缘地带，英军早已有所准备。此前，那里所有的后勤部队和皇家空军地勤人员都接到蒙巴顿司令部的通知，要仿照若开战役中的后勤掩蔽所的模式，由驻英帕尔平原内的各单位，分别用坦克和铁丝网建成起一处处环形工事，等待日军来自投火网。不过，已经被打得残缺不全的日军第33师团确实再也无力进攻了，田中信男中将默默地等待着牟田口军司令官撤退的决断。而蒙巴顿和斯利姆中将，也忙于调兵遣将，在严阵以待的同时，部署着展开反击的方案。

英帕尔正面的战事，暂时平息了下来。

通常所说的英帕尔战役，除围绕英帕尔一地进行的一系列战斗外，还包括在英帕尔以北的科希马和乌科鲁尔地区英日双方展开的激烈战斗。那里的攻防战是整个英帕尔战役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且是与英帕尔方面的战火几乎同时点燃的，欲知详细情况，且看下章分说。

第十六章 浴血科希马

战略要地敌我争，科城守军苦支撑；

飞调劲旅来增援，日军战线遭溃崩。

话说东印度那加兰邦首府科希马，位于英帕尔以北 50 英里，是一座海拔 5000 英尺地势险要的高原小城。该城是块避暑胜地，当时城内居民不过万人。乌科鲁尔在它的东南面，是科希马通往印缅边境道路的必经之路。

由于盟军在东印度的阿萨姆邦建立了空运和反攻基地，而阿萨姆邦好像一座楔入缅甸北部的狭长半岛，日军要摧毁这个基地，就要越过屏护阿萨姆半岛的两道门户——英帕尔和科希马。所以牟田口中将在进攻英帕尔的同时，即以其第 31 师团为主力并配署第 15 师团部分兵力，直扑科希马。

3 月 8 日，佐藤幸德中将率领第 31 师团乘木筏和小船陆续渡过亲敦江。在唐都和霍马林一带，他们稍事停留休整后，即分成 3 个纵队向科希马挺进，其中，走在最前面的一个纵队是由宫崎繁三郎少将所辖的旅团。英国人承认：“这些亚细亚式纳粹冲锋队员，作为徒步行走的步兵来说，也许可算是世界上最顽强的了。他们在丛林中行军一天所经过的路程，相当惊人；他们在科希马周围出现的时间，比原先预计的要早。”宫崎少将率领的先头部队与第 15 师团的一部相配合，先是击溃了守卫山夹库地区的一个英印旅，然后向科希马逼进。另外两个纵队则由佐藤师团长亲自率领，从霍马林出发，进攻乌科鲁尔，夺取这个通往科希马的交通要道。

斯利姆中将原认为，科希马四周山岭陡峭，丛林浓密，日军所能派去的兵力至多不会超过一个配备轻武器的步兵联队。但是，情况却愈来愈明显：日军向那里的进攻是整整一个师团的兵力。而科希马城的守军只有一个 500 来人的西肯特步枪营！

在科希马以西 30 英里的迪马普尔军用物资中转站则仅有一个连在守卫。斯利姆将这一危急情况报告给蒙巴顿，蒙巴顿立即从第 5 和第 7 英印师中抽调部队前去增援，并令其直辖的第 3 特种突击旅作好空运准备。另外，他命令此时尚驻在印度境内的“钦迪”第 23 远程突破旅前去掩护利多，令英第 2 师从印度内地赶来。然而，在这些部队尚未全部到达以前，战斗已经打响了。

科希马之战，首先是由驻扎在该城东面约 30 英里的阿萨姆团和阿萨姆武装警察打响的。这些由英国军官指挥的阿萨姆士兵，乃是首次参加战斗。但是，他们为保卫自己的家乡而战，表现得异常勇敢。这些阿萨姆士兵以伤亡惨重的代价，阻滞了精锐的日军第 31 师团的进攻，从而赢得了十分宝贵的时间。同时，他们在退至科希马时，又承担了抢筑防御工事的重任。在连

绵不断的山丘上，阿萨姆士兵沿着一条长 1 英里的山脊构筑起防御阵地，把这个山中避暑胜地改造成一个坚固的堡垒。

负责科希马城防务的是 H·U·理查兹上校。他命令城内所有能参加战斗的人都必须拿起枪，文书、给养员、在医院里的轻伤员统统被组织起来。当日军第 31 师团的近 2 万官兵气喘吁吁地爬上布拉马普特山顶，逼近科希马城时，第 5 英印师的第 161 旅已经空运来到，并驻守在迪马普尔前面 8 英里的尼丘加德山口。显然，蒙巴顿觉得保卫那个军用物资中转站更重要。他估计，敌人如果占领了科希马，会很快向迪马普尔发动进攻。但是，正如斯利姆后来说的：“佐藤毫无例外地是我所遇到的日军将领中最无见识的一个。他奉命攻占科希马，并在那里构筑工事固守。他那傻瓜头脑中只有一个目标——打下科希马。”实际上，他此时本可以毫不费力地分出一部分兵力攻击科希马，而同时用师团的主力去进攻防御能力尚不强大的迪马普尔，获取了那里堆积如山的各种物资，他拿下并坚守科希马才会有保证。佐藤的第 31 团最后之所以从科希马前线撤走，缺粮少弹是其中的主要原因之一。

4 月 4 日，蒙巴顿命蒙蒂·斯托普福德少将接管科希马防守的指挥权。此时，佐藤已摆开了进攻的架势。当天，日军跃出丛林，发起冲锋。虽然英军前哨部队奋勇还击，但是某些阵地还是落入敌手。日军已经取得了进攻这个坚固堡垒的立足点。

然而，在他们还未来得及发起主攻时，斯托普福德已命令英第 161 旅的一个先锋营开进科希马。几个小时后，一连拉杰普特兵借暮色的掩护来到科希马。其中，一个排回来时还护送着 200 名能行走的伤兵和非战斗人员。他们刚从敌人身旁悄悄走过，日军就完全包围了科希马，并切断了科希马—英帕尔公路。当时科希马守军总共已有 3500 人。第 161 旅的大部分部队被阻，无法打进去。

幸运的是，蒙巴顿派来的空军掌握着那里的制空权。在整个白天里，英国战斗机和战斗轰炸机怒吼着俯冲下来，几乎贴着丛林树顶对日军轰炸扫射，从而加强了防守部队的火力。同时，英国运输机还给守军空投弹药、药品、食物和饮水。这样，佐藤中将无论如何大发雷霆，他的部队仍然无法击溃守军，完成对科希马的占领。

不久，佐藤停止采用在白天出动步兵轮番冲锋的办法。日军的伤亡如此惨重，以致他不得不在夜间才派士兵出击，可是一到天亮，在英军的炮轰和空袭下，夜间战斗的成果又化为乌有了。

防守部队的伤亡也与日俱增。他们在这个战场上丝毫不敢懈怠松劲。枪炮的喧嚣声和飞机的轰鸣声不绝于耳，使得他们日夜难眠，越来越感到疲惫困顿。他们且战且退，到 4 月 6 日退入要塞山上的主要阵地。日军已经截断了守军唯一的水源，所以他们只能完全依靠空军低空投下的那些装满饮水的车轮内胎了。起初，他们守卫着一块大约有 1 平方公里的地域，但是，他们现在拼死坚守的阵地，只有原来的一半左右。在他们周围各处，在下面的山坡上、在丛林围绕的山谷里，都躺满了一排排日本兵的尸体。从某些方面来说，指挥第 31 师团的佐藤中将是个典型的武士道军人——刚毅勇猛，冷酷无情。他的最明显的特点是硬拼蛮干。在称得上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几条羊肠小道上，佐藤不惜士兵的生命，把他手下的人马一批又一批地驱赶往上冲。

守军被迫一步步向后退，阵地一寸寸向内收缩。于是，就在加里松山

中央那座被称为“避暑别墅山”的小山头上，展开了一场白刃战。现在，日军已经近在眼前，就在科希马地区助理专员优美的花园和网球场上，双方混战一团。日军为了争夺每一码土地，都不得不付出伤亡几十人的代价，最后终于在这两处地方取得了立足点。

但守军也并未撤离，日军士兵挖掘的散兵坑，最近的与守军的战壕相距不过二三百米。而佐藤却发电给牟田口军司令官称：“我部已经完全占领了科希马。”

4月8日，蒙巴顿命令向科希马紧急空投两营伞兵。但不少士兵却不幸降落在日军阵地上，成了俘虏。双方的阵地，确是太近了。10日，蒙巴顿指示已陆续抵达科希马附近的第2师和第7师部队，集结于迪马普尔，然后向科希马守军靠拢。15日，英第2师的一个旅粉碎了敌人的顽强抵抗，打上公路，突破包围圈，与第161旅会合。

随后，第2师的另一个旅在坦克、大炮和飞机的支援下，沿公路发动强大攻势，猛扑主要制高山脊。4月18日，英军突破了日军的战线：一个旁遮普营设法穿过一个溪谷，与科希马的守军会合了。第二天，大量的食品、饮水和药品也送来了。4月20日，英第2师的主力部队终于打到了硝烟弥漫、弹坑累累的山顶上，解救了科希马守卫部队。

包围虽已解除，但要彻底击败日第31师团也确非易事。日军仍盘踞在科希马城外一条长达6公里的丛林密布的制高山脊上，扼守着构筑得很深的暗堡阵地。这是一座林中要塞，两边的绿色峭壁上，长满了密密层层的树木和杂草，根本无法攀爬。

第2师的官兵多数时间驻在中东和印度内地等处，还不习惯在丛林中作战，蒙巴顿此时的预备部队不多，也只好派他们前来参战。尽管该师向敌阵地发起一次果敢的进攻，但并不能迫使敌人后退一步。而只要日军第31师守在这个阵地上，迪马普尔—英帕尔交通线就始终要受到威胁，并影响英军在英帕尔方向的防御。蒙巴顿深知这一点。于是，他一面继续向迪马普尔空运部队，一面派“钦迪”旅去占领东南面的杰萨米，以堵击来自亲敦江的日军援兵，并切断佐藤部队补给物资的供应线。

英第2师当前的任务有两项：既要竭尽全力把日第31师团赶下那道山脊，又要协助科希马守军击退敌人对已化为一片焦土的要塞山发动的疯狂反扑。他们和日军杀得难解难分，但直到4月30日，也没有夺下对方的那道山脊阵地。进攻被迫停止了下來，第2师重新整顿队伍，以作最后的突击。5月3日，该师在炮兵和坦克的火力掩护下，发起了一次全面进攻。

这次进攻由斯托普福德少将亲自指挥。战斗打响后，英军向日军的地堡和炮兵掩体发动猛攻，猛烈的炮火使科希马周围丛林密布、水汽熏蒸的群山石崩地裂。然而，当英国步兵喘着粗气好不容易爬上山顶时，却到处都遭到设在那里的日军几十个隐蔽阵地内交叉火力的无情扫射。英国士兵一批批躺在血泊里。直到当日黄昏，继续涌上来的英军才占领了一个制高山脊的一部分，并且紧紧咬住日军不放。5月7日，斯托普福德经斯利姆和蒙巴顿批准，把第7英印师的第33旅也投入战斗，进攻一个叫做贾伊尔山的地堡密布的高地。但当日的进攻除扔下几百具英印士兵的尸体外，毫无结果。3天之后，第33旅再次对贾伊尔山发起猛攻；同时，英第2师也对纵向的山岭展开进攻。英军在付出相当大的代价之后，终于占领了贾伊尔山上的大部分日军阵地。次日，增援部队也爬上山去，并开始清除日军的布雷区和开辟道

路，使坦克开了上去，从而直接加强了英军的火力。

5月13日，在贾伊尔山上残余的日军阵地也被英印士兵占领。不久，科希马城内的一些日军据点，在英军里应外合的攻击下纷纷遭到摧毁。许多盘踞在地堡深处不肯投降的日军官兵，被英军坦克的平射炮或绑在竹杆头上的高爆炸药所消灭；还有一些日本兵从掩体冲出来与英军拼命，结果也死在枪口和刺刀之下。

科希马初战告捷的消息，使蒙巴顿非常欣喜。5月15日，他致电斯托普福德，对他的胜利表示祝贺，同时告诫他：“日本第31师团并未被完全击溃，虽然他们的士气已开始崩溃，但仍在那一带坚持着，我们的部队不可有丝毫的懈怠。”

的确，科希马方面的战事已发展到这样的局面：日军在科希马外围制高山脊上长达6公里的阵地，相当一部分还在日军的手里；有些地段虽已被英军围住，但他们仍在几乎是难以攻破的山间暗堡里负隅顽抗。对攻击者来说，在绵绵阴雨的冲刷下，那些一般高达3000多英尺、四周丛林密布的险峻的群山变得泥泞溜滑，几乎无法攀爬。这是令英军各级指挥官都感到头疼的事情。然而，又是那个长着“傻瓜头脑”的佐藤中将。帮助英国人解决了这个难题。

佐藤幸德见英军取得了初步进展，天气也越来越恶劣，连日阴雨连绵，便向军司令官提出了放弃科希马阵地、向能得到补给的地点后撤的报告。

芒累，日第15军战斗指挥所内。牟田口接到这个报告大为震惊，此人虽在战略全局上考虑不周，但在战役问题上还是颇有一套。他立即电告佐藤，指出：“当今正值‘乌’号作战成败的关头，实属全军危急存亡之秋，坚决要求无论如何必须固守科希马战线。因为第31师团一旦后撤，开放了科希马至英帕尔的道路，必将造成全军崩溃。这一点已是洞若观火。”

然而，佐藤并没有接受牟田口的要求。他的后勤补给线被蒙巴顿的空军及地面渗透部队一点点地掐住，雨季也使仅有的一二条丛林小道变得更加泥泞难行。补给上不来，士兵们半饥半饱怨声一片。于是，他将牟田口的电报扔在一边，下令全师团作放弃阵地撤退的准备。6月初，佐藤亲自率领师团主力，带着1500名伤病员开始退却，只留下宫崎繁三郎带一支小部队执行截断英帕尔至科希马道路的任务。面对师团主力尚难抵御英军的压力，留下这点兵力来执行这样艰巨的任务，无非是应付一下牟田口而已。

而且，佐藤撤出科希马战线的行动，对于一直在英帕尔以北至科希马以南地区，同第31师背靠背进行作战的第15师团一点也未通报，使这个师团一下子陷入被英军南北合围的危险境地。此时，该师团的山内正文师团长正发疟疾卧病在床，代行他指挥的师团参谋长是个新手，在官兵中威信不足、指挥不力，友邻部队的撤离更使这个师团雪上加霜。

牟田口得知第31师团擅自撤出科希马战线的消息后，急派军参谋长久野村赶去制止。久野村在伏米内迎面碰上了退却途中的佐藤，指责他擅自撤退违犯军令，同时向他传达军部的新指令：“和第15师团的南翼接上，转而加入进攻英帕尔的战线。”

佐藤脖子一梗：“我师团在毫无希望得到补给的目前情况下，难以执行军部的指令。”说罢，甩开久野村，率领他的人马继续后撤。

久野村回到芒累向牟田口报告，牟田口怒不可遏，当即决定撤销佐藤的职务，由河内槌太郎接任师团长。并决定由柴田卯一接替卧病不能视事的

山内正文，任第 15 师团的师团长。对此，服部卓四郎在其《大东亚战争全史》里写道：“前此，第 33 师团长柳田中将已被罢免，现在又换了两位师团长。在大战过程中更换全部师团长，这种不祥事件，在具有光荣传统的日本陆军史上向无此例。牟田口中将自责统帅不当，也向河边方面军司令官提出了请予处分的报告。”那位两次不听命令擅自撤退的佐藤幸德中将，不久被押回东京接受军法审判，1944 年 9 月被判处死刑。此是后话，不再细表。

且说蒙巴顿接到科希马战线的日军有撤退迹象的报告后，他的目光便盯上了乌科鲁尔。这里是日第 31 师团撤回缅甸的必经之地，现在由日第 15 师团的部分部队负责把守，拿下了乌科鲁尔，就会卡住这股日军的退路，进而全歼它们。蒙巴顿命英第 2 师和第 7 英印师陆续向马奥集中，然后夺取乌科鲁尔。

乌科鲁尔现在是科希马之战中，英军大规模强攻的焦点。此处与科希马和英帕尔距离几乎相等，原是日军发动英帕尔整个战役的一个兵力集结地。蒙巴顿一声令下，由科希马蜂拥而下的英军部队，与从英帕尔向前突进的强大部队同时出发，并在预定时刻与其会师。6 月 22 日，两支队伍好比钢钳的两只钳牙，在科希马公路的 109 里程碑处将日军钳住。被钳的是日第 15 师团和在乌科鲁尔的印度傀儡军的一个旅，好几支日军纵队正沿着各条通道，向亲敦江逃窜；日第 31 师团的那些忍饥挨饿、疾病缠身的官兵，也从北面沿着通向乌科鲁尔的吉普小路退下来。第 7 英印师的先头旅迅速向乌科鲁尔逼近，他们绕过敌人，从西南面发起攻击；师主力第 33 旅则奇迹般地穿过云层包围的马奥—松桑山峰，从北面发起攻击。

乌科鲁尔这场堵截仗结束后，直接指挥战斗的第 33 方旅旅长刘易斯·皮尤上校回忆当时日军情形说：

我旅置身于那些随带着大量伤病员撤退的日军守备部队及其最近的目的地——马科鲁尔之间。敌军已不存有任何希望，他们得不到食物，得不到药品，什么也得不到了。他们衰弱不堪，再也无力挣扎向前，他们的嘴里塞满了野草，想以此来维持其奄奄一息的生命……他们成百上千地死去。我旅及所属炮兵穿过甘吉恩—洛克峡谷，沿着乌科鲁尔山脊小心翼翼地向前推进。这里，我们见到了一支日军遭到毁灭的景象：路上堆满了日本兵和动物的尸体，武器装备狼藉四散，地面都是飞机袭击时所留下的弹孔、弹坑。我旅穿过或绕过了那些被丢弃的、由枝叶覆盖的茅屋营房，隐蔽的碉堡据点和供几千人用的生活设施。到处都是未加掩埋的尸体，有许多甚至都没移动过；有些比较肥胖而样子还不难看，另一些则肮脏憔悴，瘦骨嶙峋。军队的克星——疟疾和伤寒，蔓延猖獗，发挥了最大的破坏作用。由于对后勤供应需要的估计不足，由于对英军部队战斗素质的估价过低，这就导致了他们的毁灭。

我还见到了一些日军俘虏，他们都已病得脚步难移，肮脏得如同行尸走肉一般；他们已经神智不清，或是满口呓语，或是哭泣流泪，或是畏缩不前。由于肉体经受过难以形容的困苦，他们头脑中的最后抵抗意志已被粉碎了。从排列在路边的丛林营房里，从日军住过的峡谷和山谷里，不断散发出

尸体腐烂的恶臭。卡车和汽车毁弃在路旁或翻倒在半山腰，司机就死在车轮下或僵卧在路旁的烂泥地里。

在路上深可陷足的泥浆里，漂浮着日本兵和动物的尸体。

四下里零乱丢散的装备，正是不体面的溃败的见证。有一门野战炮埋在泥地里，一辆坦克陷入泥潭，乘员都死在里面。到处都可看到大量的炮弹、地雷、轻武器以及照例必有的防毒面具。那些当初想成为印度征服者的士兵，现在从炮火下得以逃生，带着一身的疾病，正沿着无数条丛林小道，痛苦地向南挣扎行进……

乌科鲁尔被英军占领和第 31 师团遭截击，促使牟田口终于下了决心：停止“乌”号作战。6 月 25 日，牟田口羞羞答答地向方面军司令官河边正三试探：“在万一停止进攻转入防御时，根据我军现状，认为退到从印缅国境线上的亲敦江西岸高地经莫莱西北高地至铁定一线，较为合适。”

河边正三早就不想同意牟田口执意要发动的“乌”号作战，认为它太冒险，再说驻缅方面军的主要任务是看守好缅甸，没有多余的力量打入印度境内。现在牟田口打不下去了，他要趁机教训一下这个骄狂的少壮派将领。对牟田口的试探，他佯装不解，复电称：“当目前南方军总司令尚无任何命令时，你军提出如此消极意见，实感意外，仍应一心为完成我军任务向前迈进。”

接到河边正三的答复，牟田口有苦难言，谁让他当初那么狂妄呢？在发动这次战役时，他以为能很快占领英帕尔和科希马，然后控制整个东印度地区，击败蒙巴顿那支种族混杂的军队。他甚至梦想，自己的 10 万大军会像下山的猛虎一般直扑绿色的恒河大平原，占领孟买，占领德里，还有加尔各答。那时候，他将带着天皇赐予的巨大荣誉走进德里，走进蒙巴顿的司令部，从此统治这片 10 倍于日本的南亚殖民地。现在，他的壮志宏图成了泡影。“让河边正三那个老滑头看自己的笑话了。”牟田口心里悻悻地想。

其实，河边正三并不想跟他一般见识，回电讥讽了几句之后，河边还是以方面军的名义，向此时已迁到马尼拉的日本南方军总司令部和东京大本营提出了请求停止“乌”号作战的报告。因为帝国的利益总是高于一切的，再说第 15 军是方面军的主力部队，另外的第 28 和第 33 两个军是才组建的，河边正三焉能不心疼这块方面军的心头肉？

南方军总司令官寺内寿一大将接到河边正三的报告，随即与东京联系，大本营经几次磋商后同意他们的请求。7 月 2 日午夜，寺内大将即以威作命甲第 101 号发布了停止“乌”号作战的命令，由驻缅方面军向第 15 军进行传达。

第 15 军各师团残部开始全线撤退了。日方记载称：

这次退却作战是日军战争史上未曾有过的艰苦战斗。各师团既处于艰苦环境中，而将士还由于长期苦战和补给断绝，早已疲惫不堪；众多的伤病员即使用全部兵力也不能抬着护送，而且处在第一线上的人员也大都患有疟疾、痢疾和脚气等病，医药卫生用品的补给，却毫无准备。……由于道路泥泞崩坍，车辆完全不能行动。而且时值雨季顶峰，横在我军退路上的蒙尼普尔河、雅纳河、尼瓦河、亲敦江等几条大河自不待说，所有河床干道也都泛滥，洪水奔流。至于我军渡

河器材、设备，则寥寥无几，无济于事。……有些部队令伤病员徒步先行，行动困难的大部分选择了自杀的办法。徒步的病人，在沿途的密林中力尽而倒下的、被浊流吞没下落不明的不计其数，真是兄哭嗷嗷，凄惨万状。

盟军的情报人员获悉了日本南方军总司令部下达的全线撤退命令，报告给战区总部，蒙巴顿立即指示斯利姆的第 14 集团军 7 个师开始全面追击作战。按牟田口的部署，日军的总退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向亲敦江退却，第二阶段向明京山脉退却。要求各师团残部应在 7 月底之前，撤至并占据亲敦江西岸及加包山谷的耶沙皎一线，然后进行第二阶段退却，渡过亲敦江，退到明京山脉，进入新的防御阵地。

蒙巴顿看出对方的打算，遂令斯利姆派部队抢占亲敦江上的各个渡口，并让进攻加包山谷的第 81 师抢先绕过日第 33 师团残部背后联络线上的吉灵庙和加里瓦。在困兽犹斗的日军官兵的拼命抵抗下，英军没有能抢先占领亲敦江各渡口，但仍使牟田口的第一阶段退却目标迟滞到 8 月中旬。

8 月 20 日，日军转入第二阶段退却，主要目标是渡过亲敦江。此时的亲敦江因暴雨和山洪，江面宽度已增加到 1500 米以上，而且各渡河点均暴露在英军火炮和飞机扫射轰炸之下。日方材料称：“当时我军有 5000 多名重伤病员猬集呻吟在各渡河点，8 月 25 日，我军就在这种情况下开始渡河退却。经过第 31、第 15 师团后卫部队拼死战斗，和渡河战斗队的奋斗，终于在 8 月 30 日夜半，使最后一兵渡至亲敦江东岸。9 月下旬，第 15 师团余部向明京山脉、第 31 师团余部向实皆及曼德勒退却，军纪和士气陷入了最坏状态，并由于丧失了通讯器材，军司令部与师团司令部的联系不时断绝。

第 33 师团抗击腹背之敌，依然保持严格的军纪和高昂的士气，携带所有武器向钦高地的山脉地区退却。敌军一部出乎意料地继续向亲敦江东岸渗透，第 33 师团早已损失惨重，此时更有被孤立于钦高地的危险。然而军部无法援救他们，只好信凭该师团的勇敢奋斗精神，期待他们靠自力突破敌人包围，向后撤退。”

不过，斯利姆中将的第 14 集团军各主力师虽然跟踪追击打到了亲敦江西岸，却也没有能渡到对岸全歼日本第 15 军。英国战史专家利德尔·哈特认为：“其进展之所以被耽搁，与其说是受到日军的顽强抵抗（日军现在只剩下一支疲乏、饥饿的残部），还不如说是由于雨季洪水的缘故。”因为英军的车辆多、装备重，不管怎么说，他们也不如日本士兵能吃苦耐劳。

牟田口的损失是惨重的。日方自己承认：“当时军部已无法掌握各师团、各部队战斗力的情况。大致的估计是，最初越过亲敦江参加英帕尔战役的约 10 万人中，约损失了 3 万名，另有 2 万伤病员任其自流地撤到更远的后方，剩下的兵员还有约 5 万名。而这 5 万人当中有一半以上是病人。第 15 军的武器损失更为惨重。以第 15 师团为例，一个步兵大队剩下的武器只有一挺重机枪、两挺轻机枪和两个掷弹筒，仅及一个小队的装备。据报告，有的师团的步枪总数只有 600 支左右。”无怪蒙巴顿后来洋洋得意地对妻子说：“这是迄今为止日本人在东南亚遭受的一次最大的军事失利，因为被消灭的人数比太平洋岛屿的任何一次作战都多。”

东京不会饶恕战败的将军。整个英帕尔战役失败后不久，1944 年 9 月到 10 月之间，大本营撤掉了牟田口的第 15 军司令官职务，并更换了该军参谋长和全部主要幕僚，改由片村四八中将任军司令官，吉田权八少将任军参

谋长。河边正三也跟着牟田口承担了失败的责任，被免去了驻缅方面军司令官职务，由木村兵太郎中将接任。接着，日本南方军总司令部在自己的任免权限内，还将第 15 军各师团的参谋长也全部更换了，“以图全面刷新、重建全军”。

英国舆论界普遍认为，英帕尔战役的胜利，称得上是蒙巴顿“个人的胜利”。

因为他一开始就对这次战役抱有必胜的信心，并且顶住了伦敦某些人的压力，坚持把战役打下去。据那位缅甸的流亡总督多尔曼—史密斯回忆，在日军刚刚发起大规模进攻时，他有一次聆听了蒙巴顿在高级军官会议上的讲话，“蒙巴顿绝对充满自信地指出，日本人推进多远都没有关系，他们最后将被歼灭掉。”蒙巴顿的理论是：“让日本人自己去消耗，然后，在雨季切断他们的补给路线时，再一举歼灭之。”战役过程中，白厅没有给蒙巴顿多少帮助，有时甚至压他停下来。当 5 月份英印军队基本上顶住了日军的进攻，初战告捷后，蒙巴顿曾打电报给参谋长委员会，要求得到“明确的最新指示”。布鲁克看法早就是明确的。他认为，这次战役是劳民伤财，现在应当对蒙巴顿的职权作出规定，以便“如果可能的话结束我们在那一地区不断增长的义务所带来的压力”，即不主张蒙巴顿动用更多的师进行全面反击。蒙巴顿立即派参谋长波纳尔返回伦敦，向白厅的官员们，“令人振奋地描述了英帕尔战场的情况：日军将被歼灭，我方部队的士气非常高涨，经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他们现在认为和日本人作战是射击游戏的一种极好形式”。这番夸大其辞然而奏效的描述，才使布鲁克等人同意蒙巴顿全面反击的计划。当然，“假如布鲁克当时能够想象得出这次胜利的规模，也许他就不会那样冷淡了。”尤其欣慰的是，丘吉尔首相在整个战役中赞同和支持蒙巴顿的主张，使他能够打下去。

在英帕尔战役的同时，史迪威指挥中国军队约 3 个师的兵力在缅北发动了密支那战役。史迪威事先没有把自己的作战计划通报给蒙巴顿，因而蒙巴顿也基本上没有过问密支那战役的事情。不过，蒙巴顿对史迪威不把自己的计划向他报告感到恼火，但却并没有像史迪威本来想象的那样有受侮辱感和勃然大怒。他对别人只是这样平淡地说：“占领密支那机场真是一条好消息，对吗？那是我最感兴趣的战线之一，是由我的副手史迪威将军指挥的。”

日本第 15 军虽然未遭到全军覆灭的下场，但它的战斗力几乎完全丧失，这就造成了日军在缅甸已陷入整体上的防御阶段，无力再发动大规模的主动进攻性军事行动。然而，蒙巴顿明白，要彻底击败他的对手——整个日本驻缅方面军绝非易事。

特别是他在英帕尔战役后期亲临一线视察时，深刻感到了被武士道精神武装起来的大多数日本军人的顽强：“毫无疑问，日本士兵还是像以往那样刚毅顽强，英国人虽然打死了成千上万名日本兵，但是统共只抓住了 600 多名俘虏，其中大部分人还是由于身负重伤或是被营养不良和疾病折磨得气息奄奄，才无力自戕，当了俘虏。日本兵宁可用双手结果自己的性命也不愿投降，第 14 集团军穿过淅沥滴水的丛林追赶敌军时，一次又一次深切地感受到了这一点。在触目惊心的战地医院里，他们看到过一行行排列整齐、躺在担架上的日军尸体；每个死者的头颅上都有一个子弹穿过的弹孔。从他们从容的姿态可以看出，他们宁可死于同伴之手，也不愿被生擒活捉。

在丛林深处，行进的尖兵部队曾碰到整车整车肃然僵坐的日本兵尸体，

他们都是被一名军官从后脑射杀的，而那个军官自杀后就扑倒在他们旁边。”况且，日本的后备役兵员补充制度相当完善，他们在前线的某个师团只要未遭全歼而被撤销了建制，该师团在国内的留守处，往往能很快在指定地区征集预备役人员运来填补缺额，尽管日本的人力资源这时已不敷使用，征集到合格的兵员越来越困难了。

“战胜这些狂热的武士，夺取缅甸的内地，绝非指顾之间所能完成，必须有完整的计划和充足的部队和资源。”战役接近尾声时，蒙巴顿带着这样的想法前往锡兰（今斯里兰卡）的康提总司令部，谋划下一期作战计划。

蒙巴顿的总部不是设在印度的德里吗？何时又迁到锡兰去了呢？欲知事情的原委和蒙巴顿在那儿的情形，且看下章叙说。

第十七章 运筹反攻

总部迁往宁静地，风景小城筹战计；
多方掣肘心苦闷，顾全大局舍两栖。

康提，在僧伽罗语中是“山”的意思，它位于锡兰的中部，在马哈韦利河支流安班河的上游河畔，是当时锡兰的第二大城市。不过，那里的居民并不多，仅有五六万人。它在锡兰的康提王朝时期，曾是抗击葡、荷、英殖民者的英雄城市，被称为“马哈隆瓦尔”，意即“伟大的城市”。

实际上，蒙巴顿司令部的大部人员在英帕尔战役开始后不久，就已经陆续迁到了这里。美英首脑在决定建立东南亚战区总部时，英国参谋长委员会曾建议这个总部不应设在印度，最好是设在锡兰。美国人无所谓，因为它实际上是英国人的。只是丘吉尔首相坚持应把战区总部设在印度，认为即使不把总部设在德里，至少也应把它设在加尔各答，理由是锡兰离战场太远了。其实，丘吉尔的真正想法主要还是从政治方面考虑的。当时印度民族主义运动仍很活跃，国大党等各主要政治力量不情愿、有的还公开号召印度人民不参加“英国的战争”，日本也图谋扶植傀儡政权，煽动印度人“进行反对英国的独立战争”，以达到它自己取而代之的梦想。丘吉尔坚持把战区总部设在印度，目的是借这个机构所形成的威慑作用，镇住当地的反英情绪，并把印度牢牢地控制在自己的阵营内。因为作战部队的最高指挥部就设置于印度，它还能摆脱这场战争吗？

这就是丘吉尔的政治算盘。胳膊拧不过大腿，参谋长委员会的将军们只好同意首相的意见，将东南亚战区总部设在德里。到了1944年初，情况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印度的局势经蒙巴顿等人的努力已经缓和起来，同时，蒙巴顿本人也不想呆在德里，丘吉尔终于同意东南亚战区总部可以迁往锡兰。

蒙巴顿对德里的印象一直不佳。1944年4月13日，他从英帕尔前线临时返回总部，见到德里的人们一副懒洋洋的样子，气愤地说：“为什么在德里总是有一种消极的气氛，而在前线每个人都充满了勇敢和进取精神？”他不由得又想起上任前摩根爵士的告诫，应当尽一切可能避开德里。参谋人员已经选择了康提作为总部机关的新址，4月15日，蒙巴顿下令开始搬迁，

至5月中旬，总部各部门及其大部分人员都在康提安顿了下来。而蒙巴顿则带领几名得力的作战参谋前往卡拉米，继续指挥英帕尔战役。

康提是东南亚著名的旅游城市，周围群山环抱，气候宜人，植物茂密，风光绮丽。刚打完一次大胜仗的蒙巴顿，抵达这里便感到一切都是那样地舒心，该好好享受一下了。他把康提王朝古老而豪华气派的王宫辟为自己的官邸，在著名的贝拉德尼亚植物园中盖起了一座漂亮的办公楼和宿舍，让总部众多的男女工作人员搬了进去。“康提也许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地方，也是一个良好的工作地点。”蒙巴顿满意地写道。

出身于贵族的蒙巴顿，是好讲排场和享受的，尽管在条件不允许的情况下，他也能跟下级一起去吃苦。可是，在眼前的情况下，新的总部很快就成了奢华的代名词。拉尔夫·阿诺德发现，总部的工作人员们看上去都“很有排场、时髦而且富有”，“数量众多的漂亮汽车”使他感到惊异，“我感到康提的气氛对我来说显得太豪华了”。总部机关所在的植物园内，栽培着各种热带和亚热带植物，花团锦簇，争奇斗妍；饭厅很舒适、雅致，饭菜也不错。但一切都没有什么特别之处，相同级别的麦克阿瑟战区总部的物质供应，比蒙巴顿这里更丰富，然而却学不来英国人的贵族式风格。

人们对康提新总部的另一项指责是说它人浮于事。蒙巴顿最初计划总部的全部编制为4100人，但不久便迅速膨胀了。锡兰驻军司令莱顿将军写道，“人们确实怀疑，一位司令官是否应当用7000人来制订和监督连规模都还没有确定的作战计划”。

总部人数最多时，曾突破了万人。在人力严重缺乏的情况下，伦敦方面也对这种过分的铺张感到十分不悦。

新总部在支出方面也不节省。蒙巴顿在距离康提30公里的山上修建了一座简易机场，花了将近50万英镑，然而却几乎没有使用过。他还在科伦坡定做一辆镶着金箔的豪华马车，在总部编制里保留着一支由30名乐师组成的乐队，这一切都表明了他骨子里的贵族习性。“康提的新司令部即使只有较少的人力财力，也能发挥同样的作用。除了蒙巴顿的最热心的崇拜者之外是没有人否认这一点的。”伦敦舆论是如此认为的。

不过，有些事情做得是必要的。如他在康提设立了一座“东南亚盟军司令部广播电台”，让英国报界转载该台新闻，使各界公众“不能遗忘在远东一个角落里作战的英国士兵”；专辟日语节目，以瓦解日军的士气；并创办了《东南亚盟军司令部》报纸和《凤凰》画报，宣传自己的主张、鼓舞部队的士气。尤其是战区总部从南亚次大陆迁到锡兰一事的本身，才使它名实相符，东南亚的色彩越来越浓了，同时也表明了蒙巴顿对海洋战略的重视。

蒙巴顿从不介意别人的说三道四，此时，他正在设想新的缅甸作战计划。他曾于7月份提出过两份计划：一个是“卡皮特尔”计划，即命令第14集团军渡过亲敦江向曼德勒推进，然后再向南进攻仰光；这是个陆地进攻计划。另一个是“德拉卡拉”计划，即在1945年初对仰光直接发动两栖登陆进攻。他这两个方案最初是作为两种选择提出的，如果“德拉卡拉”计划得到通过，斯利姆的第14集团军可暂时按兵不动。蒙巴顿真正愿意干的，就是这个两栖联合作战计划，他从来没忘记自己是以海军将领的身分担任战区总司令的，总要给海军找点儿事干。斯利姆不甘心被抛在一边，对此提出反对。最后一致同意，陆地进攻无论如何也要进行，至少要推进到缅甸中部地区的曼德勒。为了争取参谋长委员会同意“德拉卡拉”计划，蒙巴顿亲自出

了趟差飞往伦敦游说。

伦敦出现了好兆头。布鲁克不大情愿地同意，应该在缅甸采取某些行动，并且认为在各种不同的可能性当中，“德拉卡拉”计划似乎是最可取的。坎宁安是唯一不同意的人，他认为预定进攻仰光的两栖部队“太单薄”，“沿海发动进攻的建议是“如意算盘”。蒙巴顿不无道理地反驳说，他以前任何一次要求都被指责为过分铺张，这一次他决心依靠自己的力量。问题在于，他虽然有地面部队和飞机，但缺少登陆艇和其他装备以用于扩大战果。8月8日，军方在伦敦举行了一次关键性的辩论。蒙巴顿需要来自两方面的支持，一方面是希望进攻苏门答腊的丘吉尔，一方面是希望太平洋地区战略能够得到重视的参谋长委员会。然而两者都是不那么可靠的，对“德拉卡拉”计划态度犹豫、暧昧。坚定支持蒙巴顿的是艾登，艾登认为直接发动对仰光的两栖进攻，是迅速结束缅甸作战、把英国军队从那里解脱出来的唯一途径。他指出，澳大利亚军队将会给英军的登陆提供帮助。其实，蒙巴顿也有同样的想法。但他们这种一厢情愿的希望后来没有实现，堪培拉没有同意去给英军打头阵。

据艾登回忆，蒙巴顿在辩论时忧心忡忡“非常不高兴”，到结束时却变得“非常满意”。辩论会后，布鲁克跟蒙巴顿进行了私下会晤，“讨论夺取仰光的问题。

这一行动是基于以下这一前提的，即我们可以从10月1日起把第6师从欧洲战场上撤下来”。没有这个前提，显然就不能实施“德拉卡拉”计划。不过，布鲁克能有这样的表态，蒙巴顿就很感到满足了。

能够阻挠这个计划的还有美国人。魏德迈6月在华盛顿警告说，他将反对所有的在南缅海岸作战的计划，除非它们能够为打开通往中国的缅北通路作出“及时的贡献”。后来蒙巴顿确实感到了在如何采取下一步进攻计划的问题，总部的英籍和美籍参谋人员中出现了分裂迹象。在同年9月英美领导人的会谈中，美国人对“德拉卡拉”计划充其量是不冷不热。但同时他们又表示，如果在缅甸北部和中部的进攻不会使人力物力消耗殆尽，他们可以接受它。还认为蒙巴顿如果实施该计划，尚需要再增加6个师的兵力，其中部分将从印度调遣，部分来自从意大利战场撤下的部队。

这又是一个前提，而且比布鲁克提出的更大。蒙巴顿闻知了美国人的表态后，自以为他们同意了“德拉卡拉”计划。波纳尔在日记中写道，蒙巴顿对此“感到极为高兴。他真是头脑简单。如果我在他的位置上，在没有确实得到人力物力之前我是不会过分激动和兴奋的。”

蒙巴顿在某些方面的确有点儿稚嫩。由于欧洲盟军发生了阿纳姆失利和德军发动阿登攻势这两件事，紧接着，日军在中国大陆发起打通交通线的“1号作战”频频取得进展，使蒙巴顿不仅未得到原先允诺的部队，反而被调走了一二个师和三个美国运输机中队。10月中旬，蒙巴顿抱着使“德拉卡拉”计划复活的一丝希望再次飞往开罗参加几天会议。到达开罗以后，他发现丘吉尔还没有来，正逗留在莫斯科。

蒙巴顿也想去见一见斯大林，因此要求允许他立即飞往莫斯科。但是，来自莫斯科的“特急”电报却反对他这样做，说由于苏联尚未和日本宣战，蒙巴顿的前往将会引起许多政治反响。丘吉尔来到开罗以后，蒙巴顿的境遇仍然没有什么好转。他不无苦涩地回忆说：“真有意思，在去年11月开会的相同地点再次会晤，用和去年相同的话要求对我们的战场提供帮助和援助。”

然而，丘吉尔告诉他，目前情况下不要指望从其他地方调部队去参加大规模的仰光登陆计划，他应当继续从陆路向前推进。在目前的人力物力条件下，如果他能够实施一些小型的类似的“德拉卡拉”计划，或者从印度发动一些袭击，那当然更好了。

自己最有兴趣的计划又一次被抛弃了，蒙巴顿闷闷不乐地回到了康提。但是，他的烦恼不仅没有减轻，反而加剧了：有人利用取消两栖作战计划这一时机提出应削减蒙巴顿的总部人员。布鲁克对韦维尔说，迪基的那个机关“过分膨胀得令人绝望”，还有人提出蒙巴顿应当接受陆地战略的现实，把总部迁回次大陆。同时，由于种种原因，蒙巴顿在几个月之内和他的副司令、参谋长、副参谋长和军种司令们统统闹翻了。

蒙巴顿与战区副司令史迪威刚结识时，关系尚好，蒙巴顿甚至还为他在蒋介石面前说过话，使史迪威没有被蒋介石赶走。然而，俩人友谊的时间并不长。还在1944年1月份时，蒙巴顿为整顿地面部队，召集吉法德、斯利姆和史迪威等人在德里开了一个会，会上，蒙巴顿彬彬有礼地对史迪威说，他决定将史迪威率领的中国在北缅的军队，划归东南亚战区陆军部队司令吉法德上将统一指挥。

史迪威听罢暴跳如雷，“在接下来的争论中，史迪威像魔术师一样不停地变换着自己的身分：作为中国战区的参谋长，他要直接服从蒋委员长的指挥；作为一个美国将军，未经马歇尔的批准，他不能接受英国人的指挥；作为蒙巴顿的战区副司令，他是吉法德的上级，他不能听从自己下级的指挥。”蒙巴顿哑口无言，因为史迪威言之有理。尽管事实上他作为蒋介石的参谋长和蒙巴顿的副手职务，都是名义上的，但给了他这些名份，就不能不承认史迪威的说法至少在字面上是符合逻辑的。

事情已经陷入僵局。吉法德不露声色，可是心里很恼怒；在场的其他低级军官们见到上级的争吵，则感到非常尴尬。蒙巴顿虽仍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但已开始觉得自己刚上任时应帮着蒋介石把史迪威赶走。突然，像在阴霾沉闷的天空中露出一缕阳光一样，史迪威自己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他不接受吉法德的指挥，但可以接受斯利姆的命令。

史迪威方才振振有词的逻辑，变得有些混乱了。斯利姆仅是第14集团军的军长，本为地面部队司令官吉法德的下级。与会者不禁哑然失笑，而蒙巴顿却深深地松了一口气，因为史迪威这样的表态，实际上还等于要受吉法德的领导。斯利姆是个和善、幽默和有自知之明的人，此后他在与史迪威的交往中，从未以上级的姿态出现，甚至不曾下达过一次书面命令，有什么任务他总是亲自跑到史迪威的驻地，然后像聊天似地把任务敲定。当然，就是蒙巴顿本人也未尝不是这样，他的左眼不就是在去史迪威驻地的路上被竹枝扎伤的么？

性格不很稳定的史迪威对别人的看法常常是很矛盾的，譬如对蒙巴顿，有时称赞他是个“有魅力的年轻人”，有时又骂他是个“花花公子”。蒙巴顿对史迪威的称赞和侮辱只是一笑了之。1944年10月，蒋介石再次要求解除史迪威的职务，这一次，蒙巴顿没有再为史迪威说话。史迪威对此似乎满不在乎，实际内心对蒙巴顿强烈不满，他认为蒙巴顿应对他所受的侮辱负责。这是不公正的。蒙巴顿对他说：“正如你所知道的那样，大多数英国人都认为难于与你共事，但是，在所有你我个人之间的问题，我发现你是易于相处和乐于助人的。”蒙巴顿还曾对罗斯福这样说过：“对于史迪威的离去，我感

到很遗憾。”

海军的萨默维尔是战区军种司令中第一个与蒙巴顿闹翻的。蒙巴顿来自海军，而最嫉恨他迅速晋升的恰恰是海军的高级军官们。陆空军人员对别人破格提升的适应性要大一些，比如斯利姆将军的平时军衔不过是中校，而战时军衔则是中将，统率一个集团军，因此他们能很痛快地服从蒙巴顿的领导。海军军官对军衔顺序历来非常讲究，憎恨一切打破规矩的人，特别是有皇室关系而可能受到了特别优待的人。

海军对哪怕是王子来舰队服役，也总是非常吝啬地授予个中尉或上尉了事，因为它认为自己是“大英帝国”的精英军种。萨默维尔因嫉妒而憎恨蒙巴顿，无论后者怎样想方设法接近他，他都没有一丝一毫善意的表示。在一些小事上萨默维尔很没风度，而在大事上，比如蒙巴顿所下命令中关于海军的部分，他从不认真地去贯彻执行。

平日心绪好时蒙巴顿隐忍不发，此时，一肚子火气的蒙巴顿借萨默维尔在一件事上处理不当，干脆把他赶走，由布鲁斯·弗雷泽接任。

紧接着离职的是皮尔斯。战区参谋长波纳尔最初想让肖尔托·道格拉斯接替他，后来又改变了主意，换成了利—马洛里负责指挥战区的空军部队。

吉法德早在英帕尔战役进行当中就被蒙巴顿解除了职务，但他一直没有离开战区总部。这一时期，他与蒙巴顿的关系比以往要平静得多，俩人似乎谁也犯不着谁。

波纳尔在 6 月份时就开始寻找吉法德的接替者，他认为奥利弗·利斯将军是最理想的候选人，但是利斯当时正在意大利战场上指挥第 8 集团军作战，难以脱身。蒙巴顿曾经想过不设战区陆军司令而由他本人直接掌管地面部队，因为他许多时候实际上也是这么干的，但伦敦方面不同意。最后，1944 年 11 月，利斯终于从意大利调到这里，受命担任东南亚战区盟军地面部队司令，隶属于蒙巴顿。

最后一个离开蒙巴顿的是参谋长亨利·波纳尔。他比蒙巴顿年长许多，虽然蒙巴顿很欣赏他的判断力、诚恳和忠实，但是波纳尔有时过于热心地扮演蒙巴顿的保姆的角色。蒙巴顿希望自己的参谋长要年轻些，他说：“经常对比我年龄大十几岁甚至更多的人发布命令，是一件多么大的苦事。”结果，波纳尔离开康提被调回伦敦，给蒙巴顿派来的新参谋长叫布朗宁，蒙巴顿称：“由博伊（布朗宁）这样的年轻人担任我的参谋长真是太重要了，因为他只比我大 3 岁。”

蒙巴顿 1944 年 10 月从开罗返回时，有一段时间仍不死心地认为“德拉卡拉”计划是可以挽救的。他曾在康提给罗斯福总统打电报说，“我正在尽一切努力积蓄足够的力量以进行两栖作战”。罗斯福回电称：我希望你能够进行这些两栖作战，但美国现在还帮不上你什么忙，我的麦克阿瑟将军在太平洋战场上，已经把多余的登陆艇和其他登陆器材都快拿光了。

美国盟友的这番回答，在康提引起的只是苦笑。就在蒙巴顿苦闷的时候，夫人埃德维娜和女儿帕特里夏来到了他身边。埃德维娜虽早就答应来跟他团聚，但圣约翰救护队的工作使她实在脱不开身。这个救护队几个月前随盟军参加了诺曼底登陆战役，做为这个救护队的领导者之一，埃德维娜的工作得到了艾森豪威尔将军的高度赞扬。

妻子和女儿的到来，给蒙巴顿带来了欢乐，使他的心情多少愉快了一些。不过，埃德维娜是个要强的、事业型的女人，她在宁静的康提没呆多久

时间，便要求丈夫允许自己去访问前线部队，蒙巴顿答应了。于是，埃德维娜首先飞抵印缅边境一带访问了斯利姆将军的第 14 集团军。斯利姆回忆说：前线的条件还是艰苦的，当遇到那些既没有桥又没有船的小河时，她就跳下水游泳过去。蒙巴顿夫人是给人能留下深刻印象的那些女人们之一。她的头脑绝对是第一流的，她勇敢无畏，具有出色的组织能力和不可动摇的坚强意志，所有这一切又因她那迷人的女性魅力而倍增。人们不可能与这样一位了不起的女性争吵。她真诚地与我们交谈，尽心尽力地为我们办事，她的风采折服了我的部队，包括我。

如果说由于蒙巴顿坚持海上登陆的“德拉卡拉”计划，引起过斯利姆陆军部队的不满和意见的话，那么，埃德维娜对前线地面部队的访问，则帮助丈夫融洽了与斯利姆等陆军将领们的关系，使他们又和好如初了。看来，埃德维娜在蒙巴顿最苦闷、最恼火的时候来到东南亚，真可谓正是时机。

实施自己最欣赏的两栖登陆作战计划已毫无希望后，蒙巴顿只得又捡起“卡皮特尔”计划。这是一个纯粹的陆上进攻计划，作战的主力将是第 14 集团军的 8 至 9 个师。计划要求英印部队首先强渡亲敦江，并在那里建立桥头堡，然后在曼德勒—塔泽—稍埠—敏建地区与日军进行决战，得手后再南下进攻仰光。显然，这不如“德拉卡拉”计划中，要求直接对仰光发动登陆作战来得迅速，但蒙巴顿现在已经没有选择的余地了。旱季已经来临了，这是地面部队展开行动的最好时机，不允许错过这几个月的时间；而且伦敦方面对他迟迟不愿定下从地面发动进攻的决心，已有些恼火，文登就曾来电暗示蒙巴顿，“我担心这种连续不断的拖延对你来说太可怕了”。

经过一番思考后，蒙巴顿终于在 11 月初正式决定对缅甸日军的歼灭行动将以地面作战的形式来完成。

后来战局的发展表明，这一决定是对的，尽管在陆地山岳丛林中作战令英军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不过，蒙巴顿主张进行两栖登陆，吸引敌人在海岸地区决战的“德拉卡拉”计划，由于没有得到实施的机会，谁又能说它是错的呢？

话说两边。英帕尔战役日军惨败后，驻缅日军首脑十分清楚，英军早晚有一天要渡过亲敦江打过来。随着日本在太平洋战场上塞班、关岛、提尼安等战役中的失利，此时，“缅甸的战略地位，对大本营来说，已失去了政治战略指导上的积极意义。只不过是泰国、马来、印度支那半岛西面的防壁而已。然而，防守缅甸的价值并未失去，因为它占有能够扼制盟军企图沿孟加拉湾向马来半岛的头部和新加坡方向进攻的英印军锋芒的地位。”所以，日本认为还必须守住缅甸。

新上任的日本驻缅甸方面军司令官木村兵太郎中将，根据南方军总司令部的指示，于 1944 年 9 月底拟出守卫缅甸的作战设想，并为各地段作战确定了代号：继续切断及妨害印中地面联络的作战称为“断作战”；对向曼德勒附近及该地以南伊洛瓦底江畔正面来攻之敌的作战称为“盘作战”；对向印度洋沿岸正面来攻之敌的作战称为“完作战”。“盘作战”和“完作战”是针对蒙巴顿的英印军队；而“断作战”是对付北缅中国远征军的，这里不再去表。

10 月下旬，日本情报机关已侦知盟军将放弃蒙巴顿的“德拉卡拉”计划，基本上确立了由陆路进攻缅甸的战略，于是，木村中将立即召集第 15

军、第 28 军、第 33 军各参谋长及作战主任到仰光，就方面军今后作战构想，特别是“盘作战”指导要领，进行了研究。研究的课题是：

1. 面对将要全面转入旱季攻势的优势的英印军，第 15 军能否保持住目前从英多附近经明京山脉至加里瓦的战线？
2. 因丧失大半机动能力而战力下降的第 15 军主力，能面对航空优势及机动能力堪称卓越的英印军的追击，实行 500 公里以上的转进，在伊洛瓦底江岸确立反击态势吗？
3. 在伊洛瓦底江畔的防御，是以前岸配备，还是江岸直接配备，或是后退配备，怎样较为妥当？
4. 对来自伊洛瓦底江东岸、瑞丽江畔方面的一部盟军之侵入，如何处理第 15 军与第 33 军的衔接部位蒙米特的防卫？

这些法西斯职业军官们确实是战争的行家，提出的课题颇有预见性和针对性。

在仰光海边一幢警卫森严的楼房内，他们经过几昼夜的研究和争论，得出了如下的结果：

针对第 1 项课题，根据第 15 军的现状来判断，“与其说在目前战线上坚守两个月，将忍受敌人攻击的损失，莫如说过急的退却，使军内部崩溃的危险更大；解决第 2 项难题的办法是，先使第 31 师团占据瑞波平原，然后让在英多方面战斗的第 15 师团及第 53 师团，沿着英军机动部队追击困难的伊洛瓦底江两岸地区后退；对第 3 项课题的争论结果是，实施伊洛瓦底江岸的直接配备；最后一项的研究结论是，“第 15 军与第 33 军衔接部位的汤彭山脉，是第 15 军的右翼屏障，必须确保。”

从木村兵太郎发扬“军事民主”，搞的这次集体讨论和研究的结果来看，日军防守缅甸的基本战略是坚守防御与机动防御相结合，并未强调反击作战。然而这个战略没过几天，就被方面军参谋长田中新一中将改变了。他提出的作战指导纲要是，“方面军虽采取战略持久，但在战术方面则采取积极地反复地反击”，并且规定，适时与英印军在伊洛瓦底江进行决战，“决战正面预定为曼德勒之伊洛瓦底江下游江畔或伊洛瓦底江口之三角地带”。他在请求木材方面军司令官批准自己的方案时虽承认：“本作战指导，万一失败，可能遭到全军覆灭的恶运，但除此之外别无良策”，强烈要求批准。

木村内心主张“无论在何种情况下，方面军必须避免陷入决战，因为动辄陷于决战，结果有耗尽战力，难达战略持久之虞”。可是，田中新一是他的参谋长，但资历不浅，与他的军衔同样是陆军中将，所以当田中强烈请求批准自己的方案时，木村经过一番沉思权衡，还是违心批准了。那次所谓“军事民主”集体研究出的结论，就这样被轻易地置于不顾。战后，日本防卫厅战史研究室编纂的《缅甸作战》一书评论道：

田中参谋长考虑的作战指导思想，明显与木村方面军司令官的想法相背谬。与琐事不同，在作战指导的根本观念方面只要被认为有重大相背之处，方面军司令官必然要求修正。但木村中将没有这样做，大有被参谋长的硬性请求所屈服之势。

言外之意，木村患得患失，没有起到主帅总揽全局大政方针的作用，也应对日军后来在缅甸防御作战的全面失败负有责任。

这时整个缅甸的日本部队尚有 10 个师团、两个独立旅、1 个坦克联队

和 10 万人的后勤部队，另有 1 个飞行师，但能作战的飞机仅约 50 架。日军的这些师团团在缅北、若开和英帕尔战役中屡受重创，兵员和战斗力都远非过去可比。滇西缅北的第 18、56 师团在中美英印联军的打击下，正在向南溃退。在缅北南地区的第 54、55 两个已很弱的师团也受到英第 15 军的钳制。能够集结在缅中地带与斯利姆第 14 集团军决战的部队，只有片村四八中将接任的第 15 军及一些配署部队，而该军的 4 个主力师团经英帕尔—科希马之战后，元气尚未完全恢复，据日方材料称，全军兵员仅 3 万人左右。

而斯利姆集团军此时下辖的第 4 军和第 33 军，总共有 6 个陆军师、3 个独立旅和 2 个坦克旅，即相当于 8 至 9 个满员师的实力。英军在数量和质量上，这时都远远超过当面的日军各师团，而且还有更强大的装甲部队的支援以及绝对的制宝权。日第 15 军与这样的对手决战，无异于自投罗网。如果能够凭借山岳丛林的有利地形，软磨硬抗地打一场机动防御战，或许还可以拖延一下时间，等待战局形势的变化和增援部队的到来。

蒙巴顿不再迟疑和拖延了，他全力以赴投入陆路进攻的准备工作。他很清楚，要使进攻缅甸迅速奏效的话，显然还有许多事要做，从根本上说，主要的问题还在后勤，而不在战术。虽然斯利姆的第 14 集团军陆上运输和内陆水上运输都得到了改善，但向缅甸内地纵深发展还要依靠空中补给。为此，蒙巴顿专门组建了一支“战斗货运特遣部队”，货运飞机自然是从小美国那里借用的。他还将分散的情报机构统一协调起来，使战区总部加强了对它们的领导。这正是：云谲波诡，两栖计划落空；舍己从人，转入陆路进攻。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章分说。

第十八章 穿插敏铁拉

平原围歼计未成，蒙氏速把新策生；

遣派铁军去奔袭，腹背插刀敌入瓮。

盟军大规模进攻缅甸的行动，首先从强渡印缅边境东侧的亲敦江开始。

1944 年 11 月 10 日，斯托普福德将军指挥的第 33 军在亲敦江西岸完成攻击部署。

黄昏时分，阿萨姆团的一个突击营在炮火的掩护下，向江对岸的莫莱发起冲锋。士兵们乘坐的橡皮舟在湍急的水流中如同一片树叶，他们不顾东岸日军阵地射来的子弹勇敢地向前挺进，在付出一半伤亡的代价后，终于登上了东岸。接着，该军的第 20 师主力也陆续渡过了亲敦江，并占领了莫莱。与此同时，第 11 东非师在皇家空军准确无误的空袭支持下，沿着亲敦江西岸幽暗的加包山谷向加里瓦打去。加里瓦位于莫莱以南约 50 多公里，是日军在亲敦江上建立的又一个防御阵地群。东非部队的进攻遭到对方激烈地抵抗，直到 12 月 2 日才占领了加里瓦。至此，进攻部队完全控制了莫莱至加里瓦这段 50 多公里长的江面。

12 月 10 日，印度工兵在亲敦江上迅速架起了桥梁，使第 14 集团军的各主力师得以开过对岸。在大部队过江时，蒙巴顿来到桥头巡视：“我们看到一番令人鼓舞的景象——亲敦江上，我们的无数水陆两用车和其他运输工

具正在运送兵员；河岸上，各种型号的卡车和机动车疾驰前进，就像赛马大赛那一天通往埃普索姆（英国著名的赛马场）的交通一样。步兵们排成一行和车辆齐头并进，马拉的车辆夹杂其间。

整个景象就像是奔涌向前的巨浪，这是我所见过的最激动人心的景象。”

蒙巴顿和斯利姆之所以在漫长的亲敦江上选择这一地段渡江，是企图与日军在瑞波平原上决战。瑞波平原位于加里瓦西南面，它是缅甸干燥的中部平原的一部分，是夹在伊洛瓦底江和亲敦江之间的一片开阔的地区。相对于山岳丛林地区，多沙土的瑞波平原，显然更能发挥英军的装甲优势和空中优势，是与日军较量的理想场所。

在瑞波平原这个主要“捕杀场”上，他们安排的“捕杀手”是梅塞维的第4军。梅塞维是非洲战场上的英雄，又在若开等战役中立过功，不久前刚刚被提升为第4军军长。

斯利姆曾在一次集团军司令部的会议上说：“我要的是这样一个人，他将在亲敦江破釜沉舟，然后率领部下前进——而梅塞维正是这样的人！”

梅塞维的第4军，包括他自己担任过师长的那个赫赫有名的第7英印师和训练有素的第19和第17英印师。后来，集团军直辖的第5英印师也归梅塞维指挥。第7英印师这时由埃文斯担任师长，他也是若开战役中的功臣；第19英印师由身经克仑之战和沙漠之战的又一名老将、精力充沛的皮特·里斯将军指挥。梅塞维的装甲部队为第25坦克旅。蒙巴顿给梅塞维的命令是：跨过亲敦江后进入瑞波平原，与日本第15军驻守在那里的师团进行决战，并夺取日本人在耶乌—瑞波地区的各重要机场。这一击要打得既快又狠。

按照蒙巴顿的估计，中国人和美国人的5个师，即新编第1军和新编第6军，正把日本的两个师团牵制在缅甸北部地区。同时，英第15军的部队将在若开地区牵制日军的大约1个半师团。此外，几项洋攻计划，包括对缅甸南部漫长海岸部署引而不发的两栖攻势，又可把日军的1个半师团从主要战役中吸引出去。这样，梅塞维的第4军在瑞波平原上歼灭若干个日本师团，是完全有把握的。

梅塞维部队渡过亲敦江后，遵命向东冲击。第19英印师到12月12日，已推进了80多公里。4天之后，他们又占领了英多西北部的班毛，并同从北部挥戈南下的英第36师会合，向瑞波平原逼近。

第19英印师推进得这么远而竟未激起日军主力的反应，说明了什么？当情况逐级上报给蒙巴顿后，引起了他的思考：英帕尔战役以后接替河边正三的木村兵太郎中将，是日军出色的军事谋略家之一。既然他让第19英印师如此轻易地推进到瑞波平原的边缘，可见他并不想在这块宽阔的平原上决战。这使他大失所望，他原想在这一比较空旷的地区，用英军优势的装甲部队、大炮和空军，包围并全歼日军的。

因此，他会同斯利姆研究制定了一个新方案：斯托普福德的第33军（相当于4个师）从北面向曼德勒施加压力，去占领伊洛瓦底江上的渡口；这时，梅塞维的3个师要从吉灵庙向正南进发，尽可能悄悄地直插密沙河流域，然后从甘高向东南推进，在本各附近的伊洛瓦底江下游占领一个渡口，目的是越过日军守卫曼德勒部队的后方，在敏铁拉附近建立一个战略性屏障，从而封锁他们径南向仰光的退路，并截断来自仰光的补给。最终将日本第15军歼击于曼德勒—塔泽—稍埠—敏建地区。

新方案完成得很好。梅塞维的部队在深入的侧翼包抄行动时，秘密穿过丛林密布的甘高山谷，并在帕科库出其不意地强渡伊洛瓦底江。然后，运用装甲部队和空降部队风驰电掣般挺进，直逼东南面敏铁拉日军重要基地。

梅塞维部队的深远穿插和包抄行动，是新方案实施的关键，他们是如何完成这一艰巨任务的呢？

——梅塞维将军首先诱使日军相信：他的主力仍在皮特·里斯的第19英印师后面全力向瑞波平原推进。他在达木设了一个假的军司令部，它所用的无线电波道与真的一模一样，而真正的军司令部却在这时悄悄地转移了。斯托普福德的第33军发给第19英印师的所有电讯，继续经过这个假的司令部传递，而真正的第4军司令部则尽可能长时间地保持静默。参谋人员在明码电讯中有意搞些“泄密”的事件，新闻广播也参与制造一些混淆视听的消息。许多高级军官乘坐的指挥车仍在假军部里进进出出，使日军谍报人员仍以为梅塞维和他的军司令部仍逗留在达木。

一切就绪，即将行动。但就在这时，75架美国运输机却被猝然抽调到云南去，因为中国军队在广西面临着日军的猖狂进攻。蒙巴顿为此向美国方面提出抗议，说这些飞机都已装满了运给先头部队的补给品，而梅塞维这次向敏铁拉的远距离穿插是以空运补给为基础的。但抗议没有奏效，大部分飞机还是被调走了。现在，梅塞维必须沿着一条雨季无法通行的坎坷不平的土路，从达木到帕科库冒险行军700公里。

这条土路本是供老百姓的牛车通行的，而现在要通过的部队却达3个师之多，还有重型坦克、大炮和其他车辆。好在工兵部队于15天之内，紧急加宽、加固了这条土路的2/3路段，使上述重型装备得以勉强通行。

至1945年1月底前后，梅塞维的部队终于陆续抵达了伊洛瓦底江岸地区。这条江是缅甸的主要河流，自北向南奔腾而下，全长2000多公里。该江自入海口起，有1500公里的流程可供相当大的轮船通航。每年1月份，江面最窄的地方也足有500码宽，而最阔的地方有4000码。虽然江水此时处于最低水位，但是开阔松软的沙洲却又形成了另一道险障。在江边，车辆很容易一下子就陷进泥沙，没掉半个车轮。甚至连吃水浅的船只也常会有搁浅的危险。

日本人很清楚，梅塞维可能试图强渡的江岸地段约有300多公里。木村采取了恰当的措施，对比较容易渡越的渡口都严加布防，并掌握着一支机动预备队——包括精心挑选的突击部队、坦克和时刻准备轰击任何其他渡江地点的炮群。仍然留守在西岸加包附近的部队担负着双重任务：一方面阻滞英军挺进，一方面守备供日军反击用的桥头堡。另外还有一些是对第14集团军集结部队进行突袭和骚扰的敢死队。

当梅塞维秘密抵进伊洛瓦底江边的时候，他在所有可用的渡口选择了良宇这个最合适的地点。2月5日，他命令第7英印师在那儿建立一座桥头堡。他是依据对岸敌军的设防力量选择这个渡口的。良宇渡口处的江心有个沙洲，渡船只能按斜角航行行驶，这样航程就延长了1.8公里左右。但尽管这样，这儿的航程还是最短的。从这里渡江，不但可使船只筏排最快地来回周转，而且登陆后可直接奔向对岸向东公路和向南公路的交接点。

同时，为了掩盖在良宇渡江的真正企图，梅塞维还计划在色漂佯装渡江。色漂位于石油重镇稍埠对岸，在帕科库下游70公里处。第28非洲旅将担任佯渡任务。此外，达木假军部里的参谋人员还精心炮制了一张标注好的

地图，图上表示英军预定袭击安羌，并故意丢失了一件副本，让附近的缅甸居民拾走。另外，在帕科库也将同时发起渡江，以诱使日军相信英军也有在此处渡江的意图。另一场规模较小的佯渡将在良宇以南 11 公里处的缅甸古都蒲甘进行。1 个锡克营在那儿佯渡，如有可能就渡过江去。

日本人低估了英军在良宇那儿渡江的可能性，这是不难理解的，因为除了良宇本身临江的地方外，江东岸都是高耸入云的峭壁，偶尔夹着干涸的河谷。这些峭壁俯视着对江平坦的江岸，上面有视角极佳的观察哨。但渡江部队也有一个有利因素，这就是良宇实际上是日军两个师团的结合部，因而日军预备队要赶到这里就不如赶到主要阵地那样方便。

报经斯利姆和蒙巴顿最后批准，梅塞维下令在 2 月 14 日凌晨 4 时渡江。那天夜里没有月亮，天色漆黑一团，这对部队在西岸隐蔽集结很有利。渡江的直接目标是 4 个江滩，它们位于良宇镇以南的一段近 2 公里长的防线上。从那儿可以取道干涸的河谷到达高地。渡江时没有预先的炮火准备，没有飞机轰炸，没有掩护火力。第一批步兵突击队要完全靠自己悄然而无声的行动渡过去，关键在于出其不意，攻其不备。

第 114 旅已事先在帕科库发动了进袭，虽然立即遇到了原先估计到的日军疯狂抵抗，但还是把设守坚固的日本人赶了出去。第 89 旅一面在西面给以掩护，一面令其锡克营在甘蒲发起佯渡。有了这两个旅的佯动，第 33 旅才得以开抵良宇渡口，发起决定性的渡江战斗。在 48 小时稍多一点的时间内，该旅把所有可用的船只、筏排、装备和军需物资都秘密迅速地运到集结地区。在梅塞维预定渡江时间的前一刻，一支侦察分队在黑暗之中对选定的登陆江滩进行了一次大胆的最后侦察。正当他们的筏排偷偷往回划时，不巧遇到了两个驾小船巡逻的日本兵。他们别无选择，只得开枪把这两个人打死。这可能惊动了敌人。然而，过了一会儿，首批步兵突击队打起蒙上遮光罩的导航灯渡江时，江岸上仍是毫无动静。显然，守军对零星的枪声已习以为常了。梅塞维的第一批士兵在黎明前，一枪未发就过了江。至清晨 5 点，一切都按计划进行着，但很快这种顺利的进展就中断了。

第 33 旅大部队渡江时，由于缺少偷渡训练和过分自信，出现了乱哄哄的场面。

接着，有些船只开始漏水，这就更增加了混乱。结果，当第一道金色的曙光突然清晰地照亮渡江现场时，该旅的大部分船只还在江面上无秩序地行进着，而没有踏上陆地。于是就在这时，他们被日军发现了，对岸峭壁上的日军机枪开始猛烈地扫射，给正在渡江的官兵造成了很大的伤亡。

行动已经暴露了，靠偷渡过江完全不可能了。梅塞维命令大炮和坦克一齐向对岸守军阵地开火，飞机也被召来攻击敌人的阵地。在这些火力的掩护下，残存的船只又竭力划了回来。英军将坦克沿着大江西岸排列成行，坦克后面则部署了重炮群，这样，只要任何一处地方出现日军的抵抗，就施以毁灭性的炮击。强大的炮火压得日军抬不起头来，在炮火网的掩护下，由旁遮普士兵打头阵，乘着摇摇晃晃的小船过江，平安地涌过对岸的干谷，冲上高地。没多久，一批接一批的部队很快渡越江面，当夜幕再次降临时，总共有 3 个营过了江。

次日，梅塞维手头仅有的这些船只又在江上穿梭往返，继续运送后续部队渡江。

与西线渡江时所用的庞大的英美机动船队相比，梅塞维用来渡越远为

开阔险恶的伊洛瓦底江的船只，就显得荒唐可笑了。斯利姆回忆录中把这些船只形容为“两根竹竿加上一根靴带”。正如斯利姆后来所评论的那样：“智慧、刚毅和胆略，这向来就是我军仅有的也是取之不尽的装备。”

西方人讲话历来有些夸张，不过，由于梅塞维这次行动的远程穿插突袭性质所决定，他不可能事先有庞大而坚固的机动船只却是事实。他用来渡江的船只，多数是些竹筏、粗陋的缅甸农船和缴获的敌军浮舟。他在加里瓦上游的一处山地丛林里制造一些大木船，但为了把它们运入水中，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需要挖许多土方，使渠道直通到山坡下，另外还要对坎坷崎岖的小路进行开拓改造。显而易见，不管费多大的力气，他所有的船只加在一起，也不能使几个师的人马同时渡过伊洛瓦底江，只能一趟趟地靠穿梭往返把部队运过对岸。

2月15日，良宇周围的日军被完全清除了出去。粗笨的筏排载着谢尔曼式坦克沿着斜角航线，浩浩荡荡、从容不迫地驶过江面，在指定的沙滩上登陆。到第二天，2月16日结束时，英军已经建立起一个坚固的箱形防御阵地，以对付预料中的日军反击。然而令人惊奇的是，到此时为止，日本人只是进行了些短促袭击而已，没有大规模的行动。梅塞维命令已渡过江的第17英印师和第7英印师，毫不迟疑向敏铁拉方向前进。日军仍被帕科库和鱼漂两地的佯攻所迷惑，又因英印第19师和第20师在北面刚强夺了直逼曼德勒的桥头堡而受到威胁，所以反应迟缓。直到2月19日，越过蒲甘向南猛进的第89旅才突然遭到日军激烈地反击，但梅塞维遵照蒙巴顿的电令，置该旅的激战于不顾，率第4军主力继续向前推进、穿插……

敏铁拉是日军曼德勒防线的战略后方，该地连同以东约25公里处的塔泽，是日本第15军和第33军的后勤中心和军需屯集地。这一地区还有日军6个简易机场。敏铁拉供应着从东面的萨尔温江到伊洛瓦底江这两条战线上全部日军的补给物资，拿下它，曼德勒的日军必将土崩瓦解，并使日军在缅甸的整个弧形战线陷于背部受敌的境地。蒙巴顿之所以要英军不顾一切地向敏铁拉突进，意义就在于此。

由于木村兵太郎司令官远在仰光坐镇，曼德勒防线由方面军参谋长田中新一中将直接指挥。他判断，英军将从北面对曼德勒发动全面进攻，他将在自己选择的战场上进行并且赢得这场大会战。田中新一开始根据自己的判断调兵遣将。他设想第15师团能够把英印第19师牵制在原地，而第33师团将阻止英第20师前进，于是他把部队从帕科库和敏铁拉调来增援曼德勒守军。他仍然认为梅塞维在良宇渡江不过是一种声东击西的虚招，而没有意识到英军要直插曼德勒西南方向的敏铁拉，还愚蠢地以为英军的主攻方向在曼德勒的正面，这样他就可以集中兵力实施自己的伊洛瓦底江会战计划了。曼德勒这个缅甸的第二大城市，位于伊洛瓦底江畔，日军在那里早已筑有完善的防御工事，可以迎击任何来犯之敌。

但是，英国人没有钻进这个火网，虽然他们在曼德勒北面保持着对该城的压力。

这是蒙巴顿和斯利姆早就盘算好的。2月21日，梅塞维的先头部队——第17英印师向前挺进，目标是首先占领敏铁拉东北面的东沙。次日，科恩的第48旅步兵最先出现在通往敏铁拉的尘土飞扬的公路上，谢尔曼式坦克纵队则沿着公路两侧疾进。当英军坦克突然从日军后方阵地抄袭过去的时候，公路上日军的第一道封锁线被冲垮了。

进攻部队现在兵分两路，第 17 英印师的第 64 旅插向东沙南面的要塞，另一支部队直取关键性的高地，准备向东沙发起钳形攻势。尽管日军阻击部队拼死抗击，第 64 旅到 2 月 23 日还是推进到离维朗不到 4 公里的地方，并拔除了日军的要塞。同时，第 17 英印师的主力猛烈进袭坎耶，从而完成了对东沙的包围。

24 日，第 17 英印师攻下了东沙。该师各旅继续全速前进。当夜，在歼灭许多敢死队和狙击手之后，该师分兵把守主要的公路和铁路要点，准备最后奔袭敏铁拉。

25 日清晨，第 48 旅留守原地，阻击来自北面的救援日军，而其余各旅连同其锐不可当的坦克部队，则继续向敏铁拉急驰。英军拿下塔布通机场后，蒙巴顿又马上派运输机把一个旅的援军，于 26 日拂晓运抵这个简易机场。接着，得到增援的第 17 英印师很快逼进了敏铁拉外围。

由于田中新一愚蠢地把原驻扎在敏铁拉的 1 个师团调往曼德勒防线，造成守卫敏铁拉的兵力非常薄弱。此时，这里日军的最高指挥官是第 2 野战运输司令粕谷少将，据日方材料统计，守军总共只有 3 个步兵营、2 个机场营和 1 个高射炮营，不到 4000 人；另外还有几百名住院的伤病员。当英军收紧包围圈时，每一个日本士兵，甚至伤病员也不例外，都奉命投入火线死战到底。

不过，敏铁拉的日军不乏武器弹药，粮食也不短缺，这里到处都有各种各样的军需仓库。所有的日本兵都有某种式样的自动武器武装起来，并携有充足的弹药。

他们潜伏在地堡和据点里，隐蔽在房屋。店铺、仓库和佛教宝塔内，甚至埋伏在该城西面和南面入口处周围开阔的大湖堤岸后面。粕谷少将还从周围机场拉来高射炮用作平射反坦克武器，并在城市中央设置了五花八门的地面火炮，决心与敏铁拉共存亡。

2 月 28 日，第 17 英印师发起进攻。首先由一支部队筑起路障，封锁通往稍埠的道路，以防止两地的日军取得联系。同时，第 63 旅发起冲锋，猛攻守军西部防御阵地，第 48 旅则扑向北部防御阵地。谢尔曼式坦克以 25 磅自行火炮和两个步兵营为后盾，转战于敏铁拉外围的北部、东北部和东部。蒙巴顿派来的皇家空军和美国空军的战斗轰炸机，对敏铁拉城进行了狂轰滥炸。其中，特别有效的是美国空军的两个大队，每一个大队均有两个闪电式和霹雳式战斗机中队，以及一个 B - 25 型轰炸机中队，此外还有两个用以撤退伤病员的 L5 联络机中队。美国空军的飞机的续航能力比英国飞机强得多，所以能始终不断地在敏铁拉上空巡回飞行，随时可用来对付日军的火力点。

在粕谷少将的督战下，日本兵在地堡工事里拼命地负隅顽抗。英军不得不一个一个地进攻这些地堡。落日时，还有相当多的地堡未被英军夺取。梅塞维只得下令部队退出已成一片废墟的敏铁拉，以防夜间遭到伏击。打红了眼的英印士兵不愿撤出，结果，日本兵趁黑夜偷偷地爬出地堡，企图收复失去的表面阵地。于是双方交错开火，抵近肉搏，枪炮声震耳裂心，彻夜不绝。

3 月 1 日，蒙巴顿得知敏铁拉还未拿下，非常气恼，便要斯利姆亲自飞抵前线指挥。斯利姆到现场后，决定在该城北面集中兵力发起攻势，以最终占领敏铁拉。

日本人素以（卜票）悍勇武著称，而在敏铁拉废墟残垣间进行的鏖战

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日本士兵只有咽了最后一口气才停止抵抗。一个负伤的日本兵只要还能爬到一挺机枪旁射击，那么即使死到临头，也会豁出命去干。那些在地堡里坚持战斗的日本兵，面对英军火焰喷射器的威胁和劝降喊话，宁可被烧死也不爬出来投降，直到3月3日最后50名没被打死的日本官兵跳入湖中自尽，敏铁拉才被英军完全占领。

接到这些残酷场面的报告后，蒙巴顿对日本官兵顽强的战斗意志所震撼。在西方人的观念中，战争是一种残酷和不人道的行为，具有一切排斥理性和不符合常规的性质。尽管他们并未少主动发动或被迫接受战争，但当军人在战斗中尽了最大努力仍无法摆脱绝境，他就有权放下武器向对方投降。这对他仍然是光明正大的，合乎人道的和无损荣誉的军人。为了让他的亲属知道他还活着，根据西方公认的国际惯例，敌国一方还得把他的名字通知中立国。被俘的军人无论对于自己还是对于家庭成员来说，都不能算作蒙受羞辱，别人也不能歧视他们。日本人对此恰恰难以理解。蒙巴顿曾翻阅过被译成英文的日本军队的《军人手令》，里面的第7条规定：“……叛乱、投降、越权、读职、抗命和逃跑一律处以死刑，……同交战国媾和后，被敌方遣返的军人将以投降罪论处……”

“那是一条多么残忍的规定。”蒙巴顿看着来自敏铁拉前线的报告，又想起了他读过的日本《军人手令》，不禁感叹道。同时，他还想到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初期，据说在巴丹半岛、新加坡、菲律宾、香港和印度尼西亚，当成师成团的英美军人放下武器、打着白旗走出战壕投降时，曾令日本军人大吃一惊。对日本人来说，当他们面临同样的绝境时，军人只有一个选择：冲锋或者自杀。日本人将这种选择赋予了一个崇高而壮烈的名字，叫做“玉碎”。因此，日本人不能容忍自己被俘，同样也不能容忍别人做俘虏。在战俘营里，任何人笑一笑都可能遭杀身之祸，因为日本看守们认为这些贪生怕死的战俘，是没有笑的权力的。日本人由于鄙视战俘而肆意虐待和屠杀战俘的事例在西方广为流传。在英帕尔战役时，蒙巴顿就曾听说一群为西约克郡团运送物资的英印士兵，被日军俘虏后，日本人把他们的双手绑到树上，然后把他们抽打得昏死过去。俘虏醒过来以后，再用刺刀把他们一个个挑死。蒙巴顿听说后即愤言，他永远也不能宽恕日军对待俘虏的残忍行为。

此时，蒙巴顿似乎理解了第17英印师以那么大的兵力和火力，居然费了一周多的时间才占领敏铁拉的原因。

“日本军队的作战意志太顽强了，他们不会甘心失败，还会向敏铁拉反扑的。”蒙巴顿内心暗暗地料定。

果然，一个多星期以后，日军发起的一场夺回敏铁拉的血战开始了。

敏铁拉失守后，木村司令官在仰光再也呆不住了。他知道敏铁拉位于伊洛瓦底江南岸扇形地带的要害，它的失守使在曼德勒正面作战的第15军陷于腹背受敌的绝境，从而致整个方面军于死命。现在，他顾忌不了许多了，下令田中新一停止准备伊洛瓦底正面的会战，从第15军的第15和第33师团中各抽出一个联队，配合第33军的第18师团和第49师团，全力夺回敏铁拉。木村还特别指令，敏铁拉争夺战由第33军司令官本多政材中将指挥，方面军参谋长田中新一不要插手。

3月12日，本多中将接受了任务，随即赶赴敏铁拉东南面35公里处设立战斗指挥所。他认为夺回敏铁拉，首先要夺回那儿附近的各个简易机场，因为这是阻止更多的英军被空运来增援的必要步骤。日军疯狂地扑向机场，

同时，其他部队不顾一切向良宇冲击，以阻止英军继续渡江。3月15日，所有的机场都弥漫着战火的硝烟，当运输机载着第5英印师的空降旅在几个机场同时着陆时，炮弹常常就在机身周围爆炸，官兵们往往一跳下飞机就得直接参战。在反扑中，日军甚至用“肉雷”来炸英军的坦克：敢死队员钻进散兵坑，每人各拖着一个100公斤的炸弹，把炸弹夹在两膝之间，引信调整到“瞬时起爆”点，在坦克爬过散兵坑的那一瞬间，敢死队员就触发撞针。

不过，英军很少几辆坦克是被这种拼死的办法炸毁的，但日本兵倒炸死了不少。就像日本人采取“特攻机”的自杀战术，并没有撞毁多少艘美国军舰一样，他们过于迷信人的肉体和精神的勇敢了。

梅塞维在敏铁拉的部队，各个兵种配合得很出色，联络情况极为良好。无线电台可以直接呼叫飞机，准确无误地轰炸和扫射日军的攻击部队，使敏铁拉城外焦枯的田野上，到处都散布着肢体破碎的日军尸体。这场争夺战共打了两个星期，到3月28日结束，仅据日方自己的统计，两个日军师团及配属部队，共死亡官兵6500余人。

但是，当战斗还在敏铁拉城外激烈进行的时候，日军部队却成功地收复了东沙周围的制高点，切断了第17英印师从良宇方面来的补给线。梅塞维着手重新打开敏铁拉至良宇之间的道路，同时又急忙派部队攻打敏建，以打开一条新的水路，减少补给方面的困难。第7英印师的两个旅，在蒙巴顿派来的飞机一路跟踪掩护和空投补给的支援下，越过干燥荒芜、尘土飞扬的平原，奔向敏建。一周之内，英军重又夺回了高地，打开了敏铁拉通往良宇的运输补给线。同时，敏建被攻占后，英军迅速在那里建成了一座临时码头，从而又从水路获得了大量补给品。至此，日军不得不完全放弃了夺回敏铁拉的企图。

蒙巴顿麾下的部队在敏铁拉打赢了，下一步就是夺取曼德勒。曼德勒旧称“瓦城”，坐落在伊洛瓦底江中游，为缅甸历史上古东吁国首都，也是缅甸仅次于仰光的第二大城市。

英军占领了敏铁拉，以及随后又击退了本多政村中将率领两个多师团的反扑。

已经决定了日军在曼德勒防线必将崩溃的命运。因为占据了敏铁拉的英第4军，犹如一把钢刀插在了曼德勒守军南面的后背。其实，就在木村兵太郎中将调兵力反扑敏铁拉的时候，蒙巴顿已将尚能调用的兵力统统投入曼德勒外围，伺机拿下曼德勒。

在曼德勒西南俯视该城的山上，筑有日军的机枪地堡群，防卫森严，守敌为第15军的第15师团主力；其他的第31和33师团，则分别守卫在城市南部至眉苗一带。

主攻曼德勒的是斯托普福德的第33军，3月14日，他们逼进了杜弗林要塞，并于15日完成了对它的包围。英军乘筏排渡越70米宽的要塞护河，一次又一次企图攻占要塞，但都没有成功。英军对泥土堆成的高墙进行的持续炮击见效甚微，甚至调来中型火炮进行抵近射击，出动飞机轮番投下密集的炸弹，也没有起什么作用。经发电请示蒙巴顿同意，斯托普福德决定绕过杜弗林要塞，留待以后再攻取，而从其他方面进攻市区。

日第15师团驻守在杜弗林要塞的部队，见英军绕开了自己，逞强好胜的柴田师团长下令放弃要塞，折回市区与英军交战。可是，一离开坚固的要塞，仅有轻武器装备的日军，根本不是配有坦克战车的英军的对手，很快被

击败。第 31 师团的正面也被英军突破，接着眉苗也落入英军之手。3 月 20 日，日第 15 军司令官片村四八中将见下属各师团将陷于被分割包围的境地，遂下令撤出曼德勒，向东南方向的恰随突围。当日，英军完全占领了曼德勒。

曼德勒是缅甸国土的正中心，交通辐接，商业鼎盛，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都居于重要的地位。它的收复，无疑是英军重入缅甸以来的重大胜利。蒙巴顿在攻占曼德勒两天之后便来到了这里，他对斯托普福德将军表示祝贺，并慰问了攻城部队。然而，他在城里巡视了一遍后，又不禁感慨道：“看我年轻时曾经来过的地方在这次战斗中被烧为焦土，真使人感到伤心。”

此时，缅北的日军在中国远征军的打击下，已苟延残喘；而整个缅甸中部已落入蒙巴顿指挥的英军之手，到仰光的道路已经打开。在这几周的战斗中，英第 14 集团军所属两个军的伤亡人数约 1 万余人，而日军的损失更大，大抵要占他们已缩减了的兵力的 1/3。当日军沿着一条漫长而崎岖的道路向东南方向撤退时，又损失了许多装备。这样，他们在缅甸继续抵抗的前景也就更加黯淡了。

然而，仰光的大门虽为蒙巴顿洞开着，但他必须迅速到达那里，因为雨季即将来临，又因为美国运输机将于 6 月初解除在缅甸战场上的任务而派往中国。敏铁拉距仰光近 600 公里，蒙巴顿能否顺利地占领仰光，从而完成反攻缅甸的最后一战，取决于他的部队能否赢得和时间赛跑的胜利，以及他还能制定出什么出奇制胜的计划。

正是：奇兵穿插赢顽敌，攻取缅都须急袭。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章分解。

第十九章 最后的胜利

催兵励马占仰光，日本败势如秋蝗；
一鼓作气坚战意，敌酋蒙辱来投降。

英国第 14 集团军各部队这时主要集结在曼德勒、敏铁拉和稍埠地区，且控制着南至温敦江那段通往仰光的主要公路，现在剩下的任务就是粉碎日军的一切抵抗，并在雨季前一举攻克仰光。

斯托普福德的第 33 军行动比较早，他们在打下曼德勒以后即开始南下。而集团军所属的另一个军——梅塞维的第 4 军则由于连续几周的远程穿插和在敏铁拉与敌进行反复、激烈的争夺战，部队已经有些疲惫，所以南下行动迟缓。然而，第 4 军拥有 3 个师和 1 个坦克旅，又久经沙场，恰恰是蒙巴顿最器重和仰仗的主力。

梅塞维的进军路线是一条坑坑洼洼的破旧沥青公路，四周尽是从林覆盖的群山，山上还有成团成伙的日本兵沿路进行袭扰。庞大的车队和步兵在公路上，缓慢地向南移动着，梅塞维则坐在自己的指挥车里忧心忡忡。

集团军军长斯利姆对这支主力部队的推进速度不满意，他写了一份便笺空投给梅塞维：“我清楚地了解——而且如果我不清楚的话，也许会有许多人愿意提醒我注意——一支机械化部队仅仅限制在一条公路上行进，而

且还要抢在时间的前头，冲过不断袭扰的敌军部队，奔袭仰光，这实在是极其轻率的、可能也是相当非英国式的军事行动。然而，我了解自己所担的风险和一旦失败所招致的惩罚，但我准备承担一切……沸腾于整个集团军上下的激昂情绪已是一种看得出摸得到的实实在在的东西，我也同样希望您怀有这种情绪。”

梅塞维随便浏览了一下便笺，心底骂了一句：“该诅咒的斯利姆，自己舒舒服服地呆在后面，却来教训我，我真不知道要我走的是一条什么样的路呵。”

尽管他与斯利姆平常的个人关系不错，斯利姆对他也很赏识，他的军长职务就是斯利姆在蒙巴顿面前极力推荐才获得任命的，但梅塞维还把斯利姆那张亲笔便笺揉成一个纸团，扔出车窗外。

4月8日，斯利姆闻知梅塞维仍在以那样迟缓的速度行进，知道自己的话并未奏效，立即给此时已在康提总部的蒙巴顿去电，请战区总司令直接敦促梅塞维的行动。

通过若开战役和这次在敏铁拉打的几次硬仗，蒙巴顿对梅塞维非常赏识和喜欢，他觉得这个勇将不会存在什么战斗情绪不高的问题，其部队之所以南进迟缓，一方面确实有道路不好等一时无法改变的客观原因；另一方面也要理解，做为一个直接带兵打仗的战地指挥官往往具体的、局部的问题考虑得多，而从全局角度考虑得少。

一旦向他说明了全局利害，梅塞维会克服重重困难加快自己前进步伐的。考虑了几天后，蒙巴顿给梅塞维发去了一封电报。

蒙巴顿后来回忆这封电报的内容时说，“我告诉他，如果我们在雨季到来前未占领仰光，第14集团军将陷入困境，只能通过一条沥青路获得补给，而日军将能够很容易地控制这条道路。我还告诉他，如果在加快进军程度的过程中，他的士兵中死亡人数达到了3000人，我将对此负责。我说明了这一切后，他答应立即前往第5师的先头部队，催促他们尽快前进。”同时，蒙巴顿又向梅塞维指出，为了保证英军在6月份以前拿下仰光，他必须在4月下旬占领敏铁拉至仰光之间的东吁。

木村兵太郎中将竭力挣扎，拼命招架。他命令从曼德勒突围出来的日第15军向东吁集结，尽管这个军的各师团已严重减员了；还决定把从北方撤下来的编制仍较齐全的第56师团作为后备力量的核心来使用。第15军各师团残部从曼德勒挣脱出来后，现在还在梅塞维的第4军的后面，他们为了南下同自己的部队汇合，竭力争取抢在英军之前到达东吁。东吁附近有5个野战机场，仰光正处于从东吁各机场起飞的战斗机的航程范围之内。日军要守住仰光，就要首先到达东吁，加强那里的防御力量。

如果日军真的抢先赶到东吁的话，英军失去的将不仅仅是夺取机场的机会了。

计划中对仰光实施小规模两栖进攻的日期已提前到5月初，因为这个时间一过，海上条件恶劣，英军将无法登陆。梅塞维的部队只剩下半个月左右的时间了，而进军的路程还有一多半！日第15军从曼德勒冲出来后，本来要往掸邦高原撤退和休整，而且部分部队已经抵达了那里。木村命令在掸邦高原所有的日军马不停蹄、日夜兼程直接向东吁扑去，因为相对说那里与东吁的距离最近。冲在头里的是业经整编并又重具相当实力的日第15师团。很快，该师团就与梅塞维军的主力平行急驰，因而从空中可以看到两股尘烟

滚滚的洪流，几乎是并驾齐驱地向前挺进，中间仅隔着一道窄窄的栅栏——一条丛林覆盖的山脉；

在这个紧要关头，是缅甸人民帮了英军的忙。如果说许多缅甸老百姓在日军占领初期，还被日本所宣称的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帮助缅甸人摆脱西方殖民枷锁”等华丽的辞藻迷惑过的话，战争后期已认清了日本强盗的侵略嘴脸，盼望盟军能早日赢得这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克伦族游击队发挥了熟悉地形的优势，他们炸毁桥梁、堵塞公路、袭扰日军的军用车辆和行进中的步兵，使拼命赶路的日本人遭到了层层阻滞。梅塞维的部队终于赶到了前头，他们加快了挺进的步伐，继续向东吁进发。

不过，第4军的先头部队——第5英印师在前进过程中，于央米了首先遭到了驻在那里的一支日军守备队的阻击。虽然英军坦克隆隆开过这个尽是茅屋的小镇，但日本士兵却乘黑夜潜回该镇并筑下防守工事。到黎明时，他们的反坦克炮控制了镇口的公路，英军不得不把他们全部消灭掉。在接下来向瑞苗行进的过程中，英军补回了耽误掉的时间。公路在瑞苗外将穿过一个黑乎乎、阴沉沉的峡谷。就在行进中的队伍已经望得见峡谷的时候，发现一股日军正在山上挖着工事，第5英印师的勇士们赶上去消灭了这股日军。道路再次扫清，现在距仰光还有400多公里，而离东吁近在咫尺。

4月22日，当第5英印师的坦克以破竹之势冲进东吁时，日本人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一个站在值勤哨位上的宪兵竟举手阻击一队坦克通过，却被一碾而过。

等日本人醒悟过来的时候，他们在英军横冲直撞的坦克面前已经无能为力了。奉命血战到底的日本官兵第一次显出了惊慌失措的状态而狼奔豕突。

第5英印师在东吁给日军以粉碎性的一击后，遵照总部的指令并不作片刻的停留。

他们直接穿过该镇并于次日抵达以南55公里的彪关。那儿的一座大桥已被日军炸毁，师工兵营迅速架设了简易桥梁，使部队继续挺进。紧随其后的是第17英印师，该师在科恩将军的率领下，保持着与第5师的密切协同。两师部队进抵彬韦贡时，距仰光的路程还有200多公里。

在这个关键的时候，木村兵太郎离开了仰光城赶往勃固。勃固位于仰光东北正面的80公里处，是英军沿公路南进仰光的必经之路。木村现奉日本南方军总司令官寺内寿一大将的直接命令，不惜一切代价守住缅甸南方。因为雨季即将来临，所以本村认为蒙巴顿不会试图从海上登陆袭击仰光，并考虑到仰光是一个从陆上无法防守的海港城市，于是决定坚守勃固，进行决战。他从毛淡棉调来了独立第24混成旅团，并新编了两个旅团，其兵员来自仰光的卫戍部队、交通线警备队、海岸守备队，甚至还有在仰光的日本侨民。总之，能搜罗来的都被驱赶到了勃固防线。

这次，该科恩的第17师打头阵了。4月26日，该师打垮了守在一段狭路周围的日军的抵抗以后，于4月28日抵达勃固城郊。随即，遭到了日军炮群的轰击。梅塞维命第5坦克旅前去助战，并绕过勃固去切断莫英意水库东面的日军退路。当第5坦克旅的谢尔曼式坦克隆隆开向那里时，木村命令数十辆日军坦克前去迎战。木村现在手头仅有这些坦克，是日本“三·五式”超轻型坦克。严格地说，这种轻型坦克不能算作坦克，它状如一只方铁箱子，正面装甲只有主战坦克的一半厚，没有旋转炮塔，只配备2至3挺大口径机

枪。坦克战斗全重仅 4.5 吨，甚至能装在大卡车上运输。日本是个资源匮乏的国家，它舍不得用几十吨的钢铁去制造像 32 吨的“谢尔曼式”或 50 吨的“潘兴式”那样的坦克，它的坦克部队多数是由轻型坦克组成的。当然，无论是谢尔曼式还是潘兴式坦克，也不是英国人造的，而是那个物质实力雄厚、号称“民主国家的兵工厂”的美国制造并提供的。

日本兵驾驶着那些仅几吨重的“方铁箱子”与英军第 5 坦克旅相遇了。尽管他们英勇无畏地向前冲去，但他们的机枪射在谢尔曼式坦克上仅碰出一串串火星，根本穿不透它那厚重的装甲。相反，庞大的谢尔曼式坦克群几乎没怎么动用坦克炮，很快就将日军的几十辆“方铁箱子”碾成了一堆堆废铁，来不及跑出来的士兵成了里面的肉酱。在钢铁的较量中，日本人自然无法取胜。

勃固城郊被英军控制后，科恩分兵两路同时突进，发起了攻城战斗。北路用一个旅，东和东南一路投入他的装甲部队。北面那个旅冲杀战斗，穿过房屋建筑，迫近了公路桥。坦克在这个地区行动困难，不能充分发挥威力。随同坦克前进的步兵，奋不顾身地投入逐屋逐堡的争夺战，猛攻市区河流上的各个桥梁。印度步兵冒着猛烈的扫射，匍匐爬过炸歪了的桥梁，歼灭守桥的日兵。然后，更多的同伴攀爬过桥，或是乘筏排、游泳过河，投入战斗。经过 4 月 30 日一天的战斗，英军在夜幕降临时，已占领勃固城的北部。

次日，城南的日军开始从勃固向仰光撤退；而在此前，木村兵太郎见守城无望，已先期返回了仰光。于是，科恩的第 17 英印师紧随着日军撤退的脚步，占领了城南，从而完全控制了整个勃固城。

这里离仰光还有 80 公里，梅塞维要率领集结在勃固的第 17 师和第 5 师发起最后的冲刺。然而，正当先头部队拥出城去踏上仰光公路的时候，天上乌云密布，闪电划破长空，暴雨瓢泼而下。英军一直在同雨季赛跑，而雨季却提早 2 周来临了。几小时之内，英军需要用作简易机场的平地已被大水淹没，看上去仍然完好的公路已成一片泥沼，沟渠河谷化为股股汹涌的急流。勃固河开始哗哗作响，而且很快就要咆哮起来了。

梅塞维的第 4 军在和时间的赛跑中，还是输给了雨季。他们的坦克、大炮、车辆以及步兵纵队，被暴雨和洪水阻滞住了。当然，如果他们不是在勃固争夺战中被耽搁了几天，区区 80 公里的路程他们会一下子冲过去的。而正是失去的这几天时间，使梅塞维将军失去了由他的部队首先攻入仰光、进而解放缅甸首都的个人荣誉了……

康提。4 月下旬，蒙巴顿由于患恶性阿米巴痢疾而病倒了。虽然病卧在床，但他仍然在自己的房间里召开了一系列重要会议，同时不断通过电讯和前方保持联系。

“蒙巴顿干得好极了，疾病没有把他压倒。”布朗宁参谋长后来回到伦敦向布鲁克汇报情况时，这样说。

在梅塞维部队的整个南下进程中，蒙巴顿一直关注、鼓励并空中支援着他们。

他一方面希望他所喜欢的梅塞维能获得最先攻进仰光的荣誉，另一方面又担心他们不能及时抵达那里，从而累及了夺取仰光的全局。他翻出了那个曾被人否定而自己仍念念不忘的“德拉卡拉”计划，此时此刻他觉得它还有用，尽管目前已无须展开那么大的规模和兵力，但对仰光进行两栖登陆作战的基本精神还适宜于现在。特别是它作为万一第 4 军不能及时到达仰光的

一种保险措施，更有着非常紧迫的现实意义。

他决定从驻守在吉大港至若开一带的克里斯蒂森的第 15 军中，抽出一个师的兵力执行两栖登陆任务，这个师将配署一个中型坦克团和一个伞兵营，并紧急搜寻了一些登陆艇集结待命。

当蒙巴顿接到梅塞维军在勃固一带果然被雨季阻滞的报告后，立即下令于 5 月 1 日起，实施对仰光的两栖登陆计划。

仰光位于缅甸全境的南端，濒临印度洋的莫塔马湾，它是缅甸最大的港口，也是缅甸的首都和最大的城市，此时人口约 60 多万。勃固被英军攻破后，日本人扶植的缅甸傀儡政府正在忙于撤退；日本侨民正在被组成志愿队用来守卫仰光；驻缅日军各机关正在烧掉文件和密码本，捣毁机器设备。木村兵太郎为避免被英军活捉的下场，逃离了仰光，临走时他让日第 28 军司令官樱井省三中将负责防守。樱井接手后，自知带领那些残兵败卒根本无法守住仰光，随即也带着自己的残余人马向锡唐河方向逃去。

5 月 1 日，英军在发动两栖登陆之前的几个小时，蒙巴顿令空军飞越仰光上空进行侦察，发现在市内监狱的屋顶上涂写着“日本人滚蛋了”的标语，才知道日军已经逃之夭夭了。然而，登陆计划继续实施。黄昏，廓尔喀伞兵营在仰光河口着陆，同时两栖部队在仰光港口附近登陆。2 日，他们合为一路在未遇任何抵抗的情况下进入了仰光城。5 月 6 日晨，从勃固南下的梅塞维的第 4 军先头部队，也终于开进了仰光。

至此，缅甸实际上已完全解放。

5 月 10 日，蒙巴顿从康提飞抵仰光，对这座被日本人占领了 3 年多的城市回到了盟军的手中，他非常高兴。他感谢英国的、印度的、非洲的、廓尔喀的等等不同种族的士兵们的英勇奋战，同时慰问了一些饱受苦难的仰光居民。当梅塞维垂着头向他表示惭愧的时候，蒙巴顿宽宏大量地拍了拍他的肩头：“虽然你们没能及早赶到，但是，如果不是你们的快速推进并在勃固击破了日本人的防御，因而迫使木村中将撤离了仰光，两栖部队肯定会遇到激烈地抵抗。真正的胜利还是属于你们的！”

夺取缅甸之后的下一个重大步骤是进攻马来半岛及其新加坡。为此，热衷于制订计划的蒙巴顿又推出了取名为“拉链行动”的作战计划。他本打算在 7 月份实施，但还是由于拨给他的舰艇、飞机和兵力不足，而被束之高阁起来。

7 月中旬，蒙巴顿被丘吉尔叫往柏林参加波茨坦会议。由于欧洲战事随着 5 月 9 日德国正式签署投降书，已于两个月前结束了，波茨坦会议主要研究对日作战问题，所以需要蒙巴顿代表东南亚战区总部前来参加。

蒙巴顿抵达柏林的当天晚上，丘吉尔就请他去吃饭。当蒙巴顿来到丘吉尔下榻的胖特烈大帝的宫殿时，丘吉尔的举止显得很神秘，他只是和蒙巴顿碰了碰手，然后把头伸到门外探望了一下，关上门，又亲自拉好了窗帘，这才把蒙巴顿拉到身边轻声说：“你又得改变计划了……”

没等他说完，蒙巴顿脱口而出：“这次绝不！”

“一定要改，甚至可能还得放弃。因为在你的“拉链”计划实施之前，日本人就已经宣布投降了。”

“你怎么知道？”

丘吉尔又降低了声音说：“这是绝密的消息。斯大林和他的情报人员现在还不知道，他们也来波茨坦开会了。你一定不要走露消息，美国人已经制

造出了原子弹，他们准备把它投向日本，这样日本会很快投降的。”

真不走运。蒙巴顿刹时感到自己的又一项计划将要告吹了，而且它很可能恰恰是自己在东南亚战区事业上的顶峰。

7月17日下午5时，美、英、苏三国首脑齐坐在波茨坦西席林—霍夫宫里一张由斯大林特意带来的大圆桌旁，召开了著名的波茨坦会议。包括蒙巴顿在内的各国代表团高级成员，则分别坐在稍后一排的椅子上。罗斯福总统已于3个月前突发脑溢血病逝了，继任的杜鲁门总统前来参加会议。而实际上这次会议之所以开了两周之久，原因之一就是丘吉尔将要在会议中途返回伦敦参加大选，看来他的位子也有些坐不稳了。果然，会议后期那张大圆桌旁英国首相的位子，由新当选的艾德礼坐上了。

8月2日，波茨坦会议一结束，蒙巴顿即先返回了英国。5天前，丘吉尔被英国选民们赶出了唐宁街。事先，丘吉尔蛮以为英国人民会让他再干上5年，因为他为拯救大英帝国所作的贡献之多，定会使他在大选中稳操胜券。然而，英国选民们把他和他的保守党内阁统统赶下了台。对此，丘吉尔感到惊愕不已，他大骂英国人“忘恩负义”，但还是不得不接受了这个现实。

蒙巴顿对这个选举结果也感到“不可思议和令人难以置信”。不过，他向以不介入政治自居，因为作为军方的高级将领和王室成员，他必须要这样做。他现在只关心新的工党内阁，对他的“拉链”计划持何种态度。他和新首相艾德礼早就相识，私交也不错，而且艾德礼性格温和，易于倾听别人的意见。蒙巴顿感到与他谈论问题，反而比跟丘吉尔议论事情更容易一些，尽管丘吉尔曾提携过他并一直庇护着他。

他对艾德礼说：“封上瓶盖是错误的和愚蠢的。”因为在蒙巴顿看来，日本现在还没有投降，就是它宣布了投降，也有实施“拉链”计划的必要。放弃这个计划的错误在于，那等于说盟军无视饱经苦难的当地居民希望狠狠打击日本军队的正当要求；其愚蠢在于，如果不通过“拉链”计划使英军尽快登上马来半岛，战后就会使英国失去在当地人民中的形象，甚至永远失去了英国在那里的存在。因此，不设法在那里跟日本人打一下，英国人就没有面子和荣誉。

艾德礼同意蒙巴顿的观点，答应他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自主决定是否实施“拉链”计划。

于是，他没有必要再呆在伦敦了，他要赶紧回到战区司令部去。8月7日，他乘坐一架4个引擎的约克式大型轰炸机从伦敦起飞，中途除了加油以外，几乎没有停留。

结果，31小时内飞行了6343英里，打破了当时所有的远距离飞行纪录。

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同时，他从英美联合参谋长会议接到命令，接管菲律宾以南的整个西南太平洋地区，目的是使麦克阿瑟的美军部队能从这些地区脱出身来去占领日本本土。

次日，英国参谋长委员会又给他下达了新任务：（1）重新占领已光复地区中的关键地域，确保对已投降的日军的有效控制，解除日军武装；（2）努力尽可能早地释放英国和盟军的被俘人员和其他被日军监禁者。

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在整个东南亚战区现仍有大约50万日本陆海空部队散驻在数百万英里的范围内，另外还有100多万“不太安稳的”当地日本傀儡军和抗日游击队交织在一起。没人能肯定各日军部队是否已收到了投降命令，也没人能保证一旦恢复了英国人的统治，那两部分“不太安稳的”

当地武装是否会不约而同地起来反抗？

蒙巴顿立即行动起来，他命令立即实施“拉链”计划，以任何可能得到的部队向马来亚和新加坡进军。同时，他指示沃克中将率领包括扫雷艇在内的各类军舰所组成的混合舰队，立即冒着雨季时节的风暴出海；命令其他部队迅即出动，前往香港、西贡等地接收日军司令部。他还给此时在伦敦的妻子发了一个“十万火急”的电报，要她立即带着救护队赶来东南亚，帮助救治将要从日本集中营里获救的伤病战俘。

然而，几天以后，麦克阿瑟给了蒙巴顿当头一棒。此时麦氏已充任了盟军对日事务的最高负责人，他命令蒙巴顿在8月31日东京受降仪式正式举行之前，不要采取任何军事行动。后来由于台风袭击日本列岛等原因，受降仪式推迟到9月2日在美国的“密苏里”号战列舰上举行。

接到麦氏的命令，蒙巴顿勃然大怒。他后来自称，当时他想到了那些仍在日军铁蹄下、监狱里受苦受难的人们，在胜利之际，绝不能让他们再无缘无故地多受两周的折磨；他想到了业已出发的部队，如果再命令他们停止前进将会带来难以想象的混乱，其中许多小型舰艇在返航途中肯定会被风暴所吞噬。抱着一线希望，他给伦敦参谋长委员会打了急电。

回电让他遵守麦克阿瑟的命令，同时麦帅又来电督促他执行命令，电文的用词十分粗鲁，虽然这也可能是美国人的方式——“路易斯勋爵，穿好裤子等着，不要着急。”

蒙巴顿对这种粗鲁的玩笑并不欣赏，马上恼怒地回电反击：“如果你能把我区日本人的裤子都脱下来，我当然不着急。”他决心按照自己的既定计划行事。

9月9日，蒙巴顿下令英军在马来亚的波德申和巴生港附近的莫里布登陆。“海滩的情况比预想的要糟糕得多，”具体负责这次行动的指挥官奥弗雷·罗伯茨在日记中写道，“有47部车辆在海滩上陷进去了。”

不出蒙巴顿所料，虽然日本天皇早已宣布了投降，但这里的日军还是进行了抵抗。由于登陆行动的突然性，一个只配备轻武器且士气沮丧的日军师团，很快被解决掉了。尽管如此，英军还是遭受了一些挫折，许多士兵的鲜血洒在了沙滩上……

战争最终结束了。

在盟国所有的高级将领中，蒙巴顿对日本的态度是最强硬的。因此，他在战后访问过许多国家，却从来没有访问过日本，日本人也不欢迎他。在日本受降问题上，他从一开始就跟总负责这件事情的麦克阿瑟有不同的意见：

我们如果对日本人手软，我们将会犯严重的错误。我担心，如果我们不能使日本人遭受彻底失败的耻辱，即把他们打回老家去，日本领导人将会利用你没有给他们以粉碎性打击这一事实向他们的人们灌输下述思想，即日本是被科学而不是在战场上被击败的。

一般说来，我不是怀有报复心理的人。然而，我总是感到，如果我们对日本的领导人不强硬，他们最终还会卷土重来，再发动一场战争的。

在给一位私人朋友的信中，他的态度更加强硬。他认为，战争应当一直进行下去，直到日本天皇本人亲自到马尼拉（麦克阿瑟进入日本之前他的

司令部曾设在那里)来投降。这样做将会使战争再延长2至3个星期,也许再动用原子弹,但是他认为,这样做“将会永远地摧毁现在看来被挽救下来的日本封建主义和军国主义机器”。

而麦克阿瑟的看法与此不同,认为缴械投降是一种古老的作法,“将导致败方的丢脸和丧失信念”。对麦氏居然要亲自跑到日本,接受其领导人在很少有下级在场的情况下投降的作法,蒙巴顿不以为然。他坚持在他的战区内,日军投降应由所有的日方高级将领在他们自己的部下面前,举行正式的签字仪式;而且,一定要当场象征性地对他们进行缴械,并将这些佩刀、枪枝等作为战利品分发给在场的盟军军官和军士。

他果然是这样做的。1945年9月12日,东南亚盟军司令部的一正式投降仪式在新加坡举行。由于日本南方军总司令寺内寿一元帅(1945年4月晋升)事先被告知了仪式的程序,忍受不了这种格外的侮辱而称病不去,由板垣大将代表他参加仪式。这一天,板垣大将率领缅甸方面军司令官木村、第3航空军司令官木下、第18方面军司令官中村、南方军总参谋长沼田、第10方面舰队司令官福留以及第2南遣舰队司令官柴田等高级将领来到新加坡特别市政厅,他们当场解下佩刀双手递交给盟军军官,然后在投降文件上签了字。

板垣等几位日军将领,想走上前去与身着笔挺的白色皇军海军上将制服的蒙巴顿握手寒暄,被蒙巴顿断然拒绝了。事先,所有将要参加仪式的盟军军官还得到通知:无论对方怎样主动,所有人都不得与日本人握手。

“接着,我命令他们离开市政厅。”蒙巴顿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我一生中从来没有见过如此令人厌恶、恶心和野蛮的脸。一想到如果在他们的统治下世界将会是什么情景,我就不禁感到战栗。当这些日本人离开座位,蹒跚地走出去的时候,他们看上去就像是一群猩猩,穿着布袋一样的马裤,膝关节几乎拖着地面……”

仪式结束之后,蒙巴顿乘车“穿过密集的人群,在无尽无休的雷鸣般的吹呼声中”返回几公里外的英军司令部。不过,他对当地居民真诚祝贺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欢呼声却理解错了:“我想,这一情景生动地体现了新加坡人民欢迎英国重返的心情。”正像一位英国传记作家后来所评论的那样:“如果不是感情激动,蒙巴顿是不会对人群的热情发出以上有政治倾向性的见解的。但是,在胜利的时刻,他的失言应该是可以谅解的。”

为了奖赏蒙巴顿在整个战争期间的功劳,特别是他指挥英印军队在缅甸击败日军的辉煌业绩,艾德礼首相向英王提议封他为“缅甸蒙巴顿伯爵”。乔治国王为王室成员中能有人凭着自己的功绩而获得这个荣誉,感到特别愉快。由于蒙巴顿没有儿子,英王还作了一个不同寻常的决定,准予蒙巴顿的女儿们继承爵位,以免使这一荣誉在蒙巴顿身后中断。

蒙巴顿听到这一喜讯后,高兴之余也夹带着一丝伤感。他对从父辈那里继承下来的“路易斯勋爵”的称号抱有终生的留恋,有着近乎迷信的那种感情,认为它给自己带来过许多好运。然而,他在领受更高一级的荣誉时便顾不得那些了,毫不推辞地接受了“缅甸蒙巴顿伯爵”这一称号。

尽管离开英国海军舰队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但蒙巴顿内心最喜爱的还是真正的海上生涯。战争结束了,做为一个战区的最高司令官、一个获得了伯爵称号的海军将领,他为皇家海军带来了荣耀,现在他想要回到海军去,继承他先辈的事业,继续寻觅他少年时的梦想。1946年6月,蒙巴顿

抱着重返海军舰队的强烈愿望回到了英国。正是：东南亚战区功名成，光荣返国奔前程。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章分解。

第二十章 印度总督

重返海军梦难成，印度独立掀飓风；
蒙氏赴任忙折冲，是非功过待议争。

从东南亚返回伦敦后，蒙巴顿和夫人埃德维娜过了一段安静的家庭生活。在此期间，他还愉快地主持了时年 22 岁的长女帕特里夏的婚礼。女婿是个令人喜欢的年轻人，他的父亲也曾经在皇家海军中服过役。

1946 年早些时候，伦敦的小道消息流传说，蒙巴顿将出任驻澳大利亚或南非的英国总督；也有的说，他会被派往中东地区担任驻某一个国家的大使。蒙巴顿对这些传闻不屑一顾，战争的需要使他立志像他父亲那样成为英国第一海务大臣。但是理想的风帆并非那般顺心遂意，然而他却一如既往初衷不改。此外，他觉得一个有着担任过战区最高司令官的经历、并且年富力强（蒙巴顿此时 46 岁）的人，能为皇家海军干不少事情。

海军也需要他。1946 年底，蒙巴顿被预任为英国地中海舰队第一巡洋舰队司令。

转年 1 月 6 日，他被送往朴茨茅斯海军学院高级将领班进修，为担任这个新职务接受岗位培训。然而不久，蒙巴顿发觉自己又将要离开皇家海军了。

此时，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已岌岌可危。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印度人要求独立的呼声和力量在稳步而强劲地增长，虽然屡遭英国殖民当局的镇压，但独立的火焰一直没有被扑灭。蒙巴顿回想起两年前在德里跟尼赫鲁的一次聊天时，他提到 1922 年与埃德维娜在德里大学第 13 号房间私订终身时的幸福情景，尼赫鲁听罢，皱着眉头不无讥讽意味地说：“当您和您的姑娘在 13 号房间里欢乐时，我还正在贵国设在德里大学附近监狱里的第 13 号牢房关着。”一席话，说得蒙巴顿一脸尴尬色。

是共同的反法西斯战争，减缓了印度人民及其各党派对英国的压力。然而战争结束后，印度民族独立运动又迅猛发展起来了。

丘吉尔的保守党内阁执政时，尽管在对殖民地政策方面作了一些调整，但他们在印度独立问题上的基本态度是强硬的。1945 年夏季，艾德礼的工党政府上台后，已明显感觉到英国经过长达六七年战争的折磨，经济实力大为削弱，再去大规模镇压印度的独立运动确已力不从心，因而允许“在大多数印度人同意的前提下，印度可以取得独立地位，并保持同英国悠久而特殊的友谊”。此后，工党政府便开始从印度逐步撤出英国的一些人员和机构。

当从英国殖民统治下获取独立的希望还很渺茫时，印度（当时它包括今天的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的两大教派——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的教众们联合起来为独立而斗争。但在 1945 年英国工党政府答应给印度独立地位时，两大教派本来就有的潜在矛盾开始公开化了。当时的印度，信奉印度教的人约有 2.55 亿，而信奉伊斯兰教的人只有约 9200 万人。穆斯林们担心

在一个中央政府之下，他们会成为受迫害的少数。此外，还有为数众多的其他小民族和小教派，在印度历史即将发生转折性变化时，纷纷起而争取自己的地位和权力。各派之间的冲突和角逐是如此之激烈，以至于曾在一次流血冲突中竟有 8 万余人伤亡。以印度教信奉者为主体的国大党要求建立一个独立的、统一的次大陆国家，而穆斯林们则要求建立自己的国家——独立的巴基斯坦。这就是当时激烈冲突的主要症结。

民族冲突在整个次大陆上蔓延：加尔各答、孟买、比哈尔和东孟加拉，到处都有不同教派之间相互残杀的悲惨画面；旁遮普邦此刻也犹如一堆干柴，点点火星即能酿成漫天大火。更可怕的是，有迹象表明，各地方政府机构、当地警察甚至印度籍部队的纪律在分裂情绪的影响下已经开始崩溃。英国侨民们都感到，一场大灾难即将来临。显然，有必要采取紧急行动了。但是，到底采取什么样的紧急行动还不清楚。

此时的印度总督还是韦维尔。他是个倔强的老军人，但缺少想象力和应变能力，显然无法应付这种错综复杂的局势。艾德礼首相对他很失望，决定让蒙巴顿去接替他的职务。

艾德礼认为，蒙巴顿具备担任印度总督所需的各种条件：他在东南亚战区任职时，“已成功地塑造出自由的非殖民化人物的形象”；作为享有盛誉的英雄，“他的任职起码能缓和某些帝国主义者的担忧”；选择英王乔治的表兄弟担任印度总督，对印度的王公们也有吸引力。此外，蒙巴顿跟国大党领导人尼赫鲁之间的个人关系也不错，他曾于二战期间在是否关押尼赫鲁的问题上持有过开明的态度，尽管后者还是被韦维尔等人再度逮捕。艾德礼说，“蒙巴顿活跃随和，能同各种人相处，是国大党的领导人最容易接受的人物。此外，他还有一位不寻常的夫人。”艾德礼唯一的担心是蒙巴顿本人，是否愿意接受这一使命。

蒙巴顿不愿再度离开他在皇家海军中的岗位，对重返印度任职一时显得很犹豫。

于是，他首先去找乔治国王征求意见，国王对他说：“迪基，你应该去印度。事实上，只有你才能把那儿的事情处理好。这不仅是因为当地的著名人士都喜欢和尊敬你，而且还因为你是一位亲王的儿子。他们对我个人宣誓效忠过，这是一种承诺。

我们答应他们独立，也只有我们王室的一个成员亲自去，才能使他们相信我们双方可以解除这种承诺。”

至此，蒙巴顿别无选择。不过他仍向艾德礼首相提出了 3 个条件：第一，无论印度的事态如何发展、各方能否达成协议，英国最迟将于 1948 年 7 月以前撤出。蒙巴顿认为，如果没有一个移交政权的日期，印度人决不会相信他是去废除殖民制度，而不是维护殖民制度的。由于他的坚持，内阁作出明确指示：“移交权力的日期可以在一个月之内的任何一天。但是，你应该争取把日期定为 1948 年 6 月 1 日。”第二，他要亲自挑选自己的工作人员，而且有权调整已在德里任职的英国官员。艾德礼表示同意。第三，也是他个人最顾虑的一个条件，即要求把他的名字仍保留在皇家海军现役人员的名册上，这样不至于影响他将来能重操旧业。蒙巴顿的这一要求同样得到了满足。

1947 年 2 月 1 日，蒙巴顿在伦敦正式接受了大英帝国驻印度总督的职务。接着，内阁发言人又公布了新总督的启程日期：3 月 20 日。在临行前的几个星期他整天忙忙碌碌，又是会议，又是吹风；还要整理行装，打防疫

针。此外，还要同亲戚朋友会面话别，参加庆祝活动等等……

1947年3月22日，蒙巴顿携夫人抵达德里。在骑兵的护送下，他们乘坐敞篷马车来到总督府——卢蒂恩斯官。韦维尔在红地毯铺设的台阶上迎接了蒙巴顿夫妇。蒙巴顿和埃德维娜向韦维尔鞠躬致意，此时此刻，印度总督仍是韦维尔，蒙巴顿必须在韦维尔次日上午离开德里后才算上任。

两天以后，英印当局举行了新总督的就职典礼。按照传统习惯，新总督在这种场合应穿戴华丽、言语不多。然而蒙巴顿却一反惯例，穿着朴素，并向所有来参加典礼的英国人和印度人发表了讲话：

虽然新总督一般不在宣誓仪式上讲演，但我很愿意向你们，向印度人民讲几句话。

我所担当的不是通常情况下的总督，我们伟大的国王已经决定于1948年7月以前移交权力。……我相信每一位印度政党领袖都和我想的一样，认识到当前的形势是严峻的、我们的使命是艰巨的。我希望尽快与你们协商，尽一切可能帮助你们。

同时，我们每个人都需尽其所能地避免可能导致流血冲突的过激行为。我有许多印度朋友，其中有些是在25年前结识的——我夫人和我就是那时在德里大学定下婚约的。最近3年来，我又交了一大批印度朋友，特别是在战斗部队中结识了许多我引以为骄傲的朋友。

做韦维尔总督的继任者不是件容易的事。……然而，我对困难的任務不抱任何幻想。我只需要众人的亲善。今天我就是向印度人民乞求亲善……

这位实际上是大英帝国驻印度的最后一任总督，在演说的最后言辞中，是否对百年来英国对印度的残酷统治夹杂些道歉的意味呢？这只有蒙巴顿本人才清楚。

他宣誓就职完毕后，不久便同印度各党派领导人开始了一系列会谈。每次会谈约1小时左右，一般都在他的书房里进行。他曾想会见印度的各界代表：基督教、拜人教、印度教、伊斯兰教、学者、商人、大学生等等。但是，他很快决定，真正的实权人物才是他会见的主要对象。比如，印度教和国大党有实权的是尼赫鲁、甘地和萨德尔·佩特尔；穆斯林派的最高决策者只有真纳。不把他们当回事，解决这里的问题就一切无从谈起。

蒙巴顿与尼赫鲁首次相遇时，就很喜欢他，蒙巴顿佩服尼赫鲁的才貌、机智和老练。蒙巴顿错误地认为自己理解尼赫鲁的思维方法，但是又正确地估计到，他对尼赫鲁的尊重会使尼赫鲁作出热烈的反应。相反，他对穆斯林领袖真纳的印象却不佳，据他个人的日记记载，他同真纳的所有会谈中从来没有过令人愉快的事，因为真纳先生除了为建立一个独立的巴基斯坦而奋争外，其他任何替代的方案都是不愿接受的。真纳认为，在他与尼赫鲁的争执中，蒙巴顿是偏袒后者的，因而损害了穆斯林的利益。

蒙巴顿就任之初，曾设想了一个方案：为了维持次大陆哪怕是表面上的统一，在中央机构保留一定权力的前提下把印度分成3个部分——印度斯坦邦、巴基斯坦邦和王公土邦。但他很快意识到，这种方案没有一方会满意。到4月中旬，蒙巴顿已肯定，某种分治是不可避免了。只是到底实行什么形式，怎样去实现分治，心里还没有谱。他指示自己的主要助手、总督秘书长

伊斯梅着手准备一个印度分治计划。

计划被很快制定出来了，尽管这会惹恼了坚持次大陆为一个国家的印度教徒，但蒙巴顿还是让伊斯梅于5月3日把它带往伦敦请求内阁批准。

这个方案的主旨是：在次大陆独立后，将分别形成两个独立的国家——印度和巴基斯坦；孟加拉和旁遮普省可以拆开后并入印度和巴基斯坦，也可以作为两个整体分别加入印巴两国，或单独存在。关于王公土邦的地位问题，方案规定得很含糊，暗示由它们自定前途。蒙巴顿要求内阁无论如何要在10天内考虑并通过这个方案。工党内阁在一星期就完成了任务。方案的修正部分是按英国议会的要求搞的，议会希望把几个含糊的地方说清楚。经过修改后的方案更明确地声称，印度的各个不同地区可以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除此之外，方案没有增加新的内容。蒙巴顿认为，方案中唯一会引起混乱的新问题是建议西北边境省也应有选择独立的自由，但又认为必须如此。后来，印巴两国长期为克什米尔问题争执不休，以及克什米尔内部长期动乱和纷争证实了蒙巴顿的预见。但他明知事态会向那方面发展，为什么还那样做呢？显然，给前殖民地留下点隐患，是符合前宗主国的利益的。同时还会满足某些不甘退出殖民地的英国人以某种幸灾乐祸的快感。

经过修改后的方案被送回到德里后，蒙巴顿想把它送给尼赫鲁看一看，因为“我有一种预感，尼赫鲁不会喜欢这一方案”。助手们竭力反对提前向一方透露方案，他们说，把方案只给一方不给另一方是不公平的。蒙巴顿回答说，方案事关重大，不能在程序细节上再挑剔了。不管如何，有可能反对方案的是致力于次大陆为一个国家的国大党，而不是真纳的穆斯林联盟。

5月12日，蒙巴顿在睡觉前派人把方案交给了尼赫鲁。当天夜里，“尼赫鲁简直像发了疯，说蒙巴顿的方案同他所期望的相差太远，完全不能接受”。第二天，蒙巴顿便收到了尼赫鲁的一封信，大意是：方案的整个要求同我们一贯的立场完全不一致。方案中的未来印度使我非常吃惊。事实上，我们所作的努力遭到了破坏。眼前出现的全新的图象是，国家支离破碎，争斗不息，一片混乱。此外，我感到遗憾的是，方案恶化了英印两国的关系。

在尼赫鲁看来，国家的分裂即是灾难。而蒙巴顿则认为，印度为了获得独立就不能不承受这种代价。他还认为统一未必就好，印度教徒和伊斯兰教徒激烈冲突的现实也无法做到这一点，印巴两国可以各走各的路、各过各的日子。不过，他也曾跟别人声称过：“要不是宗教的狂热逼得我无路可走，我决不会同意把一个国家分开的。”

对印巴分治、进而可以建立一个独立的巴基斯坦，以真纳为首的穆斯林联盟自然是赞同的。这实际上也是真纳一生的奋斗目标，至今他被巴基斯坦人民尊称为国父，因为他当之无愧地是巴基斯坦国家的缔造者。尼赫鲁和其他国大党领袖，经过反复磋商后，最终也同意了蒙巴顿方案的基本部分，剩下的就是如何处理数百个大大小小印度王公土邦的前途问题了。

印巴分别独立以后，这些王公土邦怎么办？伦敦的政治家们认为，在印度的英国政府同王公土邦之间的关系是非常特殊的，只要英国在印度的统治一结束，英国对王公土邦拥有的权力和责任随之告终。1947年5月，蒙巴顿又向外界重申了这一观点：“只要印度和巴基斯坦两个国家一成立，英国的至高无上的权力就宣告结束。

王公土邦随之而完全独立。如果愿意，他们可以自由地签订新的协定。”对此，无论是国大党，还是真纳的穆斯林联盟都不赞成。甘地曾经指出，王

公土邦是英国的产物，是首领们为了削弱印度对大英帝国的抵抗而建立的。只要蒙巴顿鼓励王公们独立，国大党就会认为，蒙巴顿是在通过把印度的合法领土巴尔干化，并允许王公土邦这种人为造成的、不民主的时代产物发展来破坏新独立的印度。穆斯林联盟同样希望一些王公土邦并入巴基斯坦，因而也反对让它们独立。

在双方的压力下，特别是在国大党的强烈要求下，蒙巴顿只好出面劝说王公土邦放弃独立建国的想法，虽然在他早先提出的分治方案中以含糊的措词，并不想认真解决这个问题。1947年7月25日，王公议院召开大会，25位主要的王公首脑和74位王公的代表参加了会议。蒙巴顿身穿挂着勋章的华丽的军服走上讲坛。他没有讲稿，滔滔不绝地对与会者进行劝告。他的话时而充满哲理，循循诱导；时而富于感情色彩，不拘礼节。他用无可辩驳的事实说明，这是一次再也不会重复的机会。如果王公们愿意合并，他们内部的自治将受到保护。他的演讲吸引每个听众，因为他知道何时该用毛骨悚然的预言把他们吓得身冒冷汗，何时该用幽默的话语驱散笼罩在他们心头的愁云。有位王公代表当场说，他没有得到王公的旨意，不知如何办好。蒙巴顿顺手操起一块玻璃镇尺说：“让我看一看这块水晶里将呈现什么占卜未来的图象，然后给你答复。”四周鸦雀无声。蒙巴顿煞有介事地鼓捣了一番，然后宣告：“你的殿下请你在合并条约上签字。”

也有难办的土邦，这就是克什米尔邦。克什米尔的居民除查漠以外大多信奉伊斯兰教，但统治这里的王公却是个印度教徒。由于它的边界大部分同未来的巴基斯坦接壤，居民又多是穆斯林，人们一般认为它可能会并入巴基斯坦。然而，在克什米尔印度教王公的眼里，并入任何一方都不好。如果一定要并入某一方，他宁愿选择印度，也不愿选择穆斯林的巴基斯坦。他在无法选择的情况下，下决心把事情拖下去，拖得时间越长越好。私下希望最终能获得独立地位，因为在众多的王公土邦中，克什米尔是最大者之一。

蒙巴顿确曾亲自到克什米尔首府斯利那加去了一趟，劝说王公同意并入巴基斯坦，但没有结果。为此，有些巴基斯坦人看到蒙巴顿劝说克什米尔王公并入巴基斯坦没有成功，便认为他是有意偏向印度；同样，许多印度人也埋怨蒙巴顿没有规劝好理应并入印度的海得拉巴士邦并入印度，认为他照顾了巴基斯坦。到此为止，他再也不想管下去了，这或许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期间，连续6星期我每天要工作17小时，身体快要拖垮了”；或许他有意要留下一个创口，“由新独立的国家自己去解决”，而这样岂不更容易使英国日后对南亚次大陆施加自己的影响吗？

然而，不管还有什么遗留问题有待解决，印巴独立已经不能再延迟了。巴基斯坦和印度独立的日期，分别定于1947年的8月14日和15日，而实际上仅仅相差10多个小时而已。按照计划，蒙巴顿要分别参加两个国家的独立仪式，以示公允。此刻，花一切代价平安度过这两个独立日是他的最大愿望。只要那两天穆斯林和印度教徒不发生冲突，只要英国人和当地人不发生磨擦，就算万事大吉了。此外，他还要想方设法维护英国的尊严和体面，比如他告诫尚未移交权力的各地方英国行政长官说：“独立日那天，英国国旗不要挂得太显眼，防止人们对此不满，采取侮辱行动，这一点要注意。”

由于巴基斯坦独立稍早一点，蒙巴顿先要去卡拉奇参加巴基斯坦的独立仪式，然后马上返回德里参加印度的独立仪式。8月13日，蒙巴顿乘飞机抵达卡拉奇后，乘车来到政府大楼。真纳的军事秘书伯尼上校说，蒙巴顿

去政府大楼的路上，观看的人群远远超过了几天前真纳抵达这里的时候。当晚，真纳举行了盛大的宴会，既是庆祝巴基斯坦独立，同时也是为了欢迎蒙巴顿抵达卡拉奇。蒙巴顿本来不准备讲话，但真纳在说完祝酒辞后，礼貌地请客人也讲几句，蒙巴顿推脱一番后还是在宴会上讲了10多分钟。“他用语准确，掌握分寸，滔滔不绝，”随行的坎贝尔·约翰逊还写道：“他是天生的演讲家，不拘礼节的仪态，小河流水般的语调，同宴会的气氛十分和谐。”

第二天上午，巴基斯坦国民大会开幕，宣布巴基斯坦正式独立。蒙巴顿被邀请在国民大会发表演说，他呼吁结束暴力，声称印巴分治不是断绝来往，而是一种新关系的开始，并要求巴基斯坦保持与英国的特殊友谊。会后，庆祝独立的游行开始。

真纳、蒙巴顿、埃德维娜和真纳夫人一起登上敞篷汽车，缓慢行驶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游行的路程总共有3公里，由于事先得到情报说有极端分子要往敞篷汽车上扔炸弹，所以他们站在车上绷紧了神经。“不过，传说的爆炸阴谋没有成为现实。”蒙巴顿在日记里简要写道。真纳也庆幸伟大的安拉能让客人活着回来。

当天下午，蒙巴顿又匆匆飞回到德里，参加次大陆另一部分的独立活动。

在14日与15日之交的午夜，尼赫鲁在印度立法会议上庄严宣布：“半夜12点，世界处在沉静之中时，印度就要走上独立自由的新生活了。”

此时此刻，蒙巴顿的总督府里一片静寂。他一个人坐在书房里，思绪万千。说实话，对大英帝国这块最大的殖民地在他这一任失去，蒙巴顿内心深处是难受的，然而这又是无可奈何的唯一选择。正像当他后来遭到国内强硬派指责时，总督府秘书长伊斯梅为他辩护的那样：“1947年3月蒙巴顿总督上任时的印度，印度就像是一艘舱中满载弹药而在大洋中着火的船。当时的问题是在大火延烧到弹药之前把火扑灭。事实上，除了像我们所做的那样去做之外，在我们面前并无选择的余地。”英国《每日邮报》当时的评论也承认，如果英国政府不允许次大陆独立，“它将至少需要50万英国占领军——由于英国其他的军事负担，没有、也不可能有这样大的兵力”。所以，索性把独立作为一个“慷慨的礼物”送给它。

8月15日黎明，印度首都的庆祝活动开始了。成千上万的农民从德里四周的郊区涌进了这座早已人口密布的城市。蒙巴顿写道：“从我记事之日起，从未见过如此众多的人群。”早上，他和夫人先到德巴尔厅参加印度政府各位部长的就职仪式，然后又前往国会大厅，在那里发表了讲话。他说，次大陆独立的时间，比他上任前英国政府给他指示的日期是提前的，并坦率地承认是宗教争斗和无政府主义的威胁迫使他提前这样做。他再次强调，印巴分治是根据印度教和穆斯林的意志而采取的必然行动，是根据双方的路线方针作出的决定。言外之意，他要向长期主张次大陆为一个国家的印度国大党领导人阐明，印巴分治并不仅仅是他个人的主意。他最后讲到了自己：“从今天起，我是你们法律承认的总督了，我请求你们把我作为你们中的一员。我将为印度的利益贡献出自己的一切。”

正像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英联邦国家至今还保留着总督一样，刚刚取得独立地位并随即加入英联邦的印度和巴基斯坦当时也设立了总督职位。此前，蒙巴顿想同时兼任次大陆这两个国家的总督，然而真纳拒绝了他，巴基斯坦的总督由真纳自己担任。而蒙巴顿则在印度政府正式邀请的前提

下，只担任印度的总督。不过，它与原来总督职位的含义相比已经不一样了，仅是一个挂名的元首而已。

在国会大厅讲完话后，蒙巴顿傍晚又去参加独立庆典仪式。当他乘坐的马车刚靠近悬挂印度新国旗的观礼台时，立即被人们围得水泄不通。阅兵游行队伍也被欢乐的人流吞没了。蒙巴顿决定离开这里返回总督府，因为在这个印度人盛大的欢乐场面中，做为英国的象征他并不感到自在；况且五六十万狂欢的人群中，哪怕一个小小事件，一个暴力的举动立刻会酿成一场大祸。在卫兵们的护拥下，他乘坐的马车在一寸寸地爬行，随时都有可能被人流吞没。尼赫鲁自然非常高兴，做为印度独立后的首任政府总理，他居然跟些年轻人一样叉开双腿在汽车引擎上面的盖子上，为印度的独立而欢呼雀跃。

晚上，又有 3000 多人来到总督府举行庆祝晚会，他们一直欢闹到次日凌晨。在印、巴独立的这几天，蒙巴顿总共只睡了 12 个小时。他是人们注意的中心。他先是在卡拉奇，然后返回德里，3 天内发表了 4 次重要演说，主持了重要的谈判，没有过片刻的宁静。他忍受着疲劳，坚持工作。现在一切都完成了，至少他的第一部分任务已经做完了。“我一生中从来没有经历过像今天这样的日子。”蒙巴顿用这句可作多种解释的话，结束了他就整个次大陆独立的过程而写给伦敦的工作汇报。

与此同时，艾德礼首相对蒙巴顿的工作表示赞赏，他来电称：“一项史无前例的艰巨任务今天终于完成了。在这伟大的时刻，我向你表示衷心的感谢。你在战胜每一个艰难险阻中所显示出的卓越才能令人惊叹不已。你短暂的总督任期将永远载入历史的史册。此外，我向埃德维娜、伊斯梅及其他为完成这一任务作出了贡献的先生们表示感谢。”

由于蒙巴顿在 1947 年 8 月 15 日印度独立那一天，他在国会大厅的讲坛上承诺过将于转年 4 月辞去总督职务并离开印度，这样他逗留在印度的时间就不多了。

现在执掌印度权力的是尼赫鲁总理，蒙巴顿如今的挂名总督是个闲差。于是，他利用距离任期满还差 7 个月的时间，开始周游这个国家。蒙巴顿在印度独立前，包括战争期间只去过该国很少几个地方。现在他得到了补足。他沿恒河泛舟游玩，还访问了斋浦尔、孟买等 28 个地区。访问过程中，他视察了工厂、发电站；参观了大中小学；为新工程奠基；为新医院落成剪彩；接受名誉学位。他不断地夸赞印度人的种种美德和古老灿烂的文化，说只要全体印度人民和睦相处、共同工作，印度的前途就大有希望。所到之处，受到了好客的主人们的热情接待。

只要别人不在招待蒙巴顿夫妇，就是蒙巴顿夫妇在招待别人。这种说法一点也过不过分。据总督府粗略统计，蒙巴顿夫妇这次在印度任职的总共 15 个月里，他们邀请了 7605 位客人参加午宴，8313 人参加了晚宴，25287 人参加了游园会和其他招待会。

因为蒙巴顿规定，总督府每周要举办 2 次游园会，3—4 次不低于 30 人参加的午餐会，2—3 次大型宴会。此外，他还声称总督府的大门是敞开着，面向从未进过总督府的印度社会各阶层人士。在吃喝玩乐等方面，贵族出身的蒙巴顿和他那位有着富家小姐经历的埃德维娜都很在行。但是，他们也有时候为了表示同印度老百姓同甘共苦，而规定一下宴会的饮食定量和用餐标准。

除了旅行、招待客人和处理完尼赫鲁主动来“请示”的些许事情外，骑马、打康乐球和玩高尔夫球重新成了他的娱乐活动。他还迷上了戏剧。他在给女儿帕特里夏的一封信中说：“我在这里的生活很美妙。一次，我在看戏时见到了一位英国印度混血姑娘。她是我多年没见到的美貌女子。我有幸和她相处得很好，我在她演戏时把她看了个够。演完戏我和她面对面地坐在俱乐部用餐。她走过来请我签名，并把手长时间地放在我的手上表示她的快乐。我简直不知如何是好，是不是有点欣喜若狂了！她只是我感兴趣的姑娘。你尼赫鲁叔叔见了感到很有趣。幸好你妈妈好像什么都没有看见。”

而实际上，蒙巴顿夫人和尼赫鲁之间的关系也有点儿微妙。虽然蒙巴顿知道这位印度总理与自己妻子的关系是密切的，埃德维娜也知道丈夫有所感觉，但夫妇俩除了隐晦地提起外，谁也不愿挑明它。后来到了 1952 年，埃德维娜写信让丈夫保存好尼赫鲁给她的私信时言道：

你会认识到，这些信是尼赫鲁的手迹，充满了兴趣和事实，是真正的历史资料。有些信没有涉及私事。有的带有爱情关系的色彩——主要是精神上的。尼赫鲁在我生命中占有巨大的位置。在最后几年，我在他的心目中可能也一样。我们间的会面很少，而且总是很短暂的，但是我了解他，也许他也了解我。如同所有的人一样，我们都能互相理解。可喜的是，我对你的爱情是如此深厚，对你是如此感激和崇拜，以致感到除了你没有其他人能帮助我保存好这些信件。我相信你会理解，看了这些信，不要产生任何伤害你感情的地方。我们之间虽然有时观点不一，看法不同，有一定的分歧，但是，都能互相理解，你一直很爱我，很关心我，我们的夫妻关系是伟大的。我对你非常爱，非常忠诚。

一切都解释清楚了。蒙巴顿完全理解了尼赫鲁给自己妻子的封封私人信件，那是一种友情，至多算是一种精神思想和气质上的相互吸引。因而，蒙巴顿感到自己并没有受到什么伤害。

蒙巴顿在印度独立那一天曾允诺他将在 1948 年 4 月离印度回国。他的生日是 6 月 25 日，84 岁的老母亲路易斯夫人特别重视家里的各种纪念日，因此他答应有可能的话到时就回国。蒙巴顿向印度政府提出 6 月 21 日启程回国，尼赫鲁虽然犹豫了一阵，但还是同意了他的要求。

启程前，尼赫鲁总理为他举行了盛大的饯行宴会，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祝辞：“你满载声誉来到了这里，但是你的许多声望是在印度建立起来的。你在这里经历了一个危难时期。我不知道你和你的夫人此时此刻在想些什么。反正我在想，为什么一位英国先生和一位英国太太在印度短暂的时期内能建立起如此的声望。你们可能收到许多礼品，可是没有哪一件礼品比印度人民对你们的爱戴更真诚、更宝贵。

亲爱的蒙巴顿先生，亲爱的蒙巴顿夫人，你们已经看到了这种爱戴所发挥的作用。”

主人的客气使他有点儿飘飘然，然而却让蒙巴顿得以自我感觉良好地离开了印度。他的离去，标志着英国在印度次大陆殖民统治的一个时代的终结。这时他刚抵 48 岁，回国后还可以再干一番事业——特别是在皇家海军。欲知蒙巴顿这回的理想能否实现，且听下章细说。

第二十一章 事业顶峰

如愿以偿返海军，默默等待不虚度；

好梦成真连擢晋，三军主帅权位重。

1948年6月23日，蒙巴顿携夫人乘专机返回了伦敦。

此时，这里的许多人又在纷纷议论蒙巴顿的个人志向和未来的职务安排了。有的说他可能会去搞政治，到美国当大使；有的说他可能去经商；还有的说他将出任文职的国防大臣。实际上，这种种猜测都根本不着边际。蒙巴顿重返海军的决心从未动摇过，他的志向很简单——继承父业，最终当上第一海务大臣。而为实现自己的这一志向，他只有一条路可走——重返皇家海军。

回国后的第三天，蒙巴顿就向海军首脑提出了申请。他在6月25日的日记中写道：“我向海军大臣、第一海军大臣和第一海务大臣打了报告，表示我愿一切听从他们的分配。”由于蒙巴顿在皇家海军里的军籍一直保留着，他回来自然没有任何障碍，但要给他在等级森严的皇家海军安排一个合适的位置，也颇令海军首脑们头疼。他担任过东南亚战区的盟军最高司令，还刚刚做过印度总督，职位安排低了不妥当，而仅有的几个高级别位子现在又被挤得满满的，总不能他一回来就把别人撤下来吧？再说别人也没有失职和过错呀。第一海务大臣约翰·坎宁安经过长达3个多月的痛苦考虑，于10月份决定，让蒙巴顿担任地中海舰队第1巡洋舰队司令。

英国地中海舰队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舰队之一，而第一巡洋舰队又是皇家海军中唯一的一支常备舰队，它拥有4艘大型战舰和数十艘各类中小型舰艇。所以，蒙巴顿的职位是相当重要的。但是，与他当年担任盟军一个大战区的最高司令或总督时相比，这个职位就显得微不足道了。更有趣的是，他的顶头上司地中海舰队总司令阿瑟·约翰·鲍尔将军，是蒙巴顿在东南亚战区任最高司令时下面的东印度舰队司令；地中海舰队副司令道格拉斯·彭南特也曾在蒙巴顿手下任过职。在整个地中海舰队的领导层中，他这个第1巡洋舰队司令的职务排在第4位。于是，人们好奇地观察着他们之间将怎样处理如此复杂的关系。

蒙巴顿处理眼下的上下级关系时很有分寸，既不显示出骄傲自大、摆过去的老资格，又不刻意表现出做作的礼貌和谦恭。他恰如其分地对上级表示敬意，又不失他本来应该得到的礼遇。因为谁都清楚，蒙巴顿在历史上的地位已超过了地中海舰队中的任何一个人。舰队司令鲍尔将军对他很礼貌，一见到蒙巴顿就不由地想起当年在东南亚时的情景，总是对他以“长官”相称，而蒙巴顿也尊重现实，见到鲍尔或汇报工作时，也总是恭恭敬敬地称他为“长官”。他们如此礼貌地处理好个人和工作之间的关系，在整个地中海舰队的官兵中传为佳话。

1949年10月，未来英国女王的丈夫菲利普亲王来到地中海舰队服役。菲利普亲王是蒙巴顿的侄子，他的到来使蒙巴顿非常高兴，但他们开始却很难和睦相处。蒙巴顿总想干预侄子的私事，而菲利普亲王则“极力显示自己的独立性”，有时还显得很粗鲁。叔侄俩都有点儿倔脾气，经常发生口角。

对此，蒙巴顿有些伤心地写道：“我没有自己的亲生儿子，只有两个侄子和一个女婿。即使我把他们当亲生儿子看待，他们也决不会把我当作自己的生父。我并不责怪他们，尽管我时常感到些伤感。”后来，叔侄俩似乎达成了某种妥协。“菲利普又与我言归于好了，就像以前那样。”

我们促膝谈了心，他承认他不愿受我摆布，也不愿得到我的保护。”蒙巴顿理解了侄子的想法，问题也就解决了。从此，俩人变得形影不离，相从甚密。

1950年6月，蒙巴顿被调离地中海舰队，回海军部担任第四海务大臣。当时，皇家海军部有5个海务大臣：因为参加内阁的英国海军大臣是文官，所以第一海务大臣实际上是海军的专职首长；蒙巴顿之所以很早就立志当上它，原因就在于此。第二海务大臣负责人事；第三海务大臣负责舰艇设计和制造；第四海务大臣负责补给和军饷等后勤工作；第五海务大臣负责海军中的航空兵部队。蒙巴顿本想担任第二海务大臣，这样可使自己离梦寐以求的位子只差一步，然而，霍尔海军大臣没有答应。

不过这也行，他在同霍尔会见后对女儿帕特里夏说：“我表示让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我对他表示感谢。”

有人觉得海军部这样安排对蒙巴顿不公平。鲍尔将军向上抗议说，他认为对蒙巴顿没有量材使用。得到的答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皇家海军的后勤工作一直被人忽视，其实这是一项重要工作。蒙巴顿自然不相信这种貌似振振有词的理由——“因为他们认为我今年才49岁，而其他几位海军中将都五六十岁了，我还年轻，仍可以等待。”

来海军部走马上任后，蒙巴顿对后勤方面糟糕的程度惊诧不已。15万海军预备役人员应做到召之即来，可是海军所有的仓库只有可供4万人的军服和用具。没有军需储备，也没有搞任何军需储备的计划；甚至没有足够的扫雷设备装备现有的扫雷舰。蒙巴顿开始干了。本来正像他自己所说，“作为第四海务大臣，我的工作是无足轻重的，没人忌妒，也没人认为我想利用职权胡作非为。”然而，正是他在这个岗位上工作的两年中，使第四海务大臣位置的重要性达到了以往未曾有过的程度。

他巨大的工作热情和能量迸发出来了，新的主意和新的举措不断涌现。首先，他完全重组了他的后勤机构；其次，他从第三海务大臣那里，拿过来了为各舰队分配武器弹药的权力；再次，他获得了制订皇家海军所有行政计划的权力。看他这么愿意干，海军部赋予他的任务也没完没了，像当年他父亲在这里工作时一样，海军部里的旧口头语又落在了儿子的身上：“什么事都让迪基会干，因为他肯干、会干。”

蒙巴顿还随准备去做他份外的工作，不仅是他喜欢有压力，而且是因为他非常希望整个皇家海军——这部倾注了他的深情的军事机器，能按照他的意图运转起来，让别人觉得他是个海军里唯一不可缺少的人。很自然，这引起了别人的不痛快。1951年底，麦格雷戈接替拉姆担任第一海务大臣不久，就在兴头上把蒙巴顿训斥了一顿。此后一段时间内，当海军部开会时，蒙巴顿就一声不响地坐在后面，只有讨论他份内工作时才开口讲话。但是，他的忍耐是有限度的。一次，他要求海军部批准官兵换装的提议，麦格雷戈以种种理由拖延，蒙巴顿便直接找到乔治国王，要求他对麦格雷戈施加压力。结果，他的提议获得了通过，皇家海军官兵换上了更漂亮的新式军装。这件事给海军部所有官员们留下了这么种深刻的印象：蒙巴顿有杀手锏，虽然他

不轻易去搬动，但在需要的时候，他随时都可以这样做。

1951年艾德礼的工党政府垮台后，丘吉尔又奇迹般地打回了唐宁街。由于保守党一直不满意蒙巴顿在次大陆搞的那个分治方案，人们本以为丘吉尔复出后会惩罚蒙巴顿。然而事实刚好相反，丘吉尔理解并原谅了蒙巴顿，甚至还感谢他在那里出色的工作，使自己不再为次大陆问题而心焦劳神。在台上执政和在台下做反对党，考虑问题的角度怎么能一样呢？丘吉尔依旧喜欢蒙巴顿，并全力帮助他实现当上第一海务大臣的理想。

实际上，两党领导人都对蒙巴顿的理想持支持态度。艾德礼曾说过，“我希望蒙巴顿成为第一海务大臣。”丘吉尔更不用说了，他恨不得马上把英国海军部交给可爱的迪基负责。然而英国的政治制度，特别是皇家海军的任免程序和规定，使他们都无能为力。于是，1952年5月，蒙巴顿先被任命为地中海舰队总司令；转年2月，晋升为正式的海军上将。这样，就为蒙巴顿一步步地获得自己理想的职务铺平了道路。

1955年3月，温斯顿·丘吉尔觉得时机成熟了，该是让蒙巴顿实现自己的理想的时候了。不过，在3月21日接到正式任命书之前，蒙巴顿还蒙在鼓里，他不敢相信自己一生的愿望已经实现了。这是丘吉尔最后一次帮他的忙，因为在4月份丘吉尔就辞职下台了。

上任后的第一天，蒙巴顿在日记中写道：“我坐在父亲的画像下面，心里十分激动。”尽管当年路易斯亲王的办公室窗前，现在建有一幢黄褐色的大楼，挡住了外面射来的阳光，但蒙巴顿还是坚持要去那里办公。可是，他坐在父亲当年坐过的那把椅子上，并不想沉湎于过去，他要着眼于更新、更高的目标。他认为皇家海军仍需要改革，以期适应时代的要求。

当时，由于英国经济很不景气，政府决定大规模削减公共开支。削减哪一方面呢？1955年10月的一次民意测验表明，公众普遍认为应首先削减国防开支。同月，不久前才继丘吉尔担任首相的文登向公众作出许诺，要在此后30个月内将现役军人人数从80万减少到70万。政府的文职官员们还强烈要求海军大幅度减员。哈罗德·沃纳告诉蒙巴顿：“我觉得艾登首相已不再对海军感兴趣了。海军在各兵种中排列第三。而且，人们一直就海军在核战争年代能否起作用表示怀疑。”英国在二战中的老英雄蒙哥马利元帅，也在皇家联合军事学院的一次讲演中说，“海军在世界大战中只能起很小的作用，在其他时期，海军几乎一无所为。”无独有偶的是，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在谈到当时的苏联军事战略时竟宣称：“在热核时代，大型水面舰艇只是漂在海洋上的钢铁棺材。”总之，来自各方面的舆论都试图说明一个问题：海军曾很有活力，但现在大势已去。

重申海军的作用，使之得到公众的承认，确实是蒙巴顿就任第一海务大臣以后的首要任务。他认为，“我们只有先让别人承认，我们的舰艇将来可以成为大型游动火箭的运载工具，然后其他事项方可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在蒙巴顿任第一海务大臣期间，这是海军部所奉行政策的第一大基石。第二大基石是，保证向在世界各地执行保护英国利益任务的水陆两栖打击力量提供支援。在申请政府拨款方面，蒙巴顿很现实，也很讲究策略。他对经常嚷着要大幅度增加拨款的部下们说：国防预算是要分配给各军兵种的，海军的份额肯定会少于过去。要求过高就等于失去更多。

海军必须确定自己的首要任务，并晓之于众。只有这样，保持一支有效的和平衡的战斗力量的最起码的要求才能得到满足。

然而就是这样，于 1956 年底苏伊士运河危机以后出任国防大臣的邓肯·桑兹还要继续削减海军。这一年，蒙巴顿登上了皇家海军的顶峰——被晋升为海军元帅，但没等他高兴多久，桑兹上任后所表现出来的对海军的敌意便引起了蒙巴顿的愤怒。

桑兹是丘吉尔的乘龙快婿，曾任内阁供应大臣，以喜欢贬低他人而闻名。海军副参谋长戴维斯回忆说：“他是有名的顽固脑袋，而且……对国家的战略需求一窍不通。”更糟糕的是，桑兹得到了新任首相麦克米伦的尚方宝剑，“有权对涉及武装部队的规模、形式、组织、部署、装备和供应……似及军饷和服役条令等一切事情作出决策。”桑兹的观点是：核武器将决定战争的胜负，海军起不了多大作用；巡洋舰已不再需要了，应予以报废；航空母舰和舰载飞机也不再需要了，皇家空军可以把它们的任务包下来，等等。实际上，这等于说海军已没必要存在了，它成了奢侈品，国家养它不起了。

桑兹来国防部后，下令削减国防开支，引起了现役军官们的强烈不满。蒙巴顿在 1957 年 2 月份写道：“我们现在同邓肯·桑兹搞得不可开交。他要大幅度削减 1957—1958 年度预算和长远规划开支。女王陛下的政府打算无情地削减国防开支了。”海军部说，“如果更荒唐的削减计划——比如一年左右将海军裁员一半——获得批准”，海军部官员将集体辞职。蒙巴顿也起草了一份告海军全体高级军官书，时刻准备散发下去。内称：

我们海军部已作了全面和仔细的调查，结果很清楚，这样大幅度削减开支，只会造成混乱，破坏军队的士气。如果要就此事摊牌，我当然要明确表示，我不能再继续任职了，不能为这种人为的混乱负责。但是，在我考虑采取这一重大行动之前，我想听听同龄人的高见。

结果，和通常一样，事情并没有走到那一步，原因之一是桑兹作了明显的让步。

1959 年 5 月 22 日，麦克米伦首相正式任命蒙巴顿为国防参谋长，并建议这个职务的任期将由 3 年延长到 5 年。从地位上说，国防参谋长仅低于国防大臣，但由于后者属于文官并受党派竞选的影响，所以，国防参谋长实际上是整个英国陆海空三军武装力量的专职首长。

在正式任命公布前，蒙巴顿忙忙碌碌地度过了他在海军中的最后几周。4 月 19 日和 20 日，他发出了 1300 份告别信，其中大部分的结尾都有他的亲笔签名。4 月 23 日，他在英国广播公司发表讲话，“告诉广大人民，海军的前途是光明的”。按规定，他移交第一海务大臣职权的时间是 5 月 1 日零点整。4 月 30 日午夜，他坐卧不宁地等待着这一时刻的到来，当副官提醒他时辰已到时，蒙巴顿十分伤感地说：“现在我已不再仅仅属于皇家海军了。”说完，走到继任者查尔斯·拉姆面前，同他办理了交接手续。

蒙巴顿是继威廉·迪克森之后的第二任国防参谋长，这个职务设于 1958 年，目的是统一指挥和协调陆海空三军。然而，迪克森在完成这一艰巨的任务方面，没有取得成功。他仅干了一年多，便干不下去了，由蒙巴顿来接替他。当时，陆海空三军各自的参谋长，有事可以直接去见内阁大臣和首相，蒙巴顿认为这样做无疑是损害了国防参谋长的权威，于是他上任伊始便定下规矩，各军种有事先要找国防部请示，不准他们越级去找内阁大臣和首相。

20 多年来，蒙巴顿一直主张三军统一。还在大战期间，他就曾说过：“我个人认为，所有军官都应享有去各兵种服役的机会。他们应分别在达特默思、

克兰威尔和桑赫斯特轮流服役，一年换一个地方。这样，他们既可受到一般的锻炼，还可学到特殊本领。”他还主张，军校学员通常可以选择自己的职业，学习参谋课程和战术课程应着眼于三个军种，某一军种的参谋应到其他两军种里工作一段时间。他在 1941—1942 年负责联合作战总部期间，便是这么做的。

在领导机构的改革方面，他提出撤销各军种参谋部，而设立三军统一的联合计划参谋部，并由他来担任这个机构的常任主席。不过，由于遭到了各军种参谋长的消极抵制，这一目标没有在伦敦实现。蒙巴顿于是把它付诸实施于海外驻军，分别在塞浦路斯建立了近东联合司令部，在亚丁建立了中东联合司令部，在新加坡建立了远东联合司令部。这种新的指挥机构，在提高英军的快速反应能力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如后来在 1961 年，伊拉克再次称科威特是它的一部分，并在科伊边境集结重兵，对科威特进行威胁。英国派“堡垒”号航空母舰前往海湾地区，并答应科威特，如果它请求支援，英国军队 24 小时内即可采取行动，结果使伊拉克未敢轻举妄动。英国之所以能夺下海口，中东联合司令部的建立是原因之一。因为它能迅速协调和调动陆海空各部队，简化了工作程序，从而提高了快速反应能力。英国驻中东地区司令埃尔沃西中将说，在那次联合行动中，联合司令部的作用是很大的，没有这样一个联合指挥机构，英国的干涉肯定不会那样顺利。

然而，就在蒙巴顿在国防参谋长的显赫职位上，全力以赴地干自己的事业的时候，他的夫人埃德维娜却不幸病故了，终年仅 59 岁。

埃德维娜是位很要强的女人，自战争期间她主管过圣约翰救护队以后，一直着迷于医疗救护事业。这几年，她每年都要花费数月时间去非洲和远东地区，帮助那里的红十字会工作。1956 年，她的私人医生威尔克斯·哈维告诉她，如果她不大大减少自己的活动，3 年之内死神就要夺去她的生命。埃德维娜对此忠告不但置若罔闻，反而似乎要与死神争夺时间拼命去工作。1960 年 1 月，她代表圣约翰的海外野战救护旅去远东视察。事先被安排出来的视察日程甚至使她没有了上路的勇气，然而，生性好强的埃德维娜还是咬牙出发了。

2 月 20 日，她抵达婆罗洲即加里曼丹岛的亚比。之后她立即进行了一系列视察。

路途中，伊丽莎白女王医院的护士长伯纳姆女士发现，她有时脚步踉跄，经常停下来欣赏周围景物，看上去已疲惫不堪。伯纳姆女士见她身体如此衰弱，就在当地医院里为她准备了一个房间，让她住进去以防不测。此时在伦敦，蒙巴顿忙完公务后于凌晨 1 时 30 分上床休息。刚入睡不久，便被叫醒，说婆罗洲的总督想和他通电话。

一会儿，那边的电话打过来了，蒙巴顿从模糊不清的越洋电话中，终于听到了夫人去世的噩耗。

刹那间，蒙巴顿悲痛欲绝。人们跑过来规劝他，他默不作声地淌着眼泪，望着埃德维娜的照片，在一张纸上不断拼写着“TRAGEDY”（灾难）几个大写字母。少年夫妻，老来伴。蒙巴顿这年已 60 岁了，失去老伴对他的打击实在是太大了。

2 月 25 日，皇家海军的“威克菲尔德”号驱逐舰在一艘印度军舰的护送下，把埃德维娜的遗体运回英国。蒙巴顿写信给尼赫鲁说：“帕特里夏、帕梅拉和她的丈夫，埃德维娜的妹妹玛丽和我都去了布罗德兰兹，在家门口

等候她的遗体的到来。这是她最后一次回家。”然后，埃德维娜的遗体被送到罗姆西修道院，在那里，由 8 个人抬上了祭坛。13 个小时后，按照她生前的遗嘱，遗体将要送入大海。在她的遗体被抬上船时，水兵们鸣笛为她的亡灵开道。在参加埃德维娜海葬的船只中，那艘印度军舰是尼赫鲁亲自派来的。这使人们感到他们之间的友情超乎寻常，连蒙巴顿本人也承认，“这真是一个令人瞩目的姿态，它给所有的人都留下深刻的印象，特别会使亲爱的埃德维娜含笑九泉。”

埃德维娜去世后，蒙巴顿陷于巨大的忧伤之中，他写道：“我太痛苦了，我过去从未意识到我是多么地爱她和她对我是何等重要。”丧偶的人都会有这种心情，但蒙巴顿比其他人都更吃惊地发现，他是那样地离不开埃德维娜。他和妻子过去经常分居，也时常吵嘴，加上他在事业上很充实，自以为没有妻子在身边，他也会生活得很好。现在他才感到以前的那种想法是错误的。过去他有时愿意和埃德维娜短期分居，但现在他永远失去了她，这使他悲痛欲绝。他如今形单影只，成了年逾花甲的单身汉。

蒙巴顿担任印度总督时的主要助手伊斯梅写道：“埃德维娜的死恐怕给蒙巴顿的打击太大了。”他的部下们发现，他动辄发火训人。和以前相比，他变得优柔寡断；甚至在重要会议上，他也常常精神不集中，一阵阵地发愣。他过去给朋友写的信，总是热情洋溢、夸夸其谈，如今连给侄子——早已登基的伊丽莎白女王的丈夫——菲利普亲王的信，“都语无伦次，不大动人”。总之，他似乎像变了一个人。

有人开始劝他再婚，说这样做即使不是为了爱情，也是为了使自己的生活得更好些。据说有的名门闺秀也对做伯爵夫人和国防参谋长的夫人感兴趣。蒙巴顿或许曾多次产生过再婚的念头，但找个像埃德维娜那样的妻子如果不是不可能，也是非常困难的，于是他索性告诉女儿帕特里夏说，他不打算再结婚了，因为再婚可能会使他有个儿子。那么，他要把爵位传给她的计划就会实现不了。帕特里夏自然听得出这是老父亲的幽默，但也确信蒙巴顿不会给她领来一位继母，为此她要加倍地关心和照顾他，减轻他的痛苦凄凉之感。

在两个女儿的悉心关照下，蒙巴顿经过一段时间的痛苦，终于重新振作起来。

在细致的调查研究基础上，蒙巴顿和助手们对英国未来的防务结构提出供政府选择的 3 种方案：A. 只对现行体制作些简单的修补；B. 建立一个完全统一的和确能发挥作用的国防部；C. 允许陆海空三军种各自的总部单独存在，但必须接受国防部的全面领导。其中，蒙巴顿认为最理想的方案是 B 方案。

由于撤销三军种总部，会使许多将军的职位难保，麦克米伦首相犹豫不决，他想先选择 C 方案，然后为二三年内实行 B 方案打下基础。当他征求蒙巴顿的意见时，蒙巴顿回答说：“作为一种临时解决方案，我同意。”然而，出乎蒙巴顿所预料的是，麦克米伦首先顶住了来自各方面的压力，最后毅然决定采用蒙巴顿他们提出的 B 方案。

1964 年 2 月 24 日，蒙巴顿率领英国军事代表团赴墨西哥访问，3 月 1 日他在那里收到首相以个人名义发给他的一份电报。电报说，内阁就改组防务指挥系统开展的讨论进行得很顺利，在下次讨论会上就将发表一项声明。麦克米伦还说：“我们现在正就执行改组计划的最佳途径（即 B 方案）进行

讨论。我想让您知道,我是多么地感激您。您辛辛苦苦制订的改组方案,如今正在开花结果。”几天以后,蒙巴顿的代表团抵智利访问时,英国内阁决定采用 B 方案来改组防务系统的喜讯果然传来了。3 月 5 日,蒙巴顿在日记中写道:“《泰晤士报》航空版今天寄到了智利。该报以十分感人的笔调宣布,(英国)政府已原则上接受了我的建议,决定取消海军部、陆军部和空军部,重建一个统一的、有权威的国防部。”

多年的设想一朝实现,蒙巴顿感到自己几十年的军事事业达到了顶峰。此时他在英国武装力量中的地位仅次于文职的国防大臣,但在公众眼里,他比国防大臣重要得多,是整个英国军队的真正主宰。

这期间,他还为加强英国与美国之间的防务合作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尽管蒙巴顿希望英国的防务能够取得完全独立,但他知道,英国的安全与美国和其他欧洲盟友的安全有不解之缘。华盛顿的决策对英国军队产生的影响不亚于甚至大于白厅的决策。所以,蒙巴顿认为,保持同美国人的紧密联系至关重要。他任国防参谋长后,同美国人保持和发展关系不成问题,因为那里的许多军方领导人是他当年在战争时期的老战友和老朋友。

还是在 1963 年 2 月,当他访问五角大楼时,蒙巴顿吃惊地发现,除了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斯韦尔·泰勒之外,所有美军参谋长们都是他的旧交。空军参谋长柯蒂兹·莱·梅和陆军参谋长惠勒将军都曾在东南亚盟军司令部供过职,海军上将安德森同蒙巴顿相识得更早些。因而他们在交谈时,尽管存在着不少意见分歧,但都能开诚布公地交换意见。蒙巴顿在老朋友面前阐述自己的观点时很少有顾虑,尽管他的意见有时让对方听起来很刺耳。譬如,美国当时正准备军事介入越南,蒙巴顿直言不讳地忠告说:“根据我在东南亚的经验,除了建立一个真正为人民所接受的民族政府之外,……靠外力维持统治的任何政权都不会成功。尽管我认为通过建立一个进步的民族政府,使南越自立于‘竹幕’(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污蔑——作者)之外非常重要,但我觉得以军事手段不可能达到这样的目的。”

美国后来在越南战争中的失败,证实了蒙巴顿当时的预见。

英国能拥有核潜艇,全靠美国的技术和财政的帮助,而这又是与蒙巴顿的个人努力分不开的。当美国的第一艘核潜艇于 1955 年下水时,曾拒绝包括英国人在内的一切外国人参观。后来,蒙巴顿亲自找到美国海军核项目负责人海曼·里科弗上将,请他帮助英国研制自己的核潜艇。由于美国政府作出了决定,加上“容易感情用事的”里科弗上将看在老朋友的份上,全力以赴帮助英国研制核潜艇。对此,蒙巴顿手下的参谋丹尼斯·怀亚特不无夸张地写道:“里科弗对英国是否能拥有核潜艇并不关心,他关心的是蒙巴顿是否能有核潜艇。”

生活在核武器时代,作为军事领导人的蒙巴顿,自然要对它有自己的看法。他曾参观过美国在范登堡的一个核基地,“我当时根本没有思想准备,所以看到大力神式导弹的洞穴时感到非常吃惊。洞穴直径为 40 英尺,深为 165 英尺,足可盛下一幢 20 层的摩天大楼。当上方沉重的洞门打开后,一辆巨型起重机将大力神导弹吊上来。

整个建筑平均每英寸能抗 100 磅的压力。除非是被核武器直接击中外,其他任何力量都奈何它不得。”他担心,“这个令人毛骨悚然的东西,会使人类丧失理智。”然而他认为,核武器将存在下去。如果还来得及销毁世界武库中的核武器,他一定会这样做。然而现在为时已晚,即使核大国们同意销

毁它们现有的核武器，也不能保证它们中间的任何一方或其他某些国家不会再秘密研制核武器。所以，人类强调的重点不是销毁核武器，而是限制和防止核扩散。

到了 1964 年下半年，蒙巴顿有了告老还乡的念头。蒙哥马利知道老友的想法，转告首相说，“迪基不想再干了。”当时，英国首相和国防大臣分别是威尔逊、希利。

希利曾就这件事征求过 40 名高级将领的意见，由于蒙巴顿在改组防务系统中坚持的那个 B 方案损害过他们的利益，他们大多同意蒙巴顿告老还乡。但是，威尔逊不同意，他认为蒙巴顿享有的独特地位不能白白浪费掉。内阁经济事务大臣乔治·布朗也很希望蒙巴顿继续干下去，他威胁那些将领们说，如果同意让蒙巴顿退休，那么国防参谋长一职，政府很可能要一位文职官员接任。然而，蒙巴顿确实有些年迈体衰了，在重要会议上常打瞌睡，需要作出紧急决定时，他却要出去散步。

此时已 64 岁的蒙巴顿，自己也感到力不从心了。不过，像他那样的工作和生活方式，即使比他年轻许多的人，也会被搞得精疲力竭的。以 1965 年 2 月 1 日至 5 日的日程为例：他于 2 月 1 日上午 9 点 10 分离开住所，10 点 30 分到达办公室。到次日凌晨 1 点 30 分，除了吃饭之外，他一直都在工作。凌晨 3 点 30 分，他又得开始工作，一直到早晨 5 点。休息到 9 点 30 分时又爬起来工作。晚饭在家吃，然后一直工作到夜间 11 点 30 分。第 3 天，他 5 点 45 分开始工作。当晚有正式宴会，宴会后，他一直工作到凌晨 3 点。

2 月 4 日，一位海军上将 9 点来和他一起吃工作餐。中午休息片刻，然后又一直工作到凌晨 3 点。5 日上午 8 点 30 分至晚上 7 点，除吃点儿东西外一直没有离开过办公室。甚至在节假日，他平均每天也要花五六个小时批阅文件。长期紧张的工作，使蒙巴顿患了失眠症，他曾写道：“总是睡了不到两个钟头就醒了。”他确实太累，身体被搞垮，有点儿干得厌烦了。

6 月底，蒙巴顿的退休申请获得了批准。30 日，他在王宫侍从的引导下正式谒见他的侄媳——伊丽莎白女王陛下。当他来到白金汉宫的会见厅时，受到了女王的欢迎，女王说有件东西要赠送给他。蒙巴顿后来回忆说，“……接着，她（女王）递给我一枚功勋章。她这样做实在妙极了。只有 24 人曾得到了这种勋章，它往往只授予托马斯·哈迪那样的伟大作家和拉迪亚德·基普林那样的诗人以及拉瑟福那样的科学家。……据我所知，我是历史上得到这种勋章的第 7 位水兵。”

次日，蒙巴顿就要最终告别 49 年的戎马生涯离开国防部了。消息不胫而走，许多记者和一些好奇的过路人，都纷纷前来围在国防部大门口，蒙巴顿下楼时从窗子里看到了外面的情景，高兴地说：“嗨！门口还有这么多人，真令人满意。”

从他 1916 年由达特茅斯皇家海军学院毕业，成为一名正式军官算起，至今已将近半个世纪了。他要回到亡妻留下的遗产——埃德维娜祖上建造的布罗德兰兹庄园，度过他的晚年。正是：戎马倥偬五十载，退役归家理应该。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章分解。

第二十二章 桑榆晚景

庄园老翁无空闲，余热发挥不避嫌；
忙忙碌碌度晚景，惨遭毒手方歇鞍。

布罗德兰兹庄园在汉普郡，它是埃德维娜的外祖父凯赛尔爵士生前建造的几座庄园之一。凯赛尔爵士去世后，这个庄园归到了埃德维娜的名下，而埃德维娜病故后，庄园自然就由蒙巴顿来继承了。

庄园里的几幢房子造得十分宏大壮丽，但又有些阴森可怖。女儿们起初不愿意老父亲去住，说那里有一股邪气，怕蒙巴顿也遭到什么突然性灾难。老军人出身的蒙巴顿，对此却满不在乎，坚持搬进去住。

蒙巴顿从 13 岁入奥斯本海军学校起，50 多年来一直过着一种严格的有规律的生活。对于习惯于这种生活的人来说，退休是可怕的。退休初期，由于心理上还没有完全做好退休的准备，蒙巴顿显得有些无所事从，不知该干点儿什么好：他不再以读书为乐事；除了自己涂抹的水彩画，谁的作品也很少欣赏；除了几支舞曲，很少听音乐；英国绅士们传统的追求与爱好，他也不再感兴趣。他不去栽花种草，对赛马也厌倦了，钓鱼也失去了耐心。虽说对马球运动仍有浓厚的兴趣，但他的体力又不允许了。他认为，这就是退休生活。

女儿们觉得老父亲陷入了认识上的误区，赶紧来规劝他重新找回生活的乐趣。

蒙巴顿是善于接受别人意见的，特别是他觉得这个意见有道理时。于是，生活在布罗德兰兹庄园附近的农夫们开始看到蒙巴顿——一个经常穿着古怪的服装、骑着装饰漂亮的战马的人，每天都缓行于乡间小路上。

他还想使庄园变成一个经济基地，因为他现在感到有点儿缺钱用了。当然，蒙巴顿不愁吃穿，生活仍是阔绰的。与一般人相比，他的“缺钱用”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比如，他曾对是否花 1 万英镑买一幅上个世纪的油画感到犹豫；对该不该花 3 万英镑重新铺设庄园南道，一时拿不定主意。为了使偌大的庄园成为他的资财宝库，蒙巴顿建立了一个委员会来帮助他进行管理。他在日记里说：“虽然我的召开庄园委员会的建议一开始不大受欢迎，但是我想现在每个人都会同意这是管理这个大庄园的最好的办法。”他还发挥了特别喜欢制订计划和方案的专长，从买卖一座农场到装修一间厕所，无不像准备打仗那样，事先鼓捣出一套方案来。不过，这倒确使庄园经济兴旺起来，其中，它的成功除了委员会之外，更多的还有其女婿约翰·布拉伯恩的一份功劳。蒙巴顿对农牧业一窍不通，如果不是女王告诉，他甚至不知道奶牛是先产小牛，后下奶。但他的无知丝毫不妨碍他在整体规划方面发表高见，而且往往还确有奇效。

然而，外面的世界不允许他沉溺于自己的庄园事业，雪片似的信件和各种各样的邀请向他袭来了。一位政府高级官员想让他出来担负一件新任务，蒙巴顿写信告诉他：“我想你并没有料想到我现在过着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吧？我有 4 位每天高度紧张工作的雇员。我经常一天写 30、40 甚至 50 封信，每周被请去做 3 次、4 次甚至 5 次讲演。”邮袋里还常装着一些精神不正常的人的来信，这些人刁难每一位有名望的人。

对付他们需要小心翼翼，因此蒙巴顿还总得亲笔回一封信不可。

蒙巴顿退休以后，英国政府觉得不能让他白领一笔优厚的养老金，要

利用他极高的声望和遍布世界各地的熟人好友关系，使他成为国家的一位不可多得的解决麻烦问题的专家和非官方使者。因而，他被频频叫出布罗德兰兹庄园，以“私人”身份去扩大英国的影响。

1966年1月，女王要蒙巴顿去参加印度总理夏斯特里的葬礼。葬礼期间，他与很快要成为新总理的英迪拉·甘地举行了长时期的会谈；还与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进行了长时间的会晤。他后来回忆与苏联领导人的交谈时说：“我告诉他我祖上许多亲戚曾嫁给俄国皇帝。他说显然我家族有着悠久的历史，而他的祖祖辈辈都是彼得堡最普通的劳动者。我说你作为劳动者的后代是多么幸运啊，现在可以轻松地工作，而对我来说开始学着去工作是多么困难啊！这些玩笑太过分了，逗得他们不时大笑起来。”

从1965年退休到1979年遇害身亡，14年里他总共访问了36个国家。不论走到哪里，蒙巴顿总是准备着手解决那里各种奇特的纠纷。在马来西亚，他得知一位在该地区的英联邦军队的澳大利亚少将没能抓住一次与总理拉扎克会晤的机会而遗憾。

蒙巴顿立即给他的老朋友拉扎克打电话，告诉他这位澳大利亚“小青年”是如何招人喜欢。拉扎克为难了，看在蒙巴顿的面子上不得不同意。于是，双方举行了会晤。

1973年9月，蒙巴顿的姐夫、瑞典国王古斯塔夫去世了。蒙巴顿代表英国女王参加了古斯塔夫的葬礼，之后，又协助死者的孙子卡尔·古斯塔夫登上了王位。由于卡尔还未成婚，他又设法拉来一位罗马尼亚退位国王的公主介绍给卡尔。然而，卡尔没接受他这番好意，要了一位漂亮的德国平民女子西尔维亚·索莫拉丝为王后。

在西班牙，独裁者佛朗哥已经选定了蒙巴顿的一个外甥——年轻的王子胡安·卡洛斯作为西班牙国王和他的继承人。但是，王子的父亲唐·胡安认为没有理由把他甩在一边，国王应先由他来做。蒙巴顿又出面了。他先对姐夫唐·胡安作了番说服工作，然后又敦促外甥在即位时给自己的父亲颁发一份合法的退位证书，以安慰父亲。由于父子俩一条心，没有起内讧，使佛朗哥没有违背自己的诺言，让卡洛斯王子顺利当上了西班牙国王。

历史上欧洲各王室之间通过联姻，形成了一个结构非常复杂的成员网，外界人一般很难弄清楚它。而蒙巴顿有整理档案的癖好，像他的先辈一样，他把每一张与家族相关的纸片都保存起来。结果，他成了鉴别那些被革命推翻了的欧洲王室后裔们真伪的权威。譬如，他对一个自称是阿纳斯塔西娅并要求王室身分的人持否定态度；对外界关于安娜·安德森是他的侄女和俄国十月革命中幸存下的沙皇公主的传闻，他认为是一场骗局。他几次从布罗德兰兹庄园里跑到法庭上，与自称是俄国公主的女人当庭辩论：“我丝毫不怀疑，这个女人不是我的侄女，她和我们骨肉们没有一点相似之处。”为了欧洲王室的荣誉，他写信要求英国广播电台不要跟着传播谣言，他认为某些记者和作家只不过是借编造有关王室家族的书信、札记、文章和戏剧等赚点钱而已。

在做这些事情的同时，退休也不意味着他与毕生为之奋斗的海军事业的诀别，蒙巴顿仍一如既往地关注着海军事务。围绕航空母舰的作用问题当时军界内部进行了多年的争论，由于他不再担任国防参谋长这一职务，使他更有精力以超脱的地位参加这种争论。早在退休初期的1966年，蒙巴顿就反对削减航空母舰，做为英国上议院的当然议员，他在那里的首次演讲，就

以航空母舰对保卫英国东苏伊士政策的重大作用为主题。演讲前，有人竭力劝阻他放弃演讲，因为大选在即，而这个问题是竞选中的一部分，现在谈论此事将会卷入党派之间的政治纠纷中去。他不听，还是照讲不误。

1969年，令他恼火的事情又发生了。政府在垂直起飞的“鹞式”飞机还没有研制出来之前，就决定让“鹰”号和“方舟”号两艘航空母舰退出现役。蒙巴顿选择了一次文学午餐会的时机对该计划进行抨击。他要求这两艘航空母舰不但不能退出现役，还要拨款6000万英镑进行现代化改装。1970年6月，希思在大选中获胜，新政府决定不废弃这两艘航空母舰，甚至还同意拨6600万英镑改装它们。蒙巴顿很高兴，他从布罗德兰兹庄园里采摘一篮鲜花并附上一封信称颂希思：“你干得真不错！我非常高兴证明自己是正确的，因为我是坚信你能取胜的人之一。我盼望保守党取胜的最大目的是改变在过去几年内搞得越来越糟的防御策略。”

做为军人和王室成员，蒙巴顿要在英国两大政党——工党和保守党之间保持中立，但他内心是倾向于保守党的。蒙哥马利晚年加入保守党时，曾也想拉他一起参加，被他拒绝了。因为蒙哥马利退役后就是一介平民，而蒙巴顿则还要受王室成员身份的约束。

在布罗德兰兹庄园里，他还频频向在任的海军首脑写信，把自认为“纯粹的天才”的亲信们一个个推荐到海军的各重要岗位，惹起过人家的反感。不过，他惹过的最大一次麻烦是在1968年，蒙巴顿被英国舆论认为，他要在伦敦发动一次军事政变。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

这年5月，蒙巴顿在新闻界的一位密友休·卡德利普来布罗德兰兹庄园做客，客人谈起了民族道德日益沦丧的问题，于是俩人试图找到一位有雄心和热情的人来重振国家的精神。蒙巴顿认为前社会事务大臣巴巴拉·卡斯尔是这样的人物。不久，卡德利普又把国际出版公司的主席塞西尔·金，以及索利·朱克曼也拉到庄园来，一起讨论如何“振兴国家精神”的问题。据说讨论时，金首先站起来严厉抨击工党政府的昏庸愚蠢，为工党勾勒出一幅难堪的画面：分崩离析的政权、大街上的流血和罢工闹事等。接着，金问蒙巴顿是否愿意在这样的情况下出面做全国政府的头面人物。蒙巴顿转身问朱克曼。朱克曼说：“这是一种谋反行为。我是一名社会公仆，决不干这种事情。你也不能干，德基！”之后，朱克曼离开了庄园，几分钟以后，金和卡德利普也带着蒙巴顿彬彬有礼而又坚决的拒绝而离去了。

可是后来金说，讨论是在蒙巴顿的要求下举行的，而且当他提出“某种有名望的人”需要出来领导全国联合政府的时候，蒙巴顿没有表现出对此不感兴趣的意思。

朱克曼也说：“事实上，德基确实对年让他做个‘政府’首脑的建议颇感兴趣。如果我当时不在场，德基也许真要有所表示。”

这件事被捅出去后，一时间舆论界纷纷传言，退役的海军元帅要发动一场军事政变。威尔逊首相的政治秘书福尔肯德夫人，在接受《星期日日报》的采访中，认为蒙巴顿伯爵是一项企图推翻政府的军事政变计划的主谋，还煞有介事地描绘说：“蒙巴顿在他庄园里的办公室墙上挂了一幅地图，上面显示着应该怎样行动。”而这些话被记者登在报纸上时更甚了一步，说那次庄园会晤已经讨论到如何进行军事行动，甚至地图上都已标明在哪里架设机关枪。

幸亏威尔逊首相认为蒙巴顿没有那种狂妄的野心，至少他认为随便闲

聊与真正的阴谋夺权是有着天壤之别的。这次风波暂时被平息了，但是它使公众中那些爱打探耸人听闻消息的人，有了这么个模糊的印象：即无风不起浪，至少蒙巴顿表现得不够慎重。

蒙巴顿退休后的另一件大事是，给自己立传。他对自己的文笔没有信心，又不想马马虎虎地对待这件事情，于是总想找个专门的传记作家为他提刀代笔。

早在 40 年代，就有许多传记作者找蒙巴顿，请求为他立传。那时，他选中了英国有名的作家福雷斯特。蒙巴顿写信对他说。“如果要写我的传记，我觉得我最乐意请你来写，因为你比我认识的其他作者更能捕捉到大海的灵魂。”不幸的是在蒙巴顿退休的第二年，给他立传的福雷斯特就先走进了天堂。蒙巴顿得再找一位作家为他写传。其实，他更愿意在他死后，再由人家来写。一则可以写出他完整的一生，二则他还活着，就得给执笔人做没完没了的介绍和解释，而且又得要人家相信，又得叙述得体。而实际上这种解释将不免夹杂着某种程度的自吹自擂。这样就会遭到人们的非议，说他过分强调个人的功苦。结果，在他生前，蒙巴顿个人的传记迟迟没有写出来。

但是，这并不说明蒙巴顿不愿意在历史上给自己留下一幅叱咤风云的肖像画。

他非常欣赏一本名为《黑夜中的自由之光》的书，这本书虽不是他的单独传记，但书的作者是以“他在印度的成功”为轴线来写的。他花钱从该书作者拉里·柯林斯和多米尼克·拉皮埃那里买了好多捆，赠送给所有的亲朋好友，甚至还送给女王一阅。他对亲朋们称：“这本书史实准备无误，每读起它，便把我带回了那令人惊心动魄的年代。这本书在美国、法国、西班牙、意大利畅销了 50 多万册，而在英国却没什么人买，好像这里的人们对我在印度的成就根本不理睬。”

与文字书籍相比，蒙巴顿更愿意通过银幕来展现自己过去的成绩。他一直喜欢看电影，并且在 20 多岁时就参加拍摄过英国第一部军事教育片，他认为把自己拍进电影里，影响的范围会更大，许多人不见得爱看书，但肯定会愿意舒舒服服地坐在影院里看电影。他退休后不久，著名导演兼制片人约翰·布拉伯思就找到了布罗德兰兹庄园，请他参加一部有关他生平的系列片拍摄工作。这正中他的心意，立即表示赞成。不过他提出要求说，他不仅要系列片里自扮自演蒙巴顿，而且还要参加系列片的导演工作，以免被别人捉弄。布拉伯思为难了一阵子，最终还是答应了他的要求。

自己演自己，这在当时还是一种大胆的尝试。并非专业演员出身的蒙巴顿，自然有时显得很蹩脚，吃了些苦头。在马尔他，有一段戏是反映蒙巴顿在英国地中海舰队司令部工作时情形的，其中一个镜头拍了 17 遍，最后导演才通过。在冷嗖嗖的海风中，被折腾了好几个小时的蒙巴顿却不感到受苦，为了使自己的银幕形象更完满，他对现场围观的人们说：“我听说就是超级影星，这种情况也会有的。”

由于拍摄的需要，蒙巴顿跟着剧组几乎跑遍了他工作过的所有地方。在那里，他见到了数不清的旧交故友。他重新踏上当年战斗过的土地，仿佛过去权倾一时的好时光又都回来了。然而现实却不是这样，当片子拍好后，代表英国政府负责审片工作的伯克·特伦德不仅要求审看电影，还要审阅每一集的剧本。蒙巴顿感到自己的尊严受到了侵犯，他拒绝说：“我相信你会同意这一点，一位前最高司令、总督、第一海务大臣和国防参谋长，是必须

被允许自己决定自己的问题、自己承担来自各方面的批判的。”

英国政府要求审查影片和剧本，并非是没有道理的。因为这部重点反映蒙巴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作用和业绩的系列片，虽说主角是他个人，但必然要涉及到许多国际问题。果然，这套片子放映后，法国人抱怨它歪曲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法国的形象；美国人指责它贬低了麦克阿瑟和史迪威。就连毫无疑问是侵略战争发动者的德国，也有人抗议这部影片“表现的导致二战爆发的事件不公正”。为了平息这些不满和抱怨，英国政府以及蒙巴顿本人，又不得不费了不少唇舌和笔墨去做解释工作。

应当说，这部名为《蒙巴顿伯爵生平纪实》的系列片是成功之作。它是经过精心写作和摄制的，其中包含有大量珍贵的历史照片和记录。它的构思很有趣味，但并不庸俗化。因为这部 12 小时的片子是自传体，所以许多重要人物的活动都集中在与剧中主要人物蒙巴顿有关的事情上，而其他与主人公无关的事情都被轻描淡写地一带而过。并且为了尽量减少招惹麻烦，许多蒙巴顿置身其中的复杂事件也被大大简化了。但是尽管这样，它在英国播映时，几乎所有的电视台还是不顾蒙巴顿本人的强烈抗议，把它安排在每天晚上 10 点 30 分以后映放下流色情节目的时间里播放。

由此也可以看出，英国官方对这部系列片持有的态度了。

当 1970 年的元旦钟声响彻英伦三岛的时候，正在布罗德兰兹庄园里跟家人一起吃团圆饭的蒙巴顿，突然对长女帕特里夏说：“我预感，我不会听到 1980 年的元旦钟声了。”

他的身体越来越衰老了。尽管他还不大服老，整天四处去忙忙碌碌，并且干了些净是费力不讨好的事情。这年 7 月，英国国会举行隆重而庄严的开幕仪式，70 岁的蒙巴顿被恩准手持国剑，侍卫伊丽莎白女王步入国会大厅。这是英国国会开幕式的传统仪式，手持那柄长而重的国剑的人，必须是为大英帝国立下过卓著功勋的人，这是一种荣誉。但是，手持者必须笔直地举着它，而且在女王发表冗长的讲话时，也必须纹丝不动。那一天十分炎热，为了拍电视，灯光把蒙巴顿照得雪亮。“突然，整个地面开始像浪潮一样向前奔涌，我知道自己要昏过去了。”诺福克公爵立即命人冲上去扶住他，而蒙巴顿则挣扎着，一直坚持到典礼结束。

转年的国会开幕式，他还想享受一下手持国剑的荣誉，但女王坚持要他做这次苦差事之前检查一下身体。蒙巴顿非常自信地做了检查，结果查出了心脏病。这样，手持国剑的荣誉转给了陆军退役元帅哈丁。“蒙巴顿伯爵先是感到失望，后来像一头豹子似的叫嚷道：‘哈丁比我更老，他都 80 岁了。你看，他长袍一抖一抖的，差点绊倒两次。我要告诉女王，如果我明年恢复了，还要重操旧业。’”其实，他知道他在自我解嘲。尽管他总是竭力挺直身躯，有时甚至用双肩顶住墙壁，不让人看出他的弯腰驼背，但他心里明白自己老了。

蒙巴顿开始偶尔设想一下葬礼方面的事情了。1971 年 9 月，张伯伦伯爵与他闲聊时，问他将来希望安葬在哪里，开始他选择了怀特岛，准备和父母安葬在一起，后来又觉得罗姆西更合适些。他问过国防部，一个陆军元帅的葬礼将规定多少人参加，然后又明知故问道：“过去真的有 2500 名海军将士参加了一位海军元帅的葬礼吗？”并且追问英国退役军人协会主席，这个组织在一位海军元帅的葬礼中将发挥什么作用。尽管人家对他的罗嗦有点儿厌烦了，但还是一次次地回答了他应享有的葬礼规格。

事实上，说着说着，死神便一步步地逼近了他，并且是以一种非常残忍的方式把他带进了天堂。

爱尔兰共和军是一个著名的恐怖组织，它自成立之日起，就以用暴力手段推翻“英国在北爱尔兰的殖民统治”为目标。由于它的这一目标，在爱尔兰人中有一定的影响，所以尽管英国政府多次动用军警力量去镇压和追捕，这个组织也一直没有被剿灭，70年代中期以后甚至还很活跃。他们的恐怖矛头首先是对准英国王室和英国高级军政官员。由于女王周围警卫森严，再说暗杀一国之元首必然会引起受害者举国上下的愤怒，因而共和军选中了蒙巴顿。蒙巴顿是英国王室中年纪最大的成员，并经常以王室的代理人自居，铲掉他，同样可以起到打击英国王室、震动整个英伦之目的。

1978年，蒙巴顿就感到自己处在危险之中。这一年，他的德国远房子、住在黑森州卡塞尔的莫里茨王子遭到共和军的绑架。虽然交完赎金被很快释放，但绑架者要莫里茨王子转告他的叔叔，共和军的主要目标就是蒙巴顿。

政府派给蒙巴顿的保镖总共有28名，他们日夜守卫在布罗德兰兹庄园。警方要求，蒙巴顿晚上睡觉时一定要锁上房间，并且在身边装上通往男管家和保镖卧室的警铃。蒙巴顿一一照办了。而遭到过一次绑架的莫里茨王子认为这还不够，告诉叔叔最好的做法是每晚睡觉时带上一支散弹猎枪，那要比左轮手枪的火力猛烈的多。

蒙巴顿也照办了，每天都拖着支装满子弹的猎枪爬上床睡觉。不过，他认为从道理上讲，自己不应当是共和军暗杀的对象。他这时只是偶尔与一些学校和慈善机构打交道，而不是国防大事或爱尔兰问题，凭什么理由对方要绑架或杀死一位年近80岁的老头呢？

1979年8月27日上午11点半左右，蒙巴顿在马勒莫小码头登上了“阴影V”号，这是一条29英尺长的由渔船改装的游艇。一同上船的有布拉伯恩公爵一家：公爵的老母亲、夫人和一对14岁的双胞胎儿子。蒙巴顿的长女帕特里夏和她的丈夫约翰，为了照顾老父亲也登上了游艇。蒙巴顿还特意邀请了一位爱尔兰小男孩，跟他一起往大海里玩玩。

当游艇离开码头后，便开始加大油门向大海深处驶去。蒙巴顿穿着一件短袖汗衫，上面印着“战斗第五”的字样，这是他为纪念那艘心爱的“凯利”号驱逐舰沉没而专门请人印制的，穿着它，可以使他经常想起那次罹难的老部下，感到自己还跟“凯利”号水兵们在一起。不过，他这身打扮是家里人从未见过的，是不是它预示着什么？

他们这次来海上的目的之一是逮龙虾。前几天，他们曾在海里投放了一些陷网，这次要去看看网里面钻进去了多少。当“阴影V”号接近第一张陷网，正要关掉发动机时，只听“轰”的一声巨响，被共和军偷偷安放在游艇里的炸弹爆炸了。整条船立刻被炸成了几截。布拉伯恩公爵一家，只活下来一个孩子；帕特里夏和她的丈夫被从水中捞起后，浑身血污，两人的腿都被炸断了。那个爱尔兰小男孩也被当场炸死。蒙巴顿的尸体漂泊在几码远的水中，他的脸部朝下，四肢居然还很完整。

他死于一瞬间的爆炸中，这种死亡方式虽然残忍，但却事先没有恐惧、没有悔恨，并且又是在他最喜爱的人的陪同下，在他最热爱和迷恋的大海里死去的。这或许是一位海军元帅的理想归宿方式。这一年，蒙巴顿刚好79岁。

暗杀成功后，爱尔兰共和军的恐怖分子随即给伦敦的几家大报寄去了一份声明，宣称：“这一举动就是要引起英国人民的注意，只要他们仍然占领着我们的国土，我们就要撕碎他们的帝国主义的心脏……”

与此同时，整个英国悲恸了。伊丽莎白女王和菲利普亲王，以抽噎的啜泣声来表达对他们叔父惨遭杀害的悲痛；英国政府拿出巨额悬赏，发誓要捉获凶手。欧洲各国所有在位或不在位的王室，都对他们失去了这位德高望重的代表和纠纷调解人而备感凄凉。世界各国的几乎所有报纸都在显要位置上，登载了蒙巴顿被暗杀的消息。在他率师征战过的缅甸，仰光的英国大使馆里，一本厚厚的簿子打开着供人们签字献辞。连续4天，前来吊唁签字的人们排着长队站在大使馆前，有时队伍像一队长龙一直排到花园里。在印度，尽管“蒙巴顿方案”遗留下缺憾和纠纷，但印度人民还是记得这位在他们国家独立时奔波忙碌的英国人。印度政府宣布举国哀悼一周，首都的许多娱乐场所都停止了营业。各大国的领导人和尚健在的盟军将领们纷纷发来唁电，表示哀悼之情。

蒙巴顿的葬礼是隆重的。正像他生前所要求的那样，参加葬礼的大多数人是英国陆海空三军将士，其中又以皇家海军的阵容最为庞大和醒目。在女王仪仗队打响的隆隆礼炮声中，载着他遗体的灵车缓缓驶进了墓地。正是：
贡献毕生留英名，不幸罹难世人惊；
自古英雄多建树，功过是非后人评。

蒙巴顿年表

1900年6月25日 蒙巴顿生于英国温莎的王室家庭。曾祖母英国女王维多利亚。父

亲巴登堡亲王路易斯，原系德国王室成员，后放弃德国国籍，参加英国皇家海军，曾任海军参谋长兼第一海务大臣。母亲为赫茜·维多利亚公主。

1913年9月 13岁的蒙巴顿入奥斯本皇家海军学校学习。次年10月，其父因原籍为德

国，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和英德宣战后，被迫辞去在英国海军中的职务。

1914年末 因达特茅斯皇家海军学院的高年级学员提前毕业参战，蒙巴顿和他的海校同学转入该院学习。

1916年初 蒙巴顿以优异成绩从达特茅斯海军学院毕业，先赴“雄狮”号战列巡洋

舰上见习，后至“伊丽莎白女王”号战列舰任职。

1919年 蒙巴顿奉命进入剑桥大学切斯特学院补习大学课程。他是学生会辩论委员

会委员，曾在辩论比赛中领导剑桥大学队力克牛津大学队，以能言善

辩蜚

声全校。

1920年3月 晋升为海军上尉，随即陪同威尔士王子出访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地，

并利用出访机会组织拍摄出英国第一部军事教育片。

1922年7月 与富家小姐埃德维娜·阿什莱结婚。

1923年1月 赴“复仇”号战列舰任职。1924年 奉命前往朴茨茅斯皇家海军通讯

学校学习。

1925年 进入格林尼治皇家海军学院深造。结业后，任地中海舰队通讯军官。

1932年 晋升为海军中校，并于两年后担任“勇敢”号驱逐舰舰长。

1936年 调往海军部工作。次年，晋升为海军上校。

1938年 被送往奥尔肖特高级指挥官学习班深造，结识了后来在战争时期与之合作

的许多将领。

1939年8月 担任“凯利”号驱逐舰舰长。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蒙巴顿率该舰

多次参加战斗；1941年5月，该舰被德军飞机击沉。

1941年10月 被任命为联合作战总部负责人，筹划两栖登陆作战。

1942年3月 被授予海军中将的战时军衔，并获得陆军和空军的荣誉中将军衔。同

年8月，指挥对法国西北部迪耶普港的登陆作战，但遭失败。

1943年8月 美英首脑在加拿大魁北克举行会议，决定组建东南亚盟军司令部，由

蒙巴顿出任最高司令。10月，蒙巴顿前往印度德里上任。

1944年3月至7月 指挥英印军队取得英帕尔战役的胜利。

1945年初 指挥盟军开始反攻缅甸，经过曼德勒、敏铁拉等激战，于5月初收复仰

光。9月，在新加坡接受东南亚日军投降。

1946年6月 返回英国，获英王授予的“缅甸蒙巴顿伯爵”称号。

1947年3月至 出任印度总督。任内提出关于次大陆独立 1948年6月的“蒙巴顿方案”，该方案导致印巴分治和长期纷争。

1948年10月 出任英国地中海舰队第1巡洋舰队司令。

1950年6月 调任海军部第四海务大臣，负责海军的补给后勤工作。

1952年5月 出任地中海舰队总司令。

1953年2月 晋升为正式的海军上将。

1955年3月 出任皇军海军参谋长兼第一海务大臣。

1959年5月 麦克米伦首相任命蒙巴顿为国防参谋长。

1960年2月 夫人埃德维娜病逝。1965年6月 退出现役，返回汉普郡布罗德兰兹庄

园居住。

1966年1月 代表英国女王参加印度总理夏斯特里的葬礼。

1970年10月 在美国《时代》杂志上发表文章，反对制造和部署战术

核武器。

1973年9月 代表英国女王参加瑞典国王古斯塔夫的葬礼。

1974年 访问中国。

1975年 访问苏联。

1979年8月27日 在“阴影 V”号游船上被爱尔兰共和军放置的炸弹炸死。终年79岁。

